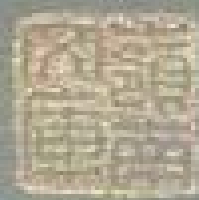


司徒尚紀著

廣東文化地理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013786

司徒尚紀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廣東文化地理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

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文化委員會

合編



粤新登字 01 号

广东文化地理

司徒尚纪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杰电脑排版有限公司排版

韶关市金启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125 印张 273,000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4,000册

ISBN 7—218—00981—6/K·225

定价: 平装 11.30元, 精装 17.50元

DI 65/34
岭南文库

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选平 卢钟鹤 任仲夷 陈越平
林 若 杨应彬 杨资元 黄文俞
谢 非

编委会 (按姓氏笔划为序):

主 编: 黄 浩

副 主 编: 刘斯奋 岑 桑 (执行) 萧如川

编 委: 庄 昭 刘扳盛 刘斯奋 朱仲南
李权时 岑 桑 张 磊 陈俊年
陈胜彝 洪志军 胡守为 饶芃子
梁 钊 黄 浩 萧如川 曾牧野
曾宪志 廖晓勉 颜泽贤

“岭南文库”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 19 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

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争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岭南文库”书目为 350 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

序 言

文化地理是人类地理学一个分支,今天各国文化人类学书籍中多辟有专章讨论文化区域问题。亡友梁钊韬与其弟子陈启新合编新著《文化人类学》(1991)即为一例。地理学者研究文化地理则始于19世纪,如德国拉采尔(F·Ratzel)及其学生(如L·Frobenius)即对文化地理及文化区域企图作定量研究。在我国则由一些历史学者和地理学者进行,如本人老师朱谦之即曾作“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说”研究,地理学者多视为人文地理一个分支,但研究者不多。因受当时人地关系论影响,即国际上把人类地理学改为人文地理学,因拉采尔的学说被批判为“地理环境决定论”,故国际地理学会于第一次大战后的1928年在剑桥十二届大会上取消了人类地理学组,改称为人文地理学组,这反映了西方地理学仍在幼稚阶段。把拉采尔提出的人类地理学取消,也反映了英、美、法地理学者对德国学者的偏见。1980年初中中国地理学会在广州开会时,李旭旦教授在我家谈论

时曾表达过此意。当时李旭旦谈及建国以来人文地理学被废弃,很是可惜。他立誓在新中国开放改革过程中将其重新建立起来,以南京师大为起点,希望我们在南方支持他。长者所嘱,自当遵从。他还嘱咐可在1983年全国人文地理学术会议上据此意撰文发表,即后来本人在会上交流的《人类地理学的范围内容》一文。该文指出:“拉采尔‘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国际学术界一大冤案。”人文地理学因此而对人种、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不予重视,今后对这些部门应加强研究。当时会上有的学者还指出,文化地理等学科的研究在我国基本上还是个空白,应予重视。可见今天我国地理学者和人类学者已有共同的想法。自该会议以后,文化地理知识介绍即不断出现于《地理知识》等刊物上,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83年),设《文化地理》专栏(1989年)。专门文章亦有不少,本人即在《海南资源环境与经济开发战略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发表《海南黎族文化地理研究》(1989年),不负长者之嘱咐也。

本世纪90年代为我国文化地理发展时期。1983年会议倡导于前,学人努力于后,经多年累积不少资料,完成不少文章。故1990年后,文化地理专著即不断发表和出版,如原理性著作,有王恩涌教授的《文化地理学》,由高教出版社印行;中国文化地理专著,有赵世瑜、周尚义合著的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印行的《中国文化地理概论》;从历史时期进行分析我国文化地理的专著,则有马正林教授审定的卢云博士撰的《汉晋文化地理》;地区性文化地理专著,目前唯本书耳。

本书为论述广东省文化地理著作,就本人所知,乃我国第

一本区域文化地理研究著作。作者司徒尚纪博士为徐俊鸣、侯仁之教授高足，著述多种，其文章能博取用宏，纳诸家之言。余观中山大学地理系诸子，著述文章，司徒君恐为成果最多一位，可见其勤奋好学，有过人者。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所提项目，给予资助，使其能完成我国首次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今日杀青，洋洋洒洒，凡三十万言，诚不负国家期望也。在文化地理学言之，则又较全国性概论者深入一层，是为可喜。如余曾在《杨成志与中国民俗学》一文中，只能概述中国东部地区，大致可分为三大文化地理区，即一为蒙古草原游牧文化地理区，二为华夏季风农业文化地理区，三为岭南热带海洋文化地理区。而岭南文化区特征，余在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祝辞中，略加提说，以为是：“炎黄文化，众流所宗，岭南亲海，热带民风”，即海洋性和热带性为岭南文化区之特点，今观司徒君巨著，其思路亦与余相同。

本书分出十章，首述广东文化形成因素，亦谈及热带性特征，与诸夏环境有别；第二章详细从历史时代文化特征予以分析，多种文化的传入和融合，即余所谓“炎黄文化，众流所宗”者也；第三章谈农业土地利用，乃司徒君研究最有心得部分；第四章谈广东聚落；第五章谈方言；第六章谈风俗，各尽其详。予尝为《佛山市风俗志》作序，提出风俗地理学研究，应重视风俗之形成，提出谓：“风俗之形成，一为地理环境影响，二为社会环境影响。风俗起于地理，而成于人文。”论点亦与司徒君相近矣。第七章谈宗教，第八章谈地名，第九章谈人才，最后以文化区划为总结。计全书十章囊括文化地理学之主要内容，亦

表明作者对文化地理学学科体系的思想,是亦本书为文化地理学创一良好体系,使后来者有所参考也。

全书引用大量文献,旁征博引,在大洋文献中,淘沙选金,工作量可谓大矣,非三年不能成也。综观全书,行文流畅,质量上乘,拜读之下,尽合予之心意,故乐为之序。

曾昭璇

1992年10月5日 于华南师大寓所

前 言

位处祖国南疆的广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横亘广东北部之南岭山地,不仅是一条自然地带分界线,也是一条文化类型分界线。孕育、发生、成长于这条界线以南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广东文化或称岭南文化,具有许多异于岭北的文化特质。它是当地南越文化为底本,与中原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外来各种文化长期交流,整合而成的一种区域文化或者亚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也是我国文化区划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广东文化源远流长,结构复杂,内涵丰富,自成格局。广东文化景观,从古代到近现代都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在全国独树一帜。广东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向外扩散,到了近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还以高位势能、崭新姿态辐射全国,在某些新兴文化领域,还处于全国前列,令世人刮目相看。所以,继承和弘扬广东文化优良传统,对社会经济文化

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长期以来,对广东文化这样一种很有地方特点和影响的区域文化,国内外学者研究并不多。而从文化地理角度进行研究,更是无人问津。这是广东人文地理研究中的一个薄弱领域。即使在当前风靡全国的“文化热”中,这股热潮也未能引入广东文化地理这个领域。它所注意的焦点,主要是普通或专门文化史以及某一文化现象,极少顾及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特别是岭南这个过去被人忽视或遗忘的角落。这都是与广东文化在全国地位和影响不相称的,远远未能满足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文化地理提出的各种要求。这不能不使人汗颜和不安,也是笔者选择这一研究的一个动因。

另外,文化地理在我国,虽然也像整个人文地理学一样,有很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但长期得不到应有重视。有关研究比起欧美甚至港台都要落后。实际上,一切经济成果,无不凝结着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在内。文化地理现象和规律讲不清楚,也就无法从本质上或深层结构去认识、理解经济地理或其他人文地理现象。近年人文地理学在我国的复兴,为区域文化地理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笔者选择了广东这个具有极显著文化特点的区域作为研究对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历经两年多的研究而撰写成这本著作。

文化的内涵很丰富和广泛,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多元的大系统;文化又是历史的投影,是时间积淀的结果。也就是说,文化是历

史发展的产物,它不是短时期内出现的,而是人类世代劳动的结晶,有其历史的阶段性、连续性和继承性,这就决定了文化不可能割断历史。文化地理学所研究的,不仅是现代文化地理这样一个很薄的层面,还包括历史文化地理的各个层次。这就决定了必须采用地理演进的研究方法,即在纵向上,研究广东文化创造的因素和过程,包括它的起源、变异、演进和扩散,在各阶段的特点和规律,并展示它发展所经历的一系列时代剖面,使人们从中看到各种文化现象或景观的时间透视;而在横向上,则探求文化各因素及其组合在各断代地域分布上的状况,分析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差异和联系。这种纵横或经纬结合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广东区域文化本质特征的认识。当然这仅是一种尝试。文化地理除了研究文化过程,重点还在于研究文化景观,即人类依托自然背景所创造的各种人文现象,也就是被改造了的自然景观,包括各种可视或可悟的文化景观。在这里主要指广东农业土地利用格局、聚落和建筑文化、方言、风俗、宗教、地名、人才等。对每种文化景观,尽可能追溯其渊源、演变、现状特点与地域分布规律。最后,各种文化景观及其组合,都归结于区域,即划分文化区。这既是文化地理一种有内在逻辑的研究手段和描述与分析形式,也是这种研究的必然结果。借助于文化区,才能区别文化空间类型,窥见广东文化在各地域的个性、差异和联系,以及空间转化、分异的规律。

有必要说明的还有,为了保持广东文化历史的连续性和便于使用历史资料以及统计数字,这里所称广东,仍包括海南

岛。本书资料,数字下限到1991年,把建省后的海南部分统计数字仍归入广东范围,以利于前后对比。另外,这里所称岭南文化,一般是指按文化特质划分的区域文化类型,如同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等区域文化类型一样;而广东文化,则指岭南文化在广东的地域分布,即其赖以存在的地域或空间。因为岭南这一地理概念,虽然主要指广东,实际上还包括广西一部分。可是在习惯上,岭南文化与广东文化经常相互混用,没有严格区别,视实际需要而定。

本项研究涉及到一个比较大的地理区域,时间上下几千年,文化范围很宽广,课题内容复杂,又是在没有先例可援的情况下完成的,加之笔者个人能力所限,其中错谬或可议之处一定很多,恳望有关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是所欣幸。

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我的导师、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热情鼓励,华南师范大学曾昭璇教授始终给予很大支持,并在百忙中为本书写了序言。此外,中山大学张寿琪教授、容观琼教授,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刘耀荃研究员等也提供不少帮助,中山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韩秋滨女士为本书清绘地图,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给本项研究以资助,特致感激之忱。

司徒尚纪

1992年10月于中山大学

目 录

| | | |
|-------------------------------|-----|-----------|
| 序言 | 曾昭璇 | 1 |
| 前言 | | 1 |
| 第一章 广东文化形成因素 | | 1 |
| 一、地域条件 | | 1 |
| 二、环境感应 | | 5 |
| 三、政治制度和行政建置 | | 7 |
| 四、民族和人口迁移 | | 10 |
| 五、技术进步 | | 12 |
| 六、经济规律 | | 14 |
| 七、心理素质 | | 16 |
| 八、历史积累 | | 19 |
| 第二章 广东文化起源、发展和传播 | | 22 |
| 第一节 先秦岭南原始文化 | | 22 |
| 一、南越文化起源 | | 23 |
| 二、南越文化特质 | | 25 |
| 三、外来文化对南越文化的影响 | | 27 |
| 第二节 秦汉六朝汉文化在岭南传播 | | 32 |

| | |
|----------------------------|-----------|
| 一、秦有组织的汉文化输入 | 33 |
| 二、汉文化在南越国扎根生长 | 34 |
| 三、六朝移民高潮带来汉文化传播转机 | 37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岭南文化持续不平衡发展 | 39 |
| 一、汉俚文化融合深化 | 39 |
| 二、开疆文化的贡献 | 40 |
| 三、海外文化移入 | 41 |
| 四、文化发展反差 | 42 |
| 五、南汉文化建树 | 44 |
| 第四节 宋元汉文化成为岭南文化主体 | 45 |
| 一、两宋移民高潮与三大民系形成 | 45 |
| 二、少数民族汉化及其传统文化区形成 | 47 |
| 三、农业土地利用改观的文化意义 | 49 |
| 四、城镇建筑文化走向成熟 | 50 |
| 五、文教肇兴和流寓人物对传播汉文化的贡献 | 51 |
| 第五节 明清岭南文化原型建立和勃兴 | 53 |
| 一、土地利用景观基本定型 | 53 |
| 二、花繁果硕手工业文化意义 | 54 |
| 三、城镇勃兴和建筑高潮带来文化巨变 | 56 |
| 四、西方文化滥觞 | 58 |
| 五、丰富多采的学术文化 | 60 |
| 第六节 近现代岭南文化的蜕变与新生 | 61 |
| 一、传统农业土地利用改组 | 62 |
| 二、近代工业文明建立 | 63 |

| | |
|---------------------------------|------------|
| 三、城镇文化景观的革新····· | 64 |
| 四、新制度和观念文化兴起····· | 65 |
| 五、华侨文化形成和参与····· | 67 |
| 六、近代岭南文化对外传播····· | 68 |
| 七、现代振兴和转捩点上的岭南文化····· | 70 |
| 第三章 农业土地利用景观与分布 ····· | 76 |
| 第一节 稻作文化景观与分布 ····· | 77 |
| 一、稻作文化在岭南发生和演变····· | 77 |
| 二、稻作文化地域分布····· | 81 |
| 三、稻作文化主要景观类型····· | 82 |
| 第二节 旱作文化景观与分布 ····· | 96 |
| 一、薯类的传播和分布····· | 96 |
| 二、小麦引种····· | 98 |
| 三、其他旱作引种和推广····· | 99 |
| 第三节 经济作物文化景观及其地域组合 ····· | 101 |
| 一、糖蔗文化景观及其类型分布····· | 101 |
| 二、以桑基为中心的基塘文化景观····· | 105 |
| 三、果园文化地位与景观分布····· | 108 |
| 四、茶园与山区土地利用····· | 112 |
| 五、城郊园艺文化景观····· | 114 |
| 第四节 热带作物园景观 ····· | 116 |
| 一、本土热带作物园景观····· | 116 |
| 二、外来热带作物园景观····· | 118 |
| 第五节 生态农业兴起 ····· | 122 |

| | |
|---|-----|
| 第四章 聚落与文化景观 | 130 |
| 第一节 农业聚落类型及其文化景观 | 130 |
| 一、农业聚落地域分布及其布局形态 | 130 |
| 二、农业聚落文化景观 | 135 |
| 第二节 城镇聚落分布及其文化景观 | 151 |
| 一、城镇聚落类型与分布 | 151 |
| 二、城镇聚落文化景观 | 157 |
| 第三节 城市聚落分布及其文化景观 | 159 |
| 一、城市聚落分布与类型 | 160 |
| 二、城市聚落文化景观 | 161 |
| 第五章 方言地理分布与文化景观 | 172 |
| 第一节 方言区形成的历史空间过程 | 172 |
| 一、墨渍式移民与粤语方言区的形成 | 173 |
| 二、板块转移式和闭锁式移民与客家、闽南以及少数民族 方言区的形成 | 175 |
| 三、杂居式移民与交错型方言区的形成 | 179 |
| 第二节 方言的地区分布和景观 | 180 |
| 一、粤语方言的分布及其文化景观 | 181 |
| 二、客家方言的分布及其文化景观 | 185 |
| 三、闽南方言的分布及其文化景观 | 188 |
| 四、汉语其他方言的分布及其文化景观 | 191 |
| 五、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及其文化景观 | 195 |
| 六、方言的相互影响和景观扩散 | 197 |
| 第六章 风俗文化景观与群落 | 201 |

| | |
|-------------------------|------------|
| 第一节 汉区民俗文化景观 | 202 |
| 一、岁时风俗 | 202 |
| 二、婚嫁风俗 | 216 |
| 三、丧葬风俗 | 222 |
| 四、饮食风俗 | 229 |
| 五、乐俗文化 | 236 |
| 第二节 汉区民俗文化群落 | 246 |
| 一、广府民俗文化群落 | 247 |
| 二、客家民俗文化群落 | 252 |
| 三、福佬民俗文化群落 | 254 |
| 第三节 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群落 | 257 |
| 一、黎族民俗文化群落 | 257 |
| 二、苗族民俗文化群落 | 260 |
| 三、瑶族民俗文化群落 | 261 |
| 四、壮族民俗文化群落 | 264 |
| 五、畲族民俗文化群落 | 265 |
| 六、回族民俗文化群落 | 267 |
| 第七章 宗教文化景观与地理分布 | 272 |
| 第一节 佛教文化景观与分布 | 273 |
| 一、佛教在广东的历史传播 | 273 |
| 二、佛教群体分布 | 277 |
| 三、佛教建筑文化景观 | 278 |
| 四、佛教寺院音乐 | 283 |
| 第二节 道教文化景观与分布 | 284 |

| | |
|---------------------------------|------------|
| 一、道教在广东神仙系统及其历史分布 | 285 |
| 二、道教主要文化景观与分布 | 290 |
| 第三节 儒教文化景观与分布 | 294 |
| 一、儒教建筑文化景观 | 294 |
| 二、儒教文化景观分布 | 297 |
| 第四节 伊斯兰教文化景观与分布 | 299 |
| 一、伊斯兰教文化在广东的传播 | 300 |
| 二、伊斯兰教文化景观 | 302 |
| 第五节 天主教和基督教文化景观与分布 | 306 |
| 一、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广东扩布 | 306 |
| 二、天主教和基督教分布格局与文化景观 | 310 |
| 第八章 地名文化探源 | 317 |
| 第一节 广东历史政区地理与地名 | 317 |
| 第二节 移民与地名 | 324 |
| 第三节 民族地理与地名 | 329 |
| 一、表示自然地理的壮语地名 | 330 |
| 二、表示人文地理的壮语地名 | 333 |
| 第四节 图腾文化与地名 | 342 |
| 第五节 历史经济地理与地名 | 347 |
| 第六节 从文化层次参证地名结构 | 353 |
| 第九章 人才的产生、分布和流动 | 361 |
| 第一节 人才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动因 | 361 |
| 第二节 人才的区域分布 | 368 |
| 第三节 人才在广东的流动和走向 | 374 |

| | |
|-------------------------------|------------|
| 第十章 文化区划 | 379 |
| 第一节 区划的基本原则及区划体系 | 379 |
| 第二节 文化区划分论 | 381 |
| 一、粤中广府文化区(Ⅰ) | 381 |
| Ⅰ—1 珠江三角洲广府文化核心区 | 382 |
| Ⅰ—2 西江广府文化亚区 | 390 |
| Ⅰ—3 高阳广府文化亚区 | 392 |
| 二、粤东福佬文化区(Ⅱ) | 394 |
| Ⅱ—1 潮汕福佬文化核心区 | 394 |
| Ⅱ—2 汕尾福佬文化亚区 | 397 |
| 三、粤东北—粤北客家文化区(Ⅲ) | 399 |
| Ⅲ—1 梅州客家文化核心区 | 399 |
| Ⅲ—2 东江客家文化亚区 | 404 |
| Ⅲ—3 粤北客家文化亚区 | 406 |
| 四、琼雷汉黎苗文化区(Ⅳ) | 410 |
| Ⅳ—1 琼雷汉文化亚区 | 411 |
| Ⅳ—2 五指山黎苗文化亚区 | 414 |
| 附录 | 419 |

第一章 广东文化形成因素

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体系,是由多种多样的因素长期作用形成的。它们包括了自然、政治、历史、技术、经济、心理等因素。而丰富多采的广东文化,恰是它们相互联系、渗透和结合的产物。

一、地域条件

地域条件指地理区位和地理环境,乃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基础,更是广东文化形成的特殊背景和条件。

广东地处我国南疆,北枕五岭,南濒大海,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这造成它既封闭又开放的地理区位,极利于孕育和发展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体系。

横亘广东北部的五岭山地,在交通落后的古代,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巨大屏障,极大地限制了古代广

东与中原的沟通。唐代以前,中原人对岭南基本上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斥之为“蛮荒”、“徼外”之地。同样地,岭南人也难以跨越五岭进入中原,对那里的经济文化了解更少。虽然五岭间有许多通道可以相互往来,而且事实上两地居民很早就假道它们彼此交往,在文化上产生过一定作用,但这并不能改变历史的隔膜状态。另外,广东大部分疆域被海洋包围,使它与大洋彼岸世界隔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又增加了自己的封闭性。结果“朝廷以羁縻视之,而广东亦若自外于中国,故就国史上观察广东,则鸡肋而已”^[1]。由此形成岭南人的独特生活习俗和语言,并保持多种社会经济文化形态及其缓慢发展的过程。

但是,广东又恰处在我国南海航运枢纽位置上。生活在岭南的古越人很早就驱驰于这片广阔的海洋,随着航海、造船等技术进步,岭南人又不断假道海洋,迈出国门,走向世界,走上与世界各地交往的道路,从而不断削弱自己的封闭性,增加开放性,并最终使海洋给广东带来无限开放的优势和生机。特别是到了近现代,海洋成为广东对外开放的主要通道,得海外风气之先。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广东人,正是依靠这种优势,从多方而接受先进文化的熏陶,创造出以中原汉文化为核心,又融合着南越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和海外多种民族文化的广东文化,或称岭南文化,并以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彪炳于中华民族文化史册,对人类文化也产生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临海位置更成为它接受世界经济重心东移所带来的文化观念辐射的优势,由此诱发了文化观念更新,

新文化意识勃兴的热潮,并产生许多新文化景观。地理区位作为一种历史范畴,对现代广东文化的作用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广东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尤其在历史早期,地理环境的作用是各种格局的文化类型得以产生的基础。

广东跨中亚热带、南亚热带、热带和赤道带,加上地形影响,又兼具了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等垂直地带性特点,形成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复杂的地理景观。水、土、光、热和生物资源极其丰富,为人类驯化生物品种,捕捞水产,创造丰富物质文明提供强大后备基地。所以古人说广东物产,“兼中外之所产,备南北之所有”^[2]。但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岭南自然环境又是恶劣的,即中原人谈之色变的所谓“瘴疠病毒”。淮南王刘安谏汉武帝远征岭南说:“南方暑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蠹生,疾病多作,兵未刃血,而病死者十之二三。”唐韩愈贬潮州上表曰:“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文献通考》谓宋绍圣年间,臣僚说广东一路十四州,以英德府烟瘴最甚,有“人间地狱”之称。这样的地理环境,外来人难以久居,土著文化只有混合于外来文化,而没有被外来文化消灭。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之下,为了生存,人们被迫与大自然进行顽强的斗争,逐渐认识了这里的自然规律,不但改造了自然,也发展了自己,使岭南文化内涵不断向纵深扩展,创造出五彩缤纷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例如为了防避烟瘴和毒虫野兽侵袭,古人多架本为巢,形成栅或干栏式建筑。岭南

有些房屋，“任其淋漓”和“日光穿漏”，缘故在于“地暖利在通风，不利堙湿”³，此为地理环境影响居俗之一斑。人们饮食服饰文化也受环境影响。岭南人多嗜食槟榔，是为了“辟瘴，下气，消食。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⁴；岭南普通百姓，衣着简便，赤足跣行，与湿热气候不无关系。此外，环境还影响到民情风俗，如某些地区过去盛行一夫多妻制，原因是：“南方盛热，不宜男子，特宜妇人。”⁵女子多于男子，为实行这种婚俗提供可能。

岭南与我国南方和同纬其他地区的地理环境又有其相近之处，是产生相似文化的重要条件。因为民族迁移一般多选择与故地相近的地理环境，故岭南文化能够吸收邻近地域文化作为自己的构件；相反，文化传播也往往在双方地理环境大致相似的情况下发生，岭南文化在建立的同时，不断向海内外辐射，并为对方吸收，这正是以自然条件大致相近为基础的。

广东境内，北为山地丘陵，中部为河网密布冲积平原和三角洲，南临大海。这三种不同地理环境，使这里的初民一开始就创造出三种亚文化并存的态势，奠定了文化区域差异的基础。北部山区，“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当地居民“强悍、好勇斗狠”⁶。中部冲积平原，既利于农耕和稻作文化发生，又因其居于沿海和山区过渡交汇之处，易于成为交易之所，故其“人多务贾与时逐”⁷，渐渐形成商业文化的优势。至于沿海地区“广为水国，人多以舟楫为食”，“逐海洋之利”，其人“身御灵风”，“习海竞渡角旺”⁸，“粤东滨海地区，耕三渔七”⁹、大海的波涛造就了当地居民敢于冒险勇于向外开拓的进取精

神,成为他们海洋文化的本质特征。当然,也由于某些地区长期封闭,地区文化发展很不平衡,故清初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说:“粤东(即广东)人才最盛,正以僻处岭海,不为中原江左习气熏染,故尚存古风耳。”但无论是山地文化、商业文化还是海洋文化,都有一个共同地方,即勇于面对自然环境和机会的挑战,具有敢于开拓和勇于承担风险的决心和本领,渐渐养成岭南人“其不性并轻悍,易兴逆节”¹⁰的社会文化特质。总之,地理环境直接赋予各个类型文化以不同色彩,并形成岭南大异于岭北地区的文化景观。

二、环境感应

人类创造文化的行为是以环境感应为基础的,即人与环境之间的结合,文化才得以发生。一方面,环境为人类生存活动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人类必须根据自己生理、精神和对事业追求的需要与自然景观、文化景观乃至区域发展相互感应,继而创造出不同层次和风格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与环境的这种感应关系,以及两者的结合和统一,反映了一个区域文化发展过程和本质特征。

岭南古代森林密布,瘴疠袭人,环境恶劣。岭南人为适应这种环境,除了住干栏、食槟榔以外,还砍伐森林,驱除瘴气,在山坡台地上刀耕火种,在水边低地火耕水耨,建立稻作文化;在河网海滨者则断发文身,捕捞水产;在山岗森林者则狩猎为生,创造了自成一格的南越文化。

秦汉以降,汉文化更多地传入岭南,但也经历了一个变异和整合发展过程,才演变成岭南文化主体。这包括中原移民必须选择适应岭南地理环境的文化模式,并建立相应文化景观,例如从以种植麦、稷为主的旱作文化转到以稻、薯类为主的稻作或梯田文化,由此产生土地利用方式和食物结构的变化;为了避免与土著居民矛盾,减少冲突,中原移民自成社区,聚族而居,尽可能保持自己的固有文化,但又不能割断与环境及土著文化的联系,在这种矛盾作用下,形成兼具两者特色的混合型文化风貌。这以客家文化至为典型。客家人特有的建筑、语言和精神文化,无不是进入岭南山区以后与环境相互感应的产物。

宋元以来,人居岭南汉人大量增加,开发沿江平原低地成为解决人口对粮食需求主要方式,围田和基塘文化应运而生,成为粤中地区新文化景观。当人们最基本的生理要求得到满足以后,利用海洋,发展商业贸易,追求金钱和财富的欲望膨胀滋长,商业文化和海洋文化在广东沿海地区兴起,城镇和市井文化随之发展起来;迨到近代,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在广东日益尖锐,迫使部分人口出走,而东南亚和香港等地开发需要大批劳动力,吸引大批人口出洋,华侨文化作为一个文化类型出现,其景观遍于广东侨乡;近年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崛起,区域发展成为文化发展动因,迅速改变广东的文化景观。

从文化也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来看,岭南在不同时期的自然和社会人文环境,无不决定各个文化群体对它们

的反应和评价的态度,也由此决定对它们利用和改造的选择、决策和效果不同,产生文化风貌大不一样。例如岭南经常发生各种自然灾害,但当地人习以为常,并采取很多办法对付它们,形成许多异于外地的文化景观。岭南屋檐倾角很大,利于雨水倾泻;以灰泥粘紧屋瓦,不致被风掀揭刮走;建造坚固高大石坝,抵御洪水对田园、城镇侵袭;广泛采用矮脚稻种和茎干坚韧的蔗种,减少风灾带来的损失;开垦层层梯田,减少土壤侵蚀;在城市街道两旁建造骑楼,抵御夏季强烈阳光和骤雨;利用地形差异种植橡胶,减少台风可能造成的危害;在沿海或大河受洪水威胁的地区,人们建筑简陋木屋,下系小舟,随时可以逃命。这些景观,外地难以看到。无论从上述文化发展过程还是现存景观中,都可说明环境感应是岭南文化产生和景观新陈代谢的一种支配力量。

三、政治制度和行政建置

政治制度也是文化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一个区域的政权形式、职能及其与邻近地区相互作用的方式,都属不同层次的政治行为,对该地区文化形成以重大影响。

岭南开发较晚,政治上远远落后于中原,且盛行多元政治制度,产生相对独立政治格局,利于保留和形成地方文化风格。虽然秦汉已在岭南建立封建制度,但南越人氏族制仍被保存下来,直到唐代岭南仍盛行奴隶买卖制度,冯冼家族成为广东南路和海南实际统治者。所以古代经略岭南,多以地方酋豪

或渠帅为刺史。这些氏族,不但对于保存岭南土著血统上的主体地位有贡献,而且对维持治安、推进团结、发展岭南文化都有很大功绩。今日岭南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光辉灿烂,不能忘记这些氏族和少数民族的贡献。

历史上割据岭南的南越政权和南汉政权,一方面扶植和发展土著文化,另一方面也接受汉文化,对发扬和造就岭南文化建功不少。例如赵佗仿效粤俗,椎髻箕踞,自称蛮夷大长,提倡土客通婚;南汉主招揽中原名士,设立学校,建设广州城等,都有助于岭南文化繁衍。而它们以后重归中央上朝,岭南统一的实现,从政治上保证了岭南稳定性,并始终是封建王朝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为汉文化成为岭南文化主体创立了政治前提。

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特殊政策和措施,也有利于岭南文化按照自己的轨道发展,并产生特有的文化景观。历史上每推行闭关锁国时,多留广州为对外通商口岸,外来文化得以在这里移植生长;汉武帝严行抑商政策,但没有在岭南执行,这里仍然“以其故俗治,毋赋税”^[11],免除政治经济对文化冲击;唐政府在岭南实行任命当地土人为官的“南选”制度,有利于保持土著文化。又在广州置番坊,专为外商交易和居留地,尊重外人风俗习惯,保障外人权益,这对吸收、保留外来文化起很大作用,番坊也形成为伊斯兰文化荟萃之地;清乾隆帝以粤人不谙官话为由,也对两广单独采取一些特殊文化政策。鸦片战争以后,广东比国内其他地区更彻底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政治性质的这个大转变,一方面使封建文化受到猛

烈冲击,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化取代过去印度文化和阿拉伯文化,通过港澳和众多华侨直接进入广东,并与岭南文化相结合,使之更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和活跃的发展机制,最终使广东成为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科技成果的试验地和向内辐射基地,与其他省区文化发展机制和景观明显不同。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有了可靠保证,社会主义新文化作为一股新生力量,牢牢地占领了广东大地。而进入80年代,广东又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和引进西方经济文化、科技的窗口,更广泛深刻地开展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交流、吸收和融合过程,掀起一股又一股外来文化热浪潮,日新月异地改变广东文化的各个层面。这都是与我国政治稳定和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分不开的。

政治制度是通过行政建置来保证和实施的,所以一个区域建置沿革直接影响到文化的传播、交流、分布和区划,也是文化发展一种动力。

秦汉在岭南初置郡县,结束各部南越人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南越文化也在汉文化冲击下开始淡化,但不是被消灭,而是与汉文化相结合,共同产生新的岭南文化。南北朝时在粤西等地大量侨置郡县,对中原文化在岭南扎根生长,无疑起了保证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从唐代开始,行政建置步步深入,汉文化随而进入这些地区,覆盖区域不断扩大。汉文化在海南黎族地区的传播和占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置发展的一种结果。明代今广东轮廓才基本形成,此后很少改变,自此广东作为一个较完整的行政单位,文化内外交流大为加

强,加速地方文化体系的形成,省治广州以及各府州治也基本固定下来,成为各级文化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行政建置经过一系列调整,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因素,这也是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必要措施。这主要有:一、在海南和粤北建立民族自治州县,这是保留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条件和形式;二、近年设置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使其成为不但是吸收外来文化的窗口,也是形成和传播特区文化、企业文化等不同层面文化的基地;三、近年以市带县建制的出现和建制镇大量增加,以及它们城镇职能的加强,也同时标志着它们作为地方文化中心的形成。这对建立广东文化地理网络,完善它们的运行机制,发挥巨大作用。实际上广东近年掀起各种文化热潮,主要是在城镇和特区孕育、发展,再扩散到其他地区的,这再一次显示政区调整给岭南文化带来生机和活力。

四、民族和人口迁移

任何文化都是民族的文化。它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文化载体,即民族和人口迁移。移民一则造成文化传播,二则使不同地域文化发生交流,形成新文化,推动文化向前发展,故移民在文化形成上占有重要地位。而移民素质、源地、迁移时间、路线和分布,又影响到一个区域的文化特色。岭南文化是由生活在岭南地区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但汉族的到来,无疑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古越族是岭南土著居民。他们创造了岭南的古代文明。南越文化作为土著文化主体,代表了岭南文化在上古发展的成就和水平。但比起中原汉文化,它毕竟是落后的。所以岭南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汉人的不断南迁。秦汉进军岭南,也是有组织的移民。这不仅增加了开发岭南所需要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而且大大地改善了岭南文化环境。他们与土著越人和睦相处,从事艰苦劳动,成为开发岭南的先驱,同时也为发展岭南农业耕作和手工业技术,以及兴教办学等提供各种人才。在他们浸染、熏陶之下,华夏文化开始在岭南生根,也标志着中原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奠定了岭南文化发展基石。此后历经东晋初、唐末、元初、清初前后多次大移民,不但广东人口民族成份发生巨变,汉人成为当地居民主体,而且广东文化结构也非昔日可比。土著文化不是被汉文化融合、改造,就是作为底层文化积淀下来,与中原文化差距也缩短了。大抵在明清之交,以中原文化为脊梁,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广东文化构架已经形成。

汉族南迁与土著居民的汉化和居地收缩都是同步进行的。这些土著居民后来演变为黎、壮、瑶、畲、苗等少数民族,他们退居山区,保留着自己的民族文化,成为多彩多姿的岭南文化一个组成部分。此外,历史上移居广东的还有海内外回民和北方满人。他们集中分布在一定地域,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样为岭南文化增添异彩。

南迁广东的汉人,由于他们的源地、人居时间早晚和分布地区环境的不同,大约在唐宋时期,渐渐分化、发展为广府、福

佬和客家三个民系。他们除了具有共同的文化特质以外,在语言、风俗、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这都成为广东文化区划的基础。

五、技术进步

文化之形成,尤其是物质文化的创造,必须借助于物质手段,即技术进步,包括农艺改良、生产工具和先进科学技术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只有把握技术进步发展变化这一基本线索,才能真正掌握人类社会物质文化发展的状况与规律。而从文化生态学观点出发,生态环境的变迁主要取决于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技术水平和价值观,可见,技术进步对文化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上古时代,岭南越族先民使用简陋石器工具,从事原始助耕农业,创造了以曲江石峡文化为代表的古代文明。商末到春秋战国,青铜工具在岭南较多地应用,岭南农业文化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青铜文化给岭南文化增添新的光彩。秦汉以后,铁器工具已在岭南广泛使用,加上牛耕推广和其他技术进步,传统精耕细作的农业被建立起来。东晋时广州已能冶铁,唐代铁器工具推广到各个生产部门和少数民族地区,岭南物质文化内涵更具有多元性。到宋代,适于各种土地类型使用的农具都配套齐全,而且基本定型,水利兴起,加上占城稻种的引进成功和推广,说明广东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已经到了成熟阶段,成为这一时期广东物质文化繁荣的

重要原因。明清广东虽然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生产技术都没有产生根本性的突破,但很多技术进步已改变明代以前广东“文化常后于中原”^[12]的局面,清代,广东文化已渐能比雄于中原、吴越及楚文化了。这些技术进步包括大兴农田水利,广泛引进新作物品种,改良农具,采用先进方法从事采矿、冶炼、制陶、制糖、晒盐等,使广东跻身全国先进地区之列。但反观这时广东的自然环境,却在不少地区出现负向转变。例如珠江三角洲大量围垦,水患日趋严重;从化、香山伐林过度,不少地区童山濯濯;海南沿海风沙弥漫,许多城镇被迫搬迁。这些都显示了人类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到了近代,广东得海外风气之先,首先引进西方近代生产工具和技术,包括各种动力、机械和专用工农业生产工具等,并建立起各种近代产业,使广东物质文化生活和景观发生很大改变,以后来居上的姿态,令世人刮目相看。

近40年,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比比皆是,遍及各个生产部门和地区,已经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显著变化。而这必然又带来文化生活的内容和形式以及社会心理乃至价值观念的变化。经济生活的丰富、多样和弹性化,使人们增强了个人与人际关系丰富化、多样化和弹性化的要求,促使人们追求和更新文化知识的欲望更加迫切,创造的冲动更加旺盛,兴趣和爱好更加广泛,行为方式更加多种多样,个人特点更加鲜明,独立自主性也更加发展。这一切都反映在广东近年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及景观日新月异

的变化上；同时也让人们以新方式方法反思过去，构筑未来文化模式和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进步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广东文化发展的火车头。

六、经济规律

文化的产生、发展与传播，不但受自然和社会规律制约，而且受经济规律支配。社会经济形态不同，人们创造文化目的、效果和手段都不一样，文化景观也迥然有异，可以说，经济规律也是文化形成基础之一。

宋代以前，封建自然经济在广东占绝对优势，交换很不发达。例如陈朝时“岭南诸州多以盐、米、布交易、俱不用钱”¹³。在这种自给性、单一农业经济结构作用下，“小农的生活方式是顺其自然，他们赞美自然，谴责人为，于其纯朴天真之中，很容易满足。他们不想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¹⁴。结果到处是单一粮作生产、城镇稀少、景观单调、文化封闭而且落后。宋代以后，封建商品生产在广东活跃起来，商品经济规律开始成为文化景观形成和变迁的动力，大片土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形成集中分布农业文化景观。例如荔枝在“番禺地僻岚烟锁，万树累累产喜果”¹⁵；市井文化很兴盛，广州有“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的繁华，甚至远僻的海南儋县中和镇也有夜市。那里是昌化军城，“民夷杂糅、屠沽纷然”¹⁶。明清广东商品经济浪潮进一步高涨，特别是在广东有悠久历史的面向海洋、仰资海洋、以外贸为主的海洋经济得到高度发展，并

成为广东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其时有人断言“广东之富,在商不在农”¹⁷。这种经济现象在中央集权统治下中国各省区中非常罕见。因此,在这些商品经济规律支配下,广东文化深深地植根于商业土壤,并以商业为核心形成了一系列时代和地域特征,包括基塘农业景观在珠江三角洲出现、专业性经济作物种植区大面积发展、市镇畸形发展和繁荣、城镇商业文化景观蔚为大观,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敢于冒险开拓、向外发展的商业人才。

鸦片战争以后,广东经济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导致生产和流通领域与过程的重新组织,与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并成为这种分工一部分。从此,广东农业土地利用和工业文化深刻受制于这个体系所经历的各种风潮,不断改变自己的空间结构及组合方式。例如珠江三角洲基塘农业景观不断发生桑、果、蔗基替换现象,稻作种植在许多地区萎缩,传统家庭手工业破产甚至湮没。近代工业文明在许多城镇兴起。类似的景观荣枯迭起,充分显示半殖民地条件下广东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生产目的在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这一规律决定了各种文化现象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精神风貌。例如建国初期在海南和粤西建立的以种植橡胶为主的上百个农林场,就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热作文化景观;1958年开始兴起水利建设高潮,席卷广大农村,形成强烈时代气氛。而星罗棋布在南粤大地的成千上万个水库,则是

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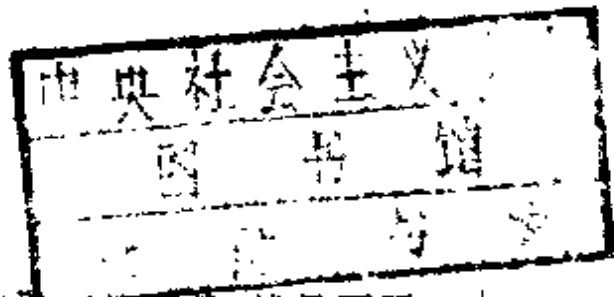
现代商品经济,是属于一种高度文化凝聚而成的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它同样制约着文化的更新和发展。港澳文化、特区文化、以及珠江三角洲方兴未艾的城镇文化和企业文化即为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地区经济发展,现已成为 90 年代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广东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经济体制的这一转变,必将进一步发挥岭南文化固有的商业优势,推动广东经济的高涨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深刻改变广东物质文明和人们的精神风貌,迎来无限瑰丽的岭南文化的春天。

七、心理素质

创造文化的主体是人,其知识水平、劳动技能和素质、性格、气质、心态、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不同,对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程度与效果,以及对外来文化选择,创造文化的类型、层次、结构等都有很大差异。岭南人具有许多异于其他省区的特点,创造了风格迥殊的岭南文化。

商品意识:商品生产和意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被压制,但岭南地处边陲,封建王朝往往鞭长莫及。秦汉以来,广州一直为对外通商口岸。在无数次商品交换中,岭南人不断受到商品的潜移默化,培养和加强了追求商品价值的意识,自发地从事商业活动。“广东富盛天下,负贩人多”^[18]，“岭南为边隅



财赋之区。……四民之中，商贾居其半”^[19]的记载，就是写照。因此，商品、市场、价值、信息等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使岭南人目光远大、心怀意广、重利轻“义”、讲求实际，成为一种优势的文化潜质。这在明清商品生产中发挥很大作用，创造出种种商业文化景观。雍正皇帝曾因之而斥责：“在广东本土之人，唯知贪财重利、将地土多种龙眼、甘蔗、烟草、青靛之属，以致民富而米少”^[20]。在现今改革开放时期，广东人特别活跃，在商业经济发展中走在全国前列，这绝不是偶然的。

冒险开拓：商品意识使岭南人很早就懂得金钱的力量，也学会和掌握了通过商品交换来获得财富的手段。为此他们不惜冒险，敢于和善于开创，习惯变化，不怕新奇，被“推为华商之冠”^[21]，成为岭南人气质之一。这也是岭南文化得以不断除旧布新的重要原因。

秦汉时代，岭南商人就远涉鲸波，开展海上贸易，其目的如唐代谚云：“欲拔贫，诣徐闻。”徐闻为海上丝绸之路一个港口，实际上商人足迹遍及东南亚，此后历久不衰。甚至在明清严行海禁之时，仍有不少人铤而走险，下海贸易，成为巨商。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经济凋敝，大批广东人出洋谋生，对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从本世纪开始到近年改革开放，广东人更一马当先，实行各种试验，取得很大成绩。

为了发展，必须不断开拓创新。自古以来，岭南人在变自然景观为文化景观的过程中，在中外文化交流接触中，锻炼、改造和提高了自己，形成了不断追求进步、改革的热情，以及为此所必需的气魄和智慧，故能接受新鲜事物，加以仿制。尤

其 19 世纪以来,当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成果和民主思潮涌入时,中国封建王朝许多臣民视如洪水猛兽,甚至闹出许多愚不可及的笑话。但在岭南,反应却不一样。近代历史表明,广东早已是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科技成果的基地和窗口,学习西方文化的人和事,大都出现在广东,继而影响到内地,从先进机械、铁路、航空技术、西式医院、医疗技术、学校、新闻报刊到时代先进思想家都莫不如是。近年掀起产品革命,从家用电器、时装、饮料、超级市场、美容院到出租车、商品住宅等等,无不是广东在领导着全国潮流。而它们更新换代之快,蔓延地域之广,更使外地人叹为观止。这是岭南人开拓创新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出的硕果。

反传统与超前意识:岭南文化,一方面本有古越族许多遗风旧俗,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封建文化的叛逆和反抗,如哭嫁骂嫁、不落夫家、海南黎族“放寮”风俗等。清末普遍存在“自梳女”、“自由女”,社会对此“视之淡然若忘”。²²;另一方面岭南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相对较少,而直接来自西方文化的启迪却很多,故岭南人思想和行为规范每有其反传统和超前一面。古代,惠能开创禅宗南派,建立顿教,是世界和中国佛教史上一次空前变革,引起佛教文化的广泛传播。近世通过海外贸易、华侨进出和假道港澳吸取西方一切先进实用知识和技术,通过对比、鉴别,人们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和动摇,首先在广州和珠江三角洲,继而在沿海城镇以至内地,人们从工商经营、工艺制作、建筑设计、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日常生活,乃至社会价值、思维方式等,都率先效仿西方文化成果,并

建立了许多被视为新奇的文化景观。这是当时仍笼罩在传统封建文化云雾之下的内地所无法比拟的。上述近年广东经济文化迅速崛起,更是广东人超前意识集中体现。这一切恰如林语堂先生早年在《中国人》一书中对广东人评价那样:“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

当然,也许出于对自然、图腾、祖先或宗教崇拜过深,自古以来迷信在岭南就很流行。另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商品经济激烈竞争面前,或在创新经营、开拓事业过程中,总要承担风险,一些人缺乏安全感,不得不求助于神灵;还有一些人由对金钱和权力的崇拜转到对神灵的崇拜,于是宗教文化大行其道,并产生许多敬神事鬼迷信景观。这至今仍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存留在许多地区和人群中,也是参与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八、历史积累

恩格斯说:“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²³。文化也是如此。它

作为人类创造的结果,既是时间积淀的产物,也是历史的投影。任何一个区域的文化面貌,总是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文化的这个特性,决定它具有不同于自然因素的继承方式,即不是象生物借助于先天本能遗传,而是通过民族、移民、语言、宗教、习俗等方式,一代一代地留传下来,才不致于中途消失。文化这种继承方式,能把不同历史时期联贯起来,使之具有连续性。所以这些继承方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性质和特征,也就影响到相应时间断面的文化地理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积累对一个地区文化形成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岭南文化借以传承和扩布的以上各个要素,都有自己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它们有的过程已经完结,但结果并没有泯灭,而在继续发挥作用,影响到岭南文化的性质和景观。例如广东多个民族存在,依然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大规模民族和人口迁移在广东已经停止,但由此产生的广东三大民系已经铸造了广东地域文化原型;广东三大方言亦早已成熟,现为人们所习用,成为文化区划的一个主要根据。广东宗教地域性并不很明显,但其景观却很触目。广东风俗,地区差异较大,群落林立,也是文化区划原则之一。正是这些历史积累,构筑起岭南文化的参天大厦。

注释:

1. 梁启超:《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七册,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

- [2] 乾隆《邱文庄公集》卷 8,《南溟奇甸赋有序》。
- [3]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4。
- [4]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6。
- [5]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10。
- [6] 《郭嵩焘奏稿》第 13 页,岳麓书社,1983 年版。
- [7]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14,食语。
- [8]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七篇卷 8,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
- [9] 萧令裕:《粤东市舶论》,引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 [10] 《隋书》卷 31,地理志。
- [11] 司马迁:《史记》卷 30,平准书。
- [1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 60 页,上海中华书局,1932 年版。
- [13] 《隋书》卷 24,食货志。
- [14]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六卷第 24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
- [15] 陈襄:《荔枝歌》,引见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六)第 29 页。
- [16] 苏过:《斜川集》附录下,遗事,《书上元夜游》。
- [17] 《郭嵩焘奏稿》第 149 页,岳麓书社,1983 年版。
- [18] 魏际瑞:《四此堂稿》卷 10。
- [19] 彭邦畴:《重修梅州试院记》,转见《十四世纪以来广东省社会经济的发展》第 186 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 [20] 《清世宗实录》卷 53。
- [21] 《粤省近年商况》,见《东方杂志》第 6 卷第 3 号。
- [22]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 7,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
- [2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 12 页,人民出版社,1971 年版。

第二章 广东文化起源、 发展和传播

广东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它是在土著南越文化基础上,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博采其他民族和地域文化之精华,经过长期融汇、整合、创新、升华而成的一个区域文化体系。广东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向外传播,对中华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文化地理学一个致力点,就是追溯、探讨它发生发展的过程、特点和规律,并提供一个纵向历史剖面。

第一节 先秦岭南原始文化

先秦岭南仍处在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生活在当地的南越族先民,已经创造了包括新石器和青铜文化在内的古代文明,成为南越文化主体,同时吸收其他文化养分,构成这一时期岭南文化的基本形态。

一、南越文化起源

南越文化主要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隋唐约三四千年时间南越人及其后裔创造的土著文化。但其渊源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约 13 万年以前的以曲江马坝、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人类化石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文化。岭南原始人群已普遍用火,结网捕鱼,狩猎野兽,采集野果,用骨针缝制衣服,表现出物质文化生活的多样性,从中可窥见南越文化朦胧的曙光。而广东新石器时代距今约 1 万年到 3500 年,遍布洞穴、山岗、台地、海滨的这一时代文化遗址在广东已发现 400 多处,具有代表性的有南海西樵山、英德青塘、三亚落笔洞、始兴玲珑岩、潮安陈桥村、增城金兰寺、曲江石峡、佛山河宕、高要茅岗、广州飞鹅岭、陵水大港村、香港大屿山遗址或遗存等。人们使用多种较为先进的细石器,从事渔猎和农耕,还制作几何印纹陶和彩陶,加工玉器,饲养猪、狗、牛等牲畜,使用不同材料建造原始房屋等,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多采,极富有岭南地方风格,异于中原华夏文化。例如石峡文化的人工栽培稻种,说明稻作文化已达到较高水平。在多个遗址都发现有二次葬和拔牙习俗,水上“干栏式”和红烧土面或硬土居住面的“窝棚”式建筑,以及图案多种多样的几何印纹陶等,都成为原始南越文化的重要特征。“石峡文化”堪为岭南新石器文化荟萃的博物馆和代表,它与星罗棋布在岭南大地的其他文化遗址一起,说明岭南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源地之一,同样有过光

辉灿烂的古代文明。

南越先民经过长约 10 多万年进化,一步一步地从蒙昧、野蛮向文明社会迈进。到西周,南越作为一个族体已经形成,南越文化也成为它的重要标志。到春秋晚期,南越文化注入青铜文化成份,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考古发现,今广东境内青铜文化遗址约有 300 多处,墓葬 100 多座,各类青铜器八九百件¹。以珠江干流及其支流沿岸居多,包括刀斧等生产工具、炊具、兵器、乐器、酒器等。其文化风格除了一部分与中原和楚地相似以外,大部分具有鲜明地方色彩,属南方百越文化系统,说明前者可能来自岭北,而后者更多的是当地铸造的。阳春、珠海、揭西、深圳、香港等地都发现过铸造青铜器的模具(陶范和石范),标志着—个新兴的铜铸造业在岭南出现。它与这些青铜器的使用—样,是岭南物质文化史上的重要事实,对山林开发、编制竹木器等发挥过—定作用。特别是南越铜鼓,铸造技艺精湛。文化内涵丰富。在广东常见于北江以西广大地区,延续时间直到隋唐,是岭南青铜文化—朵奇葩。只是与青铜文化时代相应的奴隶制在岭南并不发达,青铜工具很少用于生产,使它的社会文化意义受到很大限制。而实际上与青铜工具—起使用的还有一定数量的石器和陶器,其时间下限延至战国,少数甚至到西汉。但青铜文化毕竟是南越文化从石器到铁器的—个过渡或混合类型,它如同在中原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作用—样,也是岭南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飞跃的—种动力。

二、南越文化特质

南越文化作为一个文化体系,经历时间虽然很长,但在先秦时期已基本定型。它的许多文化特质不但迥异于中原,而且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在岭南文化史上有特殊意义。

南越人受环境影响,除以稻为主粮外,还嗜食水产,包括鱼类、贝类,以及蛇、虫、鼠类等,令中原人深为惊诧。后世岭南人特殊饮食风俗,都是从南越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

岭南植物资源很丰富,可供敷身的衣料很多。后世文献记载南越人是以棉、麻、蕉、葛、竹、蚕丝等纤维为衣料的。与中原相比,种类不见得少,唯使用时间落后而已。成书于战国的《尚书·禹贡》曰:“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反映了南方少数民族先人的服饰特点。所制衣服简单凉快,流行“贯头式”,适应岭南气候特点。

在岭南湿热气候下,溶洞在石灰岩地区很发育,南越先民初时住在洞穴里,称穴居。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山岗出现半地穴式建筑和平地起的茅房,是山区居民早期住宅,而沿海和临河地区,则为上述“下栏式”建筑。高要茅岗遗址发现这种木构建筑文化特征与浙江河姆渡遗址所见十分相似。而在始兴白石坪山的战国遗址中,发现绳纹板瓦、瓦筒和半瓦当,反映房屋规模不小,用料也很讲究,是岭南用瓦盖屋顶之始。广州旧称楚庭(亭),有“越宫室始于楚庭”^[2]之说。近年在广州中山五路发现西汉初南越王宫殿遗址,证明南越建筑文化已达相当

高水平。

生活在江河水汴的南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³，也“善于造舟”⁴。舟楫是他们主要交通工具。考古学和民族学者提供证据，南越人是以独木舟穿梭于河川海浪之间。广州发现秦汉船台，其起源可能在先秦。海南黎族至今保留有竹架或木架船形屋，为黎族先人乘独木舟或木筏渡海上岛的物证。近年在化州、怀集等地出土汉至魏晋多艘独木舟，那些地方都是南越人居地。后世岭南造船技术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并发展独特的海洋经济模式，与悠久南越文化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先秦时在南越人物质文化基础上产生了相应的精神文化。这包括迷信，因为南越人生活在险恶环境，笃信巫鬼是很自然的事情。《史记·孝武本纪》有“越人俗信鬼”，“而以鸡卜”等记载。解放前黎族和壮族仍有鸡卜遗俗。先秦文献多处说越人断（短、披）发文身。直到建国初，黎族仍保持这种风俗。文身具有图腾、宗教、民族、艺术、婚姻等意义。少数汉人也接受这种风俗。此外，古南越人还有猎头、吃人之风，相信被吃者的智慧和力量会转移到吃人者身上。《墨子·鲁问》记：“楚国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诗人屈原在《楚辞·招魂》中唱道：“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而祀，以其骨为醢些。”此种风俗延续很久，唐代鉴真流落海南振州，还被告知“此间人物食人”。⁵凡此种种，说明上古南越人道德文化观念和习俗与中原人完全不同。当年中原人据此指责南越人为蛮夷、异类也就不足为奇。

三、外来文化对南越文化的影响

先秦时期,我国南北之间已经有着频繁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不断给南越文化注入新鲜养分,使之得到改造和提高,并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中原、楚、吴越和巴蜀文化等。

(1)中原文化:按禹贡九州,岭南不在其范围内,但却属“五服”最外一层,即未开发荒服地区。这说明岭南已为中原所知,并被列入将来扩张范围,因而有实施其经济文化影响之举。《尚书·尧典》云:“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周天子对南方诸蛮及周边一些民族“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辞言传之。凡其出入送逆(迎)之礼,节币、帛、辞令而宾相之”⁶。到商代伊尹制定四方献令,对南方各民族,“请令以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⁷。另据《白云越秀二山合志》关于越人公师隅条下说:“时三晋惟魏最强,越王与魏通好,于是使隅往复南海,求犀角、象齿以献之魏。”中原与岭南这种文化交往,已在考古发掘中得到有力参证。例如粤东商末到西周“浮滨文化”遗址出土的凹刃斨、有阑戈与江西吴城遗址出土同类器物相同或相似。陶器中大口尊器形风格与河南二里冈所见同类器物相近⁸;信宜出土西周铜盃与中原西周中晚期铜盃形制相同;又曲江马坝马鞍山出土西周晚期铜铙与江西出土西周铜铙几乎一模一样,同时出土的还有东周铜钟、春秋铜鼎、铜镈

于和甬钟等中原礼乐器,这些实物不但表明岭南已受中原礼乐教化影响,而且从出土地观察,可推测文化交往是沿五岭一些连接河流通道进行的。雍正《陕西通志》曰:“有无同”⁹,“有”恰是粤方言大量用词,又珠江三角洲一带娶媳妇曰“索老婆”,而山西“霍山以北……娶妇曰索妻”¹⁰。这是古代北方移民在岭南语言上留下的烙印。

(2)楚文化:楚越地理上相依,夏至战国,楚经济文化发达,是南方民族融合中心和文化中心,也是南越文化一个重要来源。

尧舜时代,越人高固为楚相,在南海设楚庭,岭南受楚文化感召已很明显。春秋为楚历史文化形成发展时期,冶金技术达到一流水平。南音之兴,楚歌之盛,在中国古代文化舞台上蔚为大观。而这时恰是岭南青铜时代,迫切需要先进文化来发展自己,故对楚文化也易于接受和吸收。楚也在这时开始向南扩张,《国语·楚语》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庞大矣”;又《左传·襄公十三年》“也有楚”“抚有蛮夷,奄征南海”等类似记载。前382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令尹,“于是南平百越”¹¹,楚文化更长驱直入。虽到战国后期,楚国式微,无力顾及岭南,但文化交流和影响也没有中断。归纳起来,楚文化主要在以下方面影响南越文化:

(一)稻作文化传人。虽然曲江“石峡文化”已证明三四千年前岭南已有人工稻栽培,但楚发达的稻作文化仍然会扩张到岭南。广州有“五羊城”、“羊城”、“穗城”之称,皆来源于周夷王时五仙人骑羊衔谷穗降临楚庭这一传说。按楚𦉳[音米 mi]

姓,原为羌夏族一支。《史记·楚世家》曰:“羊姓,楚其后也。”羊即羊的叫声。则五羊传说可能象征楚人五个支系,将稻作文化传入岭南,因为神话多少带有某种真实根源。

(二)青铜文化传入。岭南出土春秋青铜器,除了具有中原风格以外,再有则与江淮楚地风格相同。例如肇庆、罗定出土编钟,与湖北随县出土的基本一致,肇庆松山战国墓出土铜罍、壶、足、盘,以及全省春秋战国墓所出土的青铜剑,部分戈、矛、镞等兵器来自楚地或受其影响。这类器物大部分发现在西江流域,少数在北江流域,甚至在湛江硃洲岛也发现楚式青铜剑、斧和削刀等。它们正是楚越交通方便地区,无论从器物风格还是地缘上看,都显示岭南青铜文化是在楚文化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一开始就包含有楚文化因素。实际上楚越青铜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类型。

(三)城市文化嚆矢:广州古称番禺,而番禺起源于“楚庭(亭)”。先有楚庭,继有五羊降于楚庭的神话。这个“楚庭”有多种解释,嘉靖《广东通志》认为楚庭是城,称“楚亭郢在番禺”。万历《广东通志》卷七也说:“开楚庭。曰南武。”《谈史方輿纪要》广州城条称:“又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萃于楚庭,遂增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12]。此外还有一些筑城记载,出入也颇大,但不管怎样,广州筑城,与楚有关,而将楚庭理解为城中官衙,也标志着楚文化渗入广州。以“楚庭”为代表的番禺城市出现,表明岭南城市文化自此开始。番禺很快成为南方多种土特产集散地和全国著名都会之一。

(四)移风易俗: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之前,岭南与

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盛行二次葬,石峡和佛山河宕文化遗址证实了这一葬俗。春秋中晚期,受楚文化影响,同时也由于奴隶制出现,岭南有些地区改变了这种葬式,代之以棺槨制^[13]。当然二次葬仍在许多地区保留,并延续至今,但楚文化毕竟起了移风易俗作用。

秦灭楚后,不久岭南也归入秦王朝版图。楚文化才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转而为强大的中原文化所代替。

(3)吴越文化:南越族作为百越一支,其文化特征与百越其他支系是可以沟通的。其中江浙吴越文化也是参与南越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石器时代,岭南先民与江浙先民已有所接触,石峡文化一些陶器和玉器与江浙良渚文化很相似,表现了相互间一定的文化联系。春秋时吴国和越国都成为强国,形成共同文化。而吴、越北方各国,由于“习俗不同,语言不通”¹⁴,故吴越文化只能向南传播,特别是楚灭越以后,部分越人流入岭南,传进吴越文化成分更多,并被融合为南越文化的一部分,时到现在仍斑斑可考。吴越地区流行鸟图腾崇拜,不但有鸟田传说¹⁵,而且发现春秋战国鸟田图。岭南也有类似传说,即所谓“雒田”¹⁶,一种仰潮水灌溉农田。按《说文》释“雒”为“鸕鶿”,即小雁。故“雒田”与“鸟田”都反映两地农耕文化内涵相似,当是两种文化交流的一种佐证。吴越有过居全国之首的造船业,能制造多种楼船和桥船。越灭亡后,越人漂流海上,先进造船技术传进岭南。广州秦汉船台遗址,与此不无关系。特别是吴越语言,在广东保留甚多。《广东新语·文语》曰:“广州语多与

吴相趋近。如须同苏，逃同徒，豪同涂，酒同走，毛同无，早同祖，皆有字有音”〔17〕。广州地区俚语“佬”，据南朝顾野王《玉篇》所录“佬”字，当时流行于吴越地区，有人以为广州方言“佬”字，系从吴越转来。《越绝书·吴芮传》曰：“旃航，买仪尘者，越人如江也”〔18〕。按今日广州方言，舟车停靠曰埋，如公共汽车停站，曰埋站。据罗香林教授考证，“埋即买仪尘之买所转称”〔19〕。粤语称美好物事为嬾(盞)，今苏州、宁波等地仍用此字。粤语“噉多”实为吴越语“咍多”、“咍好”。粤语自称“我们”为“依地”，“依”乃吴越古音。吴越语黄王读音不分，两广白话也如此。江、讲、角、谷、冷、落等字，吴越音与两广白话差不多。吴越人称小孩为犷犷，不只广府人，连客家人至今仍这样称呼小孩。陆容《菽园杂记》说吴中舟行忌住和翻，称箸儿为筷儿，今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仍有此俗。又除夕“卖嬾”风俗，过去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很流行，意即将懒气、懦气丢掉。此俗渊源于吴越，当地叫“卖痴呆”。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有“卖痴呆”词云：“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招人买”，所记为苏州乐俗。另据《平江(苏州)记事》亦云：“吴人自相呼为呆子，又称之为苏州呆。每岁除夕，群儿绕街呼叫卖懒呆。”与广州卖懒风俗基本一致，实为吴越文化转移的结果。此外，地名也把两地文化联系起来。吴越有“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20〕。无独有偶，广州旧称番禺。禺音同余。一说为盐村。我国有三个会稽地名，一在山东，一在浙江，还有一个在广东，即今潮州凤凰山。这也是民族往来在岭南文化中留下的吴越文化成份。

(4)巴蜀文化：于先秦崛起的我国西南巴蜀文化也影响

到岭南。《史记·货殖列传》记：“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经营冶铁业，将铁器卖给越人。这发生在赵佗时代，转入岭南铁器有一部分，由四川经西江运来。又据《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建元六年（前135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以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宽数里。出番禺城下’。”可知产于四川枸酱，已运到番禺。此外，汉武帝时张骞出使大夏，见到从印度转贩过来的蜀布和邛竹杖。有人认为，这些货物是由四川运来南越再转往印度的^[21]。联系秦汉海上交通盛况，这不无道理。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派大军大举进攻南越，并令罪人及巴蜀、江淮10万人移居南越，与“土人杂处”。巴蜀地区种稻历史悠久，经验丰富，稻作文化随这些人居者带进岭南，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有人认为，广州五仙观里五位仙人手中持谷穗的少者，是江淮、巴蜀无名水稻栽培技术传播者的化身^[22]。当然，由于牂牁江遥远屈曲，巴蜀文化抵岭南时难免已成强弩之末，加之时代久远，后人研究不多，现在留下遗迹较少，也就不足为奇。

第二节 秦汉六朝汉文化在岭南传播

秦汉岭南先后归入中央王朝版图，成为封建集权制国家行政区一部分，这是岭南历史发展的一个划时代事件。从文化意义来说，这也是岭南古代文化一个新起点。自此以后，中原汉文化与南越文化发生更多接触，渐渐融合，同化南越文化，

并以后来居上之势,得到广泛传播。迨到六朝移民高潮到来,这种传播发生转机,并最终导致南越文化趋同于汉文化局面。

一、秦有组织的汉文化输入

秦在岭南推行郡县制,今广东跨三郡十六县,大部分地区覆盖在秦政治势力之下,基本上结束过去互不统属、政治上落后的状态。这是岭南制度文化上的一项首创,为汉文化输入铺平道路。

伴随秦军到达岭南的,除大批掌握各种技能的“亡人”、“罪人”、“赘婿”、“贾人”以外,秦始皇甚至另外征集1万5千名未婚女子南下“以为士卒衣补”^[23]。他们把中原生产技术、礼乐教化、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带进岭南,陶冶南越族人。中原华夏族与南越族在血缘和文化上的交流,自此通过不同渠道展开,渗透到岭南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各个角落,形成新文化风貌。首先输入较多铁器农具,使大片荒古土地得以开垦,也改变过去“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24]状态。现今之曲江、连县、英德、清远、番禺、顺德一带成为经济文化最先发展地区。秦人在进军岭南沿线设置城池或关隘,除作为郡县治的城池以外,另有辅助附近关隘的城堡,如在今仁化、乐昌、英德有三座,有一座叫“万人城”的,谅规模不小。还有湟溪、阳山、涯浦三座秦关,以及沿北江河谷修建多处“驰道”,皆为重要建筑工程,除体现中原建筑文化风格以外,它们都是传播中原文化的据点和通道。广州秦汉

船台遗址反映了秦代造船技术已很先进,布局合理,船台与滑道相结合的原理与近代船厂没有两样。善于造舟的南越人融汇了秦人较高的文化知识,建成了如此先进的船台,是很自然的事情。

中原文化还借助于秦势力渗入当时尚无行政建置的海南岛,近年岛上多处出土秦国钱币“秦半两”。海南甚至直到建国前,一些地区仍袭用秦国六进制。明人唐胄说:“秦以水德王。其数用六。今琼人行使铜钱,犹用六数,以六文为一钱,六十文为一两,六百文为一贯,又田禾以六把为半担,十二把为一担,亦用六数,皆秦旧俗也。”²⁵ 秦历史虽然短浅,但对岭南首次有组织的文化输入,功不可没。

二、汉文化在南越国扎根生长

秦末汉初,赵佗割据岭南,所建南越国达95年。但赵氏政权仍坚持秦汉多项政治制度,同时采取揉合各民族文化的政策,从而使秦开辟的传播汉文化渠道进一步畅通,汉文化继续在南越国扎根生长。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出土的南越王墓,堪为汉越文化的一座宝库,也是汉文化在岭南传播的缩影。

象岗山出土大量金、玉、陶、玻璃、象牙、竹、丝、药、石等器物,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工艺精湛,令人惊叹不已。其中一部分器物造型、纹饰与中原一样,说明它们或由秦军带来,或与中原交换所得,但仍有不少器物颇具地方特色,如编钟、句鑿、铜鼎、铜仿、铜烤炉,以及许多金银制品,造型奇特,显属当地

铸造,表示南越国物质文化已达相当高水平。特别有意义的是出上大量铁器,除兵器以外,还有铁锄、铁斧、铁锛等农具,说明南越国也掌握铁器锻造技术。另外,还通过边境贸易从中原输入一部分铁器和牛羊马匹。这不但提高南越国的生产力,而且改变了南越人极强的地域观念,冲决与中原人很深的隔阂,利于汉文化的扩散。

南越人悠久的造船技术在南越国时得到进一步提高,为对付后来汉武大军压境,曾竭力建立一支精锐水师。《汉书·严助传》说:“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人伐材治船。”故在广州建立秦汉船台亦非偶然,有人估计所造船只载重量达50—60吨以上^[26]。《广东新语·木语》曰:“贲隅之东,八桂生焉”,故舟楫多采桂为之。故曰:“番禺之桂,爰始为舟。”秦汉船台造船所用木材,经鉴定主要为格木、樟树、覃树、杉木等良材,与文献所载科属一致。为此必须使用强有力的铁器工具,这与铁器文化在南越国广泛传播非常吻合。

在精神文化方面,赵佗一方面尊重南越人的风俗习惯,甚至亲自“弃冠带”,着越服,“椎髻箕踞”,自称“蛮夷大长”,利用当地人为官,保留南越文化;另一方面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汉文化在岭南传播。如鼓励汉越通婚,办学教民,推广汉文化,尊老敬老,移风易俗等,使汉越民族和睦相处,社会安定,汉文化意识在南越人中不断加强,也加快了汉越民族融合过程。赵佗这些文明进步功绩,得到汉高祖刘邦充分肯定,刘赞其治理岭南“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27]。所以说赵佗无愧为开发岭南的第一位功臣。

南越国都番禺为汉文化在岭南的生长点和向外传播基地，“赵佗城”城周 10 里，在今广州市中山四路五路相接地区。这一带出土汉代建筑遗存，包括南越王宫“万岁”瓦当、印纹方砖、瓮、罐等，其中铺地砖为秦制宫廷建筑用砖，其花纹与西安、咸阳秦宫殿的铺地砖相同；象岗山南越国第二代主赵昧墓，亦仿秦皇宫苑规制兴建，还有应元路越王井等，足证明中原营城、打井技术已传入岭南，番禺城也从传说变为现实，成为广州城市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另外，南越国在边关互市，在渡口、村场、交通要道等地举行定期集市。刘宋沈怀远《南越志》云：“越之市为圩，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南皆然。”这也是在中原影响下出现的文化景观。可见，南越国对汉越文化的宽松政策，开创了岭南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先河。

赵佗死后，南越国国势不振，不久被汉武帝平定，岭南重归汉王朝，也揭开了汉文化直接在岭南传播新的一页。中原和楚地大批铁器、耕牛，及其他先进生产技术源源输入岭南，使大面积密林深谷开垦成为可能，稻作、旱作和经济作物栽培业进一步发展起来，粤北、西江甚至海南北部和西部土地利用景观发生很大改变。到西汉后期，番禺、泮阳（英德）已有培养士人机构。东汉初，桂阳郡属下粤北各县“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28]，以后私人办学的也不少。这些公私学校，造就了一些人才，同时也有助于改变南越人“不知礼则”，“不闲典训”状态，具有移风易俗作用。但秦汉岭南毕竟还刚踏进封建社会门槛，上著南越文化仍很强大，所以先进的中原文化只能与之采

取接触形态,继为混合形态,缓慢地在岭南传播。

三、六朝移民高潮带来汉文化传播转机

晋室南渡,岭南成了中原各阶层人士避难和落籍之地。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移民高潮也同是一次中原文化南下高潮。史称“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29]。这次持续了近300年的移民高潮余波一次又一次在岭南荡漾,从多方面改变南越文化结构和面貌,是岭南本土文化向汉文化认同和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汉文化在岭南传播的第一次转机。

第一,六朝时代在岭南侨置大量郡县,称“左郡”或“左县”,以安置南下士民,但新增郡县有不少深入南越人(俚人)僻居的溪峒,使他们成为郡县编民。这不仅利于中央政令推行,而且为汉文化扩展起了积极的保证作用。

第二,来自中原以“衣冠望族”为主体的人群,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到达岭南后,多聚族而居,即“占籍各郡”,在短期内发展为大族,不仅左右当地政治、经济命脉,而且在文化上也以居高临下之势,对待落后的土著文化,并逐步融合乃至部分取代它们,从而成为当地文化主宰。例如刘宋时徐闻著名大户阮谦之,其祖父东晋时举家迁入徐闻,数十年后到阮谦之时,已成为当地豪绅大户,阮氏自然也是封建文化在徐闻的代表人物。

第三,萧梁直到唐初,由于俚族首领冼夫人采取民族和睦

和民族融合政策,使汉文化得以在俚族地区占居重要阵地。冼氏与高凉太守冯宝联婚,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但也是俚汉文化结合的象征。如后来道光《广东通志》指出:“以礼义威信镇于俗,汲引文华、士相与诗歌,蛮中化之,蕉荔之圩,弦诵日闻。”俚族内部也逐渐消除积仇宿怨,出现较为安定的局面,甚至连海南俚人“归随者千余峒”³⁰,在此基础上重置崖州,结束海南长期无建置状态,开创了汉文化在岛上传播的新局面。

第四,汉人南迁和汉俚融合在文化上产生积极效果。自此广州“大开鼓铸”³¹,有了自己冶铁业,甚至俚族地区也有铁器工场,《隋书·谯国夫人传》有“铸兵聚众后唤君”之语。俚族从铁石工具并用进入铁器时代,俚族精湛的铸铜技术,后人叹为观止。建国后在原俚族聚居中心两阳、高州、化州地区发现的40多面铜鼓,不仅体形高大,而且饰以多种图案和花纹,为俚族特有的文化瑰宝。很多人相信,西汉以前南越人不会制造铜鼓,直到晋代裴渊《广州记》才说“俚獠铸铜为鼓”。所以只在西汉以后,铜鼓铸造技术才有可能作为汉文化一部分进入岭南,并流传到俚族地区,浇灌出灿烂的铜鼓文化之花。伴随铁器工具广泛使用的还有牛耕、排灌、酿酒,制瓷等技术,并在粤北、珠江三角洲等地推广,广东开始踏上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耕文化之路。甚至在俚族地区,农业也稳定地发展,到唐天宝年间,据鉴真和尚所见,海南沿海出现了一派种稻养蚕植果的田园风光,不少地区“村村相次”、“唐香树聚生成林,风至,香飘五里以外”³²,与过去蛮荒景观迥然不同。这也是冼夫人致力于推广汉文化的结果。

第三节 隋唐五代岭南文化持续不平衡发展

史称“五岭以南，自李唐以前，声名文物远不逮夫中原”^[33]，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交通梗阻不便。自唐张九龄奉开大庾岭（即大梅关）新道后，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自此，大庾岭道成为广东北上主要交通线。另外，唐代广州崛起为世界性贸易巨港，也是“广州通海夷道”的起点，而自隋开京杭大运河，改善了五岭南北交通，广州港腹地更扩大了，促进了物资和人口流动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岭南文化被滋润和吸收了新养分，在前代积累基础上持续但又不平衡地发展起来，改变了过去的文化格局和景观。

一、汉俚文化融合深化

文化形成与民族融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六朝移民高潮的结果，是汉人在岭南的人口比重显著提高。加上上述经过洗夫人的努力，汉俚文化融合过程在隋唐强大封建政治经济力量推动下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程度也更加深刻。例如移居海南的汉人，唐代以前为2万人，唐代增加到7万^[34]，分布地区也从岛北部沿海逐步向比较偏远、开发迟而瘴疠较严重的南部和东南部扩展。以往是汉在北，俚在南。环岛建置的完成，形成汉在外、俚在内的分布格局，表明有一部分俚人被汉化。在汉俚杂居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有显著提高，岛上不但

有不少土特产作为“贡品”输入中原,而且生产的商品也很精美。琼山郡守韦公干驱使俚人家奴“织花缣文纱”,制角器,熔锻金银,用珍木造家具和大船,舶运到广州出卖。这说明汉文化已为越来越多俚人所掌握,否则不会有这样的工艺制作。俚人另一居地雷州,唐代还从闽南移人一批居民,壮大汉人队伍,进一步开发雷州半岛。类似这样的民族迁移和民族融合事例,实质上反映汉文化越来越处于优势地位,汉俚文化界限在这里逐渐消失了。俚人中还出现一批掌握汉文化的知识分子,如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在汉未央宫大宴群臣,曾“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35]。这一雅事历被传为俚人汉化的佳话。

二、开疆文化的贡献

汉文化在岭南的传播除以大量移民为载体以外,个人历史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唐代岭南在中原人心目中,仍是一个瘴疠之地、化外之区,因而成为朝廷处置政敌和罪犯的场所。许多在党争中败北者,都被一贬再贬,最后流落岭南。他们中不乏有见识的政治家或文化人,来到岭南后,多致力于传播中原文化,推动当地文化发展。这种以开发落后地区为目的,在边陲地区传播的汉文化被称为“开疆文化”。秦汉进军岭南所产生的文化后果,当然可以说是开疆文化在岭南之始。唐代开疆文化在岭南进入一个重要阶段,流寓人物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人物著名的有杜审言、宋之问、李德裕、韩愈、刘禹

锡、李宗闵、杨嗣复、王义芳、韩瑗、韦方质、李孝逸、韦执谊、敬晖等，他们都各有建树。例如韩愈贬潮州，在那里驱鳄鱼，放免奴婢，办学兴教，正乡音等，促进潮州风气改变。为纪念韩愈而命名的韩江、韩山、韩文公祠、思韩亭、思公咱等，皆为中原文化在潮州扎根的见证。唐代贬惠州的有同平章事张锡、兵部尚书牛僧孺、著名诗人李尚德等，他们对惠州文化建设也起过一定作用。唐代贬海南的高级官吏更多，李德裕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李贬潮州再贬崖州，在逆境中不忘著述，在崖州城修建望阙亭，民间还有其子孙化为黎人的传说，作为一代名相，千百年来一直为海南人所纪念和赞扬，这与其谪居时对海南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三、海外文化移入

我国与海外交通要地，首在广东。秦汉以来，从徐闻、合浦港发航的海上丝绸之路已很兴旺，所以海外文化假道前来，流布岭南也势在必然。唐代以前，岭南文化正处在形成阶段，尚未成熟，故更容易接受外来异质文化，使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也是岭南文化多元性的一个原因。

秦汉时，集散番禺的一些土特产采自南海周边地区和民族，包括香药、琥珀、玛瑙、水晶等，《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记载了番禺与海外交通的盛况，可以说，这是有文字可稽的海外文化进入岭南之始。据考证，汉初在我国栽培最早的海南岛棉花，是从印度经越南传入的^[36]。至于中国官员、商

人、使者外出交流,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向我国进贡珍奇宝货之事史不绝书。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州发掘多座汉墓,除了出土大量上述物品,还有不少托灯男女陶俑,他们的人种学特征和服饰异于汉人,也不同于当地越人,而很有可能来自东南亚、西亚或东非³⁷。这类陶俑在徐闻、合浦、贵县、梧州一带亦有发现。从文化主要依靠移民传播而言,不管这些陶俑真正身份如何,这都可视为海外文化传人的佐证。但只到了唐代,随着海上交通发展,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民族文化才更多地移入岭南,极大地丰富了岭南文化内涵。这主要包括佛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作物品种、特殊材料、器皿等。例如唐代岭南生产各款陶瓷制品,如瓦当、板瓦、筒瓦、砖石等建材,多有贴附坐佛或莲花瓣纹。佛教寺院、塔、雕刻等建筑大量兴起,与佛教传入有关的菩提树、蒲桃也在岭南安家落户。伊斯兰教清真寺、塔,伊斯兰教徒聚居蕃坊等在广州出现。伊斯兰教著名补品补骨脂也随同其他舶来品一起传进来。还有许多身穿奇装异服,“鍍耳贯胸之类,殊琛绝贐之人”³⁸也往来于各交通大道,歇息于邸店驿站之中。只有在岭南,才更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外来文化景观。

四、文化发展反差

隋唐岭南社会发展还很不平衡,开发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并存,个别先进经济据点被大片蛮荒地区包围。这种区域发展的核心性也表现在文化上,形成较大的区域反差,成为这一

时期岭南文化发展的重要特点。

大庾岭道开通，“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近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39]。这是中原文化南下在交通沿线产生的结果。主要包括粤北、西江和珠江三角洲某些地区，刀耕火种和火耕水耨面积在这些地区还有所减少。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列举当时中国四大商港，内有“广府”（广州）一地。这些地区生产水果、蔬菜、稻米、大小麦和甘蔗等，渐渐跟上中原农业发展步伐；所产陶瓷，釉色纷呈；所产葛、麻、蕉、竹、棉等纤维织品，别具一格，为中原人所珍视，多以购得自炫；所酿酒类众多，其中荔枝酒为其中珍品，受到诗人白居易赞美；城镇在这些地区也很兴旺。广州过去被称为“茅草都市”，唐宋璟任广州都督，《新唐书·宋璟传》称，宋璟“教之陶瓦筑堵，列邸肆”，取代茅草修葺房屋，将中原建筑文化引入岭南。珠江三角洲兴起金利、龙江、容奇、桂洲、黄连，北水、马齐、香山、青岐等圩镇。圩市作为一种文化景观也在它们中形成。佛教文化在惠能传教韶州时十分隆盛，唐天宝年间“韶州生齿登皇籍者三万一千户，削发隶寺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为精舍者四百余区”^[40]，即不到10户有僧舍1区。从中可以窥见，这类地区文化色调很浓重，这当然是文化内外交流的结果。反观沿海低地和东江、韩江流域及海南五指山地区，不是多种野生动物渊藪，就是野象出没、鳄鱼为患，或者“皆雕蹄凿齿、绣面鼻饮”^[41]，俚人所居。不少志书都说，“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椎结箕踞，乃其旧风”^[42]，土著文化仍占一定优势。这种地区反差，

恰好说明岭南文化各个组成部分这时仍处在激烈的碰撞和整合之中。

五、南汉文化建树

五代时期,岭南为南汉刘氏政权割据,保持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对岭南文化发展还是有过一定建树的。特别是五代为我国第二次移民高潮,它对岭南的影响比第一次更加深入和扩大,余波直下海南,如苏东坡后来指出的,“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43]。统治岭南的刘氏来自中原^[44],深知文化对国家政治经济的重要作用,故“所招用多中朝名下士”^[45],包括:一为避乱再迁世家,如刘隐对“唐世谪宦子孙遭乱不得返,及因乱避地来岭南者,多留为之用焉”^[46];二为唐和后梁派到岭南的使节、官吏,“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47]。这样,南汉境内“名流毕集,分任得宜,岭表获安”^[48],使在唐代发展起来的岭南文化受到保护并继续发展下去。广州地区农作栽培初次出现“葑田”(又称架田或筏田),为利用水面种植水稻而不与其他作物争地的新农艺。它直到宋元时始流行于江南地区,南汉陶瓷文化在全国居一定地位,在南海官窑遗址,已发现广东早期生产的青瓷釉下彩,广州市郊石马出上的青瓷罐,为五代时南方青瓷代表。冶铁业也颇具规模,所铸铁索、铁柱每条重数万斤;所铸铁塔和佛像逼真,今存广州光孝寺铁塔,为我国现存铁塔最早最精致者。刘焜营建广州都城,曰“新南城”,包括兴修多座宫殿,以及多处离官别馆和

风景园林等,后来多成为著名风景区,如荔枝湾、药洲等,也是广州古都文化的宝贵历史遗产。南汉政权极力开展对外贸易,引进外来文化,例如在广州“广聚南海珠玑”^[49]。有不少史料说南汉最后一个皇帝刘铤貌酷似番鬼,或者至少可以认为南汉主刘氏带有波斯或阿拉伯人血统,又宠幸波斯女子,所以他们较多地引进阿拉伯文化,亦在情理之中。总之,从历史发展连续性来看,岭南汉文化因为有了南汉时的相对稳定发展,到宋代才得以形成为岭南文化主体。

第四节 宋元汉文化成为岭南文化主体

宋元是广东经济开发的一个承上启下时代,奠定了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这使文化与社会经济达到同步发展成为可能。在前代积累基础上,汉文化发展为岭南文化主体,而少数民族文化则各向分异方向发展,共同构筑起岭南文化体系,并形成了广东文化地域组合的大致轮廓。

一、两宋移民高潮与三大民系形成

北宋末和南宋末,金人和元人相继南侵,大量灾民流散到相对安定的岭南。这两次移民人数多,规模大,时间长,素质高,分布广,对岭南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影响最为直接和深远。据王存《元丰九域志》统计,北宋后期在今广东境内户口数中,主户占61%,客户占31%,略高于唐代广东境内总户数,

而北宋初广东客户仅占总户数 13%。由此可知宋代广东户口增加主要是由于岭北人口南迁。元代广东主客户虽无具体数字,人户绝对数较宋代增加无几,但宋代隐匿人户甚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元代客户比重也应是较高的。这些客民以珠江三角洲、东江和韩江谷地、雷州半岛等处最为集中,而北方南下交通干线所经南雄和韶州客户却很少。现今珠江三角洲各县居民,以及他们的族谱、家谱常说自己远祖来自南雄珠玑巷,实际上这些移民仅取道珠玑巷南下而已。除了逃避战乱,南下移民还包括经商、从征、戍守、逃荒、贬谪等人口。如广东沿海很多移民来自福建莆田、漳州,多为经商而留居。而琼雷多荒地,成为人多地少的闽人人居之地。

两宋移民特点,一是多来自江南,比较了解和容易适应岭南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二是有意识,集体迁移,聚集而居,形成一股股强大地方势力。例如据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载,宋室南渡时,取道大庾岭珠玑巷集体逃亡,首批“逃窜荔枝山下者万余人,乃结筏顺水漂流南徙。第二批集体南迁就是罗贵等之三十三姓九十七家人口。……第三批集体南迁为元兵扰攘,逼近南雄,众避兵燹,仓惶登程”^[50]。据同书统计,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这些移民,共有 73 姓 165 族,聚居于南海、番禺、新会、香山等地。福佬、客家人迁移,每多类此,故能形成相对独立的民系;三是具有文化优势,中国经济到两宋已完全转移到江南,江南也同时成为人文渊薮。江南文化比中原文化更接近岭南文化,其对岭南意义也更大。这些移民有的先人为主,有的反客为主,与原居地越人或早期的移民长

期接触,进行语言和其他文化交流,渐渐以方言和其他文化特质为表征,大抵在宋元时期,初步形成广府、福佬和客家三大民系,也是汉文化载体在广东的三个主要人群。此后,虽然移民运动仍时有发生,但已不可能打破宋元业已形成的广东地区民系结构。三大民系地位一经确定,新移民到来,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带来广东社会巨变,只能在既定社会文化结构下存在和发展。所以说,宋元为岭南文化发展史上一个转折时代。

二、少数民族汉化及其传统文化区形成

宋元时代,在赵宋怀柔和元人铁血政策交替使用,以及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之下,岭南古越族已基本被汉化,加入到汉民族大家庭。隋唐及其以前史籍中常见的“蛮夷”、“俚”、“獠”、“俚獠”等古越族各分支名称,这时已经不再出现或者很少出现,而开始使用专用族称。例如生活在粤北、粤西和粤东等地的少数民族被称为“瑶”或“莫瑶”,海南古骆越后裔也由俚而称为“黎”,主要生活在粤东的古越族被称为“畲”。这些族称以后很少变更。名称的演变间接反映了他们民族文化和分布区域的变化。例如海南黎族,于宋代汉化不断加深,从沿海到五指山腹地,基本上形成三个环形文化分布带:外层沿海州县为汉化黎族区,已完成民族融合,那里的黎人属国家编户,接受汉文化,送子弟上学,从事与汉人一样的耕耘农业,甚至改为汉姓,被称为“黎裔汉人”;中间一层即所谓“熟黎”地区,

“熟黎”归附州县统治,基本上汉化,以耕耘农业为主,但保留一定的渔猎和采集方式,宋文献称“熟黎能汉语,变服入州县圩市,日晚鸣角,结队而归”^[51];第三层即所谓“生黎”地区,深处五指山腹地,在州县统治范围以外,“无城廓,殊异居,非译难辩其言,不知礼法,须以威伏,号曰生黎”,基本上未接受汉文化,被封建统治者斥为“顽如生铁,不服教化”。到元代,黎族完全退入山区,汉文化继续向内深入。这三个文化层次带相应向内推进,其基本格局,保持到近现代。又如瑶族,隋唐时过着原始游耕和渔猎生活。宋元时汉文化随着封建政治军事势力深入瑶区而得到弘扬和传播,瑶也有“生瑶”和“熟瑶”区别。宋人朱辅《溪蛮丛笑》谈到端溪砚石时说,“金系带砚石。……熟瑶亦能砥砺”^[52]。包拯出守端州时,“水厓山瑶,熟化奔走,恩威并至,岁乃大和”^[53]。实际上许多过去古越族生活地区,宋元时都被汉文化覆盖。例如古高凉地区,“自隋唐以后,渐袭华风。体明之化,沦治于兹,椎跣变为冠裳,侏僂化为弦诵,才贤辈出,科甲蝉联。彬彬然埒于中土”^[54]。在这里已经分不出汉俚民族文化畛域了。

但是,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宋元时仍有为封建势力所未到或拒斥汉文化的少数古越族,依然保留着明显的古越族文化特征;同时也由于宋王朝推行加强中央集权、“强干弱枝”政策,加深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使退居山区的少数民族脱离民族融合方向,在山区振兴起来,加强了自己民族特色,形成所谓传统文化区。例如上述“熟黎”、“熟瑶”和“生黎”、“生瑶”的分布区域,就是程度不同的此类文化区。这也反映了

岭南文化在这一时代以汉文化为主,同时与少数民族文化共存的特点。

三、农业土地利用改观的文化意义

文明或文化基础在于开发、利用自然条件与资源。只是到了宋元时代,人们对岭南地理环境才有较多认识,特别是在掌握了沿海低地和冲积与三角洲平原的特点与规律以后,开始了以围垦为中心的土地利用高潮,在农业技术进步各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明显地改变了农业土地利用面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这是广东社会摆脱蛮荒、落后,走向文明与进步的滥觞。

唐代广东始有水利建设记载,到宋元已广泛而较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包括修筑堤围、陂塘、沟渠,以及排灌、防洪、去卤等建筑和设施。它们不仅保障了农业生产,而且作为一种新文化景观,也是人类改造自然胜利的标志。土地有了堤围,得按不同属性加以开发利用,于是出现围田、沙田、基塘等土地利用类型,分别种植水稻、桑、蕉、水果以及养鱼,生产大量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供应市场。广东稻作文化在全国享有很高声誉。北人南迁,保持面食习惯,加上政府推广和气候等原因,北方旱作文化在岭南扎根开花,宋代广东小麦种植很普遍,在广东农业文化史上有特殊意义。此外,经济作物生产也崭露头角,广东出产的甘蔗、槟榔、水果、棉花及其制品不仅闻名遍迹,而且给土地利用指明了方向。这些作物驯化、栽培、推广、

产品加工、销售等所需要的许多技术手段和流通渠道,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它们的成功,正是文化进步和传播的结果。

四、城镇建筑文化走向成熟

隋唐岭南许多州郡县城,虽为政治中心,但有不少有治无城,或城镇规制很小,无补于城镇文化景观的形成和集中。到宋代,修筑府州县城在广东普遍兴起。这不但打破了古典城市规划制度,而且导致建筑文化革新,并日益走向成熟。例如广州作为路、州、县三级行政建置治所,城垣扩建和修缮达十余次,按京城规制具体规划布置官署、坛庙、学宫、道路等位置,以及划分功能区等,显示广州城市规划与中原一脉相承。其他州县除修治旧城以外,宋代增筑州军县城的就有香山、乳源、英德、阳江、化州、琼山、朱崖军(崖城)、梅州等。这些地方皆筑有城墙、城楼、护城河等。保存至今的宋代潮州城图代表了这一时期广东城镇布局的基本格局和文化风貌^[55],与全国其他地区城镇没有原则差异,反映了广东城镇规划制度亦已定型,此后不过在其基础上扩大、改造而已。宋元广东各地建筑业相当兴盛,各类建筑物大量增加,普遍使用砖、木、瓦、灰、沙、石、铜、铁等建筑材料,木、石雕饰和彩画也越来越多,已见的大小和形式不同的木构建筑,其构件的基本形式、用材标准和加工已经定型化。例如这时住宅平面布局多用四合院式,与中原城市一般平民所居相同;在建筑物组合上,单体建筑面宽、间数

少、间隔较窄，环廊多有石栏杆，与其他地区由前厅、穿廊、后寝组成的工字形布局相似；广东现存最早寺庙木构建筑物是宋代广州光孝寺大雄宝殿、肇庆梅庵前殿、元代德庆学宫前殿等；塔也在宋代大量出现，如南雄三影塔、河源龟峰塔、六榕寺花塔、阳江北山石塔等。宋代潮州湘子桥是砖石结构的中间为启合式的木梭船浮桥，为中国桥梁建筑一大创造，许多地方多孔石拱桥的建筑工艺技术亦有很高成就。此外，祠堂、公私园林、别墅也相应增多。这些建筑进一步借鉴中原和江南风格，同时又结合岭南地理特点，注意到景观和观景关系，内外渗透，因形就势，轮廓变化灵活，艺术形象丰富，建筑细部向精巧细致方向发展，显示广东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已达到成熟阶段，而其所反映的时代文化内涵，与内地无多少区别。

五、文教肇兴和流寓人物对传播汉文化的贡献

宋元是中原文化南下的全盛时期。它的成就除了奠定广东物质文化基础以外，还开创了广东文教肇兴新局面。自此，封建文化在广东才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上承隋唐、下启明清的大转变。

广东儒学设置过去甚为寥落，宋代始得到较大发展。以仁宗时在广州建州学为发轫，到南宋时全部州和一半县都设立学校，南迁官绅还为族中子弟创办书院，聘请宿儒名流讲学。这些学校推动学风兴起，培养一批科举人才。“粤东为天南奥区，人文自宋而开”^[56]，宋代广东学业景观焕然一新。我国方

志发展到宋代已经定型成熟,而广东过去所修方志本来就很少,加之年代久远,到宋代已几乎不存。在北宋政府重视下,广东修志勃兴。据道光《广东通志·艺文志》统计,宋元广东修志书凡 59 种,但凡州都有州志,少数县有县志,如王靖《广东会要》、陈岷《南海志》、孙崇《南雄州志》、储翟《雷州志》、《万安军图经》、陈大震《南海志》、《潮州三阳志》等,皆为其时重要地方志,惜今仅存后两种了。方志增多,表示人们对广东了解已经不少,也是文化发展的一种见证。另外,秦汉以降,虽有杨孚《异物志》、王范《交广春秋》、葛洪《抱朴子》、《金匱药方》、王定保《唐摭言》和胡宾王《刘氏兴亡录》等私人著述,但毕竟是凤毛麟角,而宋元这类著作已很多,有代表性的如陈昭《太平圣惠方》、余靖《武溪集》、《海潮图序》、苏轼《海外集》等,皆为汉文化传入广东的结晶。

不管怎样,宋元岭南文化仍比中原落后,因而它仍是朝廷贬谪官员之地。其人数之多,涉及地域之广,超过了唐代。仅贬海南的宋朝高级官吏就有苏轼、秦观、卢多逊、米芾、丁谓、李纲、赵鼎、胡铨、李光、范曄、杨万里、刘克庄等人。他们的到来,像群星殒落夜空一样,照亮了文化荒凉的岭南大地。他们对当地开疆文化发展是有贡献的。例如苏东坡先贬惠州,将原先积水洼地经营为西湖风景区,推广水碓、水磨和秧马等新式农具,促进农业文化进步;后再贬儋州,在那里推广汉语,后来形成一种夹有四川口音的儋州方言,称“军话”或“东坡话”。他热情指导和鼓励黎族人民学习汉文化,使一些人后来进入仕途。自此儋州“文学彬彬,不异闽浙”[57]。他还教当地人打井,

革除不良风俗。苏东坡父子在海南撰写的一系列诗文,是开疆文化杰作。此外,李光在琼州、胡铨在崖州都曾办学兴教。这些流寓官员的遗迹遗存,后来多成为人文胜地,如英德“坡翁堂”、惠州“合江楼”、海口“五公祠”、儋县“载酒堂”、崖县水南村“盛德堂”等,都是汉文化在岭南传播的历史见证,至今仍为游人仰止。

第五节 明清岭南文化原型建立和勃兴

明清是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此期间,广东已摆脱过去的落后状态,跻身全国先进地区行列,也迎来了文化发展的兴旺局面。不但前期上升为岭南文化主体的汉文化进一步生长壮大,而且由于西方文化更多传人,岭南文化被丰富、充实以新的有用养分,逐步整合成一个多元文化体系,造就了岭南文化原型。随着广东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生长,以及内外联系和交流的加强,岭南文化更以崭新姿态和装束,出现在全国文化地图上,令世人刮目相看。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岭南文化走上半殖民地发展道路,这一阶段才告结束。

一、土地利用景观基本定型

明清农业技术进步和商品经济活力,把广东传统农业推向空前高水平,土地开发利用进一步成为经济发展轴心,其景

观也基本定型,此后不过在此基础上有所更新而已。

明清广东由于全面开发沙坦、荒地和山地丘陵而扩大的耕地面积远远超过了前代。在经济规律左右下,这些土地被各类作物分割或综合利用所形成的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各地农业文化特色。在珠江三角洲,大片沙田为水稻占领,而围田则为蚕桑、甘蔗、水果等经济作物覆盖或是水稻所在,在粤东、粤北等地山区,随着客家人大量人居,梯田成为上地利用的一种主要方式,而琼、雷干旱地区以及各地荒坡山麓,主要种植以番薯、粟类、玉米等为主的耐旱作物,在一些城市郊区,园艺业也发展起来。这样,稻作、经作、旱作和园艺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分布格局相继形成,成为广东农业文化空间基本构架和景观单元。例如除了珠江、韩江三角洲为典型经济作物集中分布区以外,还有不少特殊文化景观。以抽烟而言,到清代,从“公卿士大夫逮下與隶妇女,无不嗜烟草者”^[58],成为市井和乡邑文化一大景观;以饮食文化而言,清代闽粤一带,“无不食落花生油,且膏之为灯,供夜作”^[59],又为人类夜晚活动提供方便。此外,明清传进多种瓜果、蔬菜、花卉等作物也成为不同类型土地的占领者,参与当地传统文化空间。

二、花繁果硕手工业文化意义

商品经济活力使更多手工业脱离农业,并逐步向城镇集中。明中叶以后,广东手工业进入兴旺时期,一些手工业生产工具、设施得到改良,技术越来越精巧,分工精细,产品质量和

数量也有很大提高,并且很讲究艺术风格。广东冶铁、陶瓷、纺织、制糖、食品、造船以及工艺制作等部门在全国居重要地位。佛山冶铁、石湾和潮州陶瓷、佛山和广州丝棉纺织品等成为广东手工业文明代表。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人们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也为城市经济文化繁荣和对外交流提供雄厚物质基础。广东所产棉、丝、麻、蕉、葛等纺织品,种类繁多,花色鲜美,满足各界人士不同需要,如广州织造纱缎“甲于天下”,“金陵、苏、杭皆不及”〔60〕,大量输往海内外,广东陶瓷产品分为日用、美术、园林、建筑、丧葬陶瓷等几大类,以美观实用著称,广泛用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如所制茶壶、酒瓶,外观很优美,每每刻有赞美茶满的诗句,为各界人士喜爱。还根据国外人士需要,生产日用陶瓷和人物造像等工艺品,也常镌刻外国宗教饰纹和警句,其产品称为“广东珐琅”或“洋彩”,与其他陶瓷产品一起远销海外,所以南海丝绸之路又称陶瓷之路;广东所产蔗糖,分片糖、砂糖、冰糖等多个品种,销至苏州、天津和东西两洋,以糖为原料的食品多而普遍,风行全国,其加工手段和产品种类,与近现代的没有多少区别;广东雕刻工艺是全国富有地方特色的流派之一,包括玉、石、木、骨、象牙、角雕等,广州是全国有数的雕琢中心,所雕象牙球,剔透玲珑,技术卓越。木雕广式家具,用料讲究,不加漆饰和装饰纹样,颇受西方文化影响,上刻花鸟虫鱼,自成风格;广州所造眼镜,乃以水晶而非玻璃制成,仿于西洋又胜于西洋,曾得到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高度评价;广东造船业在全国居重要地位,所造大小、用途不一的船只,统曰“广船”,经常航行于南海和印

度洋航线上,为广人超越海洋,走向世界提供强有力的工具。造船业极大地支持了广东海洋文化的发展。

三、城镇勃兴和建筑高潮带来文化巨变

明清城镇地位和作用大大提高,成为社会经济和文化集聚中心,其文化景观更向多类型、多层次方向发展,基本上构筑起广东近代城镇文化风格。

明代广东在增建州县同时,新圩镇也大量涌现。嘉靖年间各府州县有圩市 439 个^[61]。清代在商品农业基础上,圩市发展更快,仅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乾隆时就达 570 个之多。清初,广(州)——佛(山)——陈(村)——(石)龙广东四大镇作为一个城镇系列已经形成。其他地区以府州县为核心的城镇体系亦初具规模。它们的性质、职能,规模虽然不一,但总趋势是朝着多功能和专业化两个方向分化,从而使其文化风格和景观也发生相应转变,成为明清广东城镇文化的主要特征。例如广州已建立起作为我国古代大城镇、华南经济中心的原型,其多姿多彩的传统岭南城市文化风格亦告确立。广州城区主街和重要商业区西关兴起于明到清,成为今天主要市区的一部分。广州许多手工业明清时已闻名天下,其中广彩、广雕、广绣以及其他广货,还有粤菜、粤剧、音乐、绘画等作为岭南文化代表亦先后诞生。明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人科尔沙游历广州后说,广州是他在世界上所见到的最富庶地方,那里有坚固雄伟城墙和宽阔街道,无数帆船在珠江河面上来往如梭,还有

繁华的商业市场,以及经营瓷器、丝绸的商店^[62]。另一位葡萄牙传教士克罗兹也有类似描述,他说广州出口物品,从绣花鞋、彩漆绘画盆、硬木家具到镀金铜盘等都是绝妙的艺术品,广州主要街道比里斯本还要宽阔,留下一幅古代历史文化名城的真实画卷。工商巨镇佛山,“冲天招牌,较京师尤大,万家灯光,百货充盈”^[63]。粤东巨镇潮州,高超木雕技艺,精湛潮绣皆在明清时形成独特风格,主要是这个时期潮州奠定了它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普通圩镇这时也多形成地方文化特色:河港城镇江门船只“千艘如蚁聚”^[64];顺德基塘区圩镇龙山“百物辐辏,商贾常满”^[65];位于东江三角洲水网区增城新塘镇,“十里娇歌传玉笛,一湾残月泊沙堤”^[66],充满水乡风情。

明代全国掀起大规模筑城高潮,广东大部分府州县城得到重建,达到广东古代城市建筑史上一个高峰,至今广东保留或残存城垣、城楼等建筑主要是这个时期兴建的。如广州将宋代东城、西城和中城合一,修建著名镇海楼(五层楼);肇庆在宋代子城基础上重修城垣,加高城南大堤,将七星岩经营为风景区;潮州、惠州、韶州、雷州等府治都有过浩大筑城工程,皆形成日后城市轮廓。各种园林建筑也随城镇规模扩大而迅速发展。具有代表性的广东四大名园这时先后落成,更有大量营业性园林分布在城内外,每为骚人墨客雅集、仕女游春之所。在建筑技术和装修方面也有所创新,如大量使用砖瓦等建材;出现千斤顶、手提卷扬机等简单机械;砖刻、石刻、木刻、彩画,以及陶塑、灰塑、瓷贴、铜铁、玻璃饰件等装修工艺非常普

遍。佛山石湾陶瓷塑像(俗称公仔)和潮州金木雕成就甚高,达到巧夺天工、富丽堂皇的地步。广州陈家祠、佛山祖庙、高要和文昌文庙、潮州纪略黄公祠即为其时的代表性建筑。在城乡中出现以大家庭为单位的封闭式独立住宅建筑,如广州西关大屋,粤东“客家大屋”等。为抵御外侮,沿海多修建沙石土筑炮台。此外,各地还有大量不同材质和风格的风水塔、牌坊、石基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区性特点。其中也不乏优秀作品,反映了明清建筑在广东建筑文化史上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

四、西方文化滥觞

16世纪中叶,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从此揭开了西风东渐的新时代。西方文化首先流播广东,并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被注入中国文化系统,也揭开了它与岭南文化交融和冲突的序幕,并最终成为岭南文化一个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占领澳门。此后,澳门很快崛起为世界性贸易巨港和国际公共留居地,汇集着来自不同国度、种族、民族以及肤色各异的人群。他们带来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遂使澳门成为中西文化接触、交流的中心和向内地传播西方文化的基地。葡萄牙人首先在这里移植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包括修建天主堂、修道院、学校、医院等西洋建筑,集中了西洋技艺、仪器、服饰,推行葡文、葡语、葡服等,使当地居民“集染已深,语言习尚渐化为夷”^[67],到万历年

间,澳门“今则高居大厦,不减城市,聚落万矣”。^[68],形成近代城市景观。万历三年(1576年)在澳门成立主教区,澳门成为天主教在东亚传教的中心。更有不少耶稣会教士假道澳门竞相来华,把西方天文、地理、测量、数学、水利、语言、音乐、美术等介绍到中国。特别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前后居留澳门20年,经常往返于澳门和肇庆之间,在广东内地传教15年,后来还到了韶关、南京和北京等地。他在肇庆建立了中国第一间天主堂——仙花寺,编制了第一部中西文字典——《葡华字典》,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坤輿万国全图》,以及第一部中文天主教义——《天主实录》等。后来还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西洋近代科学著作,成为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入清以传教士为主的中西文化交流虽然有过曲折,但在广东渠道或明或暗,并未中断。在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天主教堂和信徒数量仍在上升,礼拜成为风气。基督教也在清中叶重新传入广东,在广州和澳门进行一些开创性宗教和文化活动。如出版马礼逊译《新约圣经》、第一部《华英字典》,以及英文《中国丛报》、《广东纪录报》、葡文《蜜蜂华报》、中文《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等,在沟通中英文化交流方面起了桥梁作用。此外,还在澳门、香港和广州创办全国最早一批西式学校、医院,培养中国最早西医生,传播西医技术,形成看西医的社会风气。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西方文化在中国的立足和扩散,几乎无不以广东为基地,继而向北传播。

西方文化传入,使人耳目一新。例如利玛窦介绍世界各国

方域、文物、风俗、习惯和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及其与各国在地理上的关系等,补充了中国古代对世界地理认识之不足。正如清代学者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的:“地圆之说,直到利氏东来而始知之。”又利氏在肇庆展出绘有欧洲城市、宫殿、拱门、桥梁、大庙画册,许多人对西方物质文明深为惊讶。建国初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曾介绍过利氏以拉丁字母注汉字语音,并指出:“这是中国第一个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近代西方物质文明传入广东,也渐为广东吸收和仿效。到清代,广州也和北京、苏州一样,出现了制造、修理钟表的作坊。至今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清代钟表,有很大一部分是广州仿制的。

五、丰富多采的学术文化

植根于深厚的经济土壤,明清岭南文化成熟之果,不仅见于物质文化,也反映在学术文化上,在此基础上塑造了岭南学术文化原型。

明清我国修志很兴盛,现存方志主要是这时期所修。明代广东编纂方志 162 种,包括省府州县志等。清代直到鸦片战争前有 249 种,增加不少乡土、山水、寺庙、城坊志等。方志作为地方百科全书,保存了丰富的史料,也是地方文化发展历程的记载。清代修志州县分布比较平衡,表示落后地区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也是区域文化发展水平差异缩小的一种见证。

明清城镇发展,市民阶层地位上升,对文化生活提出更多更高要求;加上内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为文艺创作提供了

很有利的条件和素材。粤剧、潮剧、汉剧、琼剧作为广东四大地方剧种先后形成。此外，桂剧、梅县山歌剧、乐昌花鼓戏、粤北采茶戏、广东木偶、杖头傀儡等也相继问世并在部分地区发展起来。这些不同的文艺形式，各有自己独特的表演形式和艺术风格，拥有大量观众，在当地城乡或外地演出，深受各界人士欢迎。这也是岭南文化成熟的一种标志。

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发展，也造就了一个巨大人才群体。如《广东新语·文语》说的：“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先进政治家邱浚、海瑞，理学家陈白沙、湛若水，史地学家屈大均，诗人陈恭尹、梁佩兰，画家张穆、黎简、苏六朋等。他们许多著作，如邱浚《大学衍义补》、屈大均《广东新语》、陈恭尹《独漉堂集》等，都有很高学术价值，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也是岭南文化在封建社会最重要成就之一。

第六节 近现代岭南文化的蜕变与新生

鸦片战争的结果，使广东比其他省区更全面更深刻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质变同样席卷岭南文化各个领域。一方面是其封建文化日趋腐朽和没落，而进步的新文化也在萌芽和生长；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比以前更积极地在广东拓展它的影响、势力和地盘，使岭南文化全方位地置入一种崭新的文化参照系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加上华侨文化的形成和参与，岭南文化不断发生离析、崩坍、

扬弃和蜕变,虽然在经历这一过程之后,得到很大的改造,被涂上更多近代西方文化色彩,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旧的文化体系和文化风格。只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岭南文化才获得升腾和新生,特别是在近年改革开放大潮中得到振兴,同时也在经历一系列巨变,在动态中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文化风格和分布面貌。

一、传统农业土地利用改组

鸦片战争后,在封建自然经济瓦解的同时,农业商品化浪潮席卷广大城乡,广东传统农业土地利用迅速改变自己在文化地图上的颜色和符号,并随着所卷入国际市场的变化,建立自己的分布格局。特别是经济作物地位普遍提高,粮食生产进一步萎缩,作物对土地的空间占用和景观越来越朝单一化和区域化方向发展,显示更多近代农业文化特色。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基塘农业中,蚕桑种植面积随国际市场对生丝需求量上升而有增无已,呈畸形发展,广东很快跃为全国三大蚕区之一。但到1929年,在世界经济危机打击下,蚕业每况愈下,珠江三角洲许多桑基被蔗基或果基取代。可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因洋糖和台糖充斥,最终导致大规模砍蔗事件。广东发达的稻作经济文化自明中叶以后日渐走向下坡,战后更由于人口增加和耕地被经济作物占领而每况愈下,广东严重缺粮,许多人依赖洋米度日。在商品农业发达地区,稻作生产受到排斥,顺德“光绪末年禾田多半基塘。莳禾之田,不及什一”^[69],新会

“将沃壤膏腴不种稻而种葵”^[70]。只在尚未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陆地区,仍维持传统稻作生产。

战后,由于外来商品倾销,这种景观替代在经济作物空间分布上也大量发生,显示土地利用更多的时代特色。例如茶叶是经广州港大宗出口商品,战后欧洲殖民者在印度、锡兰、爪哇等地建立大规模茶场以后,广东茶叶生产一落千丈,茶场相继消失,南海“所产茶株百不存一”^[71],新会茶区荒废,河南茶绝迹,唯鹤山尚余少数茶山。棉花过去在广东分布很广,是人们主要衣料,“几乎无男不种植(棉),无女不纺织”。但战后在大量洋纱洋布充斥打击下,广东植棉业一蹶不振,“往往数里之内,不见一棉”^[72],甚至连僻在海南一隅的感恩农村也“迄洋纱通行,自纺均废”^[73],很难听到机杼声。自此,基本结束自古以来存在的广东棉花种植历史和景观。

当然,在传统农业土地利用改组的同时,主要是华侨文化的参与,新作物不断从海外引进广东,包括橡胶、咖啡、可可等,逐渐占领过去未开发利用的土地,奠定了近代热作文化基础。

二、近代工业文明建立

近代西方物质文化是有其生命力的。战后,在广东有着悠久历史和发达的传统手工业,都在质优价廉的外国工业品倾销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乃至湮没无闻,包括上述棉纺织业、冶铁业以及其他一些手工业。例如佛山著名的冶铁业许多部门,战后不是“制造日少”,“仅存数家”,就是“离散殆尽”^[74],

乃至“荡然无存”^[75]，以后佛山连制鞋用的“一针一线，几无不来自外国”^[76]。这代表了岭南手工业文化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同时预兆着新时代的开始。

战后，广东即利用它吸收新式工业技术的优势，主要从19世纪末叶以后，相继在广州、九龙、香港设立船坞，在广州创办电灯、机器、铸钱，在佛山创办火柴，在南海创办造纸，在汕头创办豆饼厂，以及个别地方开矿等。到20世纪初，广东近代工业在全国已居一定地位，其中制糖、火柴、制油、制蜡为全国第一；制线、针织、成衣、陶瓷、印染、皮毛、制革等名列前几名。1912年全省有工厂2426家^[77]。30年代，广东政局相对稳定，工业有较大发展，除在大中城市建立水电等公用事业外，橡胶、硫酸、烧碱、水泥等工业也建立起来。它们虽然是凤毛麟角，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广州、香港等城市向沿海河岸扩散，总归是一件新鲜事物，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改变了一些地区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而且对开拓人们的文化视野，启迪民智，从而带来社会文化风俗的异动，也起到先锋和示范作用。实际上，这些新兴产业奠定了广东近代工业构架，也是岭南工业文明一个充满生机的开端。

三、城镇文化景观的革新

近代城镇商品经济发展，要求剪除一切束缚它的罗网，其中包括作为中国封建文化象征之一的城墙。这同时引起城市规划制度、建筑形式和风格的变革，由此又牵动城镇景观的改

组,乃近代广东城镇文化发展一个里程碑。

民国初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原来许多府州县城掀起以拆城墙、开马路为中心的市政建设高潮。结果不仅城区范围扩大,新式马路也同时建成,并构成道路网络;两旁不同风格的新式建筑渐渐取代旧式建筑,商店向马路开门,形成敞开式门面;加上电灯、自来水、汽车、电话以及其他市政设施兴起,组合成新街景,体现近代城镇文化风格。广州、肇庆、惠州、梅州、琼州(海口)等城镇先后完成了这一景观的转变过程。此后城镇建设,也多有一定规划为指导,形成明显的功能分区,如广州西关商业、城内行政、东山住宅区等。近代城市功能运行所需要的各部门和设施,如政府机关、银行、公司、商店、茶楼、旅馆、公园等建筑风格既多种多样,又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形成南国城镇特有风采。如街道两旁骑楼,即为西方文化与地方环境相结合的产物,而沙面西洋建筑,则是殖民地文化入侵广州的痕迹。此外,西方饮食、娱乐、服饰、风俗等也首先在广州、香港、澳门等港口城市传播,并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以致在这些城市同样可以领略异国生活某些风味。这无一不表明,广东古代城镇文化景观原型在战后已被时代潮流冲得支离破碎,经过拼接和整合,始形成一批半殖民地式城镇,参与近代岭南文化系列。

四、新制度和观念文化兴起

战后,东潮西风更加强劲,猛烈地冲击着儒家文化在广东

的统治地位,为移植近代西方制度和观念文化廓清道路。它们作为一种凝聚着西方近代文明的高势能文化,不但给近代岭南文化体系增添新构件,而且它们广泛传播所产生的结果和影响,也有助于推动岭南文化走向新生,并使广东成为近代中国新文化中心之一。

首先是公私创办新式教育机关,包括改造旧式书院和设立各级新式学堂,从教学内容到教学形式都有所改革。另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宗教迅速在广东传播,教会办学也获得迅速发展。到1909年,全省有中小学和师范等学堂1694所,学生86437人^[78],分布各府州县。再有一些大学和专门学校,主要分布在广州、香港等城市。这些学堂或学校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空间,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对传播近代文化和中西文化交流发挥很大作用。

广东是我国近代报刊发祥地。战后办报在各地接踵而起,例如在香港办有英文《香港公报》、《华友西报》、《中国邮报》,中文《中外新报》、《华字日报》、《维新日报》等;在广州办的中文报有《述报》、《广报》、《岭南报》、《中外新闻七日录》;在汕头办的有《岭东日报》等,其他一些城市也有自己地方性报纸。到辛亥革命前夕,广东各流派创办报纸多达17种^[79],此外还有各种刊物。诸报刊相互争鸣推动,盛极一时,大开社会舆论之门,形成空前热烈的文化气氛。

通过教育、报刊、人员往来、学会活动以及商品运动等渠道,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语言、风俗、礼仪、文学艺术,以及精神文化各个方面,源源深入广东各个阶层人群和地区。这虽然

有些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一部分,但在客观上,对传播西方近代文化科学知识,开拓人们文化视野,增广见闻,打破封闭沉闷空气,反思过去,正视和批判现实,总归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即使到今天,这仍有某些借鉴作用。

五、华侨文化形成和参与

战后,大批华人出国,广东人居其大半,遍及世界各地。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吸收当时先进的西方文化和其他域外文化,通过探亲往返、书信往来等,保持与家乡联系;有的回乡办实业、教育、医院,以及其他福利慈善事业,影响或改变当地文化景观和结构。这部分由华侨兴起和传播的特殊文化,即所谓华侨文化。华侨文化虽然形成于海外,但其源头仍是中华本土文化。广东作为著名侨乡,华侨文化更是岭南文化一个子系统,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华侨文化拥有内地文化欠缺的许多优势,包括反映近代西方文化的重要成果,信息灵活,更新快,以及经济基础比较雄厚等。故华侨文化通过以上方式参与,给岭南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和养分,使之更具活力和开放性,对改变广东文化风貌,起了很大作用。近世海南热作文化肇兴,就是琼籍爱国华侨对发展我国热作农业和开发海南的重大贡献;新宁和潮汕铁路兴建也是华侨将西方物质文明移植广东的成功尝试;又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杰出历史人物或产生于广东华侨,或得到华侨的帮助,例如孙中山、黄遵宪、陈宜禧、詹天佑、司徒美堂等,

他们的气质、性格、思维和行为,都反映了西方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结合和发展轨迹。

六、近代岭南文化对外传播

像在烈火中涅槃的凤凰一样,经过近代历史洗礼、蜕变形成的岭南文化,对全国大多亚文化来说,是一种高势能和时代先进文化,故能以高屋建瓴之势,形成向国内外辐射格局,这也是岭南文化对人类文化的重要贡献。

战后五口通商的结果,我国贸易中心虽然转移到上海,但广东历史上形成的中西文化交汇点地位并没有动摇,它在吸收外来文化营养、壮大自己的同时,也不断向外传播。在国内,首受之区是湖南,继而指向长江、黄河流域。

粤湘两地源远流长的文化往来在战后发展到一个更紧密阶段。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湖南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区域之一,而与其相依的南方却是一个近代文化先进的广东,两地文化反差如此之大,岭南文化向北倾泻势在必然。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文化,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湖南,使当地人的物质生活方式、思想、价值观念和习俗都发生改变。以思想文化而言,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湖湘文化并没有提出新的思想武器,倒是谭嗣同、黄兴等志士仁人从广东接受先进思想,推动湖南维新运动。如谭嗣同说:“近年两省士夫,互相倾慕,结纳情亲,迥非泛泛”^[80]。当然除了湘人南下,广东人也北上宣传岭南文化。如维新变法前梁启超等在长沙创办时务

学堂,就给当时顽固保守的湖南社会以猛烈冲击。此后湖南新式学堂日渐增多,民智以启,风气日开,大批有识之士走出三湘,走向世界,所谓“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者也。近世发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也往往是广东倡之,湖南和之,广东鼓之,湖南舞之,然后扩散到湖北、河南以及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从太平天国到北伐战争莫不如此。这充分显示近世湖湘文化对我国沿海文化的选择对象首先不是上海而是岭南。

即使是近世上海文化,也不能摆脱岭南文化的影响。上海开埠之初,就有5万广东人移居上海,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岭南文化一次北上,至今仍在上海文化中留下很深印记。

战后大量华工出国,带动了岭南文化在海外传播。他们在侨居地形成华人社区,很多称为“唐人街”,保持着广东人语言、风俗、宗教建筑、艺术和人际关系,充满了岭南文化风格,实为岭南文化在海外延伸。在与当地人接触、交往中,这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侨居地文化风貌。例如粤菜扩散到美国,赢得当地人啧啧赞赏,广东年节风俗也在海外大行其道。产生于清末民初的广东月饼,也作为思乡之物在海外不胫而走,但品尝者并非全是华人。华侨办报也是传播岭南文化的重要方式。上世纪70年代,仅英属南洋各地52个埠头,就有华文报纸68家^[81],其他地区当不在少数。有些华侨经过艰苦奋斗,成为杰出政治家、企业家、种植园主或科技人才。他们在当地所创的业绩,也不无岭南文化基因,或者可以说是岭南文化在海外结成的丰硕之果。

此外,广东作为外国传教士、商旅等进入我国首途之区,

也就首先成为他们向本国人民介绍的对象。岭南文化借此流布海外。从早期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到本世纪初《中华归主》，都在不同程度上记载了岭南文化风貌，也是岭南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另一种形式和见证。

七、现代振兴和转捩点上的岭南文化

经过长期积淀，岭南文化在近代已经脱羽，定型为一种区域性文化体系，在全国文化地理格局中占有很突出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岭南文化不断得到改造、充实与提高，一步一步地走向新生。虽然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岭南文化在发展道路上也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反复，甚至受到“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灾难性破坏，但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以后，毕竟还是走上继续前进的道路。近年改革开放，一方面给岭南文化带来无限生机和活力，使它得到复苏和振兴；另一方面又使它面临着种种挑战。岭南文化现在恰处在这样一个新旧文化形态转捩点上，揭开现代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近年商品经济在广东得到充分发展，这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猛烈地冲击着与其相悖的一切旧的文化形态。与此同时，又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包括先进科技、信息、人才和其他文化资源；国内文化科技和人才也纷纷南下，使广东再度成为兼容南北、涵摄中外的文化荟萃之区，并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文化热潮，不断改变广东文化景观和地域分布，把岭南文化推向空前发展

的高度。例如至为常见农业土地利用类型,作物构成和布局,几无一不被市场供求关系所左右,而发生景观更替和占用;近10多年来,城乡建设日新月异,迅速改变各类聚落传统景观和建筑风貌;而随着各种社会往来日益频繁,公共关系、外语、甚至方言成为时兴;对知识和技术追求,在许多地区掀起“文凭热”、“读书热”高潮。人们在物质生活提高以后,对精神生活提出更多更高要求,各种文化娱乐设施应运而生;为适应部分人群或地区对文化需要而产生的所谓企业文化、街道(市井)文化、校园文化、特区文化等也风靡一时;华侨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至今得到高度重视,它参与形成的文化景观遍及广大城乡。岭南文化所赋有的某些品格,无论是开放意识、改革精神、还是生活方式、衣着打扮等,都已经或正在形成一个从南向北转移的冲击趋势,甚至成为全国某些文化领域的领导力量。这一切标志着岭南文化内涵日益丰富和扩大,并逐渐向高层次发展,也预兆着它黄金时代的到来。

当然,岭南文化目前正处于新旧交替过渡时期,在人们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各个层面上,随时随处都存在着新与旧的碰撞现象。即使在新文化景观背后,也会有一些腐朽或被扭曲了的文化现象,甚至还有一些文化沉渣泛起的角落。例如对神明、金钱、权力的迷信和崇拜,以及时下正在清理和打击的“七害”等。它们说明,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岭南文化,尚有许多不成熟和不完善之处,需要给予正确的引导和精心培育,这才有可能在发挥岭南文化优势的基础上,使之成为我国区域文化发展的--而旗帜。

注释:

- [1]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 [2]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7,宫语。
- [3] 《汉书》卷64,严助传。
- [4] 《艺文类聚》卷77。
- [5]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第6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 [6] 《周礼》卷38,象胥。
- [7] 《逸周书》卷7,王会解。
- [8] 《广东省博物馆馆刊》1988年第一期,第41页。
- [9] 雍正《陕西通志》卷45。
- [10] 嘉庆《山西通志》卷100。
- [11] 《史记》卷65,孙武吴起列传。
- [12]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1,广东二。
- [13] 徐恒彬:《试论楚文化对广东历史发展的作用》,见《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第74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 [14] 《吕氏春秋》卷23,《知化篇》。
- [15] 陈龙:《乌田考》,见《福建文博》1982年第一期。
- [16] 酈道元:《水经注》卷37引《交州外域记》。
- [17]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1,文语。
- [18] 《越绝书》卷3。
- [19] 罗香林:《百越源流与文化》第18页,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年版。
- [20] 《越绝书》卷8。
- [21] 吕昭仪:《对西汉时中印交通的一点看法》,见《南亚研究》1984年第2期。
- [22] 辛谷:《羊城传说与中原农业生产关系》,载《羊城今古》1992年第

3期。

- [23] 《史记》卷118,淮南衡山王列传。
- [24]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 [25] 正德《琼台志》卷7。
- [26] 《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见《文物》1977年第4期。
- [27] 《汉书》卷1,高帝纪。
- [28]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
- [29] 道光《广东通志》卷92。
- [30] 《北史》卷91,谯国夫人冼氏传。
- [31] 《晋书》卷73,庾翼传。
- [32]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第68—6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 [33] 《南汉书》卷9。
- [34] 陈铭枢:《海南岛志》第61页,日文版,昭和十四年,台北。
- [35] 《资治通鉴》卷194,唐纪。
- [36] 南京农学院《中国农学史》(下)第32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 [37]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第478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 [38] 张九龄:《张曲江集》卷13,《开大庾岭路记》。
- [39] 邱浚:《广文献公开大庾岭路碑阴记》。
- [40] 余靖:《[曲江]善化院记》,见《武溪集》卷9。
- [41]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第6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 [42] 《隋书》卷31,地理志。
- [43] 《苏东坡全集》后集卷15。
- [44]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南汉主是波斯人或阿拉伯人。
- [45] 《南汉书》卷1。
- [46] 《南汉书》卷1。
- [47] 《十国春秋》卷58。
- [48] 《南汉书》卷9。
- [49] 《旧五代史》卷135。

- [50] 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第9页,南雄县地方志编委会印,1985年。
- [51]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佚文(五),黎。
- [52] 朱辅:《溪蛮丛笑》,见《古今说部丛书》第一集。
- [53] 道光《肇庆府志》卷7。
- [54] 《古今图书集成》卷1357,职方典,高州府风俗。
- [55] 《潮州三阳志辑稿》第12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 [56]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事语。
- [57] 李光:《昌化军学记》,见《庄简集》卷16。
- [58]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3。
- [59] 檀萃:《滇海虞衡志》卷10,志果。
- [60] 乾隆《广州府志》卷48。
- [61] 嘉靖《广东通志》卷20。
- [62] 参见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第35页,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
- [63] 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
- [64] 道光《新会县志》卷2。
- [65] 嘉庆《龙山乡志》卷2。
- [66] 增城县政协《新塘镇志》,1983年。
- [67]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第29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 [68] 王士性:《广志绎》卷4。
- [69] 民国《顺德县续志》卷1。
- [70] 聂尔康:《冈州再续》卷1。
- [71] 宣统《南海县志》卷4。
- [72] 邹时庆:《番禺末业志》上商业第四,卷4。
- [73] 民国《感恩县志》卷1。
- [74]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
- [75] 麦仲华:《皇朝经世文新编》卷10。
- [76]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

- [77] 司徒尚纪:《近代广东生产分布的历史演变》,载《经济地理》1984年第1期第69页。
- [78] 《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宣统元年《广东学务统计表》。
- [79] 《清末广州几家日报简介》,见《广州文史资料》第10期。
- [80] 《谭嗣同全集》第十,治事篇,中华书局,1981年版。
- [81] 司徒杰:《广州与华侨文化》第7页,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

第三章 农业土地利用 景观与分布

文化与农业关系非常密切。在古代拉丁语和英语中，“culture”文化一词兼有“耕作”和“栽培”之意；而“agriculture”农业这一复合词，前半意为耕地，后半意为文化或耕地。由此，可以视“农业”一词为耕作文化的同义词。农业是文化基本模式中最基本要素，而农业又是以土地资源占用为基础的。这种占用即土地利用所形成的格局或文化景观，是一种最基本、最大量的文化景观，一方面有其历史演进轨迹，从古代植物驯化、作物系统形成、游耕农业到近现代农业诞生，代表了传统农业社会和近现代商品化社会文化的主要特点；另一方面又有其空间剖面，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的分布面貌，反映历史积淀下来的区域文化的重要差异。所以，农业土地利用景观已成为文化地理研究的一个核心和重要宗旨。

农业土地利用景观，既指单个作物对土地分割

利用,也包括不同类型土地由于共同利益相联一起所形成的统一利用,是土地利用的这种分割景观和统一景观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不仅是地形、土壤和气候的产物,而且是当地居民世代土地利用的结果。广东在这些方面区域差异颇大,最终形成农业土地利用景观空间分布格局也不相同,构成广东各地区域文化一个本质特征。

第一节 稻作文化景观与分布

一、稻作文化在岭南发生和演变

岭南具有水稻生长有利条件,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在曲江县距今四五千年的“石峡文化”遗存中,发现人工栽培稻的谷壳等物,其中包括籼稻和粳稻两个亚种^[1]。据专家研究,粳亚种是由籼稻普本型经人工选择培育而成的变异稻^[2],表明“石峡文化”所代表的岭南水稻栽培已达到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应是岭南稻作文化最早的一朵奇葩。此外,在曲江马坝泥岭、翁源坝仔下角垌和龙川坪头岭等山岗遗址中,都有与石峡遗存同时代的稻种出土,这同时说明稻作农业已有相当基础,岭南已成为中国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一部分,也是南越先民对我国南方农业的一项重大发明贡献。直到今天岭南人仍以稻米为主粮。根据上述遗址文化的内涵,结合史前地理环境,广东地区史前稻作文化主要分布在北江流域,文化源地为河谷阶地、河谷平原、盆地或缓坡。

岭南古代为越族人居地,种植水稻是百越文化特征之一。“耗,稻属,从禾毛者。伊尹曰‘饭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耗’”³,殷周时代,岭南种稻地区比考古发现当更广泛。古越语称“水田”为“那”,“那”字地名广布于岭南地区,尤以适宜水稻生长的北回归线附近至为集中。这些地区至今仍保持古越人对稻异称为禾的习惯。可以想象这些地名分布地区稻作文化一定很盛行。西汉司马迁划分全国经济文化区指出:“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⁴,稻米为主要食物来源。骆越人还称水田曰“骆田”。《水经注·叶榆河》说:“交州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按“骆”谐音“落”,因潮汐或洪水涨落灌溉稻田而得名。海南黎族先人为骆越一部分,汉代交州辖境包括海南岛,可见稻作文化完全可能在岛上发生。实际上西汉初汉人头一进入海南时,只见岛上一派“男子耕农种禾稻⁵”风光。由于耕作技术和生产工具进步,岭南一些地区已出现双季稻作制。东汉杨孚《异物志》载:“稻,交趾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熟”。佛山澜石东汉墓出土的水田模型,证实东汉时广东的确出现两造制,乃稻作文化一大进步。

但是,水稻是一种耗工多作物,它的推广需辅以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另外,古代人们对岭南湿热低地的认识和开发利用尚差,故直到唐代,岭南水稻生产水平还很低,不少地区还处于原始“刀耕火种”或“火耕水耨”状态,游耕农业居主导地位。《唐大诏令·政事·禁岭南货卖男女赦》云:“如闻岭外诸州居人,与夷獠同俗,火耕水耨,昼乏暮饥。”广东米谷尚不能自给,平原种稻并不多,珠江、韩江三角洲许多地区因而成为

野生动物的渊藪。

宋代,随着大量汉人南迁,带来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平原低地和水源充足台地缓坡被辟为水田的越来越多,加之这时优良稻种——占城稻的引进,一年三熟制形成,水稻才得到大面积推广,水田成为土地利用主要方式,稻米也跃居为当地居民主粮,标志着水稻作为一个作物系统已经形成。水稻是一种高产作物,它的扩展和产量增加,反过来又吸引大量人口向平原地区转移,促进那里的农业技术进步。宋代广东牛耕、铁器农具、水利和其他农艺进步更加普及和深入内地,有力地推动了粮食生产,广东成为我国南方重要的稻米产区。广州、潮州和惠州是广东三大米市,大量“广米”销售到闽浙等地。这说明稻作文化在广东日益走向定型和成熟,稻作生产支持了宋代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清广东围垦进入高潮,并推向沿海河流下游和海滩,开辟水稻新产区。如雷州附廓海康东海岸,“洋田万顷,……岁登则粒米狼戾,公私充足”[6]。此外,内陆许多山间盆地也有赖于水利事业发展而为水稻占据。如明末利玛窦在韶关附近所见那样,“平原上盛产大米和蔬菜。格外有幸的是有一条常年不息的河流流过平地的中央,灌溉着该地区”[7]。明清广东人民又创造出水稻栽培挣稿制,又称衬禾,在早稻间套插晚稻。道光《南海县志》说:“每于插早造十余日,即参插之,名曰挣稿,早造获后,苗乃勃发。”这是在地多人少、劳力不足、生产力不高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地力的一种先进耕作制度和切合实际的土地利用方式。同时流行于广东山冲田中的还有所谓夹根

稻,其特点是早晚稻种田时混播,早稻收后,晚稻始出,十月收获。五华县称此法为“撑子”,廉江称为“芮稻”。此外,更广泛采用龙骨水车,施用多种肥料,犁冬晒田,除了引进新稻种,还重视浸种、选种、品种搭配以及水稻旱播等。特别是在地狭人稠地区,人口对土地、环境压力日益加重,促使精耕细作农业在这些地区建立和发展起来,加速稻作文化进步。可以说,明清时稻作文化基本模式在广东已经定型和成熟,并作为一个文化系统,大部分传承至今。

必须追述的是,岭南人民还因地制宜,将种稻与养鱼相结合,创造了风格独到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据唐刘恂《岭表录异》载,新州(今新兴)、泷州(今罗定)的农户开荒造田,春天买来鲢鱼苗撒在田里,利用鲢鱼食性,把田里杂草连根吃掉,鱼群还可起到除虫和松土作用,鱼粪又能肥田,改良土壤,既提高了水稻产量,又可收渔利,一举两得。这被誉为“齐民之上术”。清代,珠江三角洲有稻田养鱼;晚近高要等地利用垦田、塘田,大多同时养鱼,或种稻一年,养鱼一年;或种稻二年,养鱼二年。稻谷产量一般都比连作稻增产,高者可增六成。而养鱼那年的产鱼量也高。除稻鱼轮作外,当地尚有稻鱼共栖制,并总结出两者间合理比例。直到今天,这种稻田养鱼技术,仍被认为是充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优良传统及生态农业技术,受到国际上的重视。联合国粮农组织从本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曾数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推广稻田养殖经验。亚洲和美国等一些水稻生产国都有不同程度的稻田养鱼,有的数量还很可观⁸。现在广东许多山区县,如罗定、新兴、连县、乐

昌等仍然有稻田养鱼的习惯。

本世纪以来,近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进步,使传统农业转变为近现代化农业,也给稻作生产带来革命性变化,从品种培育、耕播、管理到收成、仓储以至稻米加工、炮制,都注入许多新鲜内容。例如广泛施用化肥、农药、生长素、尼龙膜育秧,使用原子辐射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人造小气候等,现在广东光稻种一项就达1万多个。这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稻作文化内涵,使之成为近现代农业文化一部分,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稻作文化在广东的分布格局和景观。

二、稻作文化地域分布

广东适宜种植水稻的平原和盆地约4.8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22.7%。另有一部分易灌溉台地也可种植水稻。1950年到1983年,广东稻谷占全省粮食总产量87%左右,个别年份达92%。1984年稻谷播种面积占全省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83%。广东稻谷播种面积和产量在全国各省区中均居第二位,为广东农业文化最大结构单元。

根据水稻生产自然条件,广东可分为三个地带:一是北部山区,东起大埔,西至罗定、信宜一线以北地带;二是中部地区,指北部山区以南,西至廉江、化州、高州、电白、阳江以北及其以东大陆沿海地区;三是南部地区,包括电白一部分、茂名、吴川、湛江,至遂溪以南直到海南岛。在这三个地区内,水稻分布甚广,在大部分地区占当地总播种面积40—50%,高

者达 70% 以上,少数地区在 40% 以下。水稻集中种植地区在珠江三角洲、潮洲平原、鉴江中下游平原等地。

近年建立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已成为稻作文化景观典型。这些基地分为三类:一是生产水平最高的商品粮基地,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及其外围,包括以三水、石龙、崖门为顶点的三角洲地区各县,东江下游、西江、绥江和北江下游,潭江谷地,流溪河和增江平原等,面积约 3 万平方公里,覆盖 21 县市;二是新近出现的商品粮基地,多在独流入海河流中下游,包括漠阳江、南渡江、万泉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阳江、阳春、廉江、海康、澄迈、临高、琼海、乐东等县市;三是生产规模小,布局分散的商品粮基地,多为山间盆地,河流发育,河谷平地尽被辟为网状水田,分布在英德、翁源、佛岗、封开、新兴、始兴、海丰等县。

此外,在粤北、海南岛一些山区还残存游耕农业,主要种旱稻,是稻作文化的特殊分布区,也是古代流行的刀耕火种最后保留地。

三、稻作文化主要景观类型

稻作文化景观类型集中反映稻作与环境关系,也是稻作对土地分割利用的一种方式,每因各地自然和文化地理条件差异而有别,在广东大致可分围田、沙田、洋田、垌田、梯田、坑田、山栏地等。

围田:在河流下游冲积平原、三角洲平原或海河滩涂上,

为防止洪水或潮水侵袭而筑有堤围环绕的水田称为围田。这种水田土壤肥力较高,水利条件好,是上等稻田,也是典型的稻作文化景观。

广东围田始筑于唐代^[9],地点在高要金利镇的金西围,为唐末县官黄维坚所筑。虽然范围小,标准低,但毕竟是广东围田文化景观的嚆矢。宋元时期,珠江、韩江三角洲大规模围垦河汊、海滨、滩涂和浮露沙坦,围田成为平原低地土地利用重要方式。据统计,两宋 320 年间在今珠江三角洲 10 县(高要、南海、东莞、博罗、三水、顺德、中山、番禺、高鹤、珠海)筑堤 28 条,总长 66024.7 丈(220 公里),捍田共 24322.41 顷^[10]。这些堤围主要分布在西、北、东江干流两岸,如高要长利围、赤项围、盆塘围、香山围、竹洞围、腰古围、罗岸围、横桐堤;南海罗格围、桑园围、存院围;东莞东江堤、西湖堤、龙洞堤;三水格塞西围、永安围;顺德扶宁堤;番禺黄阁石基;中山小榄小围、四沙小围等。潮州、惠州也有筑堤围垦之举。不过宋元所筑大都是防洪堤,很少闭合成围,堤也低矮,多为土堤,鲜用石料,围内配以其他水利设施,包括渠道、窦闸等,围内阡陌纵横,遍种水稻或其他经济作物,围田景观初见规模。后来明人追忆宋李岩在东莞筑堤围垦的情景有诗曰:“长堤高下望无穷,遏住潮头不敢东。获得咸田千万顷,至今村落庆年丰”^[11]。

明清广东土地围垦进入高潮,土地利用成为经济发展中心,“高田处堰堤,低田用圩岸(堤围)”^[12],围田成为河谷平原地区主要土地类型。据诸史统计,明代珠江三角洲共筑堤 181 条,总长度 220400 丈(735 公里)^[13],围垦面积达 1 万顷以

上[14]；清代则达 190 条，总长 232093.2 丈（774 公里）[15]。据近人统计，从乾隆十八年到同治末年（1753—1874 年）的 121 年间，全省报垦数达 1.3 万余顷[16]。这些耕地以珠江三角洲为主，也包括韩江三角洲一小部分。它们不但沿河两岸伸延，而且推进到海坦，计有明代高要景福围、丰乐围、头溪围；三水与四会间大兴围和灶岗围；清远石角围、长岗围；三水鸦鹊围、高丰围、古灶围；南海良凿围、笕坑围、茶步围、波湾围、河瑚围、良安围；顺德南顺东西围、白驹围、大成围、大洲围、鸡公围；高鹤古劳围；新会天河围；香山北部和新会南部之西海十八沙、东海十六沙等。清代堤围在珠江三角洲主要集中在顺德、南海、番禺、新会、香山、东莞等县，尤其顺德境内，堤围密布，约占三角洲堤围半数。比较著名的有新会龙溪围、桂园围；香山古镇围、杭都大围及与新会交界的百顷围；顺德连成大围、七乡围和桂洲围等。此外，明清潮州增修北门堤、南门堤、东厢堤、江东堤、秋溪堤等；在雷州修筑东洋堤，分海康南堤、海康北堤及遂溪堤，为当地一项重大围垦工程。

明清江海滩涂大量开发为稻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先垦后围，即在沙坦浮露成陆后不筑堤围便先行垦殖，以后逐步筑堤发展为围田；另一种是先围后垦，在新生成沙坦上先筑坝，种芦苇，然后筑围，进行垦耕，即所谓“三年可以种菱，五年即可种稻”[17]，实际上是采用人工围海工程和生物措施与江海争地，与水患作斗争，向大自然索取财富，建立稻作文明。例如乾隆时仍是汪洋一片的万顷沙，到道光末年即已“用桩石圈筑堤坝，周围广三千余丈，约六十余顷，俱种禾稻”[18]，至宣统

末,即一个世纪左右,万顷沙共筑围 50 多个,围垦面积达 600 顷^[19],为清代围海造田一个缩影。不过这些田都属沙田了。

近代广东也新建和修并旧堤围,筑防洪水闸,扩大围垦。例如 1932 年建芦苞水闸,捍田 28 万亩;翌年在高要县境筑宋隆水闸,改建思霖、大榄、景福等围,捍田约 16 万亩;在顺德、四会、高要新筑了华南围、容寺围、蚬洲围等 9 条堤围,又把部分小堤合成联围;在东江三角洲 1924 年建设马嘶水闸,以及岗下、赤项、东岸、山尾、下南等基围,总长 267 公里,捍田 29 万亩。大抵其他河流河口区也有类似围垦工程。虽然由于旧生产关系束缚,这些堤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广东缺粮局面,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当地稻作生产,以后它们很多都成为广东粮食基地。

明代以降,广东围田文化内涵也大为改观,除了种稻,还广泛种植甘蔗、蚕桑、水果和其他经济作物,容当后述。堤围修筑工程技术也有很大发展,包括:一、创造载石沉船截流堵口办法,不但成功地消除倒灌,而且推广应用于水中围垦、筑堤、护堤和抢险。明初桑园围历史上著名的堵塞倒流港水口工程就是用这种办法兴建的;二、根据缺口长短、深浅和地形,结合水势修复崩决基围,使围田受灾后很快恢复生产;三、窦闸、沟渠相互配套,发挥排灌、航运等功能;四、土石兼用修堤或修筑石堤,以及挥土(泥瓜)修筑土堤,达到坚久稳固;五、在土堤外采取抛放蛮石,筑石坝,植树种草等护堤措施。近代则改为用钢筋、水泥、三合土等材料构筑各种水利工程,有效地维护围田安全。

围田: 实是早年围垦的老沙田, 但景观比沙田多样。经多年耕作, 土壤熟化, 水利设施齐全, 主要依靠电力排灌, 为高产稳产稻田或基塘区所在, 在一般耕作条件下, 水稻每亩产量可达 750—1000 公斤。围田区人多田少, 劳力充裕, 土地利用率高, 交通方便, 聚落密集, 堤岸蜿蜒, 生产大量粮食、花卉、鱼肉禽蛋。工副业也很发达, 为广东最富庶地区, 包括珠江三角洲上部, 即南海、顺德、番禺、新会, 以及广州、佛山、江门郊区, 主要分布在黄埔——市桥——龙江——江门一线以北地区。

沙田: 为三角洲新冲积的低地, 离海面不高而受潮汐影响大, 筑堤围成的水田, 在广东通称为沙田。沙田田面广大, 土壤肥沃, 但需排水与防咸。沙田以其形成年代之不同, 虽有高、中、低沙田之分, 但文化景观是一致的。

早年围垦的老沙田今已变成围田。而沙田的围垦明代始进入兴盛阶段。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记当时人们“买沙田争取沙裙, 以沙裙易生浮沙, 有以百亩而生数百亩者”, 说明沙田伸长速度在急剧增加, 上述所筑堤围很多包括了沙田。清末以来, 珠江三角洲延伸更快, 每年以 40—50 米的速度向海扩张, 有大片沙田被围垦出来, 成为新的粮仓。仅咸、同年间 (1851—1874 年) 的 24 年里, 广东承垦沙田 80 万亩^[20], 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 小部分在韩江三角洲。现在广东沙田在珠江三角洲约有 280 万亩, 分布在其前缘, 包括虎门、伶仃洋两岸之东莞、宝安、番禺、中山; 磨刀门、崖门出口之珠海、斗门、新会等地。其他一些河流入海口也有被围垦成片沙田。在西北

江三角洲,沙田界线在黄埔——市桥——龙江——江门以南。

沙田成陆时间既短,聚落稀少,耕者须远距离作业。大抵明清时,“农(民)以二月下旬,偕出沙田上结墩。墩各有墙栅二重以为固。其田高者牛犁,低者以人秧蒔。至五月而毕,名曰田了,始相率还家,……七、八月时耕者复往沙田塞水,或塞篴箔,腊其鱼、虾、蟾、蛤、螺、蛙之属以归;……禾既获,或贮墩中,或即舟载以返。盛平时,海无寇患,耕者不须结墩,皆以大船载人牛,合数农家居之”,^[21]这与沙田初时环境相适应。但经长期经营,沙田景观已非昔日可比。现在一望无际的沙田多被堤围和河汊分割,多数地区为清一色水稻,也有实行稻蔗轮作的。过去以人少田多之故,沙田实行两熟间作制,即农家所称“挣稿”,今已发展为早晚稻连作制。每月潮水上田,排灌自如,无旱涝之患,产量稳定且高,有些亩产可达600公斤,晚秋金色稻海、碧绿蔗林覆盖原野,并利用堤围广种香蕉等水果,还大养其猪、鱼、禽等,沿海营造防护林,皆为耐咸、抗风、耐浸树种;过去居民多栖身于简陋茅屋,饮用带咸味河水,交通梗阻,雨天满路泥泞,举步艰难。近年沙田景观大变,茅房多被瓦房取代,建起自来水厂、公路和桥梁,近现代工业文明已占据这些年青土地。著名作家陈残云在《沙田水秀》一文中写道:“沙田的景色是迷人的。丰收后一望无际的田野,显得特别宽广和美丽,纵横交错的小河涌,小艇穿梭如织;一排排翠绿的蔗林相映着乌黑的牛群。这仿佛是一幅色彩鲜明的织锦画”,展示出沙田景观是那樣的自然和秀美。

咸田:咸田是三角洲前缘海积平原或海滩,受咸害较重的农田。田面高程在海面以下或稍高于海平面,故高大坚固的海堤不可缺少。其围垦时间很短,多在晚近数十年,很多正在引淡洗盐、脱潜过程,水稻产量低而不稳。田内底部常埋藏有红树林残体,腐烂分解出对作物有毒害作用的强酸物质,故又有咸酸田、矾田之称。

咸田形成于现代,每为大小农场所在,集中了较大规模生产力和较先进管理方法,自成社区。土地按统一规划摆布,机耕道路、渠道和田块分割整齐,电力网、绿化带、居住区、行政管理区、文教区等功能分区明显,景观比较划一。汕头牛田洋、斗门白藤湖、台山烽火角、阳江平岗农场等,都是围垦滩涂、改造利用咸田建立起来的,面积可达数十万亩,现已成为新的粮仓,有的还向农工贸旅一体化方向发展,形成多层次综合性文化景观。

洋田:分布于河流中下游平原上的农田,在泛滥平原者为低洋田,在阶地上者为高洋田。前者利用河水灌溉便利,后者一般高出河床数米,需提水灌溉,靠近丘陵者靠蓄水灌溉。洋田土壤深厚肥沃,易于耕耘,一般实行水稻与花生等轮作,但以水稻为主,年亩产可达500—600公斤。

河流是稻作文化的摇篮。特别是在岭南,三角洲平原比河岸平原开发利用要晚,故洋田稻作文化渊源古老。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包括洞穴、山岗和土墩遗址等,许多都出土有原始锄耕农业(或称耜耕农业)所使用的耒、斧、铲,以及谷物加工工具磨盘等,附近河流经过,原始农业有可能在这些河流

两岸发生。直到宋代以前,河岸平原仍是水稻主产区。明清时期通过大量围垦,三角洲平原才压倒河岸平原跃居为水稻主产区,洋田水稻生产地区数量也相对下降。但河岸平原在各地大小河流沿岸均有断续分布,面积不小,人口密度也较大,如北江的清远、英德平原;粤东榕江、练江平原;东江杨村、惠阳平原;粤中潭江、高明河、流溪河平原;粤西鉴江、漠阳江、九洲江、南渡河平原;海南岛南渡江、万泉河平原等,皆是全省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只是河岸平原一部分仍受水旱灾害威胁,需采取堤堰、闸窦等农田基本建设,打破洋田景观的单调局面。

垌田:为丘陵台地地区宽广冲积地上的水田,一般田面比较平坦开阔,土层深厚、肥沃,广东农民称之为垌田,也是重要稻作经济文化区所在。

广东山区盆地星罗棋布,垌田多分布在盆地上。那里水源充足,地理上自成一小单元,利于生存和战守,故得以成为人类古代文明的一个个亮点,也是后来农业社会重要基地。特别是一些较大的盆地,如粤北的南雄、英德、翁源、曲江、连州盆地;粤东的灯塔、船塘、龙川、兴宁、五华、梅县、河源盆地;粤西的怀集、开建、罗定盆地;海南的乐东、通什盆地等,稻作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也非常丰富。1963年连县附城龙江一座西晋墓中出土一件陶犁田耙田模型,上有田埂、漏斗状排水设施、扶犁和扶耙陶俑以及曳拉陶牛等,即为垌田开发利用的真实写照。按垌(洞)为古越语,类今壮语,指山间谷地、盆地或小河流域,为古越人血缘氏族居地。隋唐粤西、海南俚人每以垌

为社会组织单位,洗夫人就是最大垌主。至今岭南垌字地名仍非常普遍,所以垌田稻作文化产生比围田、沙田早得多。宋代有个叫朱初平的地方官奏说海南“黎垌宽敞,极有可为良田处”,即指这类垌田,又说:“朱崖军颇有生熟黎垌米”[22]可以收余,想见产量颇丰。宋代以来人居岭南山区大量客家人,也以开垦垌田作为谋生手段之一。现在垌田仍是广东重要水稻产区,年亩产可达500—1000公斤,也是丘陵台地区土地农业开发一个重要方向。

垌田稻作生产,必须有水源保证,故水利景观至为触目。这—是陂塘蓄水和陂堰引水工程,二是人畜力和机械力灌溉。唐代增城已有“石陂水,在县东北一百五十里,灌田口余顷”[23]之说。南汉时大臣黄损在其故乡连县,“尝捐资筑高良之耶陂灌田,乡里赖之”[24]。宋元陂与山塘已成为丘陵山区最重要的农田水利形式,依靠拦水筑陂塘以蓄灌溉,按筑堰材料不同,可分木石陂、木陂、堆石陂、砌石陂等。著名的有连县星子河上木石陂、南雄连陂和凌陂(俱为石陂)等,山塘见于记载的有从化白水塘、龙川柳塘、整湖、白水塘等[25],都有效地保障垌田稻作生产。如宋代郁江(西江)下游许多地区都种水稻,“风俗……以水田为业,不事蚕桑”[26]。明清时垌田灌溉工程已很普遍。据道光《广东通志》记载,明洪武至嘉靖末(1368—1566年)近200年间共修主要灌溉工程160多处,清嘉庆末年(1822年)发展到309处。其中工程规模颇大,灌溉面积达100顷以上者有12座。蓄水工程以德庆县为多,共筑陂塘17处。而引水工程首推新兴灌田百顷以上有4处;北江水系

流布粤北山区,陂塘灌溉历史悠久,明韶州府共建各类工程 314 处,灌田 3200 多顷。清代差不多在同一地区共建 671 处,灌田 5785 顷,以小型工程为主,数量多,分布广,费用省,为当地民力所及,又适于耕地分散山区,效果颇为显著。又如南雄州清代新建一大批工程,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清丈,全州总耕地面积 56 万多亩,有水利设施的耕地 27 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48%^[27],其中陂堰引水灌溉面积又多于山塘蓄水灌溉面积,显见引水工程景观占用优于蓄水工程;东江中上游河流众多,其中新丰江流域历来是个大灌区。史称长宁(新丰)、永安(紫金)“作渠导水,不借陂塘”^[28],但中下游之博罗、归善(惠阳)、东莞东北部,则多筑堤引水灌田,高耸的堤坝为垌田主要衬景。对自流灌溉不及的垌田,则以人畜力或机械力车水灌溉。宋元时期岭南已广泛使用水车灌溉和排涝。明代水车经过改造演进为龙骨水车,更成为克服地形灌田的重要机具。从化流溪河沿岸“居民多以树木障水为水翻车,……高田可以尽灌”^[29];开平“近山之田则用水车,近海则引潮水”,使“田为膏腴,亦无旱潦之患”^[30];在清远县这种灌田水车,“仅头塘陂,在黄口泛上,为诸陂之首,沿河直上,计水车百余乘”^[31];在广州地区,“俗名车陂,所在有之”^[32],皆来源于明清时筑陂塘车水灌田。粤北直到近代仍普遍使用水车,例如曲江县下庙陂马渡水车群,内分排三列共 24 架水车,每架均可灌田 12 亩,蔚为大观。

本世纪 40 年代,广东采用近代水利技术兴建了一批灌溉工程,包括仁化、乐昌、曲江、蕉岭、英德、台山、博罗、东莞等县

所建的陂、渠、水库等,主要受益对象是垌田。这不仅扩大了稻作面积,也给垌田文化景观增添上几抹近代文化色彩。

建国数十年来,广东山区修建大量水利工程。截至1985年,共修建蓄水工程约3.4万宗,引水工程4.6万宗,提水工程1.1万宗,1177万亩农田得到灌溉,占山区耕地总面积83%。这些水利设施在山区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许多河谷盆地建立了一批高产稳产农田,使它们某些作物单产水平已经接近或赶上沿海三角洲平原地区,也是山区垌田稻作文化景观的一次革命性转变。

梯田:将山麓按等高线辟成阶梯状,外侧围以泥基或石基,主要借山泉之水以灌溉的耕地。此种梯田自谷底以至半山,由数级以至数十级不等,为山区一种主要耕作形式,也是一种特殊文化景观。山间谷底之水田,虽可名作坑田,但因其坡度大,田块小,多呈梯状,实际上亦可并入梯田之列。梯田宜种植多种农作物,其中有水源保障者,多种水稻,乃稻作文化在山区占用的重要空间之一。

梯田必须有农田基本建设,首先是田埂。东汉许慎《说文·田部》说田埂,“象阡陌之制”,这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关键措施,也是有别于刀耕火种“畚地”的主要标志。修建梯田需要较多劳动力和铁器农具。按岭南社会生产力进化程度,梯田早在宋以前就有所发展,不过那时称为“山田”。唐刘恂《岭表录异》云:“新泷等州(有)山田。”说明至迟到唐代梯田已在广东出现,到宋代则更加普遍。其时“深广旷土弥望,田家所耕,百之一尔。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后为田”^[33]。这当包括梯田。

特别是宋以后客家人大量迁居岭南,谚曰“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梯田文化固然应运而生,并作为客家文化一个特质,随着客家人四出迁移而流布各地,使稻作面积有所扩大。明清时期,梯田已作为山区最常见的土地利用方式被记入地方文献中。明人顾崧把海南田分三等,其中“有沿山而更得泉水,曰泉源田(按指梯田);有靠江而以竹桶装成天车,不用人力,日夜车水灌田者,曰近江田。此二等为上,栽稻两熟;又一等不得泉不靠江,旱涝随时,曰远江田,止种一熟,为下等”[34]。明代海南有不少“黎村米谷”[35]外运,泉源田起了重要作用。清代广东大规模垦荒,除了在沿海沙田地区之外,还在高、雷、廉琼、肇庆五府地区进行,梯田是主要开垦方式之一。“力作者于山根渐次垦阔,今岁一丘,来岁即可二三丘”[36],不少外地移民,“依山而居,斩山而食”[37],以致许多山区,“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梯田蔚为山区大观。康熙末,高、琼等府“青禾遍野,郁郁葱葱”,“所在居民……,年岁丰年,举家父母妻子克衣足食”[38],梯田稻作生产对安定社会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乾隆以后广东人口急剧增长,不堪负重人口压力,逼使耕地上山,且海拔越来越高,结果由此引起水土流失也越来越严重,反过来又动摇了梯田农业存在基础。人类创造梯田文明的这种矛盾在旧社会是无法解决的。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山区农业开发进入一个全新发展时期,不少地区掀起“治山、治坡、治沟”的群众运动,梯田实际成为这种运动的一个中心,不仅面积大为扩展,文化内涵也更加充实。据电白县统计,1950—1960年全县开梯田 1765 亩[39],

全省更不在少数。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山区水电、水利事业使大片梯田得到灌溉,并被保证以护坡、水源林以及其他土方和生物防护工程,梯田已作为一个农田生态系统,正朝着空间布局立体化、作物结构多元化的景观方向发展。

· 山栏地:过去称畲地或畲田,实行刀耕火种,主要种植旱稻和其他杂粮,为游耕农业文化载体。山栏本为一种旱稻,黎族称它的种植活动为砍山栏,山栏地也就成了这种土地利用类型的代名词。

游耕文化在世界各地和各民族中普遍存在过,也是岭南古越族一个文化特征。古越族是个很复杂的群体,包括后世所称黎、瑶、畲、壮族等。刀耕火种曾是它们主要的文化形态,古谓之种畲。现今广东留下大量畲或峯为首尾地名,尤以粤东山区最为普遍和集中,乃土著游耕文化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因地名产生比文字要早。后来在唐人诗词中,不止一次收入种畲情景。李德裕贬崖州,沿途见“五月畲田收火米”;刘禹锡在连州有《竹枝词》云:“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李商隐《赠田叟》一诗也有“烧畲晓映远山色,伐树暝传深谷声”之句。宋代以降记载渐多,苏东坡在海南亲见当地黎人“播厥熏木,腐余是穡”。到明清时代,刀耕火种才大量被记入各类方志中,以明人顾峴《海槎余录》写得最为具体:“黎俗,四月晴霁时,必集众砍山木,大小相错、更需五七日,酷烈则纵火,自上而下,大小烧尽成灰,不但根干无遗,土下尺余,亦且熟透矣。徐徐转锄,种棉花又曰贝花。又种旱稻,曰山禾。……连收三四熟,地瘦,弃置之,另择它所。”

以后类似描述不胜枚举。近代一些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在海南、粤北黎、苗、瑶区所见到的刀耕火种情况与上述基本一样。部分瑶族由此被称为“过山瑶”。这都说明刀耕火种自古保存下来，相沿已久，在山区土地开发中有特别重要意义。

随着时代进步，这种原始土地利用方式在岭南大部分地区已被放弃，但在海南岛和粤北个别地区，至今还没有完全绝迹。在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境内，1965—1976年，山栏地面积达49万亩，占自治州耕地面积7.4%，近年平均每年仍有4万亩之多^[40]；在东方县坝王岭，它的海拔高度甚至达到800米^[41]，成为广东稻作分布的最高界限。

刀耕火种技术重点不在土地本身加工改造，而在于林木砍伐，所以山栏地不必从事农田基本建设，也无须耕耘、施肥、灌溉，仅顺坡撩荒，以锥凿土，播种各类耐旱、粗生、在管理上可以粗放的农作物，如旱稻、薯、粟之类，单产一般都很低，加之地块零星分散，单家独户经营，在当地经济中地位很微弱。如在保留到建国初的黎族合亩制地区，山栏地稻谷产量只占总产量20%^[42]。现在它占的比重当然更少了。可见刀耕火种只与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相适应，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它势必被耕耘农业所取代。事实上，它现在主要保留在五指山地区，那里堪为人类原始农业文化一个博物馆。问题还在于刀耕火种烧毁大量森林，严重危害生态环境，是一种掠夺性的土地利用方式，当前已失去它存在的意义。所以结束山栏地这种景观，真正把它送进历史文化博物馆，也是当地农业土地利用当务之急。

第二节 旱作文化景观与分布

广东旱地面积广大,达 1210 万亩,约占耕地总面积 1/3,广泛分布于全省各地,以丘陵低山和台地地区最多,旱作文化即指稻以外耐旱作物对旱地的开发利用。这些作物包括薯、粟、豆、麦等。它们不仅据有广域空间,分割利用不同土地资源,而且以它们的原料加工制作的各种食品,极大地丰富了当地饮食文化的内涵,无论于古于今都是岭南物质文化的一堵丰碑。

一、薯类的传播和分布

薯类作物能植根于干旱土壤,一般不需要灌溉,可以粗放经营。广东除沿海和沿江地区的粘质土以外,其余沙质土或沙壤土都适于薯类生长。以北纬 24°为界,即饶平——广州——郁南一线以南地区,薯类一年可种三造;以北可种两造;琼雷地区终年可以种植。此外,薯类还可作为水田冬种作物。1981 年全省薯类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粮作总播种面积和总产量的 12.5% 和 8.3%。薯类对改变人们食物结构,带动畜牧、酿造和食品加工发展,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薯类在粮作中的地位,现仅次于稻类。但在历史上某些时期或某些地区,薯类却居主粮地位,对岭南文化进步有过重要贡献。

广东薯类主要有甘薯和番薯。甘薯古代还叫薯蕷,可能是

属单子叶植物薯蓣科的 *Dioscorea esculenta* (Lour) Burk, 在海南岛土名叫黎洞薯, 在广州地区叫大薯, 都为薯蓣属参薯种 (*Dioscorea alata* Linn), 而番薯是明万历年间由海外传进来的, 为旋花科牵牛属一个种, 学名是 *Ipomoea batatas* [L.] Poir^[43]。后世每以甘薯番薯混为一谈, 实误。汉代甘薯已是民间主粮, “南人专食, 以当米谷”^[44], 尤其“海(南)中之人皆不业耕稼, 惟掘起种甘薯, ……大抵南人二毛者, 百无一二, 惟海中之人寿百余岁者, 由不食五谷而食甘薯故尔”^[45]。到北宋《清异录》载: “岭外多薯, ……人多自食, 未尝货于外。”特别是“海南以薯米为粮, 几米之十六”^[46], 苏东坡在儋州见“土人顿顿食薯芋”^[47]。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草语》仍指出: “东粤多薯, 其生山中, 纤细而坚实者, 曰白鸠薯, 似山药而小, 亦名土山药, ……大者重数十斤, 肤色微紫, 曰猪肝薯, 亦曰黎洞薯”。大抵明清稻作发展较快, 番薯也传进来, 土生土长的甘薯地位渐渐萎缩, 甚至在许多志书中被列为一种蔬菜, 栽培面积没有扩大多少, 它的文化意义才告一段落。

明末番薯从海外传进我国, 这是继宋代占城稻之后我国粮食生产第二次革命, 也是一次重大文化输入。闽广作为海外交通门户, 也是番薯首途之区。晚明番薯已发展到“闽广人以当米谷”^[48]的地步。这—是番薯惧湿、怕冻; 二是广东多山、多阳, 有大面积热带和亚热带砖红壤与砖红壤性红壤, 海滨沙土等适宜番薯生长, 而稻作受坡度、灌溉限制, 多局限在河谷盆地上。这样, 番薯渐次广种于台地、丘陵以及山地下坡; 三是番薯也是一种高产救荒作物, 能满足广大贫苦大众需要, 于是

得以一种文化占用方式,不但占有广大地域空间,而且深入人们观念文化中,形成一种新文化景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粤中米价涌贵,赖此生活”[49]。东莞“河田面大洋,其民鱼盐穡事外,所植甘薯(按指番薯)、山蔗,动辄以千顷计”[50]。经过群众驯化培育,番薯名优品种也在一些地区出现,例如民初番禺番薯就有数十种,其中新造大番薯,闻名于广州一带。番薯是广东农民的主要杂粮,或早晚半饭半薯,也有以薯丝(片)混同大米煮饭或粥的。这在山区或台地区成为一种生活习惯。1981年番薯占全省薯类总播种面积98.9%和总产量99%,其中海陆丰台地、琼雷台地各县番薯面积约占当地粮作播种面积30%,呈大面积连片分布。但在山前地头、屋前屋后,零星栽培的也不少。番薯除了工业用途,或烤,或为脯,或为菜(开平炒薯叶),各有风味,已成为广东饮食风俗的一部分。

二、小麦引种

岭南气候湿热,妨碍小麦发展,现在仅作为少种作物栽培,分布偏于北部。但在历史上,由于社会原因,小麦却频频引种到岭南,对当地土地利用和生活习俗都有过重要影响。其作为一种农业文化遗产,至今仍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唐代,小麦首次引种于岭南,但“苗而不实”,结果没有成功。原因是“广州地热”[51]。宋代,一是中国气候进入寒冷期,岭南春温偏低;二是宋王朝鼓励和推广种麦,曾诏令“岭南诸县,令劝民种四种豆及粟、大麦、芥麦,以备水旱,官给种与之,

仍免其税”^[52]。后又规定“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53]；三是大批黄淮居民南下，保持面食习惯，这都加速了小麦在广东扩种。包括闽广在内的南方地区，出现小麦种植“极目不减淮北”^[54]的景象。潮州地区有“田半植大小麦”^[55]之说，惠州博罗“三山犬牙，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盛”^[56]，展现前所未有的土地利用景观。明代，原来不输租税的小麦被列入田赋，据《永乐大典·广州府·田赋篇》，广州府八县有麦地 6074 亩。清初，广州地区小麦“芄芄盛矣”，不但“豆与麦，惟高坂生焉”^[57]，即扩展到山坡上，而且“晚禾既获，即开畦以种小麦，正月而收”^[58]，东莞“二、三月春风微扇，麦浪千顷，比于云稻矣”^[59]。雷州、增城、五华等地也广泛种植，小麦覆盖平原、台地和山坡。但凡番薯种植少的地区，小麦栽培比较多。这两种作物在时空上互补分布，也是广东旱作文化一种优势。语云，“岭南面自古所重”^[60]，这当然离不开小麦引种和推广。当地人以小麦酿酒，其色如玉，被赞为“一流仙液”；磨粉炮制成水面、饼干、油饼、水晶包、卷蒸等，富有地方风味，为岭南饮食文化增添异彩。

三、其他旱作引种和推广

广东复杂多样的土地类型也为其他旱作引种和推广赋予优越条件，它们或原产于当地，或源于中原，或来自海外，在土地利用格局中占有相应位置。

岭南自古有粟，即北方人所称黍稷。《吕氏春秋》云，“饭之

美者，南海之秬”，秬即黑黍。中原文化南下，当然也会有粟被带进来，但不能改变粟仍为岭南土著文化一部分的特质。宋人史乐《太平寰宇记》在信安县（今开平）条云：“封水在县东六十里，源出云粟山。南中风土，惟稻无粟。此山种粟即成。”至少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山坡旱地种粟已成功。明嘉靖《广东通志》说，“黍有黄蜀、鱼子、狗尾脚三种，然亦绝少，不以供食用”，限于零星分散种植。但正统年间引种鸭脚粟，却获得很重要的民食意义，至少在琼雷缓坡台地上广泛种植，成为一种重要救荒作物，“六十日即熟，土人给食造酒，省米粮之半”^[61]。明临高人王佐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赞其“小熟三月收，足以供迎送，……大熟八月登，恃此以不恐”^[62]。清代，甚至连番禺、香山一带都很普遍种粟，“邑之山，农所植”^[63]，“乡间煮作糊，以代粮”^[64]，估计面积不会很大。

明代，比番薯早些时候从海外引进的粟类还有玉米，嘉靖《广东通志》记作“玉高粱”。玉米性宜燥，粗生，在不宜稻谷和其他杂粮生长的高阜斜坡以及难以灌溉的山地均可栽种，而番薯由于怕冻，只能种在坡下，故构成玉米在上，番薯在下垂直分布的景观带，化无用上地为有用，成为本省土地利用的一个新方向。此后海南黎苗族和粤北瑶族，以及其他山里人，不少人靠玉米为生。玉米是粗放经营农业作物之一。

花生是一种性喜沙质土旱地作物，原产地不在我国。“宋元间，……粤估从海上诸国得其种，高雷廉琼多种之，大牛车运之，以上海船而货于中国（原）”^[65]，这是指小粒花生。明末清初又引进大粒种^[66]，产量成倍增加，压倒其他豆类，被誉为

“乃豆之魁”。花生不仅成为大片旱地的新占领者,而且导致食物结构的重大改组。大抵明以前,广东人主要以猪油和茶子油为食用油的。到清末以后,花生油已发展为日常食用油,“广俗通用之”^[67],出现了高雷、海、陆丰、潮汕平原等著名花生产区。建国后广东花生产量仅次于山东,居全国第二位。花生榨油业也崛起于产区城乡,无论原先通于民间的手工榨油还是现代机榨油,都在当地经济结构中占重要地位。花生作为一种新作物的文化意义也得到社会认同。

第三节 经济作物文化景观及其地域组合

广东是一个适宜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生长的区域。经济作物种类近百种,主要有蔗、果、桑、茶等;分布地带广袤,从北到南,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在各类地形上都有它们的踪影;栽培历史悠久,发轫于汉唐而盛于明清。现在,经济作物是广东种植业中仅次于粮食作物的重要门类。1981年全省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全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1/4,并建立一批商品生产基地,集中布局,形成大田作物分布景观;另外经济作物也采取种植园形式,团块分散布局;还有与其他作物组合。由此所构成众多的土地利用类型,甲于全国其他省区。

一、糖蔗文化景观及其类型分布

就自然条件而言,广东为全国最适宜种蔗的地区,冲积平

原、台地和丘陵地区都可种植。近40年来,广东历年甘蔗种植面积占全国一半以上,蔗糖产量也占全国半数,人均消费蔗糖比全国高出三四倍;以蔗和糖为原料制作的食品、医药、纤维等多层次、综合开发产品多达百余种,糖和蔗是一个文化系列,而广东无愧为一个甜蜜王国。

蔗糖是岭南物质文明的骄傲,渊源甚早。战国时楚国已利用柘浆作为调料^[68](按柘同蔗),则岭南可能有甘蔗生长和利用。东汉杨孚《异物志》载:“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甘蔗特醇好。本末无厚薄,其味至均,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如饴飴,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面曝之,既凝如冰,破如砖,其食之,人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69]这是关于岭南蔗糖较早和较详细的记载。南朝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也记:“蔗……广州一种,数年生,皆大如竹,长丈余,取汁为砂糖,甚益人。”可见广州至迟在五六世纪已能制砂糖。过去有些史书认为中国制蔗糖方法至唐贞观年间才由印度传入。其实唐以前岭南已能制糖了,唯方法比较原始而已。宋代番禺(广州)是全国几个著名产糖区之一,广州土贡品已有糖霜。元代,除番禺县外,“南海、东莞有乡村人煎汁为砂糖”^[70]。明清广东蔗糖业有巨大发展,《广东新语·草语》中指出:番禺、东莞、增城、阳春等县的蔗田几乎和稻田相等。李调元《南越笔记》中也有类似记载,并指出“上农”常一家设榨糖的糖寮一所,“中农”五家、“下农”八家或十家合设一所。在潮州,蔗与鱼盐果禾被列为三利;在嘉应,蔗有四种;韶州甘蔗“熬糖最甜”^[71];雷州所产白糖,远销苏州、天津各埠;海南蔗

有多种,糖制品畅销大陆。康熙《广州府志》说“每冬初遍诸村岗垅,皆闻戛糖之声”。鸦片战争后,广东糖蔗业荣枯迭起,久经沧桑,但始终是农业一个最重要部门。甘蔗先后成为台地、山坡、阶地、冲积平原和基塘主要作物景观。

甘蔗生产的社会经济环境很复杂,现在广东完全没有种蔗的只有五个县,种植面积在1万亩以下的有8个县,2—5万亩有17个县,5—10万亩有11个县,10万亩以上有8个县,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

糖蔗对土地分割利用,主要集中分布在基塘、水田、台地、旱坡等土地类型上。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四大糖蔗基地,代表这些景观类型。

珠江三角洲糖蔗基地景观:珠江三角洲兼具三角洲冲积平原、沿江平原及丘陵、台地等地貌类型,皆可种蔗。1982年糖蔗面积164万亩,占全省糖蔗总面积43%;总产量57.7%,是全省最大糖蔗基地。由于区内环境差异显著,可分为四种景观单元。一、蔗基鱼塘景观,分布在顺德、中山小榄和南海西樵之间围田基水地区,蔗林与鱼塘相间,为基塘景观之一;二、大田糖蔗景观,分布在沙田、围田、洋田范围内,占地规模大,往往方圆数十里内,甘蔗蔽野,开榨季节到处洋溢着甜润气息,是三角洲最主要糖蔗景观;三、低地糖蔗景观,分布在东、西江下游低地河滩上。这类地形易罹水患,宜耐浸甘蔗生长。蔗田规模不大,但前临河水,后枕堤岸,间以块块稻田,也自成格局;四、海滨咸田糖蔗景观,三角洲前缘滩涂新近围垦土地,含盐分高,宜先种蔗,后种粮。蔗林多呈带状分布,在大海、

蓝天和海堤映衬下至为触目。

潮汕平原糖蔗景观:潮汕平原为广东老蔗区之一、以精耕细作著称。唯人多地少,粮蔗用地矛盾较突出,但轮种得当,甘蔗仍不失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益的重要作物,也给单调的平原景观增添丰采。

雷州半岛糖蔗景观:雷州半岛历史上曾为广东蔗区之一,清代徐闻“糖蔗之利,几与谷相半”^[72],后一度沉寂,近年又兴起为广东第二大蔗区。蔗区集中分布在深色玄武岩台地上,延绵数十里不绝。陂塘、水井、灌渠等水利设施穿插其间,每隔一段距离,植以条条防护林带,且与大片橡胶、菠萝、胡椒等热作种植园交错分布,彻底改变昔日雷州“红色沙漠”景观。当地风俗以牛车运输,深辗出一条条殷红大路,在现代运输工具和网络一旁,依然保留着这古老而粗犷画卷。

海南岛糖蔗景观:海南种植历史很早,唐天宝年间鉴真和尚流落岛上,所见甘蔗不绝于途。地方志说琼州甘蔗“四时不绝”,但过去发展很缓慢。本世纪70年代,海南甘蔗始成倍增长,1984年超过100万亩,约占全岛耕地总面积1/6。以五指山为界,集中分布在岛东北和岛西南,形成两种颇具特色的基地景观。岛东北基地垦于玄武岩台地和缓坡上,属旱田旱地类型,虽受干旱和台风肆虐,但依靠水利设施和防护林,仍得蔗林丰茂,产量甲于全岛;岛西南基地,从陵水延绵到昌江,呈半月形展开。这一地带光热充足,甘蔗含糖率高于全省,又无台风侵袭,近年甘蔗有一定发展,潜力还很大,唯地区人口稀少,水利欠充,有些甘蔗上山,产量较低。在热带稀树草原映

衬下,蔗林景观与大陆迥然不同。

二、以桑基为中心的基塘文化景观

基塘是珠江三角洲围田区一种特殊土地类型。基是分隔鱼塘周围的土埂,称基埂,塘中蓄水养鱼,两者有机结合即为基塘。按基上所种作物不同,有桑基、果基、蔗基、杂基之称,但以桑基经济和生态效益最佳,也是这种土地利用方式的核心。从文化形态考察,基塘农业文化不仅在于土地本身的开发利用,而且广及基塘产品的后加工,劳动力资源的使用,以及产品流通等,由此而形成的文化景观非常丰富多采,具有深层文化结构意义。

岭南的气候和条件适宜种桑养蚕。汉代广东北部桂阳(今连县)、西部端溪(今肇庆)、中部南海、南部珠崖(今海南岛)等地都有“桑蚕织绩”^[73]记载。广州曾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丝绸文化基础在于栽桑养蚕。这些出口丝绸除仰给于岭北以外,还有一部分产于岭南。但在基塘农业没有形成之前,岭南丝绸产量是很有限的,没有多大的商业意义。宋代珠江三角洲大量筑堤围垦,围田区形成,但堤内田地内涝问题没有解决。入明以来,三角洲人口大增,对土地开发和利用率提高的要求更为迫切。为解决洪涝水患与生产发展的矛盾,人们在筑堤围垦的同时,对围内土地开展治涝治渍活动,把低洼积水地挖深扩筑为塘,将泥土覆盖在塘的周围堆砌成基;或结合筑堤将取土的洼坑筑成塘;或将一些已淤塞的河涌筑堤基成

塘。基塘景观开始出现。明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刺激下,基塘区不断扩大,据万历九年(1581年)清丈,南海、顺德、番禺、新会、三水、高明、新安、东莞等县共有纳税鱼塘面积16万亩,约合基塘面积40万亩,其中南海、顺德各约10万亩^[74],成为最早形成基塘景观的地区。明末清初,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圈筑河坦和改造低洼潮田使基塘的规模日益扩大,但仍以果基鱼塘为主,“凡塘基堤岸,多种荔枝、龙眼”^[75],桑基鱼塘为次。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到鸦片战争前,全国独留粤海关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外商大量采购生丝,厚利所在,不但使基塘区大部分果基鱼塘被桑基鱼塘取代,而且先后掀起两次将稻田改作桑基鱼塘的高潮。南海九江、顺德龙山、龙江等乡成为“境内有桑塘无稻田”,“民改业桑鱼,树艺之夫百不得一”^[76]的纯粹桑基鱼塘之乡。至清末,以桑基鱼塘为主体的基塘区面积达100多万亩^[77]。1925年桑蚕业全盛时,广东桑蚕产量占全国1/3。此后,以珠江三角洲为主的广东桑蚕业虽有起伏,但直到80年代以前,广东桑园面积和产量仍居全国第四位。只是近10年来,由于经济和生态环境条件改变,桑基鱼塘面积在珠江三角洲急剧减少,在其起源地之一的顺德仅有2000多亩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保存下来,许多养蚕工具和设施也都散失或无存。这是一个令人忧虑和值得研究的问题。

历史形成基塘区范围,包括顺德全县,南海南庄、九江、沙头、西樵四镇,中山小榄、古镇、南头、东风四镇,新会荷塘、棠下二镇,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其中基塘面积近百万亩,内有鱼塘43万亩。基面一半种蔗,1/3种桑,其余种果、菜、花、象

草等。基塘面积不及广东全省面积 1%，却生产全省一半塘鱼，七成蚕丝、一成半糖蔗，成为经济总量最大、物质文化高度文明的地区。

以桑基为主的基塘农业，首先把种桑、养蚕和养鱼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一个奇妙的人工生态系统，使它们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保持良性循环，从而取得最佳的经济和生态效益。光绪《高明县志》对基塘这种关系作了总结性记载：“秀丽围近年业蚕之家，将洼田挖深取泥覆四周为基，中凹下为塘，基六塘四，基种桑，塘蓄鱼，桑叶饲蚕，蚕矢（屎）饲鱼，两利俱全，十倍禾稼。”^[78]其次，基高塘低，围基设窦闸控制围内水量蓄泄，既不怕涝也不怕旱，雨水多流进塘，干旱从塘取水，桑基也不受旱。广东虽多暴雨，但塘基上长年种植作物，也可防止水土流失。此外，塘基上还可间种花生、黄豆等作物，有的还在基上搭起瓜棚，伸到鱼塘上面，不仅充分利用空间，而且能起到遮阳作用，即使盛夏季节，瓜棚之下仍很清凉，水温不高，适宜鱼类生长；还有，基塘少施化肥和农药，利于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最后，基塘终年可以生产，时间安排合理；农活有重有轻，连老弱妇孺都有适合的活干，故劳力资源也得到充分发挥，没有一寸荒废土地，没有一段闲置季节。正因为如此，基塘这种世界罕见的土地利用方式，得到国内外有关专家高度评价，认为这种自然与人工相结合的生态平衡，很有研究价值。1981 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广州地理研究所合作，在顺德勒流设立观察站，开展各项研究，以便在世界热带亚热带地狭人稠、水网交错的地区推广基塘农业的模式和技术成果。

这是三角洲人民对人类文化与进步的一项重要贡献。

基塘地区以栽桑养鱼为轴心的各项活动,将当地农、牧、渔、副业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再带动了缫丝、制糖、饲料加工,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农工商贸的结合,乃至乡镇企业和集镇形成。基塘文化外延不断扩大,反过来对自身文化内涵提出更高要求,两者互为因果,推动基塘文化更新代谢。近年顺德、南海等地在基塘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细农业,开发出许多高、精、尖、特、优产品,供应国内外市场,即为基塘文化内涵向深层发展的一个范例。

近年来,广东桑园正逐步从珠江三角洲向西、北江和鉴江流域扩散,形成新蚕桑基地。然而这些新基地少有采取基塘这种形式,因为它们主要分布在旱地和河滩上,缺少基塘农业发生的地理背景。这对三角洲基塘农业而言,是一种景观变异,而对当地却又是一种景观创造,同样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三、果园文化地位与景观分布

广东是著名水果之乡,许多名果历来被列为贡品,自昔就有“岭南之俗,食香衣果”佳话。据统计,全省可供食用水果资源有400余种,而为人类驯育成功,作为经济作物栽培的有40多种,较为重要和常见的有荔枝、龙眼、香蕉、大蕉、菠萝、柑桔、橙、木瓜、桃、李、菠萝蜜、芒果、番石榴等,其中荔枝、柑桔、香蕉和菠萝被誉为岭南四大名果,文化意义也最大。水果除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以外,还是罐头、食品、酿造等工业

原料,果木也为园艺绿化、城镇建设、旅游景点配置提供必要的环境条件。而果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种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绿色文化景观荟萃地之一。

果树从野生种驯化为栽培种在岭南至少有三千多年历史。现代食用的主要水果在汉代已有记载。其后许多水果又作为一种文化输入,在岭南安家落户。例如六朝时代,计有柚子、枇杷、桂木、山荔枝、椰子、无花果、菠萝蜜从海外传入^[79],唐代有芒果^[80],油橄榄,底称实^[81](无花果一种);元代有西瓜;明代有菠萝;现代有榴连、红毛丹、神秘果等。在土地利用和丰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上有很重要意义。例如据《元一统志》记,西瓜“今岭南在在有之”;清中叶,“粤中凡村后路旁,多种山菠萝”^[82],清末时还被加工成罐头,“蜜渍之盛以铁罐装之,行于远处”^[83]。高雷廉琼和潮汕后来成为菠萝主要产区。同样地,水果也作为岭南文化输出的一部分,在海内外产生重要影响。汉代南海郡荔枝已进贡中原,以“十里一置,五里一侯”方法护送,结果“奔腾险阻,死者继路”^[84]。汉武帝还从南越取荔枝百余枝移种长安,并筑“扶荔宫”,只因关中风土不宜,虽连年移植,终无成活或结果。与荔枝同献的还有龙眼、柑桔、香蕉、大蕉等。后来虽一度停止进献,但到唐代又恢复。道光《广东通志·前事略》载,杨贵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85]。至宋代,商品经济渐渐发展,岭南荔枝更多地以商品形式输出,宋文献称:“闽粤荔枝食天下,其余被于四夷”^[86],包括“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人贩益

广,而乡人种益多”[87]。明清广东果业更一枝独秀,许多农户以此致富。据《广东新语·木语》关于干制的龙眼、荔枝时指出:“载以拷箱,束以黄白藤,与诸瑰货向台关(梅关)而北腊岭(骑田岭)而西北者,舟船弗绝也。”广东由于花果常鲜,又多灵泉甘液,故以花果和香料制成名酒殊多,如唐有荔枝酒、桂花酒,宋还有倒捻酒、七香酒、严树酒等。宋梅尧臣说:“越林多蔽天,黄柑杂柑桔,万室通酿酤,地远无禁律。”对我国酒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此外,岭南水果品种还传到海外。明中叶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将珠江三角洲甜橙种苗带回去,后又被引种到美洲,著名的美国花旗蜜桔就是由三角洲甜橙间接培育出来的。现今世界各国栽种的中国矮蕉(Cavendish)即为岭南原产。

广东水果产量向来很大。抗日战争前夕,广东水果总产量名列全国之首。建国后,种植面积退居第五位,但仍保持300万亩之多。近几年结合造林绿化和人们食物结构的改变,许多荒山坡地多被果园占领,成为这些土地利用的一个重要方向。果品也以名、优、特种为主,采取集中布局方式,形成基地。在栽培、管理、保鲜、运输、加工等方面也广泛应用近现代科学技术,改变果园传统文化的内涵和景观。

广东果园分布广及丘陵、山地、平原等各种地貌,与自然地带分异关系很密切,大致上以怀集——英德——莲花山为界,其北之粤北、兴梅地区多种桃、梨、李、柿、柑桔等亚热带水果,其南则以热带常绿果品荔枝、龙眼、香蕉、大蕉、菠萝、木瓜、洋桃、芒果以及柑桔、橙等至为普遍。但作为文化景观布

局,则有不同方式和结构。其一是珠江三角洲果基鱼塘,自明中叶以来就很兴旺,《广东新语》多处记载:“广州诸大县村落中……凡塘基堤岸,多种荔枝、龙眼,或有以稻田种者”,大抵以广州为中心,纵横百里的围田地区成为果木集中分布区。例如陈村龙眼“一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枝”,番禺大石、李村一带荔枝树“蔽亏百里,无一杂树掺其中”,广州城西泮塘、荔枝湾“两岸荔枝,香闻十里”。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景观很多已成陈迹,而今塘基上多种香蕉、大蕉,东莞是有名蕉乡。许多地方多有“蕉林夜雨”之景,又有“雨打芭蕉”之曲调,极为人所钟爱,故屈大均赞,“蕉之可爱在叶,盛夏时高舒垂荫,风动则小扇大旗,荡漾翻空,清凉失暑,其色映空皆绿……粤故芭蕉之国”。此外,“白蔗得种蕉地,益繁盛甜美”^[88],蕉蔗轮种也是珠江三角洲的重要耕作制度。其二,低丘台地果园,品种单一,专业性生产,构成清一色园林景致。增城、从化、东莞、中山、广州市郊,以及潮汕、惠州、惠东、电白、琼山等地荔科技园大多丛集在山坡台地上,并培育出许多名贵荔枝品种,如增城挂绿、中山三月红、琼山鹅蛋荔等。许多风景名胜,也离不开荔科技园作为构景。广州东郊罗岗,得以被评为羊城新八景之一(罗岗香雪),除有玉岩书院、罗峰寺等古迹以外,还因其冬有梅花、夏有荔枝,市民喜往游乐。六七月蝉鸣荔熟,广东一些地方,过去有开荔社之举,人人竞赴,以多食者为胜。现在时兴举办“荔枝节”,以品尝荔枝吸引四方游客,洽谈贸易,畅叙乡情,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深圳、东莞、增城、从化等地举办过多次。以荔枝为作料,可制作十余种美味佳肴:以荔枝命名的酒楼、宾

馆、别墅甚多，如番禺有荔园、增城有荔城等，被称为“荔枝文化”。柑桔是广东种植面积最大的水果，柑桔园到处可见，尤以中部地区规模大而分布集中。著名的潮州柑、新会橙、陈村年桔，以及建国后新建的柑桔基地，如博罗杨村、广州罗岗等，很多都是按一定规模布置、外观规整的种植园。其三，自由散漫式分布，没有固定划一化的空间组织形式，皆因地制宜，园林大小不一，景观活泼，与周围环境保持和谐。这种园林散见于各地，包括田园、郊野、公园、村前屋后等，如雷州半岛、海南岛和潮汕地区菠萝漫山遍野，广州河南岛一望平畴尽是洋桃、番石榴诸果等。

四、茶园与山区土地利用

岭南俗重饮茶，茶文化冠绝全国。所用茶叶，部分仰给于当地茶园。茶园与茶文化在岭南有不解之缘，更是山区土地利用的一个主要景观和方向。

岭南山区，雾湿露重，适宜种茶。据陆羽《茶经》，唐代韶州已产茶。在宋代，茶由政府专卖，但岭南听民自便，利于茶园开辟，循州龙川、罗浮山和封州都产茶。明末清初时，茶已被《广东新语》列入食语条目，为日常生活不可少部分，并列举广东茶有12种，即（广州）河南茶、顶（鼎）湖茶、罗浮茶、曹溪茶、新安杯渡山茶、乐昌毛茶、潮阳凤山茶、龙川皋芦叶、长乐（五华）石茗、琼州灵茶、乌药茶、东莞研茶等，主要产自名山，当为少数人享用。乾隆以后，茶叶出口量增加，茶区也大为扩展。知道

光《鹤山县志》云：“毋论土著，客家多以茶为业”，当地葵根山、大雁山，“一望皆茶树”，“来往采茶者不绝”。道光以降，饮茶在广州各商埠渐行其道，茶园开辟更随茶叶销售旺盛而日广。新会绿护屏西北几十顷山岗低丘尽为茶园；清代梅县清凉山、阴那山和大坪的三台山以产茶著名，层层茶园在望，这种茶园在全省都很普遍。虽然广东茶叶贸易在鸦片战争后备受国际风潮影响，但仍不能改变茶园作为山区土地利用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个总趋势和格局。1984年广东茶园面积约70万亩，居全国第九位，产量约40万担，在全国排第八位，属主要产茶省区之一。现在茶园分布全省90多个县市，但以西江和北江流域丘陵居多。英德茶园面积最大，潮州、和平、饶平、广宁、高州、清远、普宁、河源、阳山、怀集、信宜、罗定、连平、揭阳、丰顺、琼中、保亭等也是主要产区。许多地区还培育出代表性茶种，除上列的以外，著名的还有英德红茶、仁化红山白毛茶、大埔西岩茶、梅县清凉山茶、平远锅笃茶、广宁清桂茶、海南五指山茶等。

适应广东复杂多样的自然条件，茶园垦辟和景观也很有地方特色。这一是配置遮荫树，减少日照和强光。这种技术在明中后期已有记载^[89]。它的应用使植被稀疏、光照强烈的大片台地被辟为茶园，现在海南、雷州半岛胶茶间种，英德茶园间种相思树，珠江三角洲茶园则以楹树遮荫，形成三层或二层群落景观；其二，在茶园上遮荫树下盖草，有效地减少土壤水份损失，保护茶树安全越冬。这在清中叶已出现，有些地方至今仍然采用；其三，在陡坡茶园采取梯田形式，而在缓坡者则

顺坡而下,有的地方两者相接,坡面得到充分利用;其四,分季节轮回采茶,尤注重春茶采摘,且多在清晨带露时进行,保持茶叶的鲜嫩和香味。其时四处呈现一派“春山三二月,红粉半茶人”的佳景。

五、城郊园艺文化景观

园艺是指种植花木、构造盆景,乃一种特殊土地利用类型,主要发生在城镇附近。而其作为一种文化景观,主要是以观赏及装饰为主,此外花木也用来制造香料和香油,具有美学和实用两种功能。

岭南人爱花养花由来已久。汉代,岭南的桂、蜜香、指甲花、菖蒲、使君子等花木被移植到长安;外来花木如素馨花和茉莉花也移植到珠江三角洲地区栽种。南汉主刘龚和刘铨在广州大造宫苑,占用大片土地种植花木,在城西形成“花田”。宋真宗时,“广南”花木每年都有运到汴京,据《元一统志》和陈大震《南海志》记载,宋元时广东花卉达90余种,其中不少是从外国引种的。明清期间广东城镇日益兴盛,花木种植更多地扩展到附廓和远郊乃至个别交通便捷、经济发达的地区,并成为专业性生产,占用许多上好耕地,构成特殊景观。位处广州城西南的花地,明末时成为“海色四周无税地,香浓百亩有花田”^[90]的清一色花卉世界;“番禺鹿步都(今广州东郊)自小坑、火卉村,至罗岗三四十里,多以花果为业”^[91];广州海珠岛庄头村四周台地,种素馨多至二百亩;顺德陈村不但多花田、

场圃,而且还是传播花木技艺的中心。更有花卉“蒸露”、“蜜饯”,以及“露花油”等,“外舶争买以归”^[92],一些花油和香片还用作伴茶、酿酒、制药、染织,渗透物质文化各个领域。明末清初,广州花市出现,为便于运输和摆设,花园盆景渐见发展,这些花木不是直接种植而是盆放在耕地上,可以层层叠叠,景观密度较大,尤使人赏心悦目。例如花地盆景兴起于乾隆年间,花园从道光时4处发展到光绪时11处,到1930年又增加到14处,共有盆花20—30万盆,抗战前夕,陈村附近弼教有花园128处,盆花数万盆^[93]。有的人为成各种形状,给人以很高的文化艺术享受。

现在花木栽培已成为一种专业园艺,珠江三角洲花卉种植面积达数万亩,集中分布在广州市郊、南海、顺德、中山、花县、深圳、珠海,形成花木生产基地。其中广州花地种花面积1.1万亩,鲜花红桔遍地,盆景琳琅满目。陈村有花园110处,5000余亩,年产盆景5000万盆(株),约300个品种,名贵品种也不少,有价值上万元一盆的兰花,到处繁花似锦,四季飘香,除在耕地、塘基上种植以外,每户人家都有小花园,甚至耸立在花团锦簇中的阳台,也摆满花果盆栽,园艺从地上发展到空中,为全国少有的花卉奇观。中山小榄以菊花驰名,菊花被定为“乡花”。小榄历史上有形形色色的“菊社”,骚人逸士,争相赴会,以艺菊为乐,后发展为十年一设“菊花会”,并为定例。“菊花会”期间,举办各种游乐活动,哄动四方。近年兴办菊城农场,大面积种菊,也有在塘基上种菊的,曰菊基鱼塘,以菊花、茶藨花酿酒,风味独特,远销海外。这都被称为“菊文化”。

珠海湾仔作为出口花卉基地,已历百年,主要供应过境旅客。深圳则是新兴花木生产中心,主要是开发台地缓坡建立起来的,技术先进,集约经营,已培育出许多时新品种,源源运往香港市场,也是方兴未艾的特区文化景观一角。

第四节 热带作物园景观

广东热带区域,在廉江安铺——化州——茂名——阳江儒洞一线以南,包括雷州半岛、海南岛和南海诸岛大部分,直达北纬 10° — 12° 附近地区。在热带气候、土壤等条件下,无数胼手胝足的拓荒者,辟草莱,开阡陌,使大片荒原化为沃野,遍地荆榛变为种植园,先后培育了槟榔、椰子、橡胶、咖啡、可可等热带作物,对我国热带文化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这些热带作物园景观,按作物来源和对土地利用的差异,可划分为本土和外来作物景观两个类型,它们的发展轨迹和文化特质也有颇大区别。

一、本土热带作物园景观

这主要指槟榔、椰子等古老植物,岭南是它们原产地之一,栽培历史至少已有2000多年,主要分布在海南岛,少数在雷州半岛和西沙、南沙群岛,是典型热带作物。

岭南人嗜食槟榔,古代舍此无以驱除瘴气,后又发展为一种礼俗,故槟榔在岭南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在适宜它生长结果

的地区得到推广和传播,琼雷许多台地、丘陵得到开发利用。汉唐有关海南史籍多提到槟榔,但作为商品大规模生产、输出境外则在宋元以降。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云:“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万也”,所见“漫山悉槟榔、椰子树”^[94]。明清更负盛名,“诸州县亦皆以槟榔为业,出售于东西两粤者十之三,于交趾、扶南者十之七”^[95],形成“东路槟榔西路米”^[96],景观分异。许多人家“有槟榔之园,椰子之林”^[97],甚至黎区也有这样的种植园,当地还立碑示众,作为保护公约。但大块种植园是在近代建立的,主要分布在文昌、琼东、乐会(合今琼海)、万宁、陵水和定安,多呈块状配置,每园50亩到上百亩不等。但海南的槟榔种植面积,向无准确统计,本世纪30年代,海南有槟榔7500亩^[98],产品几乎全部通过海口输出岛外,1990年已达15.17万亩,增长319倍。现在嗜食槟榔的主要是岛上黎苗族人和大陆一些省区居民,另也作为药用,大有供不应求之势,故槟榔园垦辟仍是土地利用的一个方向,更有一些商贩常住产区,从事槟榔收购、转运。槟榔消费风俗,将会长期保持槟榔园在海南土地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

椰树耐咸抗风,对土壤要求不严,尤宜在海南沿海和沿河种植,也是海南地理景观标志之一。汉代,海南人称椰子为“越王头”,种植椰树已很普遍。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云:“珠崖一州,其地无泉,民不作井,皆仰树汁为用,”椰树见于海滨沙地、台地与山坡。宋代时椰子与槟榔齐名。明代海南沿海经过人类长期开发经营,许多地区土壤恶化,“变为斥卤”^[99],难以

利用,而椰树恰是一种嗜盐作物,不择肥瘠皆可生长,东海岸由此被开发为著名的椰子之乡,同时给这类土地利用开辟了新的道路。椰树除零星栽培外,主要也采取种植园配置方式,规模比槟榔园大得多。如近代在文昌清澜港附近的椰子园,有一个面积约 19 万亩,另一个 15 万亩,两园椰树共 2000 余万株。在三亚榆林一带有椰子园 9 个,共占地 1700 余亩,椰树 27000 余株[100]。而 1990 年,全岛椰林也不过 31.69 万亩[101]。椰林呈带状分布在岛东部和南部沿海,其中文昌又占全岛一半,著名的东郊椰林已成为这种景观荟萃之地。为配合营造防护林和风景旅游区建设,椰树也广泛种植于海岸、田间、城镇郊野、马路两旁和乡落四周等,与海河水景、聚落建筑交相辉映,构成特殊的椰风海韵和田园景观,历受人们的喜爱和礼赞。椰子的用途有 300 多种,古代举凡搭建房屋,制作船只、家具、用具,榨油,酿酒等,皆可取之于椰树;椰汁味美于蜜,微有酒气,古代曰椰酒,苏东坡有句曰“美酒生林不待仪”,屈大均也有“琼南无酒家,酒向椰中取”的吟咏。今以现代技术制成的椰汁饮料,风靡海内外;椰雕为海南工艺一绝,统曰椰文化,为全岛赢得很高声誉。

二、外来热带作物园景观

外来作物传进岭南,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又出现一次高潮,这就是以橡胶为主的一系列热带作物在海南的引种和推广,自此根本改变了广东热带土地利用的方向和景观,也是

广东热作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早在上世纪末,南洋华侨从海外引进椰子新品种,先后在文昌清澜港附近、万泉河中游,三亚、藤桥等地栽培,结果比当地所产的硕大,颇为人注意。1902年和1908年,分别有华侨从马来亚引进第一批橡胶和咖啡种苗试种于儋县那大附近,这是在我国栽培橡胶和在海南种咖啡之始。1910年乐会人何麟书从南洋引种巴西橡胶于定安落河沟(今属琼中),拓地250亩,试种4000余株获得成功,第三年深入五指山水口田栽种。此后,华侨经营胶园相继而起,到1934年全岛已有胶园94处,面积9000亩,246500株,分布在定安、乐会、文昌、儋县、万宁、琼山、琼东等县;咖啡自初次试种成功以后,1910年在安定石壁地区再行扩种,成绩颇佳,继而试种于文昌重兴、蓬莱、澄迈福山等地,自此渐次普及全岛,到1935年,全岛有咖啡园69处,5763亩,338000株,其中文昌60处,琼山4处;与橡胶、咖啡差不多同时引进的还有油棕、海岛棉、剑麻、蕉麻、金鸡纳、香茅、爪哇蔗等,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一时颇有生气,预兆着海南土地利用新格局的到来。虽然后来抗战军兴,这些种植园均遭严重破坏,但毕竟为它们以后的发展拉开了序幕。

建国40多年来,在科学考察、确定橡胶宜林地基础上,主要在海南和雷州半岛开垦出大片胶园和其他热带作物园,建立起我国最大的热带作物基地。80年代初,海南胶园面积约400多万亩,占全国橡胶面积一半左右,分布在上百个以橡胶为主的农林场里。到1990年海南橡胶已达554万亩,比80年

年代初增长 38.5%^[102], 主要环绕五指山展开布局, 形成一个环形橡胶带, 但主要集中在琼南、琼西和琼东三片。墨绿浓郁的胶林覆盖在海南岛、雷州半岛、鉴江和漠阳江流域大片低山、丘陵、台地和河谷阶地上, 胶园四周建立网格状防风林带, 林下间种茶树等作物, 形成特殊的人工生态林群落和景观。此外, 还新辟数十万亩胡椒、咖啡、可可、油棕、腰果等热作种植园。部分种植园扩展到汕头地区。80 年代初, 广东热作面积达到 700 万亩, 其中橡胶 500 万亩, 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国 60% 和 70% 以上。这些热作种属多样, 立地类型复杂, 生态环境相似, 它们相互搭配, 构成复合型种植园景观。著名兴隆华侨农场、那大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植物园、保亭热带作物研究所植物园都是我国热带植物的物种基因库, 也是热带作物景观荟萃的王国。

橡胶是现代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 直接或间接以橡胶制作的产品达 5 万种以上。橡胶原生长于南美洲亚马逊河的热带森林中, 对自然条件有很严格的要求。世界各地的橡胶园一般分布在南北纬 15° 以内, 特别是赤道附近。而海南岛已位于这个纬度范围以外, 自然条件也有一些不利于种胶的因素, 但经过人们的努力, 充分利用岛上地形、气候等条件特点, 摸索出一整套依山靠林栽培的经验, 仍创造了适宜橡胶生长的良好环境, 使橡胶分布推进到海南岛甚至漠阳江流域这样纬度较北的地区, 这在国外是没有先例的。在海南岛种植的橡胶单产并不比其原产地低, 质量也达到国际水平, 这是世界天然橡胶生产史上一个重大突破, 1982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也是广东特别是海南开发史上的奇迹。橡胶种植事业的成功,不但打破了建国初期帝国主义对我国橡胶的禁运和封锁,而且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安排了上百万人口就业,故周恩来总理把海南橡胶赞为“南国珍珠”,董必武同志题为“时代宠儿”,著名作家杨朔写诗礼赞:“自从琼岭森银橡,宝岛声华更一时”。

广东大片热带土地,过去利用很不充分,特别是琼雷地区,不但有为数相当多的各种农业地貌类型的土地为传统的作物难以利用,而且还有一部分土地由于人类使用不合理而荒废。这些外来新作物对地质、地貌和土壤等条件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性和适应性。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程度,甚至化无用之地为有用,例如耐干瘠的剑麻适种于琼雷台地和沿海的沙土平原;菠萝不择肥瘠,在酸性的山坡台地上均可生长;橡胶、咖啡对自然条件要求虽严格,但海南自然条件的多样性,仍然满足它们的要求,加上人为努力,终使它们很好地扎根生长。事实上,这些红色的土地主要是近几十年由于这些新作物,特别是橡胶的引进和推广而得到很好的利用。

从景观发生来说,这些地区过去作物结构简单,景观单调,新作物后来居上,旧作物部分被淘汰,例如新椰子种代替旧椰子种,果用菠萝代替纤维用菠萝等。这都不是简单的置换反应,而是一个由许多复杂因素所制约的土地利用的变化过程,包括作物之间的重新组合,以及耕作技术的改良等。例如胶林下间种茶树,胶林、椰林和槟榔之中间种菠萝等。同时还带动新作物产品的加工业,反过来又促进新作物种植区域的

扩大,使更多土地得到开发利用。这都显著地改变了昔日这些农业土地利用的景观和风貌,重塑了广东热作文化的形象,这也是外来的农业文化与本土条件相结合在农业土地利用上获得成功的一个范例。

第五节 生态农业兴起

生态农业内涵,是合理利用当代农业科技成果,获得资源、能源、环境的协调和谐与相互补益,以达到经济持续增长的现代化农业。生态农业是本世纪70年代在世界上勃兴起来的,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它首先在广东沿海异军突起,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并作为一种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和景观,举世瞩目。

生态农业建立在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在农业实践上表现为组织高度整体化、目的商品化、劳动集约化、手段科学化、园艺化或工厂化,以高投入达到高产出,谋求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举凡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基塘(含菜、果、蔗、杂基)农业,山区恢复植被,种草种树,以草养畜,以畜兴农各种措施,各地流行的地膜覆盖,塑料大棚栽培,温室育苗,立体栽培,无土栽培,禽畜饲养与加工一条龙等,皆为生态农业不同的文化技术形态,广泛见于平原、水域、草地、丘陵、低山、城郊、庭院等土地类型或者空间,形成多维多元的农业土地利用景观。例如顺德北滘养鸡——养鱼——加工、陈村塑料大棚内花果栽培——盆景艺

术、增城水果栽培——加工、深圳养牛——奶品加工等。

生态农业在岭南渊源古远,唐代,今新兴、罗定一带农村稻田养鱼,收取稻渔两利,实际上就是生态农业雏型。明代,在珠江三角洲兴起的基塘农业则是它的进一步发展,此后没有多少改进。近年一些地区从基塘农业得到启发,继而仿效、创造出更高水平的生态农业。例如斗门县将负标高积水洼地、荒废河涌挖深为塘养鱼,填土至附近农田,在塘边建立猪禽舍,以厩肥肥塘,田里实行稻蔗轮作,并间种套种其他农作物,实行稻——蔗——鱼——禽并举,形成“田塘农业景观”。这个县的白藤湖垦区即是这种景观的典范。那里的基塘,经过精心规划,规格划一,排列整齐,经济和生态效益都很好,比传统的珠江三角洲基塘更上一层楼。斗门县建立的田塘生态农业模式和经验,正被三水、德庆、清远和沿海一些地区仿效,越来越多地传播各地。实际上,生态农业景观非常复杂多样,模式很多,每因地区条件、环境不同而异,目前在广东正处于摸索和发展阶段,许多方面尚未定型和成熟,有待改进和完善。但有一个共同点是,生态农业景观的结构要素皆由紧密不可分割的链条联成一个有机整体,出现在一定土地类型上。这种方兴未艾的农业文化形态,对缓和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提高农业生产力,加强地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已显示越来越大的作用。

注释:

- [1] 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第7期。
- [2] 丁颖:《中国水稻栽培学》第23—28页,农业出版社,1961年版。
- [3] 许慎:《说文解字》第144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 [4]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版。
- [5] 《汉书》卷28,地理志。
- [6]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
- [7]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37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 [8] 《国外农学——水稻》1986年第1期,第11—14页。
- [9] 曾昭璇:《珠江三角洲唐代堤围历史地貌学研究》,载《农史研究》第六辑。
- [10] 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二),1976年。
- [11] 崇祯《东莞县志》卷7。
- [12] 嘉靖《广东通志》卷26。
- [13] 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二),1976年。
- [14] 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二),1976年。
- [15] 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二),1976年。
- [16] 张超良:《广东沙田问题》,转见《珠江水利简史》第153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版。
- [17] 光绪《桑园围志》卷15,艺文。
- [18] 宣统《东莞县志》卷99。
- [19] 宣统《东莞县志》卷102。

- [20] 张超良:《广东沙田问题》,转见《珠江水利简史》第229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版。
- [21]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
- [2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0,朱初平奏言。
- [23]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34。
- [24] 梁廷枏:《南汉书》卷10,黄损传。
- [25] 道光《广东通志》卷115。
- [26]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66。
- [27]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简史》第190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版。
- [28] 道光《广东通志》卷117,水利附。
- [29]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6,器语。
- [30] 道光《广东通志》卷117,水利附。
- [31][32] 光绪《广州府志》卷69。
- [33]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
- [34] 顾峴:《海槎余录》全一册,广百川学海社,辛集。
- [35] 嘉靖《广东通志》卷20。
- [36] 张渠:《粤东闻见录》卷上。
- [37] 梁华:《电白经济的四次大开发及其发展前景》,引顺治《电白县志》,见《十四世纪以来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第263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 [38] 王文雄:《奉报年年丰收万民乐业折》,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七册。
- [39] 梁华:《电白经济的四次大开发及其发展前景》,见《十四世纪以来

- 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第 268 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 [40] 林业部调查规划局等《海南岛林业资料汇编》第 189 页,1981 年印。
- [41] 曾水泉:《海南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评价》,载《环境科学论文集》,中大学报编辑部,1984 年。
- [42] 《黎族简史》第 153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 [43] 侯宽昭:《广州植物志》第 588 页、708 页,科学出版社,1956 年版。
- [44] 杨孚:《异物志》卷 2。
- [45] 稽含:《南方草木状》卷上。
- [46] 苏东坡:《居僮录·记薯说》,见民国《僮县志》卷 10。
- [47] 《东坡全集》卷 24。
- [48] 王象晋:《群芳谱》卷 2。
- [49] 吴震方:《岭南杂记》下卷。
- [50] 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五)第 28 页,引康熙《东莞县志》。
- [51] 刘恂:《岭表录异》卷上。
- [5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十六。
- [5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86。
- [54] 庄绰:《鸡肋编》卷上。
- [55] 《潮州三阳志辑稿》卷 8,土产。
- [56] 《苏东坡集·后集》卷 4。
- [57] 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五)第 27 页,引乾隆《广州府志》。

- [58]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14, 食语。
- [59] 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五), 引康熙《东莞县志》。
- [60]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14, 食语。
- [61][62] 正德《琼台志》卷 8。
- [63] 同治《番禺县志》卷 7。
- [64] 道光《香山县志》卷 2。
- [65] 檀萃:《滇海虞衡志》卷 10, 志果。
- [66] 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第 33—34 页,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67] 同治《番禺县志》卷 7。
- [68] 宋玉:《楚辞·招魂》:“膾鳖炮羔, 有柘浆些”。
- [69] 杨孚:《异物志》卷 2。
- [70] 《元一统志》卷 9。
- [71] 康熙《韶州府志》卷 21。
- [72] 嘉庆《雷州府志》卷 2。
- [73] 见《后汉书》卷 76, 卫飒传, 《汉书》卷 64, 地理志, 《水经注》卷 36, 浪水。
- [74] 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简史》第 159 页, 水利电力出版社, 1990 年版。
- [75]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22, 鳞语。
- [76] 光绪《九江儒林乡志》卷 5, 经政略。
- [77] 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三)第 48 页, 1976 年。
- [78] 光绪《高明县志》卷 2, 地理, 物产。
- [79] 参见稽含:《南方草木状》、裴渊:《广州记》、顾微:《广州记》。

- [80] 陈藏器:《本草拾遗》。
- [81] 段成式:《酉阳杂俎》。
- [82] 范瑞昂:《粤中见闻》。
- [83] 光绪《新会乡土志》。
- [84] 《后汉书》卷4,和帝纪。
- [85] 道光《广东通志》卷183。
- [86] 曾巩:《福州拟贡荔枝状》。
- [87] 蔡襄:《荔枝谱》。
- [88]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7,草语。
- [89] 乾隆《西樵山游览记》,转见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五)第75页。
- [90] 郭棐:《岭海名胜录》,转引自蒋祖缘等《简明广东史》第21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91]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5,木语。
- [92]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
- [93] 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五)第93页,1976年。
- [94]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8,花木门。
- [95]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5,木语。
- [96] 正德《琼台志》卷7,水利。
- [97]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
- [98] 广东省建设厅琼崖实业局《琼崖视察团经济组调查报告书》第一册,油印本,1934年。
- [99]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
- [100] 广东省建设厅琼崖实业局《琼崖视察团经济组调查报告书》第

册,油印本,1934年。

- [101] 海南省统计局《海南省七·五时期统计资料提要》第49页,1991年印。
- [102] 海南省统计局《海南省七·五时期统计资料提要》第49页,1991年印。

第四章 聚落与文化景观

聚落原义指区别于都邑的居民点,但现在已扩大为人类生活地域中的农村、城镇和城市。聚落作为环境、生产和生活的综合体,是一种最直观的文化景观。而聚落与建筑又是不可分割的。建筑不仅指建筑物,还包括建筑空间及其组织形式。建筑文化综合反映一个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它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经济、科技,以及属于上层建筑的历史、哲学、艺术、教育、宗教、民俗等。按照聚落成因和功能,广东聚落可分为农业、城镇、城市聚落三大类。它们的文化景观相互有别,是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一节 农业聚落类型及其文化景观

一、农业聚落地域分布及其布局形态

我国以农立国,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1982

年广东农村人口占全省总人口 81.3%,可见农村是最大量、最常见的聚落。一般说来,农业聚落比较稳定,除非因大型工程需要,很少搬迁,而变化较多的是它的规模、建筑和空间。当然,由于人口增长和农业发展,新的农业聚落也会不断出现。据 1950 年不完全统计,广东全境有自然村 59043 个^[1],到 1986 年已发展到 176068 个^[2],约增加了两倍。而差不多同一时期,全省农业人口从 1953 年 2844.3 万上升到 1982 年 4818.7 万^[3],仅增加了 0.7 倍,落后于自然村数量增长,说明自然村增加比其规模扩大更占上风,也显示农业聚落选址有特别重要意义。

农业聚落规模和分布,深受自然环境、人口、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等制约,地区差异很大。1979 年广东农村人口 4751 万,分布在 26173 个大队(即现在乡),平均每个大队人口约 1800 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全省有 35.9 万个生产队,平均每个生产队人口约 130 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广东中心村规模大,自然村规模小,人多耕地少,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以及农业人口依赖耕地关系比较松弛。而自然村聚散与人口密度高低有直接关系,其分布状态见表 1。

归纳表列各项指标,广东农业聚落可划分为三种分布类型区。其一,聚落集中区,包括粤中、粤东和粤西地区。这里平原、台地面积广大,水源充足(雷州半岛除外),气候良好,交通便利,生活条件容易方便,社会治安相对稳定。居民多为中原或闽南移民后裔,同姓聚族而居,不乏大户巨姓,村落少则数十户、上百户,多则上千户,分布比较集中。例如南海县平洲区

表 1 广东自然村地区分布及其与人口密度关系

| 区 域 | 自然村 | 占全省% | 占地规模 km ² /村 | 人口密度 人/km ² |
|-------|--------|------|----------------------------|---------------------------|
| 全 省 | 176068 | 100 | 1.2 | 291 |
| 粤 中 | 44395 | 25 | 0.97 | 406 |
| 粤 东 | 7893 | 5 | 1.3 | 894 |
| 粤 北 | 23946 | 14 | 1.3 | 140 |
| 东江—兴梅 | 30678 | 17 | 1.57 | 243 |
| 西 江 | 20050 | 11 | 1.14 | 224 |
| 粤 西 | 31637 | 18 | 0.75 | 395 |
| 海 南 | 17469 | 10 | 1.87 | 177 |

资料来源:《广东省行政区划简册》,广东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

1980年人口为9.5万人,分布在140个村落,平均每村600—700人,大部分以一个中心村带动几个小自然村。中山县千人以上的中心村与千人以下的自然村数量约为1:4。但民田开发早的地区,村落规模大,5000人以上的村落就有70多个,沙田区开发晚,村落少而规模小,500人以下的村落有400个。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顺德县村落,可为聚落集中区一个代表(见表2)。

又如潮汕平原,千人村落,比比皆是,上万人的村落也不乏其例,村镇规模居全省之冠,也是全国村镇规模最大地区之一。雷州半岛虽然经济欠发达,但开发历史早,地势平缓,垦荒谋生并不困难,居民往往就地结庐,村落规模也颇大。其二,聚

表 2

顺德县村落分布表

| 村落规模(人口) | 数量(村) | 占% |
|-----------|-------|-----|
| 全 县 | 366 | 100 |
| 1000≤ | 158 | 42 |
| 1000~2000 | 86 | 24 |
| 2000~3000 | 51 | 14 |
| >3000 | 71 | 20 |

资料来源:《顺德县地名志》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落分散区,包括粤北、东江——兴梅和海南岛,属山地丘陵地区,河谷盆地面积狭小,可供耕种土地有限,交通梗阻,生活条件艰苦。居民大部分是客民,异姓小户,必须分散居住才能谋生,故村落规模很小,稀疏分散。粤赣交界之南雄县平田区,居民8587人,分布在107村,南亩区12369人,分布在167村,平均每村70—80人;海南五指山腹地保亭县,20—30人的村落甚多,罕有400—500人的村落;甚至岛上条件较好的文昌县,千人以上的只有4村;临高县842个自然村,人口超过1000人的仅14村,大部分村落在100—300人之间,反映了这些地区在田头就近设立聚落的特点。但山间盆地之中,村落规模都比较大,一般可达上千人乃至数千人。如清代崖州在今乐东县三平、抱由一带河谷地区黎峒,“多者千余家,少亦七八百家”[4],后来规模当然更大。其三,聚落均衡区,主要是西江地区,为以上两者过渡类型。地形多样,河谷平原与山间盆地错杂,开发历史悠久,人口密度和村落规模居全省中等水平。

例如封开县,凡 2678 村,1000 人以上的村落很个别,100 人以下的村落虽也占相当比例,但 200—300 人的村落仍为基本部分。另外,若干独流入海小河流域,地理上自成单元,在其河谷两岸高阶地和三角洲平原上,人口往往很稠密,村落弥望。例如位处漠阳江中下游阳江县(今设市),为广东有数的人口超过百万大县之一,全县 4040 个自然村,千人以上的村落有 97 个,数百人的村落至为常见,实际上也是聚落集中区。

农业聚落分布除受人口密度影响以外,还受地形、气候、土壤、农作制度和经营方式等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又综合反映在海拔高度和农作物分布上。广东耕地分布在山地只占 17.3%,在丘陵占 25%,一般说来,农业聚落与耕地分布关系非常密切,故其分布上限也在山地最低线附近,即 800 米等高线上下。岭南气候湿热,海拔高反感凉爽,所以农业聚落分布高度很有规律地自南向北降低。在海南琼中县 700—750 米等高线上,仍有少数农业聚落,个别甚至达到 800 米,与当地刀耕火种高度相一致。但进入广东大陆,聚落高度开始下降,在地处云开大山的信宜已出现这种倾向,到粤北更加明显。如乐昌、连山、蕉岭一线,农林场一般多建在 500 米,个别在 650—700 米^[5],与广东自然地带分异规律相符。

取决于地理、历史、社会和风俗等因素,广东农业聚落,大致有以下几种布局形态:

(一) 组团状。许多屋宇团居一起,四周围筑以高墙或土圩,便于守望和病痛相扶,保障社区安全。平原或山间盆地农村多此形状。许多客家大聚落即按此摆布,有些规模可达上千

户,容数千人居住,也有几十户、百余户成为一个组团的。

(二)长条形。这等村落多见于山麓、谷底、河岸或公路两旁,尤以平原和山麓交接地带最常见。聚落规模不很大,因场地所限,几十户一村较多。潭江、新兴江、漠阳江中上游两岸这种形状村落很有代表性。而珠江三角洲大沙田地区,围垦成田时间短,为便于交通和用水,村落都沿河靠堤,呈长条形。村落规模受制于堤围,不可能很大。沿海村落也多分布在海陆接触线上,兼农耕和渔盐之利。

(三)阶梯状。依山就势,沿山坡或河谷拾级而往上建。尤其是人口繁衍、平地狭小地区,平地已开垦为耕地,聚落多向山上发展,屋瓦层层,鳞次而上。乘火车沿北江河谷旅行,常见此等村落闪烁于车窗外。

(四)丁字形。常见于河流、公路交叉地带。当初沿河或公路结庐,后来渐次沿线扩大延伸成此形状,在交通发达地区容易形成这种村落。例如在水网纵横、水陆交通线密集的顺德县,就有不少村落如此摆布。

(五)弧形。主要由于地形局限所致,常见于山脚、河流和公路转弯处。位于公路转弯处的村落对交通安全颇有影响。

(六)自由状。即不规则摆布村落,主要由周围地理景观所决定,许多农村呈此种形式。

二、农业聚落文化景观

根据农业聚落规模和分布形式,可分散居集居两种文化

景观类型。前者包括孤屋和小村,后者指的是大村。它们的立地条件、成因、功能、形态都各有自己的特征,也是农业聚落文化景观两大单元。

孤屋是指以一家屋为中心的院落,包括种养殖场,临时草寮,看水、护林居屋,瞭望所等。一般就地取材,建筑粗劣,设备简陋,空间浅窄。但山上孤屋,树林苍翠,茅舍幽然,俨如世外桃源。平原孤屋,常为杂树绿竹围绕,柴门半开半掩,屋前屋后辟有果园和菜园,外或为一片稻田,或一泓池水,倒也有几分野趣。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为耕种、狩猎、放牧,多建孤屋点缀于山野树林之间,给荒凉大地抹上几丝文化色彩。当然也有在村内外修建孤屋的。例如黎、苗族传统实行小家庭制,子女成婚自立门户,没有像汉人那样的几代同堂,因此村内都为小茅房,以竹篱围成院落,种菜养禽,而在村子外围设立粮仓、牛栏、猪舍,以及供未婚青年男女幽会的寮房等建筑物。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孤屋总趋势是在减少,但近年却在广州、佛山、东莞以及其他经济发达城镇四周,出现许多外省民工搭建的孤屋,严重破坏城镇文化景观,已发展到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小村为孤屋的发展和扩大,规模从三五家到十家二十家不等,人口百人以下,有“三家村”之称。小村文化景观比孤屋色彩充实,气氛也热烈。山居者屋前屋后堆放柴火杂物,屋檐下多悬干菜,村中一般有小型商店,供应日杂百货,或在路旁或在大树下立小庙宇,供奉土地公等神祇。平时娱乐较少,但随着山区建设,特别是水电事业发展,电影、电视等进入小村,

入夜充满热烈气氛。一般说来,广东山区散村,绝大部分仍属农业性质,与土地相依存,生活方式和语言变化缓慢。

形成小村的原因很多,一是地形复杂、耕地分散的地区多小村。人们为减少耕作奔波,往往就地结为聚落。故每于山间河谷平地,水溪之旁,山前山麓,常见一簇簇小村人家,但一到下游,广川平原之上,小村完全被大村取代。二是气候特殊的地区多小村,例如琼西气候干热,用水困难,为了减轻生活压力,人们也分开居住。三是缺乏安全感,人际关系紧张的地区多小村。粤北、兴梅、东江、粤西和海南等客家人分布的地区,初时主客矛盾很大,客民为自身安全,往往数家一姓聚为小村。如海南儋县南丰、兰洋、洛基、海头、临高和舍、定安思河等地就有不少清代从潮州、嘉应州迁来的福佬人和客家人小村。四是农业粗放经营的山区多小村,以就近耕作,减少往返时间,与集约农业地区迥然不同。五是交通梗阻之地多小村,这类地区羊肠小径拓展不易,人口增加缓慢,以小村散居为主。六是受社会风俗影响。岭南风俗,离群索居者向为宗族所不齿。子孙繁衍、支脉旺盛为中国人传统观念,岭南更不例外,是以一姓一居地,形成小村林立。很多还以姓氏命名村落。例如东莞有邓屋、黄屋、廖屋、丁屋等数十处;广州北郊山村也多陈屋、李屋、张屋等地名;潮汕地区则喜用厝为词尾命名居地,如高厝、张厝、洪厝等,也多为小村。

集居型聚落指大村,居民从数百人到上千人不等,以各地条件而定。在山区者四五百人已算大村,但在沿海和平原地区,这样的聚落很常见。从聚落发生来说,大村都是由小村演

变而成的,但必须地形许可,有扩展余地;经济发展到有足够生活资料抚养增加人口;对外交通方便,利于与外界往来。要满足这些条件,大村分布与地形的关系特别紧密,一般坐落在200米等高线以下,包括山间盆地、高位阶地、小冲积扇、旧河床、台地,以及面积较大的丘陵等,往往在地名上反映出来。广东常见以洞、岗、寨、坪、迳、沙、围、埔、浦、瑚等为首尾命名的村落,规模一般都比较大大。

大村文化景观虽然与散居小村没有本质区别,但大村有一定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包括学校、文化室、球场、商店,有的还有市场,早晚两市,庙宇也较大,香火颇盛。近年乡镇工业发展起来,不少企业向大村转移,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工业往往布局在大村,渐渐改变当地文化景观。生产商品化、生活现代化的浪潮使传统文化观念受到冲击和动摇,很多青年人往城镇务工务商,也有举家迁往城镇者。这种以产业转移为重要特色的农村景观,在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和沿海开放地带至为明显。例如以村办企业闻名的东莞和南海农村,那里文化景观与城镇差距日益弥合。但在内陆地区,传统农业景观仍占优势。

农耕文化决定了农民往往以人丁兴旺、财源茂盛、人文发达为追求目标,于是在农业聚落建筑文化方面,力图与风水学说所标榜的如何适应自然、以期保证人的好运气这一原理相吻合,风水也就成了聚落选址的依据和空间模式。即聚落应“枕山、环水、面屏”。聚落所倚靠之山,被视为龙脉,有生气,会发达;而无山之平原地区,则视水为龙脉,作为聚落保护神,

四周环水,乃聚落外部空间的另一种模式,故曰:“山地观脉,脉气重于水;平地观水,水神旺于脉”[6]。广东农村选址也都按风水说这套模式进行,山水成为聚落环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地理环境绝非完全适应聚落选址的要求,对于不理想的地形,人们则进行积极处理,使之顺应聚落兴旺的需要。其方法主要有:一是引水成塘,或挖塘蓄水。风水说认为:“塘之蓄水,足以荫地脉,养真气”[7]。根据聚落坐北向南的要求,池塘一般在前面。前塘后村这一总体布局方式,几及岭南广大农村,尤以河谷平原地区至为常见。池塘一般在村落之南,东南或西南方向;而与水塘方向相垂直的,则是为数众多的纵向巷道,交会于塘边的滨塘大路或晒谷场。池塘最好为明月形,距离巷道3—5米以外,既有心理因素,亦符合功能需要,包括养鱼、蓄水、洗涤、消防、积肥等。这种池塘,过去称为“风水塘”,还有调节小气候的意义。而滨塘大路一般也较宽敞,平时可作晒场,社交游息,节日可开展文娱活动。这种以池塘为背景的总体布局,南面开放,北面封闭,前低后高,加上池塘调节,促进空气流通,冬暖夏凉,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二是筑堤坝,造桥梁。风水说认为“埂以卫局,桥利往来,处置得宜,亦足以面一方之元气”[8]。故地势低洼、地形破碎或被流水分割之地,每修堤筑坝,营造桥梁,以弥补自然环境之不足。珠江三角洲许多村落就建在堤围上,除了防洪,与此不无关系,桥梁也成为村落的重要构景。三是植树,一般在村落的特定地段,包括流水出口处(水口)、后山或村背广种树木,以造成一种绿化环境,这样的事例甚多。例如四会县在其主要山脉金冈山上

遍植松树和修亭。四是改造地形,培补龙脉,以此增加山岗高度或改变其形状。高要县曾将其来脉处的沙冈整治为三峰状,实际上也是改造环境的一个事例。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风水学说实质上是一种环境工程。上述对环境处理就有其科学、合理部分。昔以风水为封建迷信而简单地加以否定是不可取的。

农业聚落外部空间,无论在地丘陵还是平原泽国,皆以水口作为村落门户。村落地势最低处,一般都为水流出口地方。广东农村水口多距离村落1—2里。水口与村落距离远近,决定了村落发展规模或余地,或如今日所称之“环境容量”。风水说认为,水即是财富。为留住财气,除选择好的水口以外,最主要的是造桥,还辅以树、亭、堤、塘,以及文昌阁、奎星楼、文风塔等高大建筑物,以增加对村落的锁钥气势,彻底把关。其目的与其说是出自某种象征或意味性隐喻,不如说是为了弥补自然环境的不足,使整体景观趋于平衡与和谐。所以,水口从建筑技巧上为一村落开辟了一个内容丰富的入口序列空间,并作为一条导向性风景走廊,起到欲扬先抑的作用。至于在低短水口处建立高大建筑物,目的在于使自然构图趋于稳定,使人获得一种和平感,满足村民防卫心理。而重要的还在于,水口从文化观念上造成了封闭一统空间,有利于保存祖先人文教化与事物,养成当地人保守性格。

岭南人也一样崇天尚鬼,民俗中存在许多禁忌。为消除这种禁忌,在农村聚落中常借用风水建筑来完成。故每于村落入口、门前巷口和凶宅附近的正对吉方处,常见“泰山石敢当”字

样。按“石敢当”为所向无敌之意，能使妖魔感到害怕，唯有泰山力量可以抵御各种压力。“石敢当”让来者激发出一种敬畏感情，使前方空间具有一种引人入胜的魅力而牵人前进，令空间神圣化，传达空间性质和方向转换目的。此外，还广泛采用太极图、八卦图、镇山海、照妖镜以及其他符镇图案与文字置于门、梁和屋顶上，借以平抚人们对禁忌的恐惧心理，在客观上却带来了广东农村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

无论是散居还是集居聚落，其建筑物体型、材料、立面式样、空间组织、装饰、色调等文化内涵都很有岭南特色和地域差异。广东村落建筑物大致可分为水棚、簰、艇、干栏、单开间、双开间、三间两廊等平面类型，以及它们的复合类型，代表不同的建筑文化风格。

水棚也叫棚，是广东水乡一种独特的传统民居，傍水而建，后接堤岸或矾围，就地取材，悉用杉木、葵尾、蔗壳、稻草等构成，插入泥沙中，涨潮高出水面一尺，退潮远望如浮在水面，空间很浅窄，三维长度不过数尺，犹如白鸽笼，简陋古朴。过去这是无立锥之地的农民及社会最底层疍民的居室。凡疍民分布之沿海，河湖之滨皆有此类建筑，包括珠江各支流，韩江、漠阳江沿岸，海南岛沿海各港，以及港澳地区等。建国后许多疍民移居陆上，水棚一度大增。10多年前广州滨江路就有大片这种建筑，现在只剩个别，但在其他地区，水棚仍是疍民重要的居室。

簰，这里作浮水屋。基础为用竹或木，紧缚成矩形，敷板于其上建屋，也随潮水涨落，主要流行于水上作业人群中。例如

一些海河港口就有这种临时建筑。近年水产养殖业兴起,这种建筑也在沿海一些虾场、网箱养鱼场时兴起来。

艇,本为蛋民生产工具,但也是其生活居室,种类甚多。据1921年调查,广州有20种,包括紫艇、楼艇、厨艇、沙艇、妓艇、货艇、渔艇等⁹¹,形制和功能各不相同。它们集中于水面,即成聚落。例如阳春很多水上居民,至今仍以艇为家,聚居于县城江面上。

由罽或艇形成聚落景观,独具一格。过去香港仔一带蛋民,“都是居住在海面上,……密密层层,一只接连着一只的渔船。……这些栉比的渔船,在水波上蔚成一个城镇”。也有把渔船移上海滩,权当避风遮雨的住宅,“它们排列在海滩上,枯黑破碎,……一只接连着一只,漫成村庄。唯一给他们点缀着生活的况味,是那些硕壮的耗子,在船底罅隙间活跃地往来流窜,觅取食物”¹⁰¹。这种情景,现在已经很少了。但在用地紧张的城镇,这种水上住宅区仍不失为解决住房困难的权宜之计。

干栏建筑是百越文化特征之一,《北史·蛮僚传》说,“依树积木,人居其上,名曰干栏”。一般以竹、木、藤、茅草等构成,夯土墙,适应岭南湿热地理条件。《新唐书·南平僚传》曰:岭南“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过去岭南少数民族多居这种建筑,以后随着汉文化的传播,干栏逐步被其他建筑取代,现已演变为黎族架空船形屋,壮族“关栏”(或栏房、高栏、麻栏)和瑶族两层屋与田寮等,是少数民族地区常见的建筑文化景观。

黎族架空船形屋的屋盖一般呈平圆拱形,外观轮廓像一

条船，习惯称为船形屋。内部间隔如船舱，前后有门，但不开窗，据说是为防止恶鬼进来。整座房子用木柱支撑，离开地面。里面陈设简单，阴暗、闭塞、通风采光极差，居睡煮食同于一室，作炊时烟雾弥漫，黎人多由此引起眼疾，“三石灶”是其室内重要标志。船形屋目前流行于白沙、保亭、乐东、东方、昌江、琼中等部分地区。按其距离地表高度，分“高栏”（高脚）和“低栏”（低脚）两种船形屋。前者仍保持上居人、下居畜两种功能，见于南渡江上游地区。而后者已失去其养牲畜作用，流行于昌化江上游地区。随着时代变迁，一些黎族船形屋外表已演变为与汉人居室相同的金字屋。这主要发生在陵水、三亚和琼中地区，但室内仍保留船形屋文化特征。船形屋基本色彩为一片淡土黄色，配合四周绿树、椰林、白云、蓝天，获得一种调和宁静的效果，且与印尼、缅甸、菲律宾和台湾等地一些木桩屋建筑文化特征相类似，同样适应炎热多雨的气候条件。

广东瑶族多半还居住在二层屋里，即古人云“上楼下牧”者，亦为干栏一种。而在距离村落较远或近田地方所建的孤屋称为田寮，供临时贮放谷物用，也具有干栏文化特色。

壮族“关栏”，见于连山壮区。清末连山县官孔镛诗：“黄茅翠竹壮人家，”勾勒出壮区建筑风俗画面。壮人依山傍水面居，一姓一村寨，由“关栏”组成小院落。也流行“泰山石敢当”，与汉人建筑风俗相似。

单开间，粤中称为竹筒屋，潮汕称为竹竿厝。平面特点是面宽较窄，进深较大，一般达12—20米，靠天井、巷道解决通风、采光、排水、交通等问题。

双开间,粤中称明字屋,潮汕称单佩剑,由厅、房、天井组成。三开间,粤中称三间两廊,潮汕称爬狮,客家地区称门楼屋,为广东最常见的一种三合院式住宅。它向纵深方向发展,最普遍构成两种形式,其一是四合院式,潮汕称四点金,客家称双堂屋;其二是三座落式,又称三厅串,即门厅、中厅、后厅三厅连贯排列,客家地区称三堂屋式。

这些不同开间的建筑,不但各有自己的建筑风格,而且相互组合,构成富有地方特色的聚落文化景观。

三间两廊式传统民居流行于粤中地区,为小农户所居,中间为厅,左右为房,东廊为门廊,西廊为厨房,厅前由围墙构成约10余平方米小院落,中间多设花坛,摆设盆景,构成向心聚合式院落空间,自成一个独立安静的小天地,给人以一种含蓄、隐蔽的感觉和充满家庭温暖气氛。平时院落中还堆放粮食和杂物,进行手工业操作,月夜可纳凉,洋溢着农家生活气息。此乃封建小农经济结构产物。例如南海县大沥镇过去有不少这种建筑。但过去由于治安、迷信和总体关联等原因,这种建筑墙多不开窗,通风、采光较差,因而阴暗、阴湿,院落使用过于杂乱,有碍卫生,风格也显得呆板。

粤中村落,多由三间两廊以及竹筒屋、明字屋组合而成,也有以其中一种为主的。村前广场分布宗庙、家塾(学校),住宅环绕祠堂,呈梳式布局。这种布局严谨,道路规整,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另外,巷道与夏季风向平行,南风可直吹室内,即使炎热的中午,也可形成上下对流,使村落通风良好。冬季则有树木竹篱,挡住寒风。这样整齐的村落,在三水南边西村

及大旗头村现存较完整。

“四点金”农居流行于潮汕地区,前后进三间,中轴对称,以天井为核心组成内开放、外封闭的居住空间。厅堂为活动中心,厅前之天井敞开,室内外空间联成一体。天井地铺卵石或条石,摆设花盆,简洁明快。门廊立面装饰浓重,包括门簪、门匾、对联,侧壁则多绘风俗彩画,富于家庭气氛。门厅与天井间置通花屏风隔扇,以挡视线,使空间转折变化,内涵而不外露,充满宁静安谧的农家情调。潮汕地区,过去“家有千金者,必构书斋,雕梁画栋,缀以池台竹树,民居辄用厝灰和河土筑墙,地亦如之,坚如金石,即遇飓风摧扑,烈火焚余,而墙垣卓立……界过惠州、嘉应,虽闻有之,然不及潮州”^[11]。但这种建筑同样外墙不开窗,天井狭窄,显得挤塞;外进深大,阴湿,造型也颇严谨呆板;装饰和神龛有较多封建迷信色彩。在潮阳、大埔,以至曲江等地都有这种民居。现在随着家庭结构变化,这种民居空间尺度和景观已不合时宜。

潮汕地区地狭人稠,历史上受闽南文化影响大,村落多集居,民居发展成熟定型。村落常见竹竿厝(单间),厅房合一后带厨房天井,门前用竹篱围成小院,多为一般农民所居;单佩剑和双佩剑,即两间或三间小屋,为一厅二房或一厅四房的简朴方整民居;爬狮即三合院,四点金即三开间方整的四合院等。由这些变化丰富的住宅形式组合而成的村落,皆以祠堂为中心,中轴对称,布局严谨,甚至可由它们组成一个大围大寨。通常一围一村或一村几围,规模很巨大。现存典型围寨有饶平南联道韵楼,建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内有72套三进堂

屋,水井30口,实为一古堡式集居村落。

客家地区,山多田少,村落多在山坡或山麓,民居多种多样,风格特殊,在岭南独树一帜,乃客家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客家人聚族而居,故民居多为群体式,俗称“客家大屋”,在兴梅地区主要有如下数种:

(一) 围楼。是客家人初来岭南时建造的民居,多见于闽粤赣边境山区。在梅州之松源(何岭)、宝坑、隆文曾发现可能建于唐和五代的这种建筑,呈长方形,极少窗户,全封闭。后来长方形布局被淘汰,故目前流行圆柱形,内径10余米到数十米,以粘土、细石、竹筋或稻草筋夯土而成外墙,厚达1米。最高围楼有四五层,高达10—25米。内屋用木料构筑楼板和栏杆,分隔成三五百个房间,可供数十户甚至上百户的大家族聚居。今大埔、丰顺及与大埔毗邻之福建和村、埔北英歌山仍可见这种民居。

(二) 走马楼。外形有一字形、凹形和曲尺形。多依山而建,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居室和仓库,下层为厨房、农具杂物房、畜栏、厕所等。楼上长廊设有栏杆。这种楼式优点在于适应山区潮湿、多雨气候,既可防山洪、避潮,也可防盗,防野兽,更干爽、卫生和通风。目前客家山区,如兴梅、赣南、闽西等地仍大量存在这种建筑。

(三) 五凤楼。多见于山区,依山坡地势呈阶梯状构建。顶瓦呈层叠式,一般为五叠,从远处望去,顶瓦飞檐,宛如五只凤凰展翅,故名五凤楼。

(四) 四点金。形式与潮汕地区四点金相似。但房屋四角

升建炮楼式(两层以上)建筑,故亦称“四角楼”。楼上有瞭望孔和枪眼,即喇叭形窗口,具安全防卫功能。以兴宁、五华至为常见,梅州之南口、松口、白渡、城东也有不少这种建筑。

(五) 殿堂式。类似中原汉族府第风格的殿堂式民居。它采用我国传统建筑工艺中最先进的“抬梁式”和“穿斗式”混合结构。其布局严谨,左右对称,中轴明显,讲究坐向、主次,外观堂皇美观,具有较高的建筑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特别是屋内厅堂多,天井多,故又习惯被称为“十厅九井”,或“九厅十井”。其功能划分也很清楚,沿中轴线所分上中下三个大厅,为奉祀祖先和公共活动场所,左右两厢或四厢为生活区,以若干个花厅为中心分成许多生活单元。屋前为了一口半月形池塘,屋后建一座半月形土丘,称“花头茔”,遍植树林。这种建筑用料也很讲究,多用三合土夯墙,也有用青砖的,雕梁画栋,工艺精美。一座大型的这种建筑,内有上百个房间,可供一二十户、上百口人居住。大塘黄埔乡张弼士故居“光禄第”、黄沙乡“进士第”为现存代表性殿堂式民居。

(六) 围龙屋。由殿堂式扩大而成的建筑,其后围建成马蹄形,故曰“围龙”。一般为一条“围龙”,但也有多至二条、三条“围龙”组成大型“围龙”群寨子,其布局有二堂二横一“围龙”,三堂四横一“围龙”,包括了厅、堂、天井、水井、间、廊、门、楼、围墙、晒坪、池塘等,具有生产、生活、防守、消防等多种功能,实际上构成了以一姓或以大姓为主的乡村社区。客家人宗族、家声观念极强,子孙满堂一般也不分家,三五代同堂的大家庭不少,一座“围龙”屋常住一二百乃至三百余人。如梅县隆文岗

上村(又名岗下围)住四五户人,院落层层,蔚为大观。所以客家围龙屋与北京四合院、山陕窑洞、广西“干栏”、云南“一颗印”一样,被中外建筑学界称为中国五大民居建筑之一。1985年,美国民间建筑考察团一位文学家奥斯汀在参观梅县围龙屋之后,惊叹“这是我所看到的最感奇特的中国式民居建筑”。日本建筑学会副会长青木志郎教授在参观梅县围龙屋时题词梅县为“梅县天国”¹²,现存典型围龙屋有已故叶剑英元帅故居(在梅县雁洋镇),梅县隆文镇岩前村“秉彝庄”大围龙屋等。不过,随着时代发展,围龙屋建筑造型也在不断进步。旧的泥墙木棚已被钢筋水泥取代,平房也建至几层楼房,而且形式多样,结构新颖,如梅县南江镇“南华义庐”、洋坑“六柱楼”即为其中佼佼者。

(七)中西合璧式。见于客家侨乡,将客家传统房屋结构结合西洋建筑艺术装饰建造的一种混合型民居,具有特殊建筑风格。虽然它在外观上吸收了西洋的艺术装饰,但内部仍然是地道的客家民居传统结构,代表性的建筑有建于民国时期的梅县白宫镇“联芳楼”,程江镇“万秋楼”和瑶上镇“善木庐”等。

此外,兴梅地区还有纵列式、穿堂式、镇头式和下山虎式等民居,连同以上各式,凡 11 种。皆渊源于客家人保持中原世胄遗风和血统亲情伦理观念,适应迁移和抵御外来势力,以及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和大家族制度,也是中原汉文化与岭南山区自然和社会环境相互感应的产物。

随着客家人迁移,客家民居也作为一种文化转移,传播到

其他地区。广州、开平、台山、信宜、宝安、香港新界等地都有不少客家建筑。例如宝安坪山镇大万乡，就是一个典型的古堡式客家人村落，建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村内有数列房屋，以小巷分离。据说最多时居住六百多人，现在仍居四百多人。这种客家人村落，全省也不在少数。

客家民居，初时都是封闭式的。宋元以降，客民超过上著，力量渐渐强大，民居从封闭转到半封闭式乃至开启式，这也是一个文化景观转换过程。例如现存客家大屋就有这三种景观。封闭式以主屋厅堂为全屋核心，主屋横屋与后围屋结合紧凑，一二三围甚至多围形成一个严密整体，前后围屋内有菜园、果园、花园、鱼塘、禾坪、杂屋、畜栏、厕所等一应俱全。半封闭式与封闭式区别是让主屋与横屋成严密体系，不建后围屋，只建后围墙，并辟果园、竹林围绕四周，点缀环境，以取得经济效益。至开启式与半封闭式区别在于既建前围也建后屋，使后围屋与外横屋互相连结，但又使两边横屋与主屋厅堂解体，不设小门楼。无论哪种形式，都依地形、环境变化表现以上各种风格。例如封闭式围屋就有殿堂式、花园式、或中西合璧式等，同样半封闭式与开启式也可建成各种珍禽动物形态。值得十分强调的是，客家建筑文化内涵很注意天地、阴阳、方位和风水关系，讲求空间宽敞，房间多，厅堂宽大，建材精，形式美，墙壁坚固，结构谐调，主次分明，对称合理，设施齐全，气势宏伟，造型庄重，幽雅别致，集中华建筑文化之大成，故得以独步古今，闻名海内外。

海南岛村落景观，一则是因地理环境，尤其是台风影响，

“公私宫室不得为高敞”；二则受大陆文化影响，“规制与内地略同”¹³。一般“民居矮小，一室两房，栋柱四行柱，园径尺，中两行嵌以板，旁两行整以石，俱系碎石，以泥整成，亦鲜灰墁，其木俱系格木，质坚重，钉不可入……皆购自黎山”¹⁴，其文化特色又与自然资源不可分割。别具一格的是，海南村落几乎全隐藏在树林里，或地势稍高有水田之台地上，四周种以高高凤凰树、无花果、或椰子树作为标志，故在海南旅行，不易见到村落。村落间构筑凤凰竹、防御沟、土墙、竹篱等作为防线，拱卫村落安全。而为方便上山耕作和收割，则在高位旱地上建山寮，河流很少或基本无桥，人们涉水而过，有的村落还分布在下涸河谷底部。不过现在村落外围防御设施早已拆除，沿海地区民居主要为各式砖瓦房，但进入五指山黎苗族地区，在蓝天、翠峰、清泉组成的热带山地特有的自然景观映衬下，除一部分建国后修建的单开间和双开间并联组合形成的行列式村落以外，更多的依然是疏落有致分布简单朴素的金色茅房，以及不时出现的棕色的牛群，表现出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

近年，广东农业聚落发生较大变化，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根据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节省用地原则，许多村落经过统一规划进行改造或重建。新建村落多为100—150户，500—900人，也有将散居并为集居。布局上居住区适当集中，并兴建包括办公室、学校、托儿所、文化室、吸排水系统以及道路网络等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民居以两层为主，有“四门归厅”、“三门归厅”、“两门归厅”等组合。所用材料多为钢筋水泥或砖瓦，有条件的地区还出现一栋栋小洋楼，并

在路边宅旁及零星地段广植果木修竹,家家院落掩映于绿树丛中,环境整洁卫生、憩静幽雅,富有南方情调。

第二节 城镇聚落分布及其文化景观

按照我国城市规划法,城镇是指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和其他县以下的建制镇。结合广东实际情况,城镇人口不超过10万。聚居人口在10万以上而设市的城镇则称为城市。这两类聚落文化景观既有联系又有较大差异。

城镇是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形态和联系纽带,也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聚落。城镇规模虽不大,但“五脏俱全”,具备各种主要设施,履行多种或某种主要功能,在地方城市体系和空间结构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城镇聚落文化景观,兼有城市和乡村特点,在各类聚落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镇聚落类型与分布

城镇聚落分类很多,从文化景观角度,以分为专业性城镇和综合性城镇为宜。

专业性城镇职能比较单一,相互间差异颇大,兴起和发展历史短浅,但速度快,起伏较大,对外联系范围广,距离长,内容比较单一等。根据各镇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差异,在广东可分为交通、旅游、工矿、科教等城镇。

交通城镇常处在水陆交通方便位置,从事运输业的人口

比例高,有许多交通建筑物和设施,车流、人流、物流和信息流频繁,构成一幅各式人和物过往匆匆、节奏紧凑的图景。这类城镇有东莞麻涌、石龙、虎门,开平三埠、蚬岗,三水西南、河口、六和,中山阜沙,番禺新造、大石,台山公益、三八,顺德杏坛,南海小塘,高要禄步,乐昌坪石,龙川老隆,增城新塘,潮州庵埠,饶平三饶,梅县松口,翁源官渡,琼山云龙,东方八所等。

旅游城镇指以游览、旅行为主要社会活动和经济来源的城镇。产生这类城镇的条件,一是要有旅游资源,及满足人们美学欣赏的景观;二是要交通方便;三是要有一定数量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为人们临时外出提供各种方便有效的服务;四是要当地居民热情好客,给游客以一个文明、轻松的社会环境。旅游城镇饮食业特别发达,饭店、酒家林立,大排档满地;旅馆是聚落主体,不同文化风格的建筑物至为触目;土特产和纪念品商店很多,满足游客怀旧心理,也是异质文化的一种交流;摄影业很发达,一枝独秀。固定和流动摄影师争相招徕游客,重要景点还设固定取景镜头,但更多的游客是自带相机,选择自己喜爱的风景。旅游文化内涵很广泛,其景观也因地而异。如果以从业人口和经济收入来计算,目前广东还没有专业性旅游城镇,但以旅游功能为主者,则有西樵镇、莲花山镇等,且有数量不断增加之势。

工矿城镇比例最大,分布最广,是广东城镇的主体。一般包括以厂(场)为中心的一系列建筑群体。众多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以及其经济运行所必需的各种网络和管理机构等。这类城镇烟囱林立,构造特殊厂房和原料堆场占据很大空间。工

人很多住在专门住宅区里,按规定时间上下班。货车往来不绝,噪音和特殊气味充斥空间,环境质量比较差。据1988年调查统计,广东县城一级的工业城镇有24座,即新华、街口、市桥、澄城、黄岗、棉城、榕城、大良、西南、台城、会城、沙坪、四会、东城、三埠、廉城、兴城、平山、东海、紫城、德城、罗城、都城、兴城镇等^[15]。县城以下的工业城镇更多,星罗棋布于各地。在珠江三角洲工业城镇就有南海大沥、平洲、盐步、官窑、九江,顺德北滘、伦教、桂洲、容奇、龙江、乐从,东莞舌龙、常平、凤岗,宝安平湖、布吉,番禺大岗、化龙,增城仙村,新会古井,中山小榄等。这些城镇工业就业人口一般占当地就业人口一半以上,多者超过70%。建筑业近年在珠江三角洲异军突起,建筑城镇也应运而生,计有台山大江、北陡、隆文、三八、上川,高明杨梅、明城、三洲,恩平恩城、良西、横陂,鹤山古劳、龙口、宅梧,新会七堡,南海罗村,宝安石岩镇等。它们的建筑业人口比一般城镇高4—15倍,占当地人口20—35%。由于工业兴衰比较快,所以工业城镇文化景观一般说来比农业聚落变化较多。

科教城镇时下在广东唯有广州石牌五山镇,教育科研机构猬集,多连续楼式建筑物和运动场,人口单纯,年龄不高,环境安静整洁等。

实际上,广东绝大多数城镇职能都是综合性的,皆为不同腹地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服务中心。它们发展都比较稳定,等级比较明显。因此,它们的聚落景观也是综合的,难以用一种职能景观代表全貌。上述所谓专业性城镇也是相对而

言的。

城镇作为聚落在岭南虽然出现很早,但作为一种行政建制,始见于宋代。其时广东共设十五个镇,即南海大通镇,增城足子镇,番禺瑞石、并石、猎德、大水、石门、白田、扶胥镇,曲江濠溪镇,翁源玉壶镇,龙川驿步镇,宝昌(育雄)大宁镇,海南临川和藤桥镇等¹⁶。城镇的大量出现则是近世之事。据统计,1940年以前,广东(含广西合浦地区)有建制镇305个,1943年1月为203个,1950年8月为175个¹⁷,1953年为331个,其中人口在3—6万的城镇有7个,1—3万的有46个,不足1万人的有278个,同期还有介于城乡之间,不属建制镇的圩3000个,平均每7.5公里有一个圩¹⁸。此后广东城镇数量几乎没有增加,人为地不设镇,甚至撤镇。大多数城镇为各级行政中心,商业和服务业不发达,有少量工业,其中主要是粮油加工和支农工业。建筑业很微弱,有的是刻板划一格式,景观几乎雷同,停滞和没有生气,城镇之间则处于封闭和分割状态。近10余年来,广东城镇数量迅速增加,特别是一大批圩市升格为建制镇。1986年全省建制镇已达1454个。到1988年,广东建制镇占全国14.5%,独居首位¹⁹,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地区,城镇规模大,分布广而密,平均每80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圩镇,服务半径为5公里,是全国城镇分布最为密集地区之一。如珠江三角洲就有城镇440个,约占全省31%。此外,广东城镇分布依次再为西江地区、雷州半岛、兴梅、海南岛和粤北。不管怎样,广东仍是全国城镇聚落景观最常见和最集中地区。

城镇聚落地区分布的疏密,深受政治、经济、自然、交通等因素制约。一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多城镇,如上述之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地区。顺德县每个镇服务半径只有4.83公里,为全省之冠。二是省界或边境界线附近,城镇比较密集。原因是关税壁垒,这是不同政制地区都有的现象。各种偷税逃税等非法活动,多在这些界线经过的地区发生。厚利所在,促使两边聚落增多。例如雷州半岛与广西接壤地区就有不少这样的城乡聚落,包括峒利、大寺、那陈、东灵、那路、盘龙、沙坪、烟敦、南乡、卜塘、凤门、白沙、石角、六山塘、双合田、水岸、大伦等。深圳和香港接壤地带则有大鹏(王母)、葵涌、盐田、沙头角、宝安、蛇口、南头、西乡等。三是沿河流两岸分布,几乎所有县城无不据在河边者。至一般圩镇紧靠河边者为数更多,如漠阳江在阳春县境就有河塘、石望、松柏、春湾、合水、春城、岗美等城镇。四是沿陆路交通线分布。其中有先有聚落,后有交通,后者选线取决于前者,这于近世公路交通兴建时最为常见。而交通线完成后,原有聚落不免受其影响,或趋繁荣或趋衰落。如增城中新镇即在广汕公路通车后发展起来,1931年始正式定今名。五是水陆交通汇合点更为城镇聚落产生地点。例如广东南路地区,水路由北而南,陆路自东而西,相交之处城镇甚多。这些产生在两河汇合地点的城镇,则称为合水。信宜和阳春都有合水镇,分别位于鉴江和漠阳江与它们支流汇合地点。

受多种因素制约,广东城镇聚落布局形式也很复杂多样。

一是棋盘式,按照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制度营建,坐北向南,“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中轴对称,官署居全城中央,民居环绕四

周，外围以方城，开四门，有些还有护城河。官署左有钟楼，右有鼓楼，暮鼓晨钟，居民习以为常。从秦汉时代起，广东就按此规制筑城，如龙川县有佗城，海南儋县有儋耳城等。唐宋元时期，筑城规模越来越大，也更普遍。广东现存最早的城堡是位于廉江罗湖的唐代罗州古城。从残存城墙基看，其前有护城河、夯土城墙，城北为官署，其余为里坊的民居住宅，有城门进出，南郊有市集。宋代南雄古城和元代揭阳禁城也保留城墙和城楼。不过筑城高潮发生在明代，全国大部分州县城得到重建，广东现存古城建筑也以明代为多，但仍沿袭过去规制。如明雷州府治海康城，平面呈正方形，四门城门各相正对，街道呈十字型，井然有序。顺德和香山县城亦大致呈方形。民国初年修筑马路，许多古城垣被拆除，新城区向外自由发展。结果出现两种情况，一为“方正”形状解体，传统文化观念和景观被动摇；二是不少城垣拆除后，仍留下环城大路，代表传统文化残余势力，并成为新城与旧城的分界，旧城仍多为官署机关所在，而新城则为商业住宅区，两者文化景观有很大不同。有些护城河被填塞，成为环城大道，后世许多城镇都有环城路一类地名，反映了传统筑城文化制度。棋盘式布局在平原地区很普遍，但位居山区者，地势起伏较大，故城镇建设之初，亦往往放弃正方形或长方形格式，而采用其他切合当地实际的布局。二是放射式，于广东城镇亦不多见，一般为新县城有此形式，如花县新华镇、仁化县仁化镇、龙门县龙城镇、新丰县丰城镇，以及信宜、高州等县城都有类似放射式形状。三是自由式，无固定形状，形式自由活泼，不拘一格，既有旧城，也有新镇。属于

这种形式的有从化街口、开平三埠、高明三洲、鹤山沙坪、惠东平山、佛岗石角、罗定罗城、云浮云城、吴川梅菪、定安定城、屯昌屯城、琼海嘉积、文昌文城、儋县那大、陵水陵城、琼中营根镇等。也有内棋盘外环形布局。这主要受城垣或护城河形状影响，如阳江江城、郁南都城、徐闻徐城镇等。

二、城镇聚落文化景观

城镇聚落文化景观，一方面是从历史长期积淀下来的，有一定稳定性；另一方面是其居民主要为非农业人口，多从事第二或第三产业，接受文化信息量大，故景观变化比农业聚落快很多。那里有工作的居民按一定时间上班下班，许多工厂、企业、事业和行政机关相互配合和制约，使整个城镇社会经济有条不紊地运行。居民按照户籍制度居住，而不是聚族而居。城镇使用动力主要是电力或蒸气，而不是人力或畜力。此外，当地居民还享受近现代工业技术所提供的商业、服务业、文化和娱乐的各种方便。屋宇鳞次栉比，较为平直的马路，形形色色的招牌、广告，以及熙攘人群，构成街景。但城镇又不能像城市那样远离农村，故定期集市和大型公众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流动人口主要是附近农民，各类设施和服务主要是以他们为对象的。目前绝大部分城镇还没有公共汽车，人们主要靠步行，或依靠自行车以及少量手扶拖拉机和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县城以下的建制镇，早晚比较清冷，午间热闹，其景观比县城简单得多。还有相当一部分居民从事农业生产，说明这些城镇

植根于农业社会土壤。

广东城镇建筑过去都是传统形式。城墙拆除以后,出现少量水泥马路和骑楼,但相当一部分道路仍是鹅卵石或花岗岩石板铺的。多砖瓦房、夯土围墙,在珠江三角洲则多蚝壳垒的墙基,河而上架设砖石或木板桥梁。一些城镇的镇区与农村联系在一起,没有明显畛域。但通常是新建筑自成一功能区,多采取两面街、外店内宅布局。骑楼和屋宇纵深较长,多为2—4层。而传统民居集中保留下来,间也有插花现象。一边是较先进的基础和生活服务设施,另一边仍以稻草、枯枝为燃料,甚至把马路作为晒谷场,放猪养狗,粪便、移瓦、烂泥、宅基充斥街巷,环境质量欠佳。一个城镇,两种景观,泾渭分明。聚落建筑文化本是一种动态和充满时代感的文化。但在改革开放前,这种文化在很多城镇被窒息,或被简单化和公式化。许多建筑造型仍袭用传统严格轴对称形式。特别是1958年以后,各地兴建的办公楼、大会堂几乎一个模式,一种风格。例如现存顺德大良、新会会城、阳江江城大会堂,都仿效北京人民大会堂风格,外观上没有什么差别。“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口号被庸俗化,并渗透到建筑文化各个角落,到处把五角星、红旗、火炬作为标签,以各种纪念性数字为比例来构造建筑物,令人啼笑皆非。结果是城镇聚落景观差异消失,建筑文化缺少地方特色,到处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和格调,比1958年前后有过之而无不及。

近年城镇化过程在广东各地兴起,带来了当地物质和精神文化巨大改变。在经济发达地区,居住被视为消费之首,住

房从讲究实用转向雅致美观,追求多方面文化享受。楼房成为主要住宅。据有关调查,东莞寮步镇石坑乡,1979—1989年每百户农民兴建砖石和钢筋混凝土小洋房各42幢,不仅室内装饰华丽,也讲究室外美观,各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衣着也从追求耐穿保暖趋于款式新、色泽鲜、质料好,与大城市居民无多少差别。文化生活也从枯燥、单调趋向丰富、高雅,许多城镇不但有文化站、灯光球场、舞厅、音乐茶座,而且有公私开办溜冰场、桌球室、音乐队。邻近农村青年每于农闲或晚上结伴来到小城镇,享受各种文化娱乐,或者远足出游。人们的交际方式也从封闭家庭转向开放集市或茶座;交际范围从亲属、邻里扩大到同行、同业;交际内容从私人琐事扩大为生意、信息,而且更多地使用电话、电报以至移动电话等,构成一幅幅从未有过的城镇文化景观。但不容忽视的是,有些城镇失于没有及早规划,各类建筑一哄而起,一味追求新潮洋味,结果造成新建城镇功能分区不明,景观杂乱,建筑文化层次低,总体效果欠佳等现象。例如不少城镇都兴建商业一条街、饮食一条街,极力装饰临街铺面,而不顾商店背面“乱、脏、差”;又有一些农村圩镇,私人楼宇建得很豪华气派,装修非常讲究,但周围屋宇却很残破,巷道狭窄弯曲,犬牙交错极不协调,成为城镇建筑景观中的败笔,有必要通过规划加以整治。

第三节 城市聚落分布及其文化景观

城市聚落是指按国家行政建制设市的城市,人口一般在

10 万以上。城市相对于城镇,不但人口规模大,管辖范围广,而且结构复杂,功能齐全,经济文化生活丰富多样,构成多层次的景观风貌,也是各种聚落景观的综合体。

一、城市聚落分布与类型

广东城市兴起虽然很早,但作为一种行政建制,始见于元代,称录事司。在广东境内计有广州、韶州和潮州路三个录事司²⁰,皆设在路治的城厢地区,专管城厢居民事宜。此后直到民国时期,先后成立了广州、汕头、海口、湛江等市,城市聚落专名才固定下来。1950 年增设佛山和江门市,但城市建制发展仍很缓慢,直到 1978 年全省 1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仅 10 个,多为地区一级行政机关所在地。近年城市发展很快,1988 年初,广东城市已达 22 个,为全国设市较多省区之一。它们是广州、韶关、深圳、珠海、汕头、佛山、江门、湛江、潮州、茂名、惠州、梅州、肇庆、东莞、中山、汕尾、河源、清远、阳江、海口、三亚、通什等。如果加上香港和澳门,广东城市凡 24 个,绝大部分分布在各大河流域内,但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为集中,占半数左右,构成密集城市带。而其他城市分布比较分散,为各个地理区域中心城市。

广东城市具有首位分布特点,即首位城市规模特别大,而其他城市规模小,形成强烈反差。现在人口超过 100 万的特大城市只有广州和香港,而人口 70 万左右的大城市仅汕头一个,其余为中小城市。按照国家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

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后者城市景观将发生很大变化,成为广东新城市景观代表。

这些城市都是不同地域的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发挥多种功能。在此基础上,有些城市专业性功能会突出一些。例如茂名是一座石油工业城,汕头、湛江为港口城市,汕尾为著名渔港,中山为以家电和食品为主的轻工业城市,东莞则以来料加工著名。这使它们的专业景观更为突出,也显示城市文化特色。

广东拥有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城市。它们从普通边境小镇崛起为繁华的特区城市,不仅本身产生巨变,而且为我国建立经济特区提供了成功范例,更是新生特区文化的橱窗。

广东珠江口外还有香港、澳门两个殖民时代发展起来的特殊城市。它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基地,发挥对内地文化辐射作用,而其各种光怪陆离的文化景观,又是近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城市景观的缩影。

广东城市类型的多样性,奠定了它们异彩纷呈文化景观的基础,也是广东城市一个重要特色。

二、城市聚落文化景观

城市是一个多元、复杂的大系统。其作为聚落文化景观主要通过自然风光、道路、建筑群、公园绿化、山水利用等人文特色来表现,包括了建筑文化、绿色文化、蓝带文化(水文化)等,涉及自然和人文因素各个方面。而广东城市,除了深圳、珠海、

通什等少数城市以外,城市历史一般都很长久,或曾为省府州治,或为重要商埠,历史文化景观层层积淀。近年城市建设迅速发展,新景观不断出现,新旧景观交替叠置,促使城市文化景观向多层次、多方向和多元化方向发展,显示无限丰富的空间内涵。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些城市景观每为时代文明进程的标记,深刻反映某个时代特定地域、特定文化土壤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生产方式、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心理的需要。中国历史上汉唐和明代两次文化高峰时期,都在广东大部分城市中留下不同印记。汉唐广州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经济都会,有秦汉船台、越王宫、番禺城、“干栏”式、“曲尺式”、“楼阁式”、“三合式”建筑。唐代广州有外商云集的“蕃坊”,有怀圣寺光塔、光孝寺内石经幢等建筑遗存,有“货通狮子国,乐奏越王台。”的繁华。明代广州将宋代东西中三城合一,营造坚固宽广城垣,以及作为广州象征的多层建筑——镇海楼,嘉靖年间人口达80万²¹,”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²²。明代工商城市佛山,“民庐栉比,屋瓦鳞次”²³;河港江门船只“千艘如蚁”²⁴;西江重镇肇庆“帆樯如织”²⁵;东江重镇惠州为“岭南之名郡”;潮州“士女繁华,裘马管弦,不减上国”²⁶.,海口被誉为“小苏杭”,皆为其时城市景观某些断面。

本世纪初,许多城市纷纷拆除城墙,开马路,兴建各种公共建筑和设施,形成近代街景。此乃东西方文化在城市建设上的一次碰撞,结果出现不少将传统建筑形式运用于近代建筑创

作的探索性成果。广州中山纪念堂、市政大楼、中山图书馆、石牌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执信中学、培正中学等即为这类成果代表作。同时还引进西方建筑形式和材料，为岭南建筑增添异彩。例如骑楼，本为流行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一种仿西班牙式建筑，民初由澳门引进广州。其以建筑宽广廊道为主，相联成骑楼式街道景观。这既便于面对顾客，做活生意，又能结合岭南气候特点，遮阳避雨，故很快得到推广。到本世纪 20 年代，已是十里洋场，连绵不断皆为骑楼，成为广州主要街景，尤以第十甫、下九路、中山路、解放路、人民南路一带较为集中，以西濠口一带最为气派。不但各地城镇普遍采用这种建筑形式，形成南国都市特有的建筑风格，而且传到国内一些城市，上海广东帮商业区也是骑楼式建筑的，当然也有一些西洋建筑点缀于广州建筑群中。例如沙面不同风格的领事馆、银行、洋行、教堂、学校、俱乐部与园林等公共建筑，乃至坐椅、花坛、喷泉等建筑小品，都体现了西洋建筑整套体系结合地方特点所作的某些修正。此外，在沙面租界以外城区，也有一些西方古典或以西式为主的折衷式建筑，如长堤海关，北京路省财政厅、大新公司（今南方大厦）、爱群大厦、中山大学旧址（今省博物馆）、新华、广州电影院等，亦不失为广州近代建筑的佼佼者。

广东饮茶成风，茶楼建筑也在二三十年代兴起，尤以广州最多，著名的广州、莲香、陶陶居等茶楼这时先后落成。这类建筑从外到内都颇具特色，包括宽敞高昂的门庭空间，宽大易走的楼梯，高宽大厅，画栋雕梁装饰，满洲花窗的室内间隔，每镶有云石之红木家具以及名人字画等，都充满两国建筑风味。加

之茶楼日有早午晚夜四茶饭市,以及延聘名伶演唱,招徕顾客如云,尤以早夜二市至为热闹,与热带城市气候条件相协调,为国内其他城市所少见。

但是,岭南传统建筑文化持续性并没有在近代城市社会经济背景下泯灭,反而有所发展。在广州出现的竹筒屋和西关大屋,成为近代代表性传统民宅和官吏、侨属及富豪居室。竹筒屋即单开间,见于全省城镇,在广东城市中大量存在于内街,形成密集区,也是旧城改造的难点。在广州,知名街道有将军东、将军西、盐运西、霞飞坊等。西关大屋主要产生于清末,是竹筒屋的深化发展,青砖墙、花岗岩墙脚,正门设矮脚门、“趟栊”、“板门”三重装饰华丽,开间多,面积大(约400平方米)、多重小天井,有作小庭院和小花园;室内陈设讲究,如硬木刻花挂落、彩色玻璃屏风,再衬以中式家具、古董国画之类,显得高雅古洁,极富岭南风韵。其始建于广州宝华坊,后扩展到多宝坊、逢源坊、华贵坊等,以广州西关一带居多,故名曰“西关大屋”。著名的有多宝路李文田探花的“泰华楼”。目前保留下来的不足200家,且已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亟宜抢救和保护。其他城市也于近代形成相似于广州的建筑和景观,包括各式祠堂、会馆、客栈、牌坊、戏台、文物古董店、书斋、茶庄、商行、乃至广场、公园、绿地等节点空间和建筑小品,从建筑造型、色彩到质感,都处处体现了时代的真实。例如海口市1924年拆除明代所城,开辟多条马路,原先石板路部分改铺混凝土,两旁兴建楼房、民宅、小作坊、日杂店、饭馆、酒家,形成街景。戏院、饶园(娱乐中心)、中山纪念堂等中西式公共建筑也

先后落成,海口作为一个城市聚落已颇具规模。

岭南山青水秀,四时花果不绝,且多奇石,便于仿效自然造园与借景入园,故建筑历来与庭园有不解之缘。即使三分院落,半壁残垣,还是窗台、天台、阳台之类,总是奇花异草、落英缤纷,成为岭南古典园林重要构景。特别是在城市,营造园林自昔就蔚为风气。赵佗王朝在广州兴建宫室苑囿,是为岭南造园之嚆矢。此后广州有三国诃林,唐西郊荔园,南汉昌华苑、甘泉苑、药洲,宋代以降羊城八景,宋代惠州西湖之桥、馆和花圃等。及至明清,私家园林规模更大,建筑造型更加讲究,著名的如广州城东之东皋别业,城西之西畴,十三行商潘仕诚的海山仙馆等,据统计不下 60 座。而至今影响最大的是分布在广州附近的清代广东四大名园:东莞可园、顺德清晖园、番禺余荫山房和佛山十二石斋,均以精巧玲珑、小中见大著称,对于形成今天岭南园林起着承先启后作用。民初,各城市相继开辟公园,为普通市民所享用。如广州就先后建成海珠、净慧、仲凯、义口伶公园(均已湮),以及河南(海幢)、东山、越秀山、白云山公园等。1935 年还规划建设公园 12 处。这些公私园林,皆属我国自然山水式风景园林系统,但又吸收不少西洋建筑和欧洲几何规则式园林特色,表现强烈的岭南文化风貌,无愧为我国园林艺术宝库中之一块瑰宝。

至香港、澳门自沦入外人手里以后,中西建筑接踵而起,街道网络不断向外延伸,很快覆盖香港岛和澳门半岛,形成城市聚落。澳门乾隆时已“屋多楼居,楼三层,依山离下,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诸花果状者,其覆俱为螺旋形,以

巧丽相尚。垣以砖，或筑土为之，其厚四五尺，多凿牖于周，垣饰以堊。牖大如户，内阖双扉，外结琐窗，障以云母。楼门皆旁启，历阶数十级而后入，窈窕洁屈，已居其上，而居黑奴其下”²⁷。各式教堂、修道院、古城堡、灯塔、园林、博物院、纪念碑，酒店、娱乐场、公园，以及古老村落、水滨渔民，加上弯曲狭窄、具有南欧风格的石仔路，更体现这座中西结合、华洋共处的城市景观和独特的市井风情。香港开埠前为一片疏落渔村，鸦片战争后成为英国殖民地，渐渐被经营为对华侵略基地。先后通过填海造地，发展近代产业，以及一系列市政建设，一幢幢不同风格的建筑物、宽阔的马路、山顶公路、机场、地铁等相继落成。从太平山鸟瞰维多利亚港，两岸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低错落。遍布港岛及其后在新界各市镇的这些巍峨壮观建筑群，已成为香港城市景观的标志和经济繁荣的象征。但在这些摩天大楼之下，仍有用铁皮、木板、破砖、石棉瓦等搭成的大片木屋或寮屋，分布在上黄色山坡上。这些简陋、矮小、灰蓝色的贫民窟与高大密集的“石屎森林”形成强烈对照。近20年来，随着香港经济崛起，各种风格流派的建筑物层出不穷。其中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是在大型建筑物空地、公共屋村之间，多设文化内涵多样形态奇特的几何图案雕塑，以及袖珍式城市园艺、室内园艺式“广场”或“城”，实为综合性商场。大型屋村已成为香港住宅景观的代表。集中建造生活设施齐备的住宅楼群也遍及沙田、荃湾、屯门等新市镇内，比较著名的有太古城、富豪阁、德福花园等。一般高达二三十层，中心区域有停车场、运动场、游泳场、学校、幼儿园、花园、酒楼、店铺等。时至今日，

过去旧式楼宇建筑已所剩无几,木屋村也差不多被公屋村所取代。上述新兴起的市镇,楼宇形状多种多样,款式新颖,华丽美观,装修豪华。不少楼高三四十一层,五六十层的也越来越多,高耸入云,人如置身谷底。香港作为一个旅游购物中心,世界各地游客大量涌入。茶楼食肆,灯红酒绿,食客如云;入夜市区霓虹灯五彩缤纷,百业喧嚣,歌坛舞榭,欢腾达旦。还有蓬勃发达的新闻出版业及色彩纷呈的影视业,经常举办的东西方文化艺术和体育活动,构成繁华的城市景观,尤其赛马之日万人空巷,被称为赛马文化。香港社会还有其丑恶和落后的一面,如色情场所林立,迷信色彩浓厚等。反映了这个城市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背后精神文明的空虚。

近40年来,广东城市如城镇发展一样,虽然也走过不少弯路,付出过一定代价,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曾严重摧残人类珍贵文化遗产,但这毕竟不是主流。城市建设仍是朝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这反映在城市景观和建筑风格上,到处都充满了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广州建国初兴建于工业区内的住宅群,多为砖木结构简易平房,就是为了解决工人居住问题,如建设新村、和平新村、西湾路上人新村等。50年代中后期,吸取苏联经验,兴建组团式多层街坊小区,例如广州重型机械厂工人住宅区,员村住宅区等。同时也兴建一些独院式、双拼式和公寓式华侨新村和住宅,满足不同层次侨眷需要。80年代以来,广州住宅吸取欧美特色,结合广东地理环境特点,布局争取良好风向,灵活而不呆板,庭园与住宅小区相结合,扩大各种辅助性建筑设施,如厕、台、浴建筑等。住宅建筑景观朝着群体布

局合理、美观大方、配套齐全、内部多功能、平面布置灵活多变的方向发展,逐渐形成造型简朴、轮廓简练、线条简洁、色调明快、既富于传统和民族特色,又不偏离国际化、标准化的南方建筑风格。触目建筑物都比较轻巧、通透、秀薄、明快、典雅,与北方建筑的庄重、稳健、朴实、灰暗形成鲜明对照。如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五羊新村等一大批设计别致、造型新颖、风格独特的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即为广州城市景观增添异彩。广州友谊剧院、白天鹅宾馆等又被认为是外来文化与广东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是高技术时代的产物。这样雄伟壮观的高楼大厦雨后春笋般耸立在广东大中城市中,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城市成为这些建筑荟萃之地,它们象征着城市财力强大、生气勃勃,反映不同文化内涵,更是经济特区一个重要标志和景观。许多城市都新辟了公园、雕塑、桥梁、城徽、绿地、水面、文化遗址遗存,以及形形色色的旅游、休假、娱乐等建筑和设施,使城市空间轮廓更富现代感。如近年广州等城市园林建筑异军突起,功能、格调大异于五六十年代。那时以满足人们休息、游览需要,格调古朴、典雅、宁静,以古色古香为主题,广州流花公园、中央公园等即属其例;70年代公园建设吸取外国公园风格,以明朗、开阔为主题,越秀公园鲤鱼头青少年活动区即为这种建筑典范;近年兴建游乐场成为潮流,且与旅游业一起发展,将文娱与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以跳跃运动为主旋律,充满了活力和进取精神,如广州东方乐园、南湖游乐场、深圳香蜜湖等,皆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加之新近各种新型建材大量出现和使用,使城市建筑锦上添花。许多城市建筑外部空

间,既有庄严雄伟、朴素大方的形象,也有纤薄轻巧、活泼开朗的风格,给人以意气恢宏、钟灵俊逸、静穆深远、心情舒畅之感。例如深圳繁华热闹的商业区与珠海滨海住宅小区,即给人以上述意境和印象。甚至连城里人的衣着也受到城市空间环境的浸染,以追求淡雅、清新、飘逸和色彩明快为时尚,两者越来越趋于和谐一致。再有城市企业文化、家庭文化、校园文化、音乐茶座文化相继勃兴,名目繁多的文化节日,如欢乐节、艺术节、美食节、舞会、书画展等不时举行;公园、树下、路旁摄影,玩棋,种花养鸟,太极气功等林林总总。城市文化景观朝着多元化、多结构方向迈进。

广东城市这些年所树立起来的景观和建筑文化,通过各种渠道,辐射全国。广州、深圳等城市建筑物原檐口、大玻璃、平屋顶、遮阳板、横线条等崭新装修和造型,已成为全国许多城市的仿效对象,或参观,或模拟,或移植,一时以广州、深圳等城市为底本,规划、改造自己的城市景观。当然,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建筑和景观,也有很多是从香港借鉴过来的。

但是,在改革开放中,广东一些城市也出现了建筑文化中复古主义潮流和建筑文化景观的失控现象。前者是仿古建筑四处出现,从宾馆到寺庙,从城楼到亭阁,从文化街到仿古贸易市场,五花八门,不伦不类,充斥许多城市,从世俗空间到神圣空间都可见到这种被扭曲了的建筑文化现象,与现代建筑风貌格格不入;后者如游乐场在一些城市过多过滥,生搬硬套外国形式,缺乏地方个性;又如四处都建立内容雷同,形式一样的商业一条街。街道两旁霓虹灯形形色色,招牌林立,竞

争高下,像广州火车站附近那样。多数大中城市人行道与马路用高层栏杆隔开,店铺铁门铁闸重重,窗外除铁条以外还加铁罩,有些阳台也如此处理,使人不快。应通过城市规划和加强管理来消除这些现象,使之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注释:

- [1] 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有关民政基本资料汇编》,1950年。
- [2] 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行政区划简册》,广东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
- [3] 朱云成等:《中国人口·广东分册》第212页,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版。
- [4] 道光《琼州府志》卷20,海黎志,村峒。
- [5] 据琼中、信宜、连山、乐昌、蕉岭县五万分之一地形图。
- [6] 《宅谱指额》一卷,《向阳基作用》。
- [7] 林枚:《阳宅会心集》卷上,《开塘说》。
- [8] 林枚:《阳宅会心集》卷上,《筑埂造桥说》。
- [9] 陈序经:《省民的研究》第172—173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 [10] 《新渔》创刊号,1948年,《香港渔民生活摄影》。
- [11] 乾隆《潮州府志》卷12,风俗志。
- [12] 杨汾:《梅县的围龙屋》,载《梅县文史资料》第14辑,第72页,1988年12月。
- [13] 道光《琼州府志》卷3,风俗。
- [14] 道光《琼州府志》卷3,风俗。
- [15] 广东省国土总体规划办公室等《广东省城镇体系规划》第22页,油印稿,1988年。
- [16] 王存:《元江九域志》卷9。
- [17] 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有关民政基本资料汇编》第3页、第7页。

1950年编印

- 18 陈正祥:《广东地志》第67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78年版。
- 19 建设部城市规划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解说》第124页,群众出版社,1988版。
- 20¹ 《新元史》地理志。
- 21¹ 《名城广州》第50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
- 22¹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7,官语。
- 23¹ 《佛山真武祖庙灵应记》。
- 24¹ 道光《新会县志》卷2。
- 25¹ 宣统《高要县志》卷11。
- 26¹ 王士性:《广志绎》卷4。
- 27¹ 邱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诸蕃篇。

第五章 方言地理分布 与文化景观

语言属文化范畴,虽是一种特殊、无形的文化现象,但通过它的载体——人群的活动,反映一定的文化内涵,构成语言景观。人们每进入一个陌生环境,很容易觉察到语言景观的差异。文化地理要研究的,主要是方言形成的历史空间过程、分布类型和格局,以及由以上因素构成的语言景观的地域差异等。

第一节 方言区形成的历史空间过程

广东现代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是历史上长期以来各种方言相互取代、交融、渗透和影响的产物,同时也是一个由点到面的不断扩散、辐合、叠交的空间过程。其动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古代移民方式,以此奠定了广东方言地理的基础。

一、墨渍式移民与粤语方言区的形成

上古岭南的土著居民与中原人很少往来,使用的是古越语,即至今仍部分留存的古越族后裔壮、黎等少数民族使用的壮侗语族各语支。但民族语言的交流早就发生,先秦时期楚方言和吴越方言已通过不同途径进入岭南,故在今粤语方言的许多词义与楚方言或吴越方言接近乃至相同,这已在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对岭南文化的影响一节有所阐述。秦汉多次进军岭南,留下大批“中县人”,即中原移民,促使岭南社会发生较大变化,语言也不例外。然而岭南古越人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秦汉时虽分裂为不同支系,如《汉书·地理志》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但仍保持文化上的统一性。这时南下汉人主要在北江和西江沿岸分布,并不能占领成片广大地区,只是选择其中一些交通方便、易于防守的地点定居下来,例如西汉在今广东境内建立的七郡二十六县治所即属其例,而周围地区仍是古越人天下。但南下汉人数量不少,并拥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必然慢慢地对周围地区产生影响,其语言正像白纸上滴下墨汁一样向附近浸润,于是汉越语言进一步交流。只是这段时间毕竟有限,未能深刻改变岭南文化原貌。

东汉三国时期,南下汉移民增加,尤其是东吴以岭南为后方,加速开发,岭南土著文化受到更大冲击,古越人汉化加深,粤语方言也加快了其孕育过程,然而终未能自成一体。

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有大批汉人南下,所置州县空前增多,大大小小的汉人据点星罗棋布,古越人汉化继续加快。在前段发展基础上,一方面岭南越语与中原和北方汉语继续融合,同时渗入许多东方闽语和吴语成份。“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¹;另一方面由于山川阻隔,交通闭塞,随着时间推移,南下汉人所使用的汉语与中原和北方汉语距离越来越远,变异日益增多,终于脱离母语,自成体系,粤语方言大抵在这时形成。

唐代岭南俚人相继汉化,分布范围进一步收缩,粤语方言也进入稳定阶段。但到五代十国时期,岭南为南汉政权割据,与中原和北方联系减少,反而加速了粤语方言独立发展,显示更多的地域特色。

宋代,封建统治者推行“强干弱枝”政策,中央集权有所加强,地方势力被削弱。这使岭南土著与汉人之间产生更多隔阂,一部分土著居民得以在山区振兴起来,例如这时海南黎族在五指山区经济就有一定发展,出产“黎米”接济境外。其结果反使在唐代稳定了的粤语方言,脱离了原来汉化轨道,朝着与中原和北方汉语偏差越来越大的方向发展,在原来汉化基础上重新大量吸收古越语成份,形成为成熟定型的粤语方言。故宋代粤语与现代粤语方言差不多,不过分布区域已经大为扩大,因为经过多次移民,到宋代广东客户人数已经超过主户,外来汉人已成为当地居民主体,原先墨渍式扩散的语言据点已拓展、相联成为连续面,覆盖广大地区,即今粤语方言分布区域。

宋代以后,粤语方言扩散历久不衰,分布地域越来越大。如英德以北本为客家方言地盘,由于广州地位日益重要,南来北往的旅客渐渐增多,特别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粤汉铁路通车,铁路沿线的城镇与广州交往更加频繁,粤语方言随而扩散到这些城镇,韶关以及粤北很多城镇也流行粤语方言了。

二、板块转移式和闭锁式移民与客家、 闽南以及少数民族方言区的形成

客家人南迁,先秦史籍载而不详,至今争议颇多,这里姑且勿论。但西汉以降,客家人南迁已有比较可靠记载。至西晋永嘉以后,北方居民大量南下,定居于江淮。唐末藩镇割据和黄巢起义,又一次引起民族大迁移,客家人抵达闽广。但更多的客家人是宋末元初进入岭南,定居于粤北和粤东的。这种长途跋涉、离开祖辈世居的大本营,转移到与原居地不相邻接的大迁移,是一种板块式移民方式。早期客家人的迁移可以说是这样进行的。粤东和粤北大片客家人聚居地即为这语言板块。但是在迁移过程中,一则不可避免地与当地语言发生接触,受到影响;二则自己故上母体语言也随着时代迁流而改变,于是客家人所操的语言与中原和北方汉语有更多差异,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语言分支。大抵到两宋之际,客家方言已经基本定型,成为广东主要方言之一。

元初开始,闽粤边区客家人口不断增加,据《元史》所载,已无主客之分。那里本来就很瘠薄的土地承载不了日益增加

的人口压力,于是到明清再度掀起多次小股迁移,主要指向粤中、粤西南和海南岛,绝大部分是山区,有所谓“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说法。客家人本有坚强的内聚力,到达新居地以后,为了生存,避免与当地发生矛盾,尽可能聚族而居,自成社区,与外界接触交流不多,当地人一般也不介入他们的社区。这样客家方言就有可能长期保持其原来面貌,其分布区域成了独立于周围方言海中的孤岛。这种孤岛零散于广大山区,有的县甚至只有一两个乡讲客家话,中山市五桂山区就有包括神湾、坦洲、南岔、板芙等乡约3万人使用客家方言。台山县赤溪区全是客家人,历史上曾由此独立设置赤溪厅(县),建国后才并入台山县。又如海南岛儋县那大、南卡、洛基一带的客家人,“皆于数十年前由惠潮梅各地移入者,风俗语言,毫无改变”²。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正像雨滴生成需要一个凝结核心一样,一小股移民聚居地不断吸引新移民到来,方言岛区域有可能扩大,多个方言岛相联成片,成为方言板块。实际上,许多客家方言板块就是这样形成的。但移民时代有先后,规模有大小,分布方式也不尽相同,方言分布空间过程也以它们为转移,所以方言板块与方言岛可以同时或有先有后形成。客家方言的形成和扩展提供了典型范例。

现在闽方言分布区,秦汉时也是百越族人居地,但人数不多。东晋南朝时代,中原和江浙一带汉人大量迁入福建晋江地区,成为闽人主体。他们带来河南中州的中原汉语与当地汉人和其他上著民族语言接触,渐渐形成闽方言。广东潮汕地区与

福建地理上本为一体,有深刻的人文因缘。这些移民有一部分进入潮汕地区,并与当地土著结合,发生同样的语言接触过程,大抵到唐代,闽方言在广东已经定型,被称为闽南方言,即福佬话或潮州话,属闽方言的一种次方言,形成时间晚于粤语方言。宋代以后,为数不少的闽人和潮汕人一批批沿海路南迁,抵达广东南部沿海和海南岛,形成三个不连续的方言板块。第一块在阳江到电白沿海,时代可能始于明朝。光绪《电白县志》称:“唐宋以前,壮瑶杂处,语多难辨,前明军卫留居电城,今城中人语曰,旧时正海旁,声音近雷琼,曰海话;山中声音近潮嘉。曰山话。”又宣统《阳江县志》也称:“土音……惟西境儒洞等处接近电白,与电白、雷琼音通,与上音迥异,谓之海话。”第二块在雷州半岛东部,唐宋以后,外地移民大量迁人雷州半岛,主要来自闽南兴化府、泉州府和漳州府,以及粤东潮州府地区,定居于雷州半岛沿海各县。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贬雷州的文学家苏辙在《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小引》中说:“余居海康,……其耕者多闽人也。”康熙《海康县志·风俗志》云:“雷之语有三,……有东语,亦名客语,与漳、潮大类,三县九所乡落通谈此。”这两块方言合称雷州方言,亦称海话。第三块在海南岛东北部,称为琼文话或海南话,同治重刊《广东通志》云:“琼岛孤悬海外,音与潮同,杂以闽人。”又道光《琼州府志》也说:“琼语有数种,曰东语,又曰客语,似闽音。”其实这也是闽南语分支,虽然有一定变化,但其源头仍是闽南语。据研究,海南岛闽南语板块大概是明中晚期从潮州一带转移过去的。咸丰《琼山县志》风俗条说:“郡城县城,营居多

成籍，自宋元顺化皆汉上遗裔。洪武以来，军士初拨则多苏浙之人，继拨则河之南北，再调则又闽潮之产。”再证之以地名，海南与福建地名相同地区主要集中在岛东北部³。这是闽潮移民留下的痕迹。

在海南岛北部，以临高县为中心，包括儋县、澄迈、琼山和海口部分地区，生活着被认为与广西壮族同源不同流的所谓“临高人”，操特殊临高话，也是一个方言板块。据研究“临高人”是从广西渡海以后渐渐以现在居地为归宿的。

同客家方言的传播方式一样，闽南方言的涓涓细流也可能注入其他方言区域，形成闽南方言岛。例如中山县操闽南方言的有7万人，分布于沙溪、大涌、横栏、板芙、南荫、三乡等区内。在粤语方言区内有不少这样零散的闽南方言居民点。这些移民多是数百年前从粤东辗转迁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但大部分地区已为粤语方言居民占据，他们只能见缝插针，最后形成自己的居地和方言岛。

方言板块和方言岛也出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广东历史上越族人有很多支系，各占一定地域。后来汉人到来，他们除部分汉化以外，剩下的都退守山区，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所操语言保持较多一致性，大者为方言板块，小者为方言岛，或者方言岛镶嵌在方言板块之内，构成形态多样的空间格局。例如海南黎族原分布在环岛沿海，宋元以后完全退入五指山区，构成一块为汉语包围的壮侗语族黎语支板块。虽然黎族各支系语言还有很多差异，但一致性毕竟是主要的。明中叶以后，苗族远从广西而来，历尽坎坷，最后定居于海南深山穷

谷之中,完全处于闭锁状态,绝少有扩散可能,甚至与黎人也不能通话,形成数个规模不等的苗语方言岛。增城、博罗畲族语言也有类似过程,也属苗语支方言岛。此外,粤北连南、乳源、连县、连山、阳山、英德、始兴、翁源等地还有人数不等的瑶语支方言岛,以及连山壮语方言岛等,皆有自己的空间形成和扩散或收缩的过程。

三、杂居式移民与交错型方言区的形成

在一些交通便利或不同民族和民系接触的地带,各路移民与当地居民杂居,各自不同的语言相互交流、掺杂,产生复杂的语言现象。一个人可能同时会操几种方言,但一种方言里会夹杂有另一种不同方言的成份,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型方言区。

清远、花县、从化一带,恰处于广花平原外围,粤语方言移民首先人居平原地区,后到的客家人只得在山区和平原交界地带栖止下来,这一地带也就成了粤语方言和客家方言的交错分布区。增城也是这种区位,同属粤、客方言交界地带。又惠阳水陆交通便捷,各地人员辐辏;饶平地界闽粤两省,都是客家方言和闽南方言交错地区,类似地区还有揭西和丰顺等县,那里的语言多为移民杂居的结果。

城市居民杂居的更多,方言也至为复杂,往往在郊外形成方言交错地带,环绕城市。例如韶关市区通行粤语方言,郊区通行客家方言。广州不但远郊增城、从化、花县“粤中有客”,连

近郊也有客家方言地盘。但最典型的方言交错地区是海南儋县那大镇,其形成聚落虽然只有一百多年,但海南岛历史开发主要是从岛西北部开始的,那里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流行儋州话(清代称乡话)、军话(接近北方话)、客家话、琼文话、白话(粤语方言一种)、临高话、黎话等多种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加上建国后推行的普通话,语言更加复杂。但它们又有相对独立性,不但语言本身如此,分布地域也一样。据调查,以那大镇为中心,半径 20 公里范围内的农村,流行以上几种方言,而在镇内中心区的居民说军话,“梅县街”居民说客家话,“儋州街”居民说儋州话,“临高街”居民说临高话,那大镇堪为方言博物馆。

新兴的特区城市深圳,所在地区原说客家话,近年从外地,包括北方、江浙、广州等地移入大量人口,多种语言交汇。虽然按人口计算,操客家话者仍保持一定优势,但广州话已渐有后来居上之势,在很多场合被作为主要交际语言使用。深圳已成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多种方言交错区的典型城市。

第二节 方言的地区分布和景观

广东是语言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全国汉语分官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七大方言区,广东占有三区,每种方言又有很多分支,且大部分与官话方言差异很大,加上各类少数民族语言的存在,更加剧了地区方言庞杂纷繁的分布局面。所以历代到岭南为官的北

方人对此深感艰难不便,清雍正时有人上书:“惟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官民上下,语言不通,……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多矣。应命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飭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⁴这说明弄清广东语言的地区分布,消除语言障碍是非常必要的。

据近年语言调查的不完全统计,广东汉语方言,除了粤语、客家语、闽南语和韶州土语四种以外,还有不少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语种,每语种分支还很多,连同少数民族语言,估计总共不下 20 种。

一、粤语方言的分布及其文化景观

粤语方言俗称广东话、广州话、广府话、白话等,为汉语七大方言中语言现象复杂、保留古音特点和词语较多、内部分歧较少的一种方言,通行于岭南境内,但以广州话为中心。粤语方言使用人数约 4000 万,广东占 70%,广西占 30%。在广东境内,无论是使用人数还是地区分布范围,粤语都居首位(见表 3)。

广东纯粤语或以粤语为主的地区在粤中和粤西南,包括 47 个县市,即广州、佛山、肇庆、江门、深圳、茂名、中山、珠海、南海、番禺、东莞、顺德、龙门、佛岗、增城、从化、花县、清远、连县、阳山、连山、怀集、广宁、四会、三水、高要、云浮、高明、新兴、鹤山、封开、郁南、德庆、罗定、阳春、阳江、信宜、高州、化

表3 广东各类方言地区和人口分布

| 语种 | 分布 | 使用人口 | | 覆盖面积 | | 附 记 |
|---------|----|-------|--------|-----------------|--------|------------|
| | | 百万人 | 占 % | km ² | 占 % | |
| 粤 语 | | 28.0 | 46.77 | 84951 | 40.07 | |
| 客 家 语 | | 11.5 | 19.21 | 56479 | 26.64 | ※ 含粤、客、闽南语 |
| 闽 南 语 | | 18.1 | 30.23 | 37133 | 17.52 | |
| 韶 州 土 语 | | 0.8 | 1.33 | 6156 | 2.91 | 交错地带,各平分归 |
| 少数民族语言 | | 1.06 | 1.77 | 19165 | 9.04 | |
| 其他语言 | | 0.41 | 0.69 | 8116 | 3.813 | 人所属语种 |
| 总 计 | | 59.87 | 100.00 | 212000 | 100.00 | |

资料来源:(1)熊正辉:《广东方言分区》,《方言》1987年第3期。

(2)张振兴:《闽语的分区》、《闽语分布和人口》,《方言》1985年第3期、1989年第1期。

(3)张振兴:《广东省雷州半岛的方言分布》,《方言》1986年第3期。

(4)梁猷刚:《广东省海南岛汉语方言的分类》,《方言》,1984年第4期。

(5)人口系1982年底统计数字,不包港澳人口。面积据上引之熊正辉文和梁猷刚文所附图表提供的资料量算求得。

州、吴川、台山、开平、新会、恩平、斗门、香港、澳门等。这些地区开发较早，与秦汉进军岭南所经的路线和历史早期行政建置地区基本一致。粤语在部分县市也通行，它们是惠州、韶关、湛江、海丰、博罗、惠阳、惠东、仁化、乐昌、英德、宝安、电白、遂溪、海康、徐闻、廉江等 16 个县市，皆为各类移民杂处、不同语种交错的地带。

粤语内部按其特点差异，可分为广府片、四邑片、高阳片、勾漏片、吴化片等五片，也是五个亚区。

1. 广府片，包括广州、番禺、顺德、南海、佛山、三水、清远、龙门、花县、从化、佛岗、东莞、宝安、深圳、增城、中山、珠海、英德、肇庆、高要、高明、新兴、云浮、电白等 24 个县市。此外，韶关、曲江、乐昌三县市城区也属此片。使用人数约 1200 万，以广州话为代表，在粤语中有很大大代表性和影响。

2. 四邑片，包括鹤山、新会、江门、开平、恩平、台山、斗门等 7 个县市，使用人数约 340 万人，以台山话为代表。

3. 高阳片，包括阳江、高州、茂名、信宜、廉江、湛江、化州、吴川等 9 县市，使用人数约 520 万人，以阳江话为代表。

4. 勾漏片，包括四会、广宁、德庆、罗定、郁南、封开、怀集、信宜、阳山、连县、连山等 11 县，使用人数约 660 万。

5. 吴化片，包括吴川、化州、洪江三县市，使用人数约 100 万。

这些分布区域的差异，与它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尤其是地形显然有一定因果关系。它们皆为某一流域或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历史发展和社会经济在同一区域内展开，语言得以趋

于同一性。例如四邑与高阳片,分处潭江流域、漠阳江和鉴江流域,在各自流域内社会文化的共同性较多,但仍属语言难通的两片。又南路中部地势低平,与广西往来方便,与广州话相似的桂南话能在这一带传播,广州人称“冇”,南路人乃云“冇冇”,两字连用,故南路西部流行桂南话,称钦廉片;而东部流行闽南话,称雷州片。又西江为入广西的主要通道,广州话先溯西江传入,与北来的桂林官话相混,“冇冇”一说或许由此产生,与代表中州官话的“没有”会合后,向南传播。但广州话以移民人多而占优势,使西江一带被纳入广州话(广府片)范围,桂南话也与广州语相似,交通在这里对语言传播起重要作用。

粤语不但在音韵上,而且在词汇上都有许多特点,构成特殊的语言文化景观。初来乍到广州的外地人可能深感陌生,但习惯下来,颇有耳目一新之感。这些景观特点,一是特殊词语很多,如菜叫“煲”找叫“搵”,叫喊口“嗌”,能干叫“咧”,什么叫“乜嘢”,睡叫“瞓”,蹲叫“踎”,小孩叫“细蚊仔”,地名多用涌、濠、沥、凼、埗、(甫、埗)泥、埗等为首尾,外国的东西叫“番”等。二是保存古汉语词汇多,如畀(给)、孖孖仔(婴儿)、斟(倒)、苴(次、差、劣)、瞓(mei,闭眼)、踎(kui,疲倦)等。三是吸收外来语言成份多,大量外来词首先在粤语中流行,再注入全民语言。早期是阿拉伯语,如邋邋(la ta 脏)。后期则大量吸收英语,如波(ball 球),呔(tire 车胎),的士(taxi 出租车),花臣(fashion 花样),菲林(flam 胶卷),唛(mark 商标),骨(quarter 1/4)等。四是名词带重叠成份多,如口多多(多嘴)、心思思(心想得厉害)、眼白白(眼睁睁)等。五是小东西用“仔”

表示,如刀仔、凳仔、表仔等。六是倒装词、句多,如“鸡公”、“你去先”等,词序与汉语相反,乃古越语遗迹。

由粤语构成的其他文化景观也很丰富多采,充满地方特色。以粤语演唱的粤剧唱腔不下十余种,既能慷慨激昂,也能哀怨悲叹,很有表现力和感染力,风行两广、港澳、东南亚和欧美华人社会;用粤语演唱的小曲活泼、宛转、悠扬,深为广大群众喜爱;近年以其演唱的流行歌曲,更是不胫而走,风靡全国;珠江三角洲木鱼(咸水歌)、儿歌、粤讴等民间演唱形式也充满了地方情调,雅俗共赏,充分显示粤语构筑的文化景观拥有广大群众,具有强大生命力。

二、客家方言的分布及其文化景观

客家方言又称客家话、客话,个别地方也称僮话、麻介话、新民话、土广东话等,广泛分布在我国南方粤、桂、闽、台、赣、湘、川等七省区,约200多个县市,其中以粤东、粤中、闽西、赣南分布最为集中且连片。全国操客家话人数约有3700万人⁵,其中广东约有1150万,占31%。在广东省内,客家话使用人数在粤语和闽南话之下,居第三位,而覆盖面积仅次于粤语,主要分布在广东东部和北部20多个县市,但也散见于省内其他地区,尤以山区为甚。实际上全省79个县市都有客家话分布,其中纯客家话或以其为主的地区有梅县、韶关、惠州、兴宁、五华、蕉岭、大埔、平远、龙川、南雄、翁源、和平、始兴、连平、新丰、河源、丰顺、紫金、博罗、宝安、惠阳、惠东、揭西、仁

化、乐昌、廉江、曲江、乳源、连南、英德等 30 个县市；部分地区讲客家话的有饶平、潮州、揭阳、潮阳、惠东、普宁、陆丰、海丰、龙门、深圳、佛岗、清远、从化、花县、南海、增城、广州、东莞、中山、珠海、斗门、新会、连县、连山、阳山、广宁、三水、高要、云浮、高明、新兴、鹤山、开平、台山、郁南、罗定、阳春、阳江、信宜、高州、茂名、四会、化州、遂溪、海康、徐闻、电白、儋县、香港等 49 个县市或地区。客家话以梅县的为标准，语音较清晰，影响也大。但总的说来，客家话是汉语方言中内部比较一致的方言。

根据韵尾差异，广东客家话可分为粤台片、粤中片、惠州片和粤北片，即四个亚区。其中粤台片与台湾流行的客家话相一致，其在广东部分还可再分为嘉应、兴华、新惠、韶南四小片。即：

1. 粤台片

(I) 嘉应小片，包括梅县、蕉岭、平远，人口约 110 万。

(II) 兴华小片，包括兴宁、五华、大埔、丰顺、紫金，人口约 320 万。

(III) 新惠小片，包括新丰、惠阳、惠东、宝安、海丰、陆丰、东莞、佛岗，人口约 220 万。

(IV) 韶南小片，包括韶关、曲江、英德，人口约 100 万。

计粤台片在广东包括 19 个县市，人口共约 750 万，占广东客家人 65% 也是覆盖面积最大的一片。

2. 粤中片，包括和平、连平、龙川、博罗、河源，人口约 240 万

3. 惠州片,仅分布在惠州,人口约16万,是受粤语影响较深的一种客家方言。

4. 粤北片,包括始兴、南雄、翁源、英德、乳源、仁化、连南、连县、阳山、乐昌,人口约140万。

历史上客家人流散于各地荒野之间,胼手胝足,自耕而食,故客家方言岛也呈罗棋布于省内各地,以粤西、粤中和粤西南最为普遍,珠江口外淇澳岛即为一个典型客家方言岛,其人数多少不等,难以一一开列和统计。

客家话是客家人的独特语言,与闽、粤方言无关系。客家人笃信自己的格言:“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故能世代相传,成为联系客家人的纽带,充满亲切的认同感,并由此形成自己固有的语言文化景观。

第一,保留、沿用许多古语和中州音韵,例如乌(黑)、面(脸)、食(吃)、颈(脖子)、朝(早晨)、昼(中午)、沸(沸腾)等,常见于日常用语中,具有浓厚中州文化色调。又多用嶂、埗、背、良、磔、嫌、墩、畚、坳字为首尾表示地名,除了反映客家多山环境以外,很多都是古汉语用字。

第二,词汇创新。客家人在新居地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经济特产等影响之下,创造了许多新词汇,不但丰富了语言文化内涵,也加强了语种特色,如雪枝(冰棍)、板(米制糕点)、擂茶(饮料)、口丸(肉丸子)等,外地人颇感陌生。

第三,借用其他方言或外来词,如粤语啱(刚好)、靚(漂亮)、叻(聪明);英语恤(shirt 衬衣)、唛(mark 商标);马来语占(tsim 接吻)等,使古老的语言具有新地域感和时代感。

第四,有些词义与普通话同义,但感情色彩不同,如叫(哭)、热头(太阳)、火蛇(闪电)、心舅(媳妇)等,都难以按通常理解,须细心琢磨,才领会其意义。

第五,受粤语影响,有些构词倒装,例如紧要(要紧)、人客(客人)、鸡公(公鸡)、牛公(公牛)等,语感与他们原居地很不同。

客家人善于以自己的语言表达他们多姿多彩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客家山歌源远流长,诞生过像刘三姐那样的民歌能手,现在也相当普及,在广东民歌坛上占很重要地位。客家山歌以梅县为盛,有“山歌之乡”美誉。汉剧则是以客家话表演的地方剧,与京剧、湘剧、祁剧、湖北汉剧大同小异,音乐唱腔博采各剧种之长,并保存很多古老曲牌,朴实淳厚,高昂悲壮,形成广东汉剧的风格特点。传统剧目多达 800 多个,著名的如《百里奚认妻》、《齐王求将》等,皆有浓郁的客家风情。

三、闽南方言的分布及其文化景观

闽语是一种与普通话相差较大的方言,流行于闽、台、粤东和海南等地,共 116 个县市,人口 5673 万,覆盖总面积 15.87 万平方公里。作为其中一支的闽南语在广东使用人口约 1810 万。覆盖面积约 3.7 万平方公里^[6],分别占总人口 32% 和总面积 23.4%。而在广东省内各种方言中,闽南语使用人口和覆盖面积都次于粤语,是广东第二大方言,从人口和面积比重看,这与广东闽南语区地狭人稠状况是比较一致的。

根据闽南语内部的异同,其在广东分布的地区可分为潮汕片、雷州片和琼文片。如果闽南语是闽语一个亚区,则这三片应视作三个次亚区。

1. 潮汕片,分布地区包括潮州、汕头、南澳、澄海、饶平、揭阳、潮阳、揭西、普宁、惠来、海丰、陆丰,连成一片。使用人口约 945 万,占全省闽南语总人口 52.2%,以潮州话为代表。此外,惠东、丰顺、大埔也有部分地区使用闽南语。

2. 雷州片,包括湛江、遂溪、廉江、海康、徐闻以及中山、阳江、电白、吴川等闽南语方言岛,使用人口约 275 万,占全省闽南语总人口 15.2%。当地人将闽南语简称为“雷话”,而海康一带当地人又称之为“黎话”,因他们自称为“黎人”,但不属海南岛黎族和黎语。雷城话是本片代表,湛江市方言广播也使用雷城话。雷城是旧雷州府治所,历史上是雷州半岛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3. 琼文片,分布地区包括海南岛北部、东部到西南部沿海及内陆,大体上环绕五指山区呈马蹄形展开,计有海口、琼山、澄迈、定安、屯昌、琼中、文昌、琼海、万宁、陵水、三亚、乐东、东方、昌江等,使用人口约 440 万,占广东闽南语总人口 24.3%。

琼文话又称海南话,是海南岛代表方言,为当地方言广播和社交使用。其中文昌话语音清晰,影响较广,被视为琼文话标准,但有时也以琼山府城话为参考。因琼山府城长期为海南行政首府,也是语言辐射中心。

琼文话由于远离母语,长期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里发

展,难免受岛上四周少数民族语言影响,在发音上产生一些变异,但仍不失为闽南语一支。

闽南语区有比其他语区更特殊的语言文化景观,也是区域文化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第一,语音特别复杂。闽南语有8个声调,四声都分阴阳,有18个声母、79个韵母。潮汕片连口语在内有2167音节。如此复杂的音调,潮汕以外的人听之,会觉得屈聱牙,钩辘难辨,不易掌握和听懂。难怪当年韩愈贬潮州时对此深感不便,并试图以中州音代替它,但没有成功。

第二,词汇上有很多其他方言少见的言词,包括古词语和外来词等,提供许多语言活化石。例如粥古称为“糜”,潮漳人至今仍称“吃糜”。又如卵(蛋),目(眼睛),疮(瘦),涂(泥土),曝(晒),拍(打),褰(袖口)等单音节词也广泛使用,给人以简练、古朴的语感。近世由于华侨往来,不少外来词也流行于当地,特别是印尼——马来语,如斟(吻),堦(边缘),扬(抽打)等,年长日久,这些外来词已融合为闽南语的一部分。

第三,词法颇多独特之处,如名词尾多用“囡”表示子、儿(潮州话椅囡,海南话牛囡);省去数词,如“斤米五角”;“有”字用得特别多,如“你有睇电影阿无?”;还有宾语提前,如“香蕉买2斤”。凡此类词法,都有古越语遗风。

第四,常用厝、垵、坂(陂)、墘、社、滴、苍、油等字为首尾表示地名,作为地方文化一部分,这些地名很少见于闽南语以外地区。无论它们作为可视还是可悟的文化景观(如路牌)出现,都使外来人感到置身于一个文化反差显著的环境中。

闽南语作为一种工具也创造了灿烂的语言文化。潮剧、琼剧占了广东四大剧种半数。潮剧剧目丰富,曲牌、乐谱众多,曲调变化多样,唱腔风格独特,善于表达各种复杂深刻的感情,不少剧目如《琵琶记》、《苏六娘》、《金花女》等风靡闽南语地区。琼剧传入海南虽晚,但很快吸收民间小调,逐渐方言化、土调化,成为剧坛上一朵奇葩,传统剧目达 1500 多种,著名的有《搜书院》、《红叶题诗》、《海瑞回朝》等,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四、汉语其他方言的分布及其文化景观

广东汉语除了上述三大方言以外,还有一些混杂或语系不明的方言,在广东方言地图上同样占有一定地位。它们是粤北韶州土话、海南临高话、儋州话、军话、村话等,使用总人口约 150 万,分布地区广而零散。

韶州土话是粤北土著居民使用的一种方言,分布在连县、连南、乐昌、乳源、曲江、韶关、仁化、南雄等,人口约 80 万。由于历史上客家人不断迁入,韶州土语区域被分割,中间插入不少客家方言岛,成为互不相连的几大块,韶州土话内部也分支庞杂,差异颇大,计有如下 20 种⁷。

(1) 江西话,分布在南雄界址区和梅岭区,与赣南方言相同,人口约 2 万。

(2) 湖南话,分布在仁化城口区、乐昌老坪石、三溪等地,与湖南话同,人口仅数千。

(3) 曲江话,分布在韶关市郊、曲江西部、乳源及仁化小

部分地区,人口约 13.5 万。

(4) 乌径话,分布在南雄东北部乌径镇附近,人口约 15 万。

(5) 珠玑话,分布在南雄中部以珠玑镇为中心的地区,人口约 5 万。

(6) 百顺话(又称东坑话),分布在南雄西部,以百顺镇为中心地区,人口约 12 万。

(7) 南雄话,分布在县城及附近农村,为南雄县方言代表,人口约 6 万。

(8) 仁化话,分布在县城,为仁化县方言代表,人口约 2 万。

(9) 长江话,分布在仁化东部以长江镇为中心的地区,人口约 6 万。

(10) 长来话,分布在乐昌南部长来镇地区,人口约 3 万。

(11) 北乡话,分布在乐昌中南部北乡镇地区,人口约 2 万。

(12) 黄圃话,分布在乐昌北部黄圃镇地区,人口约 5 万。

(13) 皈塘话,分布在乐昌老坪石附近地区,人口约 1 万。

(14) 老坪石话,分布在乐昌以老坪石为中心的地区,人口约 2 万。

(15) 星子话,分布在连县东北部,包括星子、大路边、山塘、清江、潭岭等镇区,人口约 12 万。

(16) 蛮话,分布在连县西北丰阳、东陂等地,人口约 4 万。

(17) 水口话,分布在连县麻布水口村,人口约1千。

(18) 连山话,分布在连山县北部,为连山汉语方言代表,人口约5万。

(19) 山佬话,分布在阳山县东部山区,人口约5千。

(20) 船话(疍话),为水上居民使用方言,分布在浚江、武江、北江及其沿岸地区,人口约4千。

海南居民五方杂处,语言至为复杂,除闽南、客家和粤语方言以外,还有以下几种汉语方言:

(1) 临高话,海南岛独有的一种语言。黎人称它为“临高话”,汉人称它为“黎话”。据调查,临高话与黎语和广西壮语都有亲缘关系,但更倾向于后者,在没有最后确定其归属以前,暂当作汉语方言。主要分布在海南岛北部滨海平原,少数在石山丘陵地区,包括临高全境、琼山、海口市郊,以及澄迈、儋县部分地区,在北部者联成一片,人口约51.6万,以临高县至为集中,也是这种方言代表地区。

(2) 迈话,属粤语方言系统,分布在三亚沿海、乐东莺歌海一带,主要为水上居民使用,人口约1万。

(3) 儋州话,也属粤语方言系统,分布在儋县大部分地区,以及昌江南罗一带,人口约5万。

(4) 军话,是岛内部分汉人使用的方言,属汉语北方方言西南官话系统,为古代从大陆迁来海南的士兵和仕宦留下的语言。分布在儋县、昌江、三亚和东方等县市,人口约数千人。

(5) 村话,是岛内部分汉人使用的方言,语系不详,分布在昌化江下游地区,包括东方和昌江县境,人口约6万。

这些方言,除个别以方言板块出现外,大多作为方言岛或方言交错型地区出现,保持较大独立性,往往一县之内,流行多种方言。例如乳源县就有客家话、白话、曲江话、莲塘话;阳山县有白话、阳山话、客家话、山佬话;南雄县有南雄话、乌径话、江西话、珠玑话、百顺话;仁化县有仁化话、长江话、客家话、曲江话、白话、湖南话;乐昌县有白话、客家话、长来话、北乡话、黄圃话、老坪石话、皈塘话、湖南话、船话;连县有白话、客家话、墨子话、水口话、蛮话、四会话(粤语四会方言)。海南儋县语种更齐全,全县63万人口中,计有讲儋州话、军话、琼文话、客家话、临高话、白话、黎话和普通话等。大抵这些语言复杂的地区,每个县往往有五六种以上的方言,给社会交往造成很多困难,也产生了复杂的语言文化景观。《连县县志》云:“本县语言复杂,匪特远来之人难以了解,即同居本县者,往往甲区人与乙区人周旋,亦时有不懂语言之感。”^[8]但在方言交错地区,由于相互影响,居民多能操数种方言。在海南儋县这种现象很普遍,特别是售票员、售货员、小商贩,他们往往连儋州话、军话、客家话、琼文话、普通话、临高话都能对答如流,外地人却不知所云。

言为心声,这些星星点点的方言,同样可以创造出优美的历史文化。每个语种都会有为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歌谣、戏剧等艺术形式。粤北采茶戏和乐昌花鼓戏就是流行于粤北地区的两个著名地方剧种;海南临高人用他们土语演的渔歌和山歌,如哩哩美、追歌、拉帮调、浪叹等,节奏自由,灵活多变,易学易编,抒发人们喜怒哀乐等感情;儋县更有“歌海”之

称,据说儋县民歌是受苏东坡遗风影响,宋代以后发展起来的,爱唱歌的女孩被称为“儋州妹”,一曲民歌,如幽谷醇风,荡漾在古老的儋州大地,吸引着民俗学者、诗人和其他文化工作者前来采风探胜。

五、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及其文化景观

广东境内居住着黎、苗、瑶、回、壮、畲、满等少数民族。他们大部分没有本民族文字而只有语言,使用壮侗、苗瑶语族或汉语,总人口约 105 万(1982 年),但分布面积广大,遍及全省 34 个县市,对广东方言的分布格局有重要意义。

1. 黎语,属壮侗语族黎语支,是广东少数民族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约 81 万。分布集中在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保亭、崖县(三亚市)、白沙、乐东、琼中、陵水、昌江和通什市内,其余散布在儋县、澄迈、屯昌、定安、琼海、万宁等县边缘。黎语音韵和声调多,语法倒置,即修饰词在后,中心词在前,如“大房子”,说成“房子大”,与汉语语法习惯恰好相反,但与同一语族的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和水语有较密切的亲缘关系。黎人长期受汉文化影响,一般都会讲海南话。

2. 苗语,海南苗族使用的语言,属苗瑶语族苗语支,散布在五指山地区 14 个县市,以琼中和保亭比较集中。此外,则散布于崖县、乐东、白沙、陵水、东方、昌江等县山区,属典型方言岛,现在苗族男子一般会讲黎语和海南话。

3. 瑶语,广东瑶族有 9.5 万人,主要分布在粤北山区,较

集中的有连南、乳源、连山、韶关，散居在连县、始兴、曲江、阳山、英德、翁源、仁化、乐昌、怀集、阳春。瑶族操瑶语，属苗瑶语族瑶语支，有自己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与汉语完全不一样，例如“谓天曰横，谓地曰汝，日曰万，月曰罗角，山曰钟，水曰误，木曰丁”。汉人难以听懂，过去被认为“言语侏僂，不与齐民通”⁹。但经过长期与汉人接触，许多瑶人会讲当地的汉语方言，包括客家话、白话或普通话，有的人还会讲湖南话，瑶语渐渐变为底层语言。

4. 壮语，广东壮族主要分布在连山壮族自治县南部，此外，怀集、洪江和海南岛也有少量壮族，1982年全省约8.6万人。壮语属壮侗语族壮语支，是迄今保留古越语成份最多的语言，无论语音、词汇和语法都很有特色，被称为语言活化石，但现在很多壮人都会讲汉语了。

5. 畬语，畬族在广东的人数约计3000余人，过去曾使用统一畬语，但经历史上民族长期杂居，分布在潮州、丰顺的畬族现使用客家话；而分布在增城、博罗的畬族则使用“山瑶话”，属苗瑶语族苗语支。所以畬族的语言文化景观，随居地语种不同而有较大差异。

6. 回辉话，海南岛三亚回族与内地回族在宗教信仰、习俗方面相同，但因其来源不同，至今仍使用属南岛语系占语群的一种特殊语言，称为回辉话。人数约4千人，分布在相距不远的回辉乡和回新乡。虽然回辉话被多种汉、黎语言包围，但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始终未能被同化。特别是在全国回族绝大部分人口先后放弃原先各自使用的语言，而采用当地

汉语的情况下,回辉话能顽强地保留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语言奇迹。不过三亚回族现在一般都能使用多种汉语方言或黎语,处在以一种语言为主,几种语言为辅的多语制状态中。

这些少数民族,因无本民族文字,主要靠口头语言流传和表达他们的民族文化,包括古代神话、传说、歌谣、谚语、谜语,以及地名等,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风土人情,也是祖国文化艺术宝库的一部分。例如黎苗族“三月三”歌舞盛会;瑶族“耍歌堂”节日;壮族拆字猜谜对歌的“坐歌堂”,除夕至元宵的“年晚歌”(迎春晚会);畲族劳动时山歌互答;三亚回族欢度古尔邦节,都是民族文化一次大检阅,也是民族语言景观的一次大交流。在黎语地区还有许多奇特的地名,光表示村寨就可用番、抱、保、报、什、毛等,如番阳、抱由、保亭、通什、毛阳等,外人难识其义,重译乃通,实是黎语文化内涵的另一表达形式。

六、方言的相互影响和景观扩散

在社会交往中,各种方言都是相互影响、渗透和借用的,不断产生空间占用过程,语言景观也随而发生扩散,使语言的分布和景观趋于复杂化。

一般地说,在各种方言中总是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方言占优势的。广东三大方言,无疑是粤语比客家语、闽南语影响要强大一些;而在三种方言杂处地区,客家语、闽南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粤语;又由于客家语分布广而分散,方言板

块和方言岛很多,比起闽南语来,受粤语影响机会也会多一些,例如粤语特有的一些词汇,如啱(刚好,对)、𠵼(能干)、靚(好,漂亮)等已为全省客家人使用。但客家语受粤语影响最深的是地处粤、客家语交界地带的惠州市和广州市郊县从化与增城客家语。惠州市内客家话拥有一大批粤语词汇,如倾偈(聊天)、瞓觉(睡觉)、呃(骗)、特登(故意)等。原本讲客家话的深圳沙头角镇,近年也流行“乌龙”(糊涂)、论尽(麻烦)、执笠(倒闭)、拍拖(谈恋爱)等粤语词汇,原因是受香港和广州粤语影响。实际上,很多粤语对客家语的影响并不限于某地方言,而广及广东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的各地客家语。

客家语也受闽南语影响,特别是在两种方言交错地带,以饶平县至为典型,那里有相当一部分的居民会讲闽南话,有许多“客中有闽”的语言范例。

闽南话受粤语影响也比较突出,以中山使用闽南语的沙溪、大涌等方言岛最有代表性,有不少常用粤语,诸如唔该(劳驾)、埋席(入席)、争(欠)、仲(还)、虾(欺负)、饮汤(喝汤)等早在当地流行。即使集中成片分布的潮汕闽南语,也被粤语渗透过去,产生景观变化,上述客家人使用的粤语同样流行在潮汕人的常用语中。近年由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崛起,粤语影响迅速加强,一些闽南语地区出现了从单一方言向双方言过渡的现象。例如原讲闽南语的汕尾市,近年随着建置改变,人口急剧增长,大批讲粤语的居民到来,当地人也以讲粤语为时尚,竞相效法。粤语在那里不胫而走,街头巷尾到处可见用粤语交际或讨价还价的场面,当地人讲上话也要夹杂生硬的“好嘢”(好

东西)、“唔该”(劳驾)、“利是”(红包)等粤语词汇,现在当地人几乎百分之百可以听懂粤语,而能讲带浓重闽南语口音的粤语者也很多。实际上汕尾市已成为双语交际社会,也是粤语占用闽南语空间的典型事例。

粤语同样受其他方言影响,客家语和闽南语也会扩散到粤语区。这明显地发生在双方言或多方言交错地带,例如中山市和广州市郊县增城的粤语就吸收不少其他方言因素,语言景观有别于正宗粤语。中山石岐(市驻地)城区和近郊讲粤语,而石岐以南为粤、客家和闽南语混杂地区,那里的粤语受其他两种方言影响,无论音韵还是声调都渗入后两者成份,结果形成诸如莺与英、羹与经、厄与益、塞与色同音现象。增城约有80%人口讲粤语,20%人口讲客家话,县城内讲粤语,北部山区盛行客家话,但即使在粤语占优势的县城,也使用一些客家话常用词语,如“落水”(下雨)、“鸡春”(鸡蛋),甚至闽南语个别词语也进入增城粤语中,如“地豆”(花生)。但广州人叫“花生”而不称“地豆”,又说明闽南语还不能占用广州语言空间。

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一般比较落后,他们的语言深受当地汉语影响,不少人能讲当地汉语,这已在上文有所阐述。

方言的相互影响还有人口年龄层次的差异。中老年人老成持重,语言趋于稳定,原有方言不易改变;而青年人或文化程度较高的中年人思想活跃,交际广泛,容易吸收其他方言因素,也是方言受影响最大的人群;在沿海开放城市或交通方便口岸,青年人多以讲时髦语言为荣,现在主要是粤语(也有一些英语)。例如在增城,三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所操的粤

语与广州话有一定距离,保留较多客家话因素,被称为老派增城话;而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所讲的叫新派增城话,其特点是逐渐向广州话靠拢,丧失了与客家话相似的某些特点。这显系不同人群的语言基础、社交方式和程度差异所致。

注释:

- [1] 张籍:《张籍诗集·永嘉行》,中华书局,1959年版。
- [2] 陈铭枢:《海南岛志》第52页,神州国光社,1933年版。
- [3] 司徒尚纪:《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第110页,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4] 施鸣保:《闽杂记》卷2。
- [5]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第237页,1988年版。
- [6] 根据张振兴《闽语的分区》附图,熊正辉《广东方言的分区》附图量算求得,见《方言》1985年第3期,1987年第3期。
- [7] 参见梁猷刚《广东省北部汉语方言的分布》,见《方言》1985年第2期。
- [8] 民国《连县县志》卷7,方言。
- [9] 民国《恩平县志》卷4,风俗。

第六章 民俗文化景观与群落

民俗文化是文化系统中最具有传统性的一个层面,千百年来,“相沿成风,相习成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包括民间的节令、婚姻、丧葬、祭祀、饮食、孕育、医药、乡规民约、礼节、风尚、习惯等社会现象或行为,内涵非常广泛。风俗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地理环境和人们心态意识有很密切关系。司马迁说:“礼从宜,事从俗,”东汉应劭则更明确指出:“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为其上也。”^[1]故风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历来为人们所重视。风俗植根于民间,变化很缓慢,在时间上是传承的,在空间上是扩布的,因而有历史和地理的差异,也最直观地反映不同地区的文化风貌和景观,构成不同的风俗群落。

广东民俗文化景观,既指汉族也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景观。而汉族的居民成份也很复杂,可以说是百越族和汉族相互融合的多元群体。他们在融合过程中各自保留其原有传统风俗之同时,也吸收其他民族的风俗文化。因此,广东汉族比我国其他省区汉

族的风俗文化更加丰富多采,更具地域特色。而广东汉族内部,又因历史渊源不同而明显地划分为不同民系和方言区,各有自己的文化特质(Traits),加上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展现了广东民俗文化景观异彩纷呈的局面。

第一节 汉区民俗文化景观

广东汉区民俗文化虽然植根于中原汉民俗文化,但中原汉民俗文化移入岭南以后,受到环境感应和其他社会历史,以及民族等因素影响,逐渐发生变异,形成具有浓郁乡土特色的岭南民俗文化,并通过多种文化景观反映出来。

一、岁时风俗

广东汉区节令安排及其风俗,与中原汉区节令大致相同,包括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乞巧、盂兰、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但广东各种节令(含主要诞会)数量多,很多带有普遍性,其活动内容和方式也有一定地域差异。

这些节令,以正月、二月、三月最多,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人们祈求丰收,交上好运,所以祭祀活动特别繁多,这类节令几乎占全年半数。次为秋天,收获季节,人们酬神接福;夏天农事繁忙,季节迫人,人们的主要时间和精力投于生产;冬天虽为农闲季节,但冬藏、备耕、筹办红白喜事,以及一年积压下来的事情都要在这时完成,故冬夏节令相对要少,这与岭南

地理条件所决定的一年农事安排有很大关系。

表 4 广东汉区民间节令分布^[2](农历)

| 月份 | 节数 | 名 称 |
|----|----|--|
| 正 | 14 | 春节、孙正真人诞、人日、白衣观音诞、玉王大帝诞、元宵节(上元节)、钟村出会、天穿节、门官诞、路头神诞、天尊诞、招财童子诞、生菜会、司命帝君上天日 |
| 二 | 7 | 土地诞、祭社日、文昌诞、洪圣诞(波罗诞)、花朝节、观音诞、真武诞 |
| 三 | 10 | 豕民“买力”日、清明节、北帝诞、上巳节、起愿节、何仙姑诞、医灵诞、将军诞、天后诞、土地公生日 |
| 四 | 5 | 浴佛节、鱼花节、金花诞、华佗诞、芒种节 |
| 五 | 3 | 端午节、龙母正诞、关帝诞 |
| 六 | 9 | 天魁节、军坡节、死鬼过桥节、龙母娘娘诞、鲁班节、观世音诞、财神诞、二郎星君诞、围香日 |
| 七 | 9 | 康天帅诞、乞巧节、盂兰节、田了节、中元节、地官诞、城隍诞、郑仙诞、地藏王诞 |
| 八 | 5 | 司命灶君诞、中秋节、龙母润诞、山歌节、日娘诞 |
| 九 | 4 | 重阳节、火神诞、观音诞、华光大帝诞 |
| 十 | 4 | 下元节、五谷母生日、财帛星君诞、盘古王母诞 |
| 十一 | 2 | 洗夫人诞、冬至节 |
| 十二 | 4 | 腊日(腊八节)、送灶节、除夕、紫姑神(厕神)诞 |
| 总计 | 76 | |

这些节令内容,很大一部分是祭祀各路神仙,具有浓厚宗教色彩,颇有越人尚鬼遗风。但是,第一,这些神仙谱系非常庞大,包括佛、道、名人、地方英雄等化身,不少是对开发岭南、对地方事业有建树者,深得当地人的尊敬和怀念,约定俗成成为节令,这无疑有别于以儒家文化为独盛独尊的中原风俗文化。实际上,儒家文化代表人物并没有在这些节令中占有显要地位。第二,被祭祀的对象很多是女神,如冼夫人、天后、龙母、何仙姑、金花娘娘、日娘、盘古王母、五谷母、紫姑等,这不但说明母系氏族社会在岭南延续时间长、影响深远,而且也与岭南妇女较中原地区妇女少受歧视和压抑,更多地自强自立有关;第三,除佛以外,外来神也被一视同仁,受到供奉(如波罗神达奚司空),反映了广东历来对外开放、吸收外来文化的特色。另外,这些风俗活动也带有集体游乐性质,如山歌节、军坡节、生菜会、重阳节、田了节等,同样反映岭南地区崇尚自然,乐天进取的文化风格。还有,这些节令有不少带地方性或行业性的,比较多地在部分人群中流行。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区有生菜会、波罗诞、郑仙诞、金花诞、何仙姑诞、日娘诞、盘古王母诞、鱼花诞、田了节;西江地区有龙母诞;粤西有冼夫人诞;海南有军坡节;兴梅地区有山歌节;潮汕地区有死鬼过桥节;广州、佛山、香港有鲁班节等。行业性质的如医药界有孙正真人诞、华佗诞、医灵诞;渔业的有鱼花节;管民“买力”日;航运业和渔业有天后诞;农业有土地诞、土地公生日、田了节、芒种节、五谷母生日;商业有招财童子诞、财帛星君诞、财神诞等。这又说明广东风俗地区差异较大,成为风俗文化群落基础之一。

这些节令无论作为一个群体还是单个项目,都蕴藏着岭南文化深层结构,而不仅仅是它们外部表现形式。例如以下一些节令景观,就反映了广东风俗文化的品格。

1. 春节:广东各地除夕前忙于备年货,做年宵品,家家户户贴春联,到处洋溢喜庆气氛。有些地方人家吃素,不扫地,说扫地会将一年好运气和财源扫走。广东更兴守岁,全家吃过团年饭,即聚在一起,等待新年莅临。零时一到,家家爆竹齐鸣,到处弥漫着幽微火药香。初一以后亲戚朋友相互拜年,互赠茶素即冬果,给小孩赏“利是钱”,即红包,而现在单位实行集体拜年,称团拜,免去许多应酬,又节省时间。食必有鱼和发菜,取意于来年有余和发财。近年许多厂家、企业利用春节举办各种商业、娱乐和旅游活动,更使春节成为一年最隆重盛大的节日,其场面、气氛和耗资,均居全国之首。

由于广东民系不同,各地春节风俗也有许多相异。珠江三角洲地区,尤其广州附近,人们历来就有爱花、养花、赏花情趣,南汉时广州就出现花市,到19世纪中叶,花市例定在除夕前几天举行。届时各种花木涌入城市,十里长街,群芳竞发,姹紫嫣红,广州是以名为花城。市民结伴出游,俗称“行花街”,人如潮涌,热闹非凡,天亮之前,花市散去。每户居民大都买一盆年桔,取义“吉利”,或在花瓶上插上银柳、桃花、牡丹、菊花等,春意满室,吉利祥和,祈求一年好兆头。这种春节风俗,我国过去唯广州独有,现在已扩展到省内其他城市,成为一种较普遍的风俗。广州附廓和邻近县市,有专业性花卉生产,供应花市所需。顺德陈村、南海盐步、广州芳村等都是著名花果之乡。珠

江三角洲地区的除夕团年饭,除有鱼和生菜以外,还有茨(慈)菇和蚬肉。蚬音同显,取显达之意;茨菇意取添丁与家姑慈爱,表达一种情意美。团年饭后,用纸包饭团,领家中儿童出门,弃于路旁,谓之“卖懒”,有教育儿童之意。潮汕地区则户户必备当地盛产的柑桔、橄榄,作为拜年赠客礼物,谓“宾临大桔”(吉),例食由苡米、茨实、桂圆、莲子、小豆煮成的五果汤,亦喻如意、团结、吉祥。客家人过春节,长辈给晚辈分柑,未婚男女一律有份,意在有甘共欢。年初三将垃圾杂物扫尽,倒入河中,曰“送穷鬼”。初七“人日”吃由芹、韭、葱、蒜、芫及鱼、肉烹成的“七样菜”,取意于芹即勤,韭即长久,葱即聪明,蒜即会划算,芫即缘、有机遇,鱼即余,肉寓足,都有吉兆含义,乃客家人从中原带来的习俗。

无论哪个民系或地区,广东春节都盛行龙、狮、麒麟、鱼、凤、马、牛、鸡、鹅等瑞兽或禽畜等舞蹈,在广场或挨家串户表演,并往往与游神和其他歌舞相结合,形成热烈气氛。虽然有些动物舞蹈现已不流行,游神亦被废止,但取代它们的却是更加多彩多姿的游艺、竞技、体育等项目,使春节乐俗展现更多精神文明风貌。

2. 元宵节:是春节的继续和高潮。在广东则以元宵灯节最盛,四处张灯结彩,或举办灯饰展览和游行,蔚为大观,各地方志风俗条多有记载。李调元《粤东笔记》云“广州灯夕士女多向东行祈子、以百室灯供神,夜则祈灯取彩头”。海南崖县,“元宵前后,都里迎神张灯,扮演故事,谓之迎灯。自元日至此,昼打千秋,夜放天灯,或扮狮子、麒麟为戏”³。潮梅地区,是夜

各城镇张灯舞狮,鼓乐八音,倾城出游,彻夜喧腾。各地灯展,具有特色,但以广州走马灯、潮州灯屏、东莞千角灯、大良鱼灯最负盛名。灯展每与猜灯谜同时进行,把庆祝活动推向高潮,也给灯节增添了高雅的文化情趣。潮州地区甚至村有谜社,周末有谜会,已演变为一种经常性的文化活动。元宵本在元月十五,但传入广东粤西吴川、电白、化州一带,却无定例,当地人从年初二到月底,由各村自定一天为节日,不叫元宵节,却称“年例节”。据悉是为延长娱乐时间,便于亲友互访和欣赏到更多节目。这也是一种文化变异。光绪《化州县志》云:这一天“街市村民俱张灯结彩,土庶嬉戏,下户妇孺围观,夜里奉神出游,锣鼓喧天,灯光如昼,放火花,烧爆竹,打千秋”。吴川梅菪镇把元宵活动叫逛花桥,呼朋唤友,万人空巷,全镇淹没在一片花的海洋,于今不减。还展出各色泥塑,节后统统推入池塘,曰送泥鬼,寄意新的追求和开端。

3. 清明节:越人尚鬼,最敬重祖先。汉武帝平定南越,也不得不接受南越人祀鬼之风俗,并命越巫立越祝祠,以示汉越文化的汇合^[4]。此风历久未衰,已成为全民性文化心态。故广东清明节扫墓至为隆重。每届清明节,成千上万人前往墓地拜祭,俗称拜山。不少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也不远千里万里赶回故乡,拜祭先人。据有关报道,1986年清明前后,每天经深圳海关入境人数在3万以上,最多一天可超过10万,近几年人数有增无已。广州银河公墓,每天扫墓者不下数十万人,持续半月之久,市政部门专门成立扫墓指挥部,出动警察和治安人员维持秩序,给这种古老风俗场面,抹上一层现代文化色

彩。过去扫墓,包括踏青、插柳、上坟、挂卜纸、修葺坟墓、焚烧冥纸、祭奠等程式,多用烧猪、鸡、米饭、糕点等为祭品,一般全家或全族前往,爆竹齐燃,纸花飞舞,抽泣、啼哭之声不绝于耳。广东居民来源复杂,非常重视宗族关系,且靠谱系维持,故即使祖宗庐墓远在外地,也要成群结队前往拜祭,顺便互访宗亲,联络和沟通感情。现在社会条件改变了,但这种习惯势力仍很强大,清明时节,每见这样长长的队伍蜿蜒于荒烟山野之间。不过现已时兴用鲜花、水果、中西饼食代替传统祭品,乘汽车、摩托车前往的人也越来越多。更有人民团体、青年学生到革命先烈墓、纪念碑前扫祭,缅怀先人业绩,成为革命传统和爱国爱乡教育的一课。还有与踏青旅游结合在一起,扫墓的青年成份增加,逐渐改变扫墓的观念和习俗。近年随着殡葬制度改革,特别是火葬的推广和公墓陵园的建立,清明扫墓景观在大中城市已渐渐转向火葬场和公墓。例如广州火葬场和银河公墓就存放着 8.7 万个骨灰盒。由于加强管理,拜祭活动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只是在广大农村,土葬仍为主要制度,传统拜祭方式占上风,封建迷信活动也时有发生,这有待于提高人们经济文化水平,才能更新这传统习俗。

4. 端午节:五月初五端午龙舟竞渡乃南方古代越人传统习俗。越人善水,嗜食水产,以舟楫为家,为避蛟龙之害,除了断发文身,还将船制成龙式样。龙也是越人的崇拜图腾。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赛龙舟风俗可追溯到原始时代,端午节是越人为祈求生命得到安全保障而举行图腾祭的节日,后来才与纪念诗人屈原联系起来。《旧唐书·杜亚传》云:“江南风俗,春中

有竞渡之戏，方舟前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岭南也是越人故乡之一，这种风俗早就从吴越传入，并且后来居上，凌驾于其他省区。现在全国龙舟竞渡风气最盛之地，首推广东。其中又以珠江三角洲各地为最，以比赛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花样多，气氛热烈而闻名遐迩。

每年四月初八，广东各地开始准备比赛，谚云：“四月八，龙船挖。”从五月初一至初五，则为划龙船和赛龙船时间。广东龙舟，选料严格，制作精湛，装修华丽，型式多样，不仅是竞渡工具，也是一种高超艺术品。故每游弋水面，常吸引大量群众，即所谓划龙船。但高潮却是赛龙舟，届时江面画舫连檣，鸣锣擂鼓，观者如云，万人空巷。这种壮观景象，吸引过无数文人墨客、平民百姓。前广州市长、诗人朱光诗云：“广州好，端午赛龙舟。急鼓千槌船竞发，万桡齐举浪低头。屈子不须愁。”获胜一方被赏以烧猪、花红、美酒等物，笙歌豪饮，以示庆贺。顺德、东莞、广州、番禺、增城赛龙舟至为热闹，过去每为宗族组织和操纵，常为夺标争胜发生打架事件，甚至酿成人命案，诉讼经年。现在已由当地政府组织竞赛，秩序整然。顺德龙舟队作为国家代表队赴日本、泰国、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参加比赛，赢得了很好的声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过去重男轻女，妇女是不准参加比赛的，甚至连身影从龙船上跨过都要受到责难和非议。现在顺德却组建了女子龙舟队，并在1984年澳门龙舟赛中夺魁。古老的风俗，总是随着时代前进而变化的。其他地区龙舟赛也很有特色。如粤东客家地区龙舟头尾形制比珠江三角洲地区要高，龙身鳞纹斑驳，绚丽多彩，划手打扮成古代武士，威

武庄严,又另有一番景观。海南岛赛龙舟风气也很盛,光绪《崖州志》云:“五月端午,保平里有赛龙舟之举。……士女皆出港门观竞赛。”海南一些地方,还有把船称为“须虑”,与吴越地区对船的异称一样,从这里也反映两地有着深刻的民俗文化渊源。

广东也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端午节还吃粽子,饮艾酒,挂菖蒲,后两者今已不流行。但广东粽子,却与众不同,品种多至10余种,以肇庆裹蒸粽和广州莲蓉粽最为出名。粽子过去多在节日里制作,现在则成为市井酒肆间常见食品,从神坛走向千家万户,为普罗大众所享用。

5. 乞巧节:七月初七乞巧节,全国各地皆然,都来源牛郎织女神话,为未婚女子之事,但广东姑娘拜七姐,礼节繁缛、气氛虔诚,他处莫及。宋人刘克庄诗曰:“粤人重巧夕,灯火到天明”,说明广东乞巧节历史很悠久,而且很隆重。《广州岁时记》则详载了清末广州乞巧节热闹排场景象,想见以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重印的《中华全国风俗志》说:“广州风俗,綦重七夕,实则初六夜也。诸女士每逢是夕,于广庭设鹊桥,陈瓜果,焚檀楠蒸巨烛,锦屏绣椅,靓女列坐,任人人观不禁,至三更而罢,极一时之盛。”⁵其他地区多类于此,唯礼节繁简,气氛浓淡可能不同。这种活动可以雅俗共赏,陶冶人性,故得以风行广大城乡。有些乡村还有“拜七姐会”,负责筹备、组织这项活动,直到本世纪50年代,乞巧活动还比较流行,以后就很少见了。现在唯个别农村尚有保留,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一带。例如番禺石碁镇,不少村子就有“摆七夕”活动,不过内容

已经革新,脱离过去的神话色彩,而代之以各种灯饰、人物造型,以及民间工艺摆设和观赏。参加者也不限于妇女,而广及其他群众,成为一项生产与娱乐相结合、有益身心健康的群众活动。

广东乞巧节,过去还有汲水活动。屈大均《广东新语·水语》云:“广州人每以七月七夕鸡初鸣,汲江水或井水贮之,是夕水重于他夕数斤,经年味不变,益甘,以疗热病,谓之圣水,亦曰天孙水。若鸡二唱,则水不然矣。”实际上广东很多农村都有此惯例。譬如漠阳江流域就很流行。据悉,所贮江水或井水长年不生虫,用于配药治病很有疗效,翌年七夕再换云。风俗总带有现实根源。在科学不昌明、缺医少药时代,这一习惯总归是群众直观经验的总结。

6. 盂兰节:农历七月十五盂兰节,俗称鬼节:本为佛教节日,渊源于《盂兰盆经》目连救母故事,随佛教传入岭南,流传至今。盂兰节过去很隆重,往往持续数天,举行盂兰盆万人聚会,超度和施舍无主游魂,属集体性迷信活动,今已被摒弃。但盂兰节遗风犹存,一般住家仍保留节前后晚上烧衣习惯,包括烧元宝、冥钱、香烛、纸扎等物。有些人还在冥衣上写上祖先的名字,以示烧给祖先亡魂享用,同时备办牲醴,祭祀先人。这一风俗在全省各地大同小异,但好些地区提前在七月十四,如珠江三角洲、粤西和东江客家地区即如此。活动方式和景观也不尽一致,在大中城市比较淡泊,小城镇和乡村反见隆盛。例如笔者在阳春县城看到,这天晚上通城大街小巷、家家户户皆燃点香烛,一线绵延数里,爆竹声响至深夜。在广州和潮汕地区

则还有一些仪礼往来。《广东新语·事语》云：“十四日祭先祠房为盂兰会，相饷龙眼、槟榔、曰结圆，潮州则曰结星。”按圆即桂圆（龙眼），农历七月成熟，邻里互赠，取意和睦相处；又圆音同缘，也指喜结良缘。从盂兰节缘会演变到人际间结缘，反映广东人情美和心态美。

7. 中秋节：八月十五中秋节，是我国主要节日之一。团圆、赏月、祭月、吃月饼、敬老为中秋节主要风俗活动。但在广东，还有一些特别内容，也最热闹，是广东风俗美之一。

中秋节何时传入岭南已很难说清楚，但至少在宋代已有赏月活动。如宋人记潮州风俗诗云：“居民不谙灯前语，游女新成月下妆。”^[6]明代中秋节已与春节、端午节等齐名，并形成了广东过节特色。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广州时序条云：“八月，……为大饼像月（亮）浮，桂酒剥芋，芋有十四种，以黄者为贵。”清人范瑞昂《粤中见闻》则展现了一幅中秋风俗图：“八月十五中秋节，为大饼以像月，剥芋，食瓜，饮桂酒。……中秋之夕，儿童多燃柚灯，踏歌于道，……其灯以红柚皮雕镂人物花草，中置一琉璃盏，朱光四射，全以色胜，亦奇观也”^[7]。现在中秋节景观，已非昔日可比。单就广东月饼，不但品类繁多，而且质量上乘，饮誉全国，甚至远寄欧美诸国亲友，有“月是中秋明，饼是广州靓（好）”说法。当夜合家大小设台赏月，除了以上传统酒食，另加田螺和时新果品。也有人爱在江面泛舟，或携壶登山赏月，直至天明。在广州、东莞以及东江地区，则兴树中秋活动，即将灯笼高悬于竹竿上，入夜燃放烟花爆竹，一时电光火石，划破夜空；小孩也有自己活动天地，即传统踏歌出

游,手悬纸扎鱼、虾、瓜、果等灯色,至月上中天开始散去,加入家人赏月活动。

中秋又是团圆节。外出工作或出嫁妇女,节前后多回家团聚。广东商品经济发达,流动人口多,中秋交通繁忙,仅次于春节。亲朋故旧也多利用节日聚首探望,闲话家常。对孤寡老人,则予慰问,赠以月饼等礼物,或组织赏月,使老有所安慰。这种尊老敬老风俗,汉代就在中原形成。其时每到中秋,官府就要挨家挨户对老人表示慰问,同时赠以手杖坐凳之类。赵佗立南越国,把它移植到岭南,传承至今,此种风气值得发扬和提倡。

中秋活动,个别地方余兴未尽,延续到八月十六。清人陈子厚《岭南杂事钞》序云:“粤中好事者于八月十六日夜,集亲朋治酒肴赏月,谓之追月。”这在广东大部分地区现已不流行,但在香港仍不减其盛,其热闹场面不亚于中秋。

8. 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西汉已有此俗,虽然内容代有变化,但登高、赏菊、饮菊花酒之风一直流传到近代。岭南九月,已属晚秋,乃一年黄金季节,尤宜野外活动,故除了登高,还增添了扫墓、放风筝、菊展等项活动,比外地丰富得多,也是广东一个较隆重节令。

广东城镇多倚山而建,即使坐落平地者,附近亦有山岗,故每为重阳登临胜地。广州人登白云山、越秀山,惠州人登飞鹅岭,潮州人登韩山,新会人登圭峰山,阳江人登北山,东莞人登黄旗山,香港人登太平山等,这已变为一项群众性游乐活动,故重阳节又称“登高节”。

重阳又是一个扫墓季节。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在清明扫墓

者,则在重阳节前后进行。这时草木开始凋零,轻霜繁露,寒蝉无语,尤催发对先人怀念。故在好些地区,例如在广州、粤西和潮汕一带,扫墓风气不减于清明。

重阳秋高气爽,北风轻吹,又在开镰收割之前,广东人喜在这时放风筝。风筝在广东被称为纸鹞,图案有鱼、龙、百足、美人、花、草、鸟、兽等,还可装上弓扎,迎风喧鸣,妙趣横生。阳江与山东潍坊一样,是全国有名的风筝制作和施放中心。阳江风筝多达20余种,手工细致、色彩缤纷,最巨灵芝高可3米,顶架铜弦巨弓,声闻数里;最大百虫长至40米,也有小至1尺崖鹰,在万甲蓝天中展翼飞舞,万众欢呼雀跃,令人乐而忘返。阳江还举办过国际风筝节,迎来大批国内外客人。实际上登高与放风筝多是结合在一起,同时开展的。广州“登五层楼双塔放响弓鹞”⁸,海南儋县“儿童放筝、学士登高”⁹,佛山和东莞也是放鹞风气很盛的地区。

9. 冬至:冬至是我国自古以来受到重视的一个节令,在岭南更不例外。唐人刘恂《岭表录异》说:“岭表所重之节:腊一、伏二、冬三、年四。”广东以地理位置关系,冬至这天白昼最短,其后白昼渐长,有“冬至阳生”之说,表示万物生长季节自此更长,应感谢大地。另外,这时秋收既毕,藉此休息庆贺,亦一美事。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有冬至祭天活动,北京天坛公园就是明清帝王冬至祭天的地方,而民间则盛行祭祖。广东地方这天活动项目更多,称冬至为“亚岁”,“小年”,又有“冬至大过年”、“肥冬瘦年”等俗谚。

祭祖是广东冬至很重要的活动,各地都不例外。过去既有

由宗族统一办理,也有由各户举行,还伴以酬神演戏,仪式隆重,气氛浓烈。例如海南地区:“冬至之日,大会祠堂,以享以宴,济济跼跼。”¹⁰事毕举行家宴,享用祭祖酒肉三牲、果品和汤圆,庆贺一番。按汤圆是冬至必备食品,取义团圆。粤西汤圆用菜叶包裹,叫“菜包糍”,潮汕则有糯米圆和粳米圆,各有风味。一些地方还有食“鱼生”习惯,《广东新语》云:“鲮成双蝶食如流,冬至鱼生绝胜秋。”因鱼生不合卫生要求,现已改为打边炉(火锅)。另外,冬至扫墓也与祭祖一块进行,仪式与清明节一样:“祀祖为家宴,曰团冬;祭墓曰挂冬。”¹¹冬至祭拜风俗现已减弱,更多地转向礼俗往来和饮宴,这也是新条件下风俗改变的一个范例。

除了以上节令风俗,实际上一年之中,广东各地还有数不清的民间拜祭活动,哄动城乡。清人吴震方《岭南杂记》载:“粤俗最喜赛神迎会。凡遇神诞,则举国若狂。余在佛山,见迎会者台阁故事、争奇斗巧……陆离炫目……,气彻达远……,五色纸随风飞舞如蝶。”又例如在五华,有为诸神做寿诞、迎古事、赏灯、打醮等活动,并连同集市贸易一起展开,招来四面八方善男信女、小商小贩和各类游人,掀起巨大社会交流浪潮。再如广州波罗诞、佛山真武诞、德庆悦城龙母诞、粤西冼夫人诞、海南军坡节等,规模都很大,牵涉社会各个方面。这类活动,既有其健康一面,也不可能摆脱某些愚昧性或落后性一面,甚至会被封建迷信所利用。节日赌博也很严重。所以,分清良俗与陋俗,加以正确引导,就显然非常重要。

二、婚嫁风俗

婚嫁风俗是人生礼仪一种,属婚姻文化一部分,也是婚姻地理的重要内容。岭南婚嫁风俗渊源甚早,且有其特定内容和形式,有些仍然传承至今。而自西风东渐,广东受西方婚俗影响也较深;形成传统与近现代、中与外婚俗在广东并存的杂错的局面。

1. 从族外婚到自梳女:岭南社会发展较迟,上著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经历了很长过程,婚俗也如此。汉代,岭南土著越族人还处在族外婚阶段。如居住在海南岛骆越人“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¹²。其实也不止海南如此,“凡交趾所辖,虽置郡县,……人如禽兽,男女无别”¹³,连开发较早的粤北桂阳郡也受这种原始群婚影响。《后汉书·循吏·卫飒》云:“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故地理上更接近交州的南海郡和苍梧郡也不例外。直到汉人南来,中原婚俗传入,岭南这类族外群婚或其遗风,才渐渐消失。当然,这与中原官员致力于这种婚俗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后汉书·南蛮传》云:“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到西晋交州刺史陶基继续在州内推广中原婚姻礼制,“教夷人以婚娶,阖境化之”¹⁴。至此,岭南许多越人才渐渐脱离族外群婚,向对偶婚姻和一夫一妻制婚姻转变。但边远山区越人,即后来少数民族,仍长期保持古老婚俗,即使岭南汉人,也是一个混合民族,不能不受这种婚俗影响,或多或少有其遗风,成为广东

某些地区婚俗特色。这包括不落夫家和自梳女两种风俗。

不落夫家是指女子出嫁后,除了年节、庆贺、吊唁等红白喜事以外,一般不回男家,而长住娘家,时间从二三年到十年八年不等,即使回去也不与丈夫同房,甚至有相互不认识的,直到怀孕生小孩,始回男家定居,夫妻名分才正式确定。而在此以前,女子还有一定性自由。这是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过渡期的婚姻遗俗,曾广泛流行于我国南方和西南地区,尤以少数民族地区至为普遍。在广东汉区则流行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顺德、番禺、南海、广州、新会、台山等。乾隆《顺德县志》载:“乡之处女,强之适人者,归宁久羈,不肯归其夫家。”又据《屈翁山年谱》记:“翁山(屈大均)因前妻仙岭乡刘氏不落家,而以王华姜为继室。”在番禺,“乡中女子,习染归宁不返之风”^[15],又据向南《西南旅行杂写》指出:“此辈女人在台山、新会、顺德为最多。”^[16]珠江三角洲这些地区这种婚俗与海南黎族和粤北瑶族有某些相似,也说明这些地区民系是一支保留古越人遗风较多的人群。例如顺德就是南越国相吕嘉故乡,当地民俗文化有很多特殊性,都与南越族有关。

如果说不落夫家是独身主义的一种折衷,那么“自梳女”、“金兰会”则是这种风俗的发展和组织形式。虽然类似形式在流行这种婚俗的其他省区也不乏其例,但广东地区组织最为严密,最有代表性,明中叶以后,珠江三角洲蚕丝业发展起来,需要大量女工,一些女子为了独立谋生和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而宣布自梳,终生不嫁,即使被迫下嫁,也坚决不落夫家,保留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她们把头发梳成高高发髻(按古越人

也是“箕踞椎髻”的),夏天著黑胶绸衣,被称为乌衣队,集体居住在不准男子进入的姑婆屋里,死后葬在专用公共墓地“姑婆山”上。平时相互关照,严格履行不嫁誓言,倘有叛逆者,即受到奚落或惩罚。这种组织,称自梳女、金兰会或十姐妹。清人张心泰《粤游小志》云:“广州女子多以拜盟结姐妹,名‘金兰契’。女子出嫁后归宁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妇礼,必俟同盟姐妹嫁毕,然后返回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姐妹相约而自禁。……此风起至顺德村落,后传染至番禺、沙湾一带,效之更甚,即省会中亦不能免。”这是一种畸形和被扭曲了的独身主义婚俗,一方面是古老婚俗的延长和变异,另一方面出现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较早的珠江三角洲,又具有个性解放的色彩。如顺德地区“金兰契”女子,就出现过“同性恋”,女子二人结为密友,“情同伉俪,……二女同居,虽不能具男女之形式,实具有男女之乐趣”^[17]。建国初珠江三角洲还有此种婚俗,现在则基本绝迹了。

如果说不落夫家是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过渡的产物,那么进入父系社会,特别是到封建社会,在以男子为中心社会里,又产生一种与不落夫家相背的婚俗,即一夫多妻制。这在广东很盛行,社会上皆以妻妾多寡作为衡量人们财富的一个标尺,故往往以纳妾虚撑门面,一般富有家庭,男子纳妾是常有之事,“至于三妻四妾者,在在皆有。盖如此方足以维持其中等人家之体面也”^[18]。为人作妾者大都出自贫家,亦有或娼妓或个别慕虚荣的女子。她们生活基本有保障,衣食无亏,闺房之私一般不计较,故妻妾间因争风吃醋而产生风波者少,但嫡

庶子女之间的矛盾却很多。另外，纳妾制既盛行，一旦死一男子，即产生数个不等的寡妇，被视为“鬼婆”，难以再嫁，咸以为其夫亡魂附身，娶之者必受其祟云云。这类妇女的命运与自梳女一样悲惨。

新中国成立后，一夫多妻制已随着婚姻法的宣布而被废除，但作为观念意识，仍在一些人中残存。可见革除一种陋习比废止一种制度要困难得多。

2. 哭嫁风俗：《广东新语》云：“粤俗好歌，凡有喜庆，必唱歌以为欢乐。”^[19]女子哭嫁成为岭南自古传承至今的一种婚俗。女子定亲后，过门前数日或半月不出家门，邀集平时要好姐妹，练习哭嫁歌。这是一种有韵无词的唱嫁，以哭声长短、强弱、快慢来表达出嫁前难分难舍之情，但其中亦有可能露出哭中带笑的喜剧场面；另一种为真正哭嫁，出嫁女子依照当地世代相传唱法、哭法和歌词，连哭几天几夜（一般三天三夜），倾诉她们对未来命运、陌生环境的迷惘、恐惧心情，往往在哭嫁中禁不住真情流露，发展到哭父母、兄弟、姐妹、邻里，乃至哭梳妆，哭上轿，甚至一发而难以收场。遇到感情激动时，则长哭短叹，交替进行，令闻者心酸，以致感同身受，同声共哭。本来热闹欢腾的迎亲场面反被这一片凄切哭声所淹没。还有一种叫骂嫁，出嫁女子对包办婚姻或其他事情不满，平时又无处发泄，只有借骂嫁尽情地倾吐心中积怨、愤懑和痛楚。按习惯，被骂者不管是父母、兄弟、哥嫂等，此时绝不能表示不满，也不能还口，任由出嫁女子骂到男家。这对平日备受欺凌、被侮辱和损害的弱女子，可以说是对封建婚姻的一种斗争或反抗。这

种婚俗，“顺德尤为特异，迎娶时新娘登彩舆后，必沿途放声大哭，俟将到男家时，其声始辍”。^[20]实际上这不是个别地区的婚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云：“岭南嫁女之夕，新人盛饰庙坐，女伴亦盛饰夹辅之，迭相歌和，含情凄惋，各致殷勤，名曰送老，言将别年少之伴，道之偕老也。”^[21]至今仍有一些农村，流行这种哭嫁婚俗。此外，对出嫁女子，还有“伴队”习惯，即由五六个相好未出阁的姑娘陪伴到夫家去，这些姑娘叫“群队”或“隐队”，一般长相姣好，穿戴整齐，招来沿途路人观看，有些姑娘借此机会物色对象。此风现在比哭嫁更为流行。

3. 童养媳婚俗：岭南山区广大，经济一向落后，贫苦农民无力承担娶亲的巨大开支。不少山区人家把穷家女儿自小迎到家中做未来媳妇，叫做童养媳。童养媳这种古老婚俗，至今在边远山区仍偶有存在，成为包办婚姻的一种形式。

广东童养媳婚俗。一般是家里有男孩，尽早物色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为伴侣，只要女孩父母同意，男方付以少量资财，即可接女孩回家抚养，待满16岁以后，举行简单结婚仪式，便宣告结为夫妻。这种婚俗，一方面可省去沉重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是男女双方一块长大，感情容易交流和了解，比起完全包办的盲婚，易于为双方接受和适应，故得以在山区流行。过去粤北、粤东、粤西和海南都有这种现象。这种婚姻习俗，当然也有不少弊端。“细民或有童婚者，……又或以庚贴委媒索配，往往落奸人套中”。^[22]而在粤东客家地区，这种婚俗还以“等郎妹”形式出现，即男孩尚未出世，其父母已预先收养一个女孩，作为未出生男孩的妻子，这个女孩称“等郎妹”。倘男孩很

多年以后才出世、长大,或者出世的是女孩,则“等郎妹”便要面临悲惨的命运。所以,童养媳婚俗毕竟是一种陋习,建国后已被禁止,但并没有根除。一些人口贩子往往利用这种婚俗,从外地拐骗女童卖入山区,充当童养媳,酿成人间悲剧。时下卖入广东的女童很多来自于广西、四川以及其他贫困地区,而收养的则为省内一些山区县市。

4. 近代婚俗的滥觞和变异: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婚俗更多地在广东传布。清徐珂《清稗类钞》云: 亲迎之礼,晚近不用者多,光(绪)、宣(统)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广州、汕头、海口等通商口岸率先流行,继而广及沿海城镇,成为一种新的礼俗文化。这种婚礼,聚男女亲属于一堂,包括行结婚礼、见亲礼、受贺礼等,程式简单,气氛庄严而热烈。与旧式婚俗相比,长处有三: 第一为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变为男女双方同意; 第二为定婚后男女之约,先以自立求学为誓言; 第三为婚礼务求节俭,减轻两方经济负担,故颇为时人接受。到民国初年,文明结婚已在很多城市成为风气。但在受外来风气影响较少的内地,仍沿用旧式婚礼,即使大中城市,旧式婚礼仍根深蒂固,故还是新旧式婚礼参用,形成较斑驳复杂的婚嫁礼俗。

建国后,婚俗经历了许多巨变,总的发展是趋于简单、朴素,自由恋爱已成为主流,计划生育、晚婚、晚育、优生等新俗已在广大城乡得到推广。近10年来,婚姻介绍所、集体结婚、旅行结婚等形式也相继出现,并成为移风易俗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能不看到,我国婚俗还处于新旧交替时期,新婚俗的

传布也有地区的不平衡性。广东又深受港澳和海外婚俗的影响,一些恶风陋习通过各种渠道传进来,在许多地方传播,并有日益加强之势。当今无论城乡,烦琐而又浪费的婚姻仪式很盛行,且有互相攀比、竞争高下之势,特别是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深圳、珠海以及沿海一些城市,不少青年结婚要下三书六礼,讲究结婚车、婚纱、礼金、酒席,耗费动辄以万元计。讲排场、摆阔气程度比旧式婚礼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人为满足对方的各种苛刻条件和虚荣心,不惜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这是当前婚俗主流中的一股逆流,也是对传统婚姻美德的一种异化,应引起重视和加以指导。

三、丧葬风俗

丧葬风俗是一切风俗中最稳定的一部分,丧葬风俗又深受地理、历史、民族、伦理等因素影响,所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内涵很复杂,需从多角度去探索和考察。文化地理研究的致力点,在于丧葬所包括的葬法、葬式、丧服及其景观历史根源、演变与环境关系,以及它们的空间分布等。

1. 葬法嬗替

岭南与我国其他地区一样,历史上流行过土葬、火葬、悬棺葬、水面葬等多种葬法,皆以对人死后灵魂归宿如何看法不同而转移,有一定地域差异。

广东曲江石峡和佛山河宕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掘表明,古代岭南土著居民是实行土葬的,并实行公共墓地制,深

受灵魂不灭和对祖先、对图腾的崇拜制约。

秦汉以降,中原文化更多地传入岭南,“入土为安”的基本观念占了上风,土葬成为岭南葬法的主流。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深埋于象岗山下,是一座规模巨大的土葬墓室。海南岛三亚、陵水交界的军屯坡和番岭坡有我国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的一片东汉瓮棺墓葬群^[23],也属土葬一种形式。古代土葬墓在全省各地都有发现,汉以后的墓葬更是随处可见,这是一种延续时间最长,覆盖地区最广的葬法。

火葬:又称“火化”,是我国一种古老葬法,也同样流行于岭南。1982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惠来县饭钵山,发现春秋时期贮盛有人体骨灰的陶瓷^[24],为广东目前已知最早的火葬实例之一。这说明:火葬在岭南自古已有,决非从印度传入。当然,由于佛教传入我国,广东又为首途之区,有助于火葬流行。唐到北宋,火葬还限于在佛教徒中进行。到南宋,民间纷纷仿效僧人葬法,火葬在广东迅速风行起来,并成为一种社会风俗。考古发现各地宋代墓葬有不少盛骨灰的陶罐。例如中山市石岐附近的张家边、大涌、牛扎湾、环城、小榄和海边下沙、中珠排洪渠^[25],以及佛山鼓颍岗等地就有很多火葬墓^[26]。说明火葬由于具有节省开支和土地,卫生简便等优点而为人们所接受。但这是与儒家礼教相悖的。所以自宋代开始,封建统治者便千方百计设法禁止,然终未能生效。直到明初,统治者采取更严厉法律制止,火葬始大为减少。但即使至明代,仍然有一些地方实行火葬。例如三水“亦有火葬者”,潮州“细民火葬”,雷州“贫者或有火葬”^[27]。入清以后,火葬只限于个别地

方,例如《中华全国风俗志》引《清远县志》云:“民火葬,视他邑为甚”^[28]。民国时代,火葬也只在大城市中通行。建国后,由于政府大力提倡,火葬已在大中城市普及,在许多县城实行,但在山区城镇和全省广大农村,土葬仍占绝对优势。要在各个人群,各个地区普及火葬,仍需很长时间和倾注很大努力。

悬棺葬:悬棺于悬崖峭壁或岩壁洞穴上一种葬法,广泛流行于我国古代南方以及陕西等地区,也在岭南部分地区盛行,但主要分布在广西,目前在广东发现还不多。而在文献记载上,广东用“蜕仙台”名悬棺^[29]。据云,在粤北仁化丹霞山核心部分的棺材寨,存放有悬棺。这种悬棺墓葬与丹崖赤壁上的扁平状洞穴有密切的关系^[30],是考古学和地貌学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悬棺葬是人死后升天思想的反映,与火葬“登遐升天”殊途同归。它流行的地区皆为古越人居地。粤北高山层叠,峰峦入云。古越人视高山险峰为神灵居地或者通往仙界捷径。在那里安葬,可以生活在其中或更接近“神人的天国”,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和原始信仰。现在这种葬法已不流行。

水面葬:为一种很特殊葬法,仅见于珠江三角洲水网地区,主要在东莞。当地称“打水墩”,即将死者棺材平放在木桩支撑水面上,任其风化。东莞道滘直到民国初年仍很流行这种葬法。按这一带成陆较晚,至少清中后期已有此葬法,其他地区留存情况目前尚未清楚。

水面葬所在的东江河口地区,无高地可依托,人多地少,土地珍贵,而三角洲前缘未露出水面部分,难以开发利用,当

地居民打桩架木为葬,也是节省土地的一种办法。也有在洲滩边缘、离聚落较远或未开垦洲滩上安葬的,潮水一般淹不到葬具,故得以长期保存。时间长了,“打水墩”水域变成一片公共墓地,形成特殊墓葬景观。解放后,这种墓葬已不存在。

2. 盛行一次葬和二次葬式

广东汉族和其他省区汉族一样,最为流行的葬式当首推仰身直肢一次葬,即人死后直接入土安葬,死者仰面朝天,四肢平放,为死者生前最自然的仰卧状态。在岭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很多是实行一次葬式的。例如在曲江马坝石峡、东华围,曲江周田鲶鱼转、马蹄坪,曲江龙归葡勺山,始兴新村、澄陂,韶关走马岗;新会罗山咀、香港深湾、潮安陈桥村和凤地、遂溪江洪鲤鱼墩、佛山河宕等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一次葬。此后这种葬式历代沿袭,至今仍被人们习用,已成为一种最普遍和最基本葬式。

但在岭南最具地方特色的是二次葬式。它是在人死入土安葬三年以后,待人体软组织完全腐烂、分解,再打开棺槨、捡骨,用白酒洗净,然后按人体结构,脚在下、头在上、屈体、装入陶瓮(罐),重新埋入地下。这就是二次葬,亦称之为洗骨葬或捡骨葬。盛骨陶瓮称为金罍、金塔或金城。金罍不一定在原地下葬,而选葬在所谓“吉地”。如果一时找不到这样的吉地,则将金罍搁置在田边或岩穴间,也有将吉凶祸福归咎于葬地不吉而屡次迁葬的。于是堪輿之风兴起,往往为争夺吉穴或吉地而引起争端,甚至酿成械斗等惨剧。这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时有所闻,是丧葬中一种陋习。

二次葬跟一次葬一样古老。在广东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往往有两种葬式共存现象,但墓穴所在文化层次可能不同。例如石峡文化所在的氏族公共墓地里,就有一次葬和二次葬墓,还有火烧墓穴以及一墓存两套随葬品的情况。在全国,新石器墓葬似为罕见或不见。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墨子》指出:“楚之南有炎人国,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31〕这是关于二次捡骨葬的一条最早记载。楚之南当包括岭南,并与广东曲江石峡文化遗址地望相符,可见这一葬俗在广东源远流长。

古代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二次葬风俗,我国不少民族也如此。岭南首先是越人实行这种葬式,其后虽经文化融合、民族迁移等变化,但二次葬始终作为一种重要葬俗存在,不但持久不衰,而且其流行地域非常广泛,涉及各州府和不同民系。明代粤北,人“死三日则权厝之中上,三年后取遗骸为坟墓之”〔32〕。清代兴梅客家地区,“俗父母葬十年皆议改葬。改葬者以罍易棺,捡骨而置之”〔33〕。惠州一带也是“择吉壤安葬,……各县大抵相同,或有惑于风水之说,停柩期年,三年而后葬者,或有葬不数年,启土剖棺、纳骨于瓦罐,名曰金城,迁葬他所者”〔34〕。在潮汕地区,“葬后十年或十余年,则易其棺而贮骨于瓷罍,名曰‘金罐’。骨黄者,复瘞原穴,骨墨者,另觅佳城”〔35〕,总之“粤东洗骸已成结习”〔36〕。此外,西江、粤西和南路地区,同样流行二次葬俗。尤其壮语地名,例如“那”、“云”、“六”(禄、淥、菜)、“古”、“思”等分布地区,壮人遗俗颇多,二次葬亦属其列。而上述地区,恰是壮语地名覆盖之地。

二次葬文化意识很复杂,据民族学和人类学者解释,一是岭南气候湿热,土壤水分多,细菌活跃,尸骨不易保存;二是岭南民族迁徙频繁,捡骨便于携带。例如客家人“负其亲骸来此相宅,道以罍盛而葬之。嗣又以流移转徙之不常,恐去而之他,故相传为捡骸之法,以便带挈”^[37];三是彻底断绝死者与社会集体生活的联系和相互渗透,使灵魂得到安息。因为人们常认为:“血肉是属于人世间的,灵魂可以离开肉体而单独存在,并且永远不死。因此,皮肉虽已腐烂掉,但灵魂则已进入另一个世界了。并且,人们还十分盼望死者的肉质尽快烂掉,以便迁移骨骸,举行正式的埋葬,使家庭成员在另一个世界里早日得到团聚”^[38]。看来,这三者都符合岭南地理环境、民族文化和心理素质的。

二次葬具即金罍一般安放在家族祖先墓地里,年代久远,金罍越来越多,于是被后人集中起来,建立阴屋,遮挡风雨侵蚀,妥善保存。不过这种阴屋主要流行于客家地区,过去比较少,也很简陋。近来广东沿海经济发展,一些地区生活富裕起来,不良习俗也有所抬头,兴建阴屋成为风气,变成这些地区一大景观。从广州到深圳的铁路、公路沿线,不时可见到山坡上有一簇簇、大小不等的混凝土或砖石结构的阴屋贮立其间,有的修得很漂亮,铺上瓷片,五颜六色,为它处所不及。所费资金,从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且有越演越烈之势。这种景观,非止一地,但凡在二次葬流行地区,都可看到,唯程度不等而已,应引起人们重视。

3. 葬风

岭南葬风,并不限于儒家礼制,还有不少楚、越文化遗迹,以及当地居民自行创造的种种仪式,以烦琐复杂、禁忌多、场面盛大著称。

唐人张鷟《朝野僉载》云:“岭南风俗,……死则打鼓鸣钟于堂,比至葬讫。初死,旦夕大叫而哭。”后来此习也无多大改变。此外,还有一套各地颇为相类的程式,如将临死的人抬至厅堂,将死者生前所用的家私、器物扔出屋外,亲属哭告各地亲友,到河里打水将死者洗干净,曰“买水”,谓死者在阴间无遗恨,家人好谋生;殓后点油灯,为死者守灵,不让鸡、犬、猫等从死者身上跳过,否则死者在地下永远受苦;人殓时往死者口里放银或饭,谓在阴间使用,不致成饿鬼。此后看风水、造坟、下葬,出殡时主人着麻布孝衣,穿草鞋,腰系草绳,吹喇叭、唢呐、扬幡,嚎哭,直至墓地。实际上这很多也是壮人的葬俗,如浴尸、买水。光绪《嘉应州志》云:“吾州向无僮僚,不知何从染此,抑岂草昧之初,僮人居五岭之表者,辗转流入耶。”〔39〕但潮汕地区“其葬时筑坎用灰,掩坎用土,与江、楚同”〔40〕,与兴梅地区又有差异。然而笃信神鬼,“丧尚浮屠”〔41〕,讲究排场,铺张浪费等都无多少地区差异。潮汕地区“民间丧葬……,送葬动辄至数百人,澄海尤甚。……凡遇父母丧,无不罄囊鬻产,仿效成风”〔42〕。故清末有人指摘:“按今日丧事多奢侈无节,此风茂名为甚,各邑亦多有濡染者。”〔43〕这两地代表了过去广东葬风之盛。

丧葬厚薄,植根于对神鬼的态度。粤俗本尚鬼,不亚于楚风,“互相比较起来,以吾粤为甚”〔44〕。丧葬为人与神鬼之间联

系的重要桥梁。只要有神论存在,丧葬上的一些陋习就不会很快革除。时至今日,丧葬俗中一些迷信活动还时有所闻,有必要加强移风易俗的教育。

四、饮食风俗

每个民族或民系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经济和文化因素,在烹调艺术上,土特产和食品制作,以及饮食风尚方面都会形成自己的特色,即饮食风俗。饮食风俗是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延续时间也很长,一般通过民族性或民系性,区域性及岁时节令等表现出来。

岭南食物资源非常丰富,可供人类食用的品种甚多,且四时不绝,为加工和定向生产各种食品奠定了物质基础。岭南越人原有自己的饮食习惯,后来不断吸取外来饮食文化的养份,滋润和丰富自己,经过长期交流和发展,形成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饮食风俗。

1. 杂食成风 古人以为,“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畜。食水产者,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食陆畜者,狸兔鼠雀以为珍味,不觉其膾也”^[45]。而岭南人两者兼具,经过他们加工炮制,这些腥臊、膾味食料即成美味佳肴,饱人口福,传承至今。

令外地人退避三舍的蛇类,在岭南却身价百倍,被视为美食,走进普通家庭乃至高级宾馆。以蛇为原料可制作出 30 多种精美蛇菜,著名的有“三蛇羹”、“五蛇羹”,以及与鸡、猫配伍

成的“龙虎凤大烩”(即“龙虎斗”)等。蛇还用于制药酒,蛇胆为全身之宝,民间用以治病和滋补。谚曰:“秋风起,三蛇肥”。秋冬为吃蛇季节,不但当地人趋时逐尚,连素来厌恶吃蛇的北方人也禁不住一试,近年更有不少外国人也慕名前来领略这岭南风味。除了广州为传统吃蛇中心以外,深圳、珠海、汕头,还有香港等城市吃蛇也很普遍,在广州农村,吃蛇更属时尚。

蛇本是越人的崇拜图腾,后来又成为越人饮食一种嗜好。汉杨孚《异物志》说:“蚺为大蛇,既洪且长,彩色驳革,其文锦章,食豕吞鹿,腴成养创。宾享嘉宴,是豆是觞。”淮南王刘安也说:“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中原)人得而弃之无用。”^[46]唐代韩愈贬潮州,见当地人吃蛇,“腥臊始发越,咀吞面汗骒”,简直无法忍受。唐代以后,越人基本上被汉化,但吃蛇风俗被传承下来,制作技巧还有所提高。到宋朱彧《萍洲可谈》记:“广南食蛇,市中鬻蛇羹。”吃蛇已成为市井文化的一部分。此后,人们越来越发现蛇的价值,特别是毒蛇更为宝贵,开发出各种独特制品,这实为岭南饮食文化一奇葩。

狗也是越人的崇拜对象,至今广东各地还有许多以狗命名的地名。吃狗肉在岭南同样蔚为风气,且把狗肉美其名曰“香肉”。熟狗肉会溢出一种异香味,使人食欲大增。故谚曰:“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狗肉食法在广州叫“开煲狗肉”(煲即砂锅),泥炉炭火,星星点点,为冬夜街边一景;在湛江、海康一带,则时兴白斩狗,一只只熟狗像祭神似的四脚趴放街边摊桌上,任人挑选;粤北人却喜吃腊狗头,精制腊狗头往往与火腿、香肠并挂在食品店里。白斩狗与腊狗头不同吃法,反

映了广东南北水土差异。而潮汕福佬人盛行吃“全狗席”，但现在不时兴了。至粤东客家人，吃狗肉向来就是其饮食文化一大特色，除了有炒、烧、丸、羹等多种吃法以外，更重要在于这一风俗的深层文化意义。这不仅与客家人山居生活容易伤寒中风有关，而且与客家先人来自中原时所处的农耕生活有关。客家人定居南方山区，在山多田少的条件下，仍保持先人农耕社会，而没有倒退回渔猎时代，狗不是不可或缺的家畜，也不是他们的图腾，肉食意义最大。

吃狗肉本为中原古俗，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有“杀狗磔邑四门”的记载。此俗后来传入岭南，初时是在农作任务繁重的夏季吃狗肉，以辟瘴气，增补体力。大抵清初以降，改为冬令进食了。吃狗风气也远远超过北方，过去有人惊呼：“只有两广人才懂得狗肉的异香美味。”^[47]实际上现在北方很多地方已不吃狗肉。

鼠类也是岭南人蛋白质来源之一，广东很多地方都吃鼠肉，尤以珠江三角洲、粤西、海南为甚。苏东坡贬海南，见当地人食“熏鼠烧蝙蝠”。顺德人对鼠肉炮制尤精，有腊、蜜饯、焖等多种食法，过去还是送礼佳品。在广州鼠肉美名曰“嘉鹿肉”，有专营鼠肉酒店，不过所用皆为田鼠。

岭南人还有嗜食虫类风俗，举凡可果腹而无毒者，经烹制后，皆成佳肴。如沙虫（沙蚕），潮汕、雷州半岛、阳江、电白多有生产。禾虫，产于水田，沿海人喜食。蚕蛹，珠江三角洲甚多。此外，还有禾虾、龙虱、桂花蝉、地老虎、蜂蛹、竹虫等，不仅可为家菜，而且常见于街头小食店，有些还堂而皇之进入高级酒

店。不过,由于广东人杂食,许多野生动物被奉为至味,不仅当地捕猎成风,而且还波及外地,穗港成了全国最大的野味消费中心,其中不少属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由此引起生态平衡问题,实足值得人们检讨。

2. 饮茶成风 我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瑰宝之一。据陆羽《茶经》记载,唐代韶州、潮州已产茶。南海西樵山其时不但种茶,而且焙茶。品茶已成为一部分人的享受。但饮茶成为社会风气,主要还是近百年之事。广州是其兴起中心。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光绪年间,广州华洋贸易非常兴旺,洽谈生意、政治交易和其他礼俗往来被转到茶楼酒馆里进行,饮茶也时兴起来,并渐渐改变单纯喝茶的旧习,而增加各式精美点心和菜色,使饮茶成为社交礼仪的一种重要方式,茶楼遂变成这种活动的重要场所。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兴建的茶楼越来越多,为一般市民和劳工群众提供了活动天地。他们天明即起,先上茶楼,沏上一壶茶,要两件点心,聊当早餐,且所费无多,即可稍事休息,又可交朋接友,打发时光,深受各界欢迎。一些人习以为常,风雨不改,成为老茶客。饮茶之风自此在广州大盛,并逐渐扩展到珠江三角洲各城镇,东、西、北江沿岸的重要交通口岸。现在,饮茶之风已吹遍广东大小城镇,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城市郊区,饮茶已成为农民一种嗜好。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回乡探亲旅游,少不了到茶楼把盏迎送,一些文艺团体,也假座茶楼举办各种演唱会,招徕更多茶客。近年兴起的音乐茶座,在广州、佛山、深圳、珠海等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使饮茶与音乐、艺术欣赏相结合,具有更深一层

的文化意义。

岭南气候湿热,人容易患燥热风寒感冒诸症,广东人称之为“热气”,通常以“凉茶”解之。这种以金银花、菊花、鸡蛋花、川心莲等中草药炮制成的凉茶,甘甜苦涩,诸味俱全,疗效独到,老少咸宜,是广东饮茶的另一风尚,以“王老吉凉茶”最为驰名。这种凉茶摊档过去通布城镇乡村,人人称便。近年可口可乐、健力宝等各式饮料兴为时髦,凉茶本小利微,难以竞争,渐趋式微。但它的疗效早已深入人心,故仍流行于寻常百姓家。

3. 嗜食槟榔 槟榔是一种药用植物,含多种生物碱,有消谷、逐水、除痰、灭菌等功效。岭南古为瘴疠之地,食槟榔可驱热取凉,除饥渴,与岭南湿热地理环境相适应。故自古以来,食槟榔在岭南蔚为风气,世代相传。晋人稽含《南方草木状》说,交广人客至,必先呈此果。唐则明确记载“广州亦啖槟榔”,“不食此无以怯其瘴疠”[48]。此风宋代尤盛,周去非《岭外代答》云:“广州不论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此后,槟榔不但作为口果,而且代茶敬客,作为礼果互相馈赠,亦为婚嫁聘礼,以及用以拜祀鬼神等,文化内涵有所扩大。海南人更嗜食槟榔,槟榔生产成为当地经济收入一个重要来源。在宋代以来方志、笔记、小说、歌谣、谚语中,有许多关于食槟榔的记录,与社会各个人群的关系都很密切。明万历进士王士性南游广东,见“俗好萎叶嚼槟榔,盖无时无地,亦无尊长,亦无宾客,亦无官府在前,皆任意食之”[49]。食槟榔风俗直到建国前,仍在各地流行。现在,由于自然和经济、文化环境改

变,槟榔文化功能大为削弱,除海南岛以外,广东食槟榔的人已经很个别,但影响犹在,上了年纪的人,对此风此俗,印象甚为深刻。食槟榔之风今天却在湖湘一带兴盛起来,湘潭、株洲、长沙地区嗜食槟榔风气现已不亚于古代广东。湖南已成为海南槟榔的一个主要消费地,这种风俗文化渊源,与岭南不无关系。

食用槟榔一般离不开扶留叶和石灰,相和以食,先辛后甘,吐汁鲜红,能醉人,颇具刺激性,苏东坡在海南,写过“红潮登颊醉槟榔”的诗句。现在海南人仍保持这种古老食法,陵水、三亚、通什尤为嗜食。这种食法用的果实一般未成熟,味厚而芳,叫槟榔青,而广东大陆人喜欢食用炮制后的槟榔。例如广州人和肇庆人爱盐槟榔,潮汕、东江、东莞和顺德人爱干槟榔,新会人偏爱槟榔肉,高雷、阳江、阳春人则喜食果熟干焦带壳的枣子槟榔。这种食俗地理差异,同样反映槟榔文化在广东有很丰富内容。据报道,食槟榔现在香港一些人中悄悄流行起来。物极必反,人们在享用各种精美的零食、口果之余,也许会从这古老风俗中发现新的文化价值。

4. 粥品荟萃 食粥也是岭南一种很风行的饮食习惯,不管城镇居民还是农民,余粮区还是缺粮区,粥品是主食之一。一日三餐中常有一餐是粥。至于粥品名目之多,居全国榜首,岭南无愧为粥品荟萃之乡。

粥品风行的原因,一是岭南炎热时间长,流汗消耗大,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及易被吸收的养料,各类肉粥是较理想又方便的食物;二是广东人多地少,历史上经常缺粮,食粥是疗

饥、救荒办法之一；三是食粥是越人一种风俗，流布至今。语云：“壮人据地甚广，其大部百谷皆宜，然其人犹秉祖宗以前穷守山谷之遗训，以饭食为暴殄，朝夕餐膳，无不食粥。虽然积谷盈仓，而日亦如此。”^[50]按壮人为俚人后裔，即古越人一部分，俚（黎）“乃以薯芋杂米粥糜以取饱”^[51]。中原人南来，也不能不适当当地环境，追随食粥风俗。

岭南粥品，除了家常白粥，富有地方风味的还有各种肉粥。苏东坡在海南食过黄鸡粥。现在粥品一般以老母鸡、猪骨、干贝、腐竹等熬成底粥，即味粥，再用鱼、虾、蟹、田鸡（蛙）、牛肉、猪肉、鸡肉，以及各类禽畜内脏等为配料生滚而成，食时佐以姜、葱、芫荽、胡椒粉等，鲜美异常，可随时供应顾客。这种小食店或大排档，遍布城镇大街小巷。1956年在全国名菜美食展览会上，广州粥品有84种之多，比较常见的有及第粥、牛杂粥、皮蛋粥、鱼片粥、猪红（血）粥、柴鱼花生粥、白果粥、鸡粥以及糖粥、绿豆粥等，举凡一切可以为菜者，皆可熬粥。食粥还有季节、早午晚之别，冬春粥要稠，夏秋粥要稀；早上一般只食白粥、猪红粥、及第粥；下午食豆粥或糖粥；夜晚食鱼鸡肉粥、牛肉粥或艇仔粥（一种在小艇上摆卖的粥品）。早粥要稀，午、晚粥要稠。还很讲究刀功、火候、调色、炉具等，例如熬粥一般要用瓦煲，而不用铜锅或铁锅，宜用炭火少用煤火，配料以熟为度而不能烂，如此等等，光从粥品一项，反映岭南饮食之精，风味之异。外地人先以为奇，后随乡入俗，至少成为半个岭南人。

广东人食粥，以潮汕地区至为时尚，过去常以粥混番薯为

主食,每顿无粥便感到欠缺,粥还上宴席。乡里人食粥,很少共桌,中年人多单独盛碟小菜,走出门户,三五为群,或坐或蹲,边聊边食,颇具农村风情。珠江三角洲地区以食干饭为主,粥为辅;粤西则干饭和粥参半;山区缺粮,杂粮粥很普遍。但潭江流域地区,粒米惟干饭,极少食粥,故嫁来南路妇女,对此多不习惯。这些差异,主要是各地区、各民系历史习惯不同所致。

五、乐俗文化

乐俗包括民间音乐、歌舞、武术,以及其他娱乐活动,具有广泛群众基础,是人类一项宝贵的精神创造,也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离不开一定的历史和民族背景,并在一定的区域范围里成长、发展和演变,表现了相当明显的地域特征。

中原礼乐南下,虽然最终成为岭南乐俗的主流,但并不能消灭,只能改造岭南越人乐俗活动,其遗风总是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西风东渐以来,西方娱乐文化首先在广东传播,并被结合为岭南乐俗一部分,所以岭南乐俗文化的发展和更新,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

1. 铜鼓音乐 越人善铸铜鼓。铜鼓文化是百越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广东北江以西地区和海南岛,几乎各县都有铜鼓出土,数量很多,是我国中南和西南地区很多民族共有的一种乐器。古代越人,“欲相攻击,鸣此鼓集众”^[52],“聚会亦椎鼓舞歌”^[53],击铜鼓还可“祭”祖先^[54],“祀神以治病”^[55],“击鼓以

乐神”^[56]，“用以战阵”^[57]等，统称为铜鼓音乐，广泛用于作战、祭祀、婚姻、丧葬、节日等仪式中。此外，古代越人还铸造铜钟，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有编钟、编磬等大型乐器。清远、肇庆等地也曾出土单件或成套铜钟^[58]，同样说明越人铜鼓一类音乐文化很发达。

后世越人能歌善舞的风俗能一直保持下来，与铜鼓音乐不无关系。宋《太平御览》引《风土记》记载，越人有歌舞酒会风俗，会上常弹一种叫“样”的乐器，众人随样的节奏起舞，气氛甚为热烈。今日黎、壮、瑶等少数民族，皆为越人后裔，仍以能歌善舞著称。即使汉人居地，亦颇受其遗风影响。唐人张鷟《朝野僉载》云：“岭南风俗，……死则打鼓鸣钟于堂。”明清时，“粤之俗，凡遇嘉礼，必用铜鼓以节乐”。广州南海庙“岁二月十三，祝融生日，粤人击之以乐神。其声闾鞞铿锵，若行雷隐隐，闻于扶胥江岸二十余里”^[59]。现在端午赛龙舟、春节舞狮子，各种庆典、迎宾、商店开张、乔迁新居、展览、工程剪彩等，都少不了鸣锣擂鼓。苏东坡诗云“钟鼓不分哀乐事”。只不过现在鼓具有所改变，文化外延更广罢了。

2. 民间歌谣 岭南民风骠悍，发之为声，则为歌。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论》粤歌条说：“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节长声，自回自复，不肯一往而尽，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已已。”这说明了岭南歌谣的生活和艺术风格。但不同地区，不同民系都有自己独特色彩的歌谣，构成岭南乐坛上异彩纷呈的画面。

广府地区,水乡泽国,城镇密集,商品经济素来比较发达,礼俗往来频繁,歌谣形式瑰丽多彩,名目甚多。流行于沙田农村地区者曰咸水歌,青年男女尤喜欢唱,借此表示爱情或传诵历史故事,除田野劳动、水上行船相对和唱以外,还在农闲夜晚,踞峙两地对唱,谓之“斗歌”。清代广州元宵日,五仙观前斗歌的场景,甚为壮观。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记:“歌伯斗歌,皆著鸭舌巾,驼绒服,行立凳上,东唱西和,西嘲东解,语必双关,词兼雅俗。大约取晋人〈读曲〉十之三,东粤〈摸鱼歌〉十之四,其他三分则唐人〈竹枝词〉也。观者不远百里,持瑰异物为庆头。”潮州、肇庆等地都有斗歌为乐记载;流行于乡镇妇女中者曰木鱼,行腔委婉柔和,情调近于伤感,妇女多在闺阁中独自清唱,或与妯娌姐妹一同歌唱,耍乐寻欢,而无须器乐伴唱;流行于乡镇农村各阶层群众者曰龙舟,演唱者以男性为主,配以小锣小鼓,行腔豪迈谐趣,高昂跌宕,专业人员常在乡庙、社亭演唱;流行于街头广场,多用竹板、瓦钵击节伴唱者曰山歌,亦曰歌仔,内容复杂,多为卖艺者演唱;又有卖唱老嫗所唱歌头曲尾者,曰汤水歌,辞长短不一,有雅有俗,有贞有淫,听雇者之命而定;妇女平时或岁时聚会,使瞽师唱者曰摸鱼歌,取材于古今小说,以孝义节烈为多,也使人感泣沾襟;还有粤讴,又称“解心”,流行于花月场中,绝大部分写妓女的遭遇和不幸,光绪三十年(1904年),被译成英文,意曰《广州情歌》。此外,尚有八音、南音、唱西秦、唱大棚、锣鼓柜、唱叹头、盲公箏等等,或用于红白喜事、社戏、街头圩场演出,酒楼或沿门卖唱等,都有浓厚乡土气息,为各界人士喜闻乐见。不

过随着时代变迁,这些民间乐调,除部分为粤剧吸收外,大部分已经消亡。

潮汕地区歌谣也独具一格,在戏台、乡镇广场或田野演出的戏剧叫广场戏或跔脚戏、出街戏,为潮剧民间游艺形式,以历史人物故事为主题,拥有很多观众;潮州音乐,乃中原古乐与地方民间乐调相互渗透、承袭、整合而成,融汇了正字、昆腔、西秦、外江诸剧种的音乐,形成一套自成体系的音乐艺术,有弦诗乐、细乐、庙堂乐、笛奏古乐、舞台伴乐、“潮州汉乐”、锣鼓乐等演奏形式。潮乐弦诗曲牌达千首以上。潮州音乐诗调幽婉飘逸,音色细腻,韵味悠远,风靡闽语系地区,其中最富风俗特色的数潮州秧歌,亦曰拳歌。《广东新语·诗语》说:“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又吴震方《岭南杂记》曰:“潮州灯节、鱼龙之戏,又每夕各坊市扮唱秧歌,与京师无异。”秧歌从田头走向坊市,赢得更多观众,后来秧歌又称英歌,现在已演变成群体广场性民间艺术,每逢良辰佳节,都可听到震天动地锣鼓声,看到雄壮威武的秧歌队。

孕育于山区的客家歌谣,以山歌为代表,多用双关、比喻、重章迭句等多种表现形式,唱腔多样,形象生动,通俗易懂,音乐性强。读书人、耕田佬、贩夫走卒、劳动妇女,以及诸色人等,都可随唱不辍。诗人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题记》中写道:“瑶峒月夜,男女隔岭相唱和,兴往情来,余音袅娜,犹存歌仙(按:指刘三姐)之遗风,一字千回百折,哀厉而长,俗称山歌,惠潮客籍尤甚。”又说:“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

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岗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可见以梅县为中心的客家山歌在民间非常流行,而且有很高的艺术技巧和发展水平,后来随客家人迁徙,传播到广西、湖南、四川、台湾及至南洋等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容,如食粥,食饭,抽烟,喝茶都入歌了。此外,客家地区还有踏歌、采茶歌、月歌等。同样多彩多姿,流行于里巷、山野、田地之间。每逢中秋或元宵佳节,梅县还举办山歌擂台,让歌手们显露才华,哄动成千上万的城乡群众。现在,当地政府已决定将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定为“山歌节”,这一创举,将客家山歌的发展,引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轨道,成为一种新风美俗。

竹枝词也是流行于岭南的一种民间歌谣。竹枝词本出四川,后传入岭南,到清代已成为一派,称“岭南竹枝词”。虽然其中不乏文人雅士之作,但其源泉,仍在民间,故富于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情调。正如《羊城竹枝词·自序》云:“竹枝词者,风骚之流亚,里巷之歌谣也。……发自然之天籁,相题构意,曲曲传神。”实际上,各地民间歌手,都会从竹枝词中吸取有用养分,而竹枝词能在岭南自成一格,也离不开其他民间歌谣的滋润和影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和传播格局。

此外,还有流行于沿海各港的渔歌,以闸坡、汕尾为最盛,阳江县城有“渔舟唱晚”一景,过去为邑人的黄昏去处。清远有水稻抽穗扬花时唱的“禾楼歌”,是人们祈求丰收而唱的一种民歌;粤北山区有妇女爱唱的月姐歌,本为中秋节妇女聚会

所唱,反映妇女喜怒哀乐,建国后经过革新,已成为粤北民歌,一年四季,田间地头都有歌唱;雷州半岛有男女对唱的“姑娘歌”,内容过去是以劝世、颂神为主,有时也针砭时弊,现在则结合形势,成为农村宣传的一种方式,许多村庄建立歌台或对唱班,每逢喜庆之日,到处可见赛歌的热烈场面;在海南儋县则有受苏东坡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民歌,唱歌的姑娘称为“儋州妹”,个个风姿绰约,酷爱梳妆打扮,出则三五成群,居则在专供她们休息、娱乐用的“青年馆”里,保持着类似黎、苗族同胞的对歌择偶、赶情节等奇情异俗。民歌这股醇风,至今仍在儋县土地上荡漾。

3. 民间舞蹈 民间舞蹈是一种行为风俗。越人尚武,巫术流行,在拜祭神鬼或图腾时,动辄表现各种动作,以示对拜祭对象的崇敬。这些行为逐渐变异,有些发展为民间舞蹈。此后每逢神诞节日,人们都跳民间舞蹈,成为一种风气。

民间舞蹈在广东有非常古老的历史。屈大均《广东新语·神语》中有载:古时“祭无祀鬼神,祭日皆行傩(nuo)礼……傩用狂夫一人,蒙熊皮,黄金四目,鬼面,玄衣朱裳,执戈扬盾……,此乃古礼,虽孔子不敢违也”。有人认为,现在潮汕地区流行英歌舞,其前身就是傩礼,也是傩文化在潮汕的变异。宋代广州有“五羊仙”女子舞队,是根据广州别称五羊城的神话编成的。可惜“五羊仙”舞在我国已失传,却流传到朝鲜。朝鲜李朝议研轨厅刻印的进饌仪轨载有“五羊仙”图^[60]。清李雨村《粤东笔记》载:“正月饰儿童为采女,每队十二人,人持花盘,盘中燃一宝灯,罩以绛纱,以缀为大圈,缘之踏歌,歌十二

月采茶。”实际上,类似活动非常普遍,“岁时伏腊,酹钱祈赛,椎牛击鼓,戏倡舞像,男女杂沓”^[61]。其场面想必是很盛大的。

岭南民间舞蹈虽然与中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它很大一部分是上生土长的,即使不是岭南独有的舞蹈,经与岭南人民生活相结合,也具有了岭南风格,形成种类众多、道具齐全、形式生动活泼,自娱娱人,观众量大等地方特色。

动物舞蹈:古越人崇拜的图腾很多,此后各种奇形怪状动物在广东都得到重视,被赋予某种文化意义,成为民间舞蹈,风靡广大城乡。这些作为道具的动物,计有狮子、麒麟、凤、马、牛、鳌鱼、鲤鱼、貔貅、蜈蚣(百足虫)、狗、鹅、鸡、白鹤等,其种类之多,式样之繁,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无与伦比。据1982年调查,在全国205个道具舞中,狮舞有61个,龙舞有35个,几乎占一半。龙舞起源于古代南方人求雨,《山海经·大荒东经》载:“应龙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常言“龙马精神”、“龙腾虎跃”,表现了人民意志,充满了生命力和美感,所以龙舞受到人们普遍欢迎,有五华钱龙舞、新会沙龙舞、中山醉龙舞、五邑紫来金龙舞、四会蕉叶龙舞、丰顺火龙舞、大埔乌龙舞、佛山草龙舞、乐东龙头舞、陆丰龙香舞、梅县板凳龙舞、阳江鲤鱼化龙舞、清远龙狮舞等。狮子虽不是岭南越人图腾,但却是百兽之王,民间传说中的瑞兽,象征威武雄壮,驱邪镇魔,保上安民,被广东人誉为醒狮。人们以舞狮为风尚,竞争高下。醒狮舞有南北两派之分。北派狮小,酷似真狮,适宜在舞台、广场等固定场所表演,而广东狮属南派,狮体雄大,重在狮头,表演者两脚着地,

灵活多变,可不择场地,甚至挨家串户都可表演,还有单狮和群狮之分,按表演需要组合。表演有吃青、醉青等过程,有醉有醒,象征东方古国猛醒、重振神威,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精神。广东各地都有醒狮舞,但以佛山醒狮最为著名,佛山祖庙是一个经常性舞台。舞狮和舞龙常伴以锣鼓和各种武术表演,形成极为热烈的气氛。李雨村《粤东笔记》描写广东清代新年民间歌舞盛况:“城内外舞狮象龙弯之属者百队,饰童男女为故事者百队,为陆龙船,船长者十余丈,以轮旋转,人皆锦袍倭帽,扬旗弄鼓对舞。”龙舞和狮舞都是广场舞,可容成千上万观众观赏,故得以哄动城乡,成为大众舞蹈。

其他动物舞蹈都有其深层文化意义。例如凤舞和麒麟舞,在我国很多地方已不多见,广东却比较流行,以东莞、增城、宝安、从化、花县为盛。凤为虚拟的鸟类,商民族图腾,有神鸟之称。麒麟也是传说中的瑞兽,民间有麒麟送子之说,表现人们祈求人丁兴旺之情。属于这类动物舞的还有电白、番禺的鳌鱼舞,阳江、大埔、梅县的鲤鱼舞,粤北地区的春牛舞,东江客家地区和粤西吴川一带的貔貅舞,汕头的蜈蚣舞,澄海的狮头鹅舞,增城、龙门的火狗舞,以及粤北、新丰、龙门、兴宁、五华等地的纸马、布马舞等,都很有技艺特色。

宗教舞蹈:越人笃信鬼神,宗教对他们有很大诱惑力,祭神驱鬼仪式往往演变为宗教舞蹈。这类舞蹈历史悠久,动作古怪,充满了原始性和神秘性。例如“跳岭头”舞,明代广东方志载:“八月中秋,假名祭报,妆扮鬼像于岭头跳舞,谓之跳岭头,男女聚观唱歌互答,因而淫乐,遂假夫妻父母兄弟而生,恬不

为怪”⁶²。大抵各种宗教都有其舞蹈,道教有“鲫鱼穿花”舞,其他教有“跳娘”、“招龙”舞、长鼓舞等。这些舞蹈虽然带有不少封建糟粕,但毕竟是祖先创造的,也有其表现人民愿望的一面,故得以为人们所接受。随着社会前进,宗教舞蹈也得到改造,有些已旧瓶装新酒,成为今天的流行舞蹈了,例如“鲫鱼穿花”发展为“织女穿花”。今天“跳岭头”和长鼓舞和古代“跳岭头”和长鼓舞的内容、精神面貌已不一样。

生活舞蹈:舞蹈来源于生活,古人在《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这也包括了民间舞蹈。人们在生活、劳动中有所感受,使用动作表示出来。这类舞蹈无论古今都占很大比例,如古代粤北的采茶歌舞、海南八音舞、海丰渔民娶新娘、蛋民桃叶舞;西江地区的跳禾楼;现代跳春牛、打鹿舞、舂米舞、钱鼓舞等,都拥有广大观众。

在反抗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广东人不但继承,而且加强了越人尚武精神。过去乡村城镇武馆林立,农闲、夜晚练习成风,刀舞、棍舞、剑舞等也属民间舞蹈。潮汕地区英歌舞就是表现梁山泊英雄好汉的舞蹈。现在这种反映尚武精神的舞蹈逐渐与体育活动相结合,兼有了健身作用。

据 1982 年调查,广东民间舞蹈共 506 个,地区分布是:广州 11 个,汕头地区 87 个,海南岛 82 个(含黎苗族地区),韶关地区 103 个,湛江地区 36 个,佛山地区 30 个,肇庆地区 49 个,惠阳地区 68 个,梅县地区 40 个^[63]。看来是韶关、汕头和海南地区民间舞蹈比较丰富,一些著名的民间舞蹈多产生在这些地区,如汕头地区英歌舞、钱鼓舞,韶关地区闹花灯、采茶

歌舞、海南八音舞等。但凡舞蹈分布多的地区必有相当深厚的群众基础。

4. 民间技艺 包括民间竞技、游艺、游戏、工艺、体育活动等内容,充分表现在民间游艺和各种表演会上。在广东这些活动多与岁时节日活动相结合。

作为宗教活动的一种形式,醮会、庙会也是一种群众性游艺活动,过去各地多定期举行。广州地区各种诞会均有建醮演戏之举,如三月天妃会、重阳节设醮禳替,八月华光醮;佛山“岁三月上巳,举镇数十万人,竞为醮会”^[64],此外,潮州、高州等地都有春天打醮活动,打醮事毕,往往又抬神出游,沿途村落设供,掀起更大宗教的狂热。不过这种风俗建国后已被制止。有关庙会,亦转向举办健康有益的文娱活动,并与婚姻介绍、旅游、商业集市等相结合。广州二月波罗诞,过去有“先游波罗,后娶老婆”之谚。这种传统风俗活动,正被引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轨道。

群众性游艺活动,还包括工艺品大展览,以及歌舞表演等综合性活动,这在广东也很盛行,著名的有佛山秋色、番禺沙湾飘色、紫泥春色和市桥水色等。它们共同之处都是取材于历史故事,构造不同人物造型,配合彩车、舞蹈、锣鼓等,吹吹打打,成为群众性大游行,同时展出各种精美工艺品,乡土气息至为浓厚,场面也很壮观,吸引大批游人观赏。例如1982年秋,佛山举办一次秋色活动,历时4天,约1700人参赛,出游展品1700余件,十里长街,被挤得水泄不通,计从广州、港澳和海外赶来观赏者达90多万人。1983年春节沙湾飘色在广

州举行,游行队伍长达 2 公里,历时数小时,观众达 90 万人。市桥水色在水面木筏上表演,规模也不在其他游艺活动之下。这些活动,都有很悠久的历史,明清时甚盛,这当然与珠江三角洲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文化兴盛有很大关系。

岭南人的尚武精神,还表现在一些游戏和体育活动上。各地多有自己特有的项目,如佛山、阳江九月放纸鹞,粤西一带打飞砣,海南、潮州打秋千,有的地方则盛行拔河、武术等,这些活动多在农闲或茶余饭后进行。但是其中有些活动亦属陋习,例如打飞砣,双方以抛掷石块、对垒攻守为乐,头破血流在所不惜。这种尚武精神,倘被引入歧途,即会成为一种陋俗。粤西等地一些农村,械斗之俗至今仍然存在。据报道,吴川县板桥镇杨、易两姓械斗持续百余年,建国后发生 38 次,伤 227 人,18 人被判刑,两姓居民互不对话、通婚和通商。又遂溪黄略、文车两村 1991 年 5 月 21 日发生大规模械斗,双方均有伤亡^[65]。此等陋习,当在革除之列。

第二节 汉区风俗文化群落

民俗文化有其空间结构形式,即民俗文化群落。它是由相同或相似的风俗文化整合而成的一个统一的丛体或群体。不同群落在地域上是连续的,但风俗景观却是有差异的。划分民俗文化群落是民俗地理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区别的主要根据之一。

根据上列民俗文化特色,同时结合语言差异,广东汉区可

分为广府风俗文化群落、客家风俗文化群落和福佬风俗文化群落。而广府地区内部语言差异较大,可再分为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粤西岭谷台地和粤北山地丘陵风俗文化群落。

一、广府风俗文化群落

本群落的分布范围与粤语方言区一致,与西汉南越国疆界也大致吻合,是广东民俗文化主要代表地区。因为客家民俗文化并不为广东独有,在江西等省区也占相当比重;而福佬民俗文化应以福建为代表,这就决定了广府风俗文化群落在广东的特殊地位。

1. 珠江三角洲风俗文化群落 包括广州、南海、番禺、顺德、中山、珠海、东莞等县市,乃粤语方言核心地带。广州人的很多风俗是从土著风俗传承下来的。其中最典型的是善水,使用舟楫,嗜食水产等,从西汉《淮南子》到清初《广东新语》都指出越人这个特征。而“不落夫家”,缔结“金兰契”,以及着黑衣,束髻,不嫁,独身终老的“自梳女”风俗在全国中显得非常特殊,这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以顺德女子为代表的自强不息的气质和品格,仍在现代生活中表现出来。

越俗尚鬼敬神,此遗风在珠江三角洲很盛,一是祠堂庙宇多,有“顺德祠堂南海庙”之谚,甚至一些怪石、巨树也成为崇拜对象。过去一般家庭供奉多个神祇,例如人门有门官,院子有天神,堂屋有观音、白帝、天后、华光、关帝、金花、马王等神;住房有阿婆神,水井有井神,厨房有灶神,厕所有紫姑神。

此外,还有吕神、紫微神等。万历《顺德县志》云:“俗以祠堂为重。”屈大均《广东新语·宫语》说,广州“其大小祖宗弥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据嘉庆《龙山乡志》载,龙山一乡就有家庙 200 余座。二是迷信风气很重,过去每个家庭每天烧香一次、两次或三次,神诞每月至少一次,多达七次,如白衣观音诞、土地诞、张王爷诞、关帝诞、耶稣诞等。现在神诞已经不多,但节令和每月初一、十五,许多家庭仍保持烧香习惯。

珠江三角洲又是疍民(水上居民)集中的地区。疍民操粤语方言,光珠江口附近,1949 年达 20 万人,现仅余 10 余万。他们是一部分很古老的居民,有自己独特风俗。以舟楫为家,捕鱼、摆渡为生,自相婚配,不与岸上人往来,笃信神鬼,甚至见溺水者不救,不过现在很多疍民已在岸上定居,一些陋习亦已有革除。

珠江三角洲为粤菜代表,当地人继承南越人杂食风俗,吃蛇、狗肉、水产等,各种风味小食数不胜数。除了广州,顺德大良,即凤城食谱也驰名中外。早在本世纪 20 年代《中华全国风俗志》已指出,“广东(实指广州)之酒楼,可谓冠绝中外。其建筑之华美,陈设之幽雅,器具之精良,装潢之精致,一入其中,辉煌夺目,洵奇观也”。⁶⁶。但近年香港旅游业崛起,“食在广州”有被“食在香港”取代之势。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三角洲各地茶楼酒馆林立,装饰豪华,饮食文化高度社会化、商业化,越来越多人走出家庭灶头,此风之炽,在全国中无与伦比。

作为广府风俗文化的代表,珠江三角洲人性格开朗,较易接受新鲜事物,包括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夜总会、歌舞厅等在三角洲城镇中很普遍。人们商品意识较重,迷信命运的心理也较普遍。这里敬神事鬼风气比客家、福佬民系更加突出。由于优越的经济地位和强烈的乡土观念,以及受海外文化影响较深,珠江三角洲人容易形成自满自足的优越感。

2. 西江流域风俗文化群落 东起三水,西迄广西梧州一带,包括以西江干流为轴线,各大小支流覆盖的地区。西江是两广交通要道,受广西壮人影响较深,道光《肇庆府志》云:“僮性质粗悍,露顶跣足,花衣短裙,自耕而食,又谓之山人,出湖南溪洞,后稍入广西,佃种荒田,聚众稍多,遂蔓延入广东,……与瑶人无异矣。”^[67]特别是西江地区地形复杂,古代壮、瑶与汉杂居,相互浸染,风俗上留下很多民族遍迹。例如语言就很复杂,即使乡与乡之间,虽近在咫尺,语音亦有别,通话困难。在怀集与封开交界的忠觉山周围,凡65乡14万人讲“标话”,保留有很多壮语成份,与当地操粤语方言的居民难以通话。因此各地风俗,必有小异。如上述“标话”地区,古代多为壮人居住,至今农历节日有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等。青年人喜欢对歌,服饰也别具一格,年轻姑娘基本上穿蓝衫,用红绒线扎辫子,还流行类似抢婚、不落夫家的遗俗。甚至岁时节令,各地时间也不尽相同,如端午节,在怀集就有四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五月初一、初五者。过去“占年用鸡卜”^[68],显系越人遗风。晚稻收毕,架木为棚,堆放草料,又为“干栏”变异,又歌舞取乐,曰“跳禾楼”,与越人善歌舞不无关系。据研究,西江

流域文化特质,至少有二三十种与粤北瑶族相同或相似^[69],民俗地理差异颇大。

西江流域水网稠密,水患严重,遍布大小龙母庙。农历五月初八为龙母诞,祭拜香火很旺,于今不减。龙母,实乃母系社会西江越人首领。龙本为图腾,后龙母上升为水神,作为人们的保护神,这与西江地理环境有关。

3. 粤西岭谷台地民俗文化群落 东起史称四邑(今称五邑)西抵广西钦州和合浦地区,包括潭江、漠阳江和鉴江流域,相当两汉合浦郡,即六朝到隋高凉郡疆域。据《隋书》和《新唐书》等记载,直到隋唐时代,这一带为俚人主要居地,因这一带“山丛上厚,溪洞联中,(冯洗)据三世跨八州之地,形势使然也”^[70]。时至今日,其民俗文化仍与珠江三角洲土著文化不同。俗重铜鼓,是广东铜鼓分布最广的地区,与广西流行北流型铜鼓风格相同,所谓“粤俗嘉礼,必用铜鼓以节乐”^[71],主要指这一地区。其语音翘舌,有边音,两阳与四邑,语言难通。另外“诸县中间有一二乡落与嘉应语音类者,……其余彼此相通矣”^[72]。明清客民人居,造成风俗杂错现象。

粤西是俚人首领洗夫人的根据地。洗夫人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上有过重要贡献,深受当地人崇拜,故洗夫人庙宇特别多。过去粤西一带乡民,事无巨细,都到洗夫人庙祈求庇佑或乞示,有关洗夫人的故事、传说至今仍广泛流传于群众中。这一带盛行二次葬,在山坡路旁,金罍至为触目。哭嫁也很流行,买卖婚姻,甚至童养媳制也有所闻,不少妇女现仍留髻,亦乃俚人椎髻遗风。

粤西食粥甚为普遍,不亚于潮汕地区。居民日常用具也颇特别,抽烟时使用很长的水烟管,曰“大碌竹”,谓可滤烟,不燥,与其他地区使用铜管水烟袋不同,但原理一样。沿海居民,喜用银质裤练,妇女喜戴铜鼓帽,适应沿海水咸、风大、炎热的地理环境。

3. 粤北山地丘陵风俗文化群落 北界曲江、乐昌,南与珠江三角洲接壤,西抵怀集、广宁,与西江风俗文化群落分界,主要包括北江中上游地区,可以说是广府风俗文化群落的过渡地带,其风俗颇受客家风俗文化影响,兼具两个群落特征。从化县吕田区就是一个典型。那里居住着操粤语方言和客家方言两个人群,前者乃土著居民,仍保持古越人的古装古俗。例如妇女梳髻于脑后,穿裙子,白纱巾束腰,戴大耳环,以及残存不落夫家的遗俗等。而后者则保持客家人特有的风俗文化。这两种民俗并存,恰是过渡群落的表象。

粤北毗连湖南、江西,故风俗颇受其影响,唐刘禹锡任连州刺史时说:“观民风与长沙同祖习”[73]。明代南雄“地近荆衡,俗与韶同”[74]。到清代连州,“州界荆湘,山近韶石,故其风俗好尚,多与相类”[75],例如饮食嗜辣,喜用茶油和烟熏鱼肉,食干饭多于食粥。民性淳朴,不事奢华,但迷信习气较重,甚至给人命名也深受此俗影响。有人作过统计,粤北古昔命名来源有21种,其中对观音菩萨、佛、其他神明、天主、日、月、水、井、灶神的崇拜,以桥、树、石压邪,以及与狗、牛图腾崇拜有关者,凡16种[76],诸如观养、佛保、神赐、天寿、日灵、月保、盛福、树基、水养等,皆表现了粤北人这种心态,不过现在这种风气已

日趋淡薄。但早婚,讲究风水,以及二次葬等在山区仍是较常见的风习。

二、客家风俗文化群落

本群落主要分布在东江流域和兴梅地区,其在粤北则与广府风俗文化群落杂处,在粤东又与福佬风俗文化群落相交错,其散处地区非常广泛,遍及全省山区,在广州直抵郊区从化和花县,与客家方言分布地域相一致,是占地较广的一个群落。客家风俗文化特质虽然与中原世胄有些相同,但客家人来岭南既久,受土著风俗影响颇深,其原地的风俗也发生变化,所以其作为一个独立民系,风俗文化的特殊性毕竟是首要的,也就能够自成一群落。

客家风俗文化的作用力是华夏传统文化意识,即重教化,扬家声,不同于广府风俗的商品意识,加上客家人地处闭塞贫困的内陆山区,非艰苦奋斗无以图存,所以客家风俗一个最大特点是崇尚读书,尊师重教,以读书上进为荣,不读书,不识字为耻,外出求学蔚为社会风气,尤以梅县为甚,被誉为“文化之乡”。除了读书,其他人看不起的各种职业,客家人往往干得很起劲,并颇有成就。过去广州的理发师几乎全是客家人,现在流行于各地的石匠、钟表匠,以及其他手工艺者,很多也是客家人。

客家男子多外出谋生,妇女承担田间和家庭一切重活,从驾驭耕牛,犁田耙田,插秧、割稻、打稻、挑担,无一不能;在家

庭种菜、养禽畜、煮饭、教养小孩，样样皆精；出野外，上山打柴，挑百斤重担如履平地，不让须眉。天下妇女劳逸尚分贵贱贫富，而客家妇女，即使家庭很富有，也照样参加各种劳作。此风此俗，恐为很多地区所鲜有。客家妇女极少缠足，平时不事修饰，一顶遮挡烈日暴雨的黑纱边（也有蓝色或白色）凉帽，为客家妇女特有的标志。

客家妇女这种特殊地位，又表现为客家人从不卖女为妾或当继室。过去做母亲的宁可溺死女婴，也不愿她们长大给人当奴婢，故有些地区有一家养女不超过两个的风俗。过去客家地区童养媳风俗很流行，现在仍有残余。

客家人聚族而居，“俗重宗支，凡大小姓，莫不有祠，一村之中，……必有家庙”〔77〕。过去客家人很迷信，诸事都请神赐示，家有门神、灶神、伯公神；公共神有城隍、关帝、文帝、观音、吕祖等，此外，还有众多年节神。由于迷信而惑于风水，“粤俗本尚堪舆，嘉应于风水之说尤谬执而不通”〔78〕，故客家地区很重视丧葬，二次葬至为流行，金罍、阴屋景观很普遍，又“俗不论士庶之家，妇女墓皆书孺人，……男子墓碑称公”〔79〕，这点与中原葬俗一脉相承。艰苦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形成客家人乐天、豪放、浪漫的性格，由此产生的多彩多姿的山歌，成为客家人的典型民俗，同时造就客家人的尚武精神，过去乡间多设武馆，延师教习，练习拳术和诸般器械，连妇女头发上也插二三支尖锐的髻簪（今则一支），以防止当地土著欺负或非礼。现在这种尚武风俗已渐渐变为各项群众性体育活动。

客家人困处山区，乡人多于农事之余，以狩猎为业。秋冬

季节,三五成群,带犬入山,多有所获,此乃客家人到岭南后养成的风俗。

客家男女最爱整齐,在主客杂居的地区,看衣着干净与否就很容易把客家人区别出来。即使最穷的人,除非万不得已,每天必用热水洗澡,而浴室就在灶门口,夏天也不例外。

客家人劳动量很大,故必咸食,口味浓重,主料突出用肉类多而水产少,以砂锅菜见长。代表性风味佳肴有东江盐焗鸡、酿豆腐、牛肉丸、炸春卷、梅菜扣肉等,既保留古代中原烹调法,也有现代地方特色,尤适于北方人口味。

三、福佬风俗文化群落

本群落主要分布在广东沿海地区,东起潮汕和海、陆丰,西南过中山市五桂山区后,即越过珠江三角洲,散处于粤西地区,最后经雷州半岛跨海进入海南岛东北部、东部和南部沿海,乃闽南方言分布区域。

福佬民系是古闽越(东越)后裔融合于汉族的一支,其文化特质既有别于作为南越遗裔的广府民系,更与中原汉族世胄的客家民系迥异,具有丰富的风俗文化内涵,且对东南亚诸岛土著文化产生过显著影响,乃广东风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群落。另外,“潮州为闽越地,……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80],所以本群落又是闽语民系风俗文化大群落的一部分。

福佬人所在地区,地狭人稠。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很大,不堪负重的人口压力迫使大批人外出谋生,成为一种强烈的

社会风气,培养了他们较强的商品意识。福佬人极善经营,颇有创造和开拓精神,不少人远涉鲸波,到海外谋生。过去“潮州帮”商人与“粤商”一样驰名远近。近年广东商品经济发展起来,福佬人特别活跃,足迹遍及各地城乡,渗人各行各业,大有驾于广府人之上的趋势。

福佬人与广府人主要分布在平原上,以稻米为主食,但烹调习俗不一样,广府人以食干饭为主,稀饭为辅;而福佬人却相反,以稀饭为主食,有些地区还混以番薯,若无稀饭便感到欠缺,白粥也上宴席,这是其他地区罕见的。福佬人食物多取于海洋,生蠔、生鱼、生虾之类为至味,烹鱼不去血,食蛙兼啖皮,食狗食猫,杂食之风,不减于广府人。潮汕菜式,博采闽、江、浙、粤菜之长,也自成一格,著名菜式有明炉烧海螺、护国菜、绉纱甜肉、沙茶牛肉、烧雁鹅等。其他风味小食,遍及市井大排档间。但福佬人饮食风俗最具地方特色的是工夫茶。这是一种饮茶艺术而不是一种茶。从茶叶、茶具、茶炉、泡茶用水到泡茶饮用都极讲究,有一套独特工具和高超技巧。所用茶叶必须是半发酵茶,茶壶精致小巧,以宜兴壶为上,并垫以瓷盘,沏茶以泉水为佳,井水次之。水烧开后,先烫洗茶壶,再放茶叶,冲茶必须高冲低洒,括沫淋盖,烧杯热罐,澄清滤歹,然后慢条斯理地品茶。完成这一套程序,颇费工夫,故有其名。清人翁辉东《潮州茶经·工夫茶》云,产茶区“如龙井、武夷、祁门、六安,视其风俗,远不及潮人之风雅”,举饮茶一项,“潮人习俗风雅,举指高超,无论嘉会盛宴,闲处家居,商店工场,下至街边路侧,豆棚瓜下,每于百忙之中,抑或闲情逸致,无不借此泥炉砂

铫，擎杯提壶，长斟短酌，以度此快乐之人生”。这段文字充分表达了福佬人饮茶的民俗美、艺术美和程式美。

福佬人原居闽浙，迁人潮汕，换了环境，初时对自然力充满了恐惧和崇拜，因此祭神活动遍及千家万户。祭神对象除岭南共同神祇以外，还包括天地、日月、星辰及各路神仙，约 30 余种。如正月初九拜天恩公，三月十九拜太阳公，每月初二和十六拜地主爷。奉祀神明更复杂，来历不同，名目繁多。举凡三山国王，元天上帝，协天大帝，天后娘娘，安济圣公等，岂只群众性具牲礼朝拜，还配合以规模巨大的游神活动，所到之处，家家设坛摆供，有时连闹数日，费资甚巨。这些享受祭拜的都属为人消灾降福的所谓“正神”；另一类既无神名，也无庙宇，但无处不在，只要人们感到厄运将临，就会被启示临时设祭，向这些凶神恶煞赔情，把他们送走，人们才放心。这些活动现在不仅在国内福佬人中开展，而且还联系着数百万闽南语系侨胞，也是他们心连故土的一种纽带。故每有这些活动，他们有的解囊资助，有的不远万里回来参加。当然，这些活动也不无陋习，但堵塞不如开导，风俗力量目前还是很强大的。

福佬地区流行二次葬，当地称贮骨瓷罍曰“金罐”，扫墓在清明、重阳或冬至进行。过去厚葬风很盛，每为争夺坟田风水引起械斗，地方政府都无法制止。另据乾隆《潮州府志·风俗》记，“其细民火葬，轻生，疾病辄饮水，重巫覡，轻医药”。其中愚昧陋习不足取，但火葬却值得发扬，比二次葬实胜一筹。

福佬男子常在水中作业，为活动方便，遮阳布每用上腰布方式，长约 2 米，宽 40 厘米，当地称为水腰布，广州叫“潮州

布”，亦可作汗巾用。据说，潮汕水腰布渊源于当地妇女头巾，古代潮州妇女与岭南许多地区妇女一样，以头巾为遮面饰物，民国《潮州志》说此为韩愈贬潮遗制，故曰“韩公巾”。“五四”运动反对封建旧俗，潮州妇女戴头巾习俗被革除，但为男子作为时兴沿用，发展为水腰布。其实我国东南沿海人民亦有用腰巾习俗，乃古越人遗风，东南亚一带居民也有类似腰巾。但不管怎样，水腰布仍是福佬人一种标志。

第三节 少数民族地区风俗文化群落

风俗文化是民族识别标志之一，也是民族文化一部分，对少数民族有特别重要意义。广东少数民族绝大部分是在岭南土生土长的百越人后裔，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由于种种原因，形成了各民族不尽相同的民俗风貌，在地域上自成一单元，构成为广东风俗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黎族风俗文化群落

聚居在海南五指山区的黎族，是骆越从大陆进入海南的一支，经过二三千年的民族融合，演变而成的民族群体。在热带地理条件、封闭海岛和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等因素作用下，形成了带有浓厚越族遗风的风俗文化群落。

越俗断发文身，以适应热带和亚热带环境。因为文身有利于在水中作业和游泳，有利于防止水中生物伤害。黎族继承了

越人这种习俗,从远古一直保持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有二千多年历史,至今仍有残余。文身者绝大部分是妇女,也有男子,不过图案比较简单。文身多在肌肉出露部分,如脸、颈、手、脚等,容易为人看见。据调查,文身图案斜纹类几何图形有 27 式,如单直线、双直线、曲线、圆线、三角形等,横纹类有 17 式,圆纹类有 25 式,文字类有 17 式共 86 式^[81]。当地人认为,文身一可补充衣服花边花纹,扩大衣边美观;二可摹拟衣服花纹,手镯、戒指、颈练等饰物。黎族分多个支系,文身式样又成为各支系的标志,同时还有图腾、护身符篆和婚姻等意义,被视为一种道德美和氏族美。

适应海南湿热气候,黎族喜穿“贯头衣”,类似今天的文化衫和“T”恤衣。西汉初汉人初履岛上,即见当地“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82],这也是骆越风俗之一,这种贯头衣现仍见于越南地方山民。黎族妇女的贯头衣刺绣以光泽丝线,工艺也很高超,色彩鲜明和强烈对照,更显示热带风光的特点。妇女喜穿筒裙,有棉和麻制的,分短筒和长筒两种,染成不同颜色,刺绣很美丽,有时还镶嵌各种饰物,更显得楚楚动人。黎族男子唯有美孚一支穿短裙,长不过膝,与南洋“沙笼”和苏格兰人短裙相似,仍属热带裤式。黎族其余裤式以“包阳布”为代表,用两块布片包男子阳具而得名,黎语称为“夹屎片”,或“Sen Pan”,有如现在的三角裤。海南炎热,劳动时男子多赤膊,衣服反而成为身体散热的障碍,包阳布把衣服减少到最低限度。建国后黎族生活水平提高,穿包阳布的人少了。但在山区劳动,黎族男子仍喜欢穿它,表明包阳裤式是适宜热带地区

穿着的。

黎族只有传统农业，粮食不足，饮食爱稀不爱干，习惯冷食，也适应炎热气候。蔬菜甚少，常以野菜代替。家庭畜牧业不发达，野生动物是肉食的重要来源，包括兽类，以及蛇、蟹、蚱蜢、蜂蛹、蚊卵、螺、蝉等。烤鼠肉是一道便菜，苏东坡父子在海南不止一次尝过其滋味。还嗜食腌制的生鱼生肉，其味酸，为待客佳肴，苏东坡诗云：“蛙蜍与蚺醢，敬我如族姻。”有一种在火堆里烤熟的“竹筒饭”，风味独特，也是待客上品。此外，黎族妇女嗜食槟榔，齿、唇皆被染成红色，很容易从人群中被识别出来。槟榔还是当地婚嫁的必备礼品。黎族男女都好烟，使用“大碌竹”吸食，与南路吸烟习惯一样。

黎族生产落后，自古就有集体狩猎习惯，所获猎物，实行见者有份分配，乃原始公社残余。苏东坡在儋县，“夜闻猎声，旦有馈肉香”。现在一般是个人在冬闲狩猎，但有时也以村为单位进行，尤其春节都要举行一次这样的集体活动，显示着一种民族凝聚力。

黎族退入封闭山区，越人一些习俗被相沿下来，长期没有多少改变。例如鸡卜，用于预测吉凶，决断疑难；未婚青年男女放寮（夜游），早婚及男大女小，不落夫家等。由于文化落后，迷信风气甚盛，普遍相信巫术，各种禁忌特别多，不过现在一些陋习已被革除。黎族继承粤俗好歌传统，能歌善舞。对歌是青年男女抒发感情、择偶的重要方式，东方、通什、三亚等地举行三月三日歌舞活动，就是黎族苗族民俗文化的一次大检阅，每年都吸引大批海内外人士前来采风探胜。

黎族对死者实行一次土葬,有些地方对麻疯病死者实行火葬。土葬有一套复杂的仪式和程序,虽然比广东一些汉区实行二次葬费用要少,但铺张浪费之风也很盛。按黎人风俗,死人安葬一段时间以后,要做佛事,当地称“作八”,一般扎制灯笼、纸马,杀猪宰羊,求鬼祭神,大事吃喝,参加者少则数十,多则上千人,甚至素不相识者也可参加,活动持续短则几天几夜,长达二十余日或一二个月,形成悲喜交集的场面。据《三亚市通讯》第十三期报道,该市育才乡五个村,1983-1985年,发生“作八”做鬼事件923宗,约27万人参加,杀牛16头,猪9520头,羊1067头,鸡不计其数,吃掉大米27万斤,酒15万斤,折合人民币约81万元^[83],给当地群众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也诱发很多社会问题,是一种很不良的风俗。

二、苗族风俗文化群落

广东苗族现约3.6万人,分布在海南岛。大部分分布在琼中、保亭境内,少数散见于其他县山区,形成大分散、小集中分布格局,其风俗文化群落亦如是观。

海南苗族是明代从广西作为军队调进岛上的,子孙繁衍下来,已历四百余年。平地早有主人,无法立足,故苗族多生活在深山穷谷之中,与外界隔离起来,保留许多浓厚民族风尚。妇女穿贯头长衣,下着短裙、束发、包头巾、赤足、打裹腿,适应游耕生活,便于在树林、荆棘中穿行,防止虫蛇伤害,另也是初来时征夫形象遗风;男子仅后脑留一撮毛,其余剃光,用长头

中缠绕。苗族也嗜好酸鱼肉，喜抽烟和喝酒，烧竹筒饭，善对歌，普遍采用草药、火炙等方法治病等。

苗族进入一个新地理环境，自然会遇到许多困难，故特别崇拜祖先，希望从祖先那里得到帮助，祭告最勤。此外，还信仰墓主仙公、墓主仙婆、山鬼、帝鬼、海龙王、土地公等，每次砍山、狩猎，都要向他们祈拜乞示。苗族与黎族长期共处，相互影响，在婚姻、节日、生育、丧葬和其他生活习俗方面，两族颇多相似之处。

三、瑶族风俗文化群落

广东瑶族历史很古老，隋唐以前主要定居在粤北，明代据有以西江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此后又退居粤北和零散于其他山区。现在瑶族分排瑶和过山瑶两支。排瑶聚村定居，主要集中在连南；过山瑶居无定所，流动分散，见于粤北、粤西、粤东等山区，两支人数约 10 万人，是广东地区分布很广的少数民族。广东瑶族虽是全国瑶族一部分，但其民族文化各个层面都与其他省区瑶族不同，风俗习惯也不例外，故作为一个风俗文化群落，也极有地方特色。有幸的是，建国后连南、乳源瑶族和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建立，为保存和发展瑶族风俗文化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瑶族分散于崇山峻岭间，往来困难，互不统属，过去地方政府也鞭长莫及。俗以血缘为基础，选出长老处理公众事务。建国后瑶老制已不复存在，但老人却得到尊重，丧失劳力时，

子女自觉地承担照顾父母生活的责任。瑶族世代相传的这种美德至今仍维系着瑶族社会人伦关系。另外,舅父对外甥有监护的权利和义务,外甥发生各种事情,包括婚嫁、丧葬、生育、纠纷等,都得请舅父处理。瑶族这种视外家为本源习俗是其他民族罕见的。

瑶族人热情好客,即使在严行民族歧视和压迫年代里,瑶汉人民之间仍亲密往来,有认同年、伙计之谊。瑶人对客人先敬酒,后唱“敬酒歌”,使人们有宾至如归之感,特别是上门的汉族医生、教师,被视为嘉宾。

黎族放寮对歌求偶,瑶族则以唱歌方式恋爱,叫讴莎瑶。瑶族流行单偶婚,即以在排(村)内择偶为原则,无论男女,都有老少匹配现象,甚至可差20岁以上,同时普遍存在收继婚,即翁媳、(后)父(继)女、婶侄之间以及兄终弟及,姐去妹继等婚姻结合,再婚的人数也颇多。这都是一种严格的地域内婚,其一是因瑶人聚居村寨彼此孤立,择偶机会少;其二是由瑶人以土地作为妆奁,不能带走所决定的。此外,瑶人也有不落夫家的风气,不过现在在娘家的时间越来越短了。瑶人还流行入赘风俗,尤以过山瑶为盛,男嫁女家,第一个子女随母姓,第二个随父姓,如此类推。此外,瑶人名字长而怪异,一个人的命名包括其祖宗、父亲、本人名字、姓氏和身份等项内容,并随着婚嫁、生育、死亡等变化而更改,一般男子一生要举行四次,女子举行五次命名礼,姓名长可达六七个字,如有叫唐因努亚里莎一岔者。这种命名风俗,反映了瑶族社会宗法关系和族内婚制一脉相承,男性权威和

女性的依附地位。

瑶族没有文字,只能口头流传本民族历史。时间长久便加进不少神话成份,渐渐发展为民族节日或娱乐风尚,除与汉人相同的春节、清明等主要节日以外,每隔三年举行一次小歌堂、五年一次大歌堂,举行盛大游神、斗歌等活动,为瑶族最隆重节日,每年还有狂欢节、迎春节、许愿节、赛土神节等。

瑶山的秀丽风光和游耕生活,陶冶了瑶人崇尚自然美的风俗,男女留长发、束髻,一律穿裤而不着裙,扎上裹腿,也为了适应山地生活环境。瑶人个个善于以自然物装饰自己,如山花、白鸡毛、野雉羽,还有金属项圈等。妇女更爱打扮,盛装之下,别有风韵。插上这些自然饰物,不仅视为增添秀丽,而且还是不畏强暴的象征和鸟图腾等崇拜遗迹。

过山瑶经常游动,没有种菜习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都喜欢吃腌制酸菜,而瑶族却例外。平素以米饭、薯蕷、玉米为主食,菜则为狩猎或采集得来野生动植物,嗜好烟酒,更喜食辣椒,但禁食狗肉羊肉。这与瑶族图腾崇拜有关。

劳动使肢体受污染,养成瑶人每天天夜人黄桶沐浴的优良习惯,即使寒冬也乐而不辍。由于频繁迁移,瑶人都使用卷轴神像,一般不建庙宇,这都符合游耕生活的需要。瑶人也迷信神鬼,将一切灾害疾病,归之于鬼魍为祟、神灵降罪,但建国后经科学宣传,此习渐有改变。

瑶族丧葬方式也很特别,以先死者为老,年老的可为年青死者送葬。连南八排瑶实行一次屈肢葬,死者临终被移至堂中,死后由长子背或用椅子抬至墓地安葬,是广东目前唯一实

行屈肢葬的民族。据说这种葬式能保持像胎儿在母腹内的样子,象征人死后灵魂可回到出生地胎里边去,而过山瑶则实行与汉人一样的葬式。

四、壮族风俗文化群落

广东壮族仅 3.5 万人,是明末从广西入居粤北的,现在主要集中在阳山,少数在怀集,但与之相邻的广西,却是壮族的最大居地。壮族是岭南最古老民族之一,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原来作为越族一支的原始风俗已经淡化,但现存的风俗材料仍可组成一个独特的风俗文化群落。

广东壮族居地,处在群山包围的一些盆地中,当地称为坳。那里水源充足,土地肥美,气候温和,一方面利于民族繁衍发展,另一方面又使之与外界隔离开来,保存某些古越族风情。

壮族是多神崇拜民族,尚鬼神巫,包括鸡卜,叩拜祖宗以外的形形色色神灵,诸如路边古树,山上巨石,险峻山峰,以至飞禽走兽等,都被赋于某种超人力量加以崇拜。在日常生活中也诸多禁忌。直到今天,这些神秘原始习俗仍在老一辈人中存在。另外,这些崇拜还反映在节日上。除了与汉人相同的节日外,粤北壮人还过二月二中和节,亦称土地伯公祭;四月八牛皇诞,在牛栏烧纸供神;六月六祭田头公,祈求丰收;九月九送火神节,避免火灾。这些风俗说明壮族是个农业民族,迁居粤北以后农耕活动更加频繁,与所处地理环境有不可分割的

联系。

壮人古代亦称乌浒人或乌浦人,以黑为美,故新娘礼服是黑衫、黑裤,伴娘也与新娘一样,诸样饰物皆青一色的黑色。新娘子怀孕时也要穿黑衣裳,以示喜庆和贞洁。壮人也有好歌传统,壮垌即歌乡,一些村寨常以赛歌为乐,曰“坐歌堂”,于每年春节至元宵及中秋之夜举行,男女歌手对唱,直到深夜。

一般说来,少数民族妇女地位是比较高的,但广东壮人汉化较深,男尊女卑现象颇突出。可是在婚姻、丧葬、分家等问题上,娘家舅舅却有较多发言权。这个习俗,也许渊源于母系氏族时期,是母权在新条件下的残存和折射。

壮人饮食也颇具特色,除与黎苗族一样嗜食酸菜以外,还有特殊习惯。一是吃生肉,包括猪、牛、鱼肉,切成片或丝,用醋泡浸,伴以花生、冬菇、木耳、粉丝一起食用;二是喝生血,将刚宰鹅鸭的鲜血注入醋内,和以姜、葱、韭菜等吞食。据当地人认为,生血有清热、解毒、去暑之功,与广府地区吮吸蛇血风俗有异曲同工之妙。

五、畬族风俗文化群落

畬族现是广东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仅 3000 余人。但历史很古老,唐代以前,岭南是畬族的主要聚居地,后来有过多大迁徙和不断被融合,现以潮安、丰顺交界的凤凰山为主要居地,其余散见于海丰、惠来之间的莲花山区和增城、博罗之间的罗浮山区。畬族虽少,但其民俗内容很丰富,作为一个群

落,在广东有数的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群落中,仍占有一定地位。

畲族特别崇拜图腾,以盘瓠为始祖,连其他省区畲族都深信凤凰山是他们的发源地。在畲族世代相传的《高皇歌》中,有“广东路上有祖坟”之句。盘瓠及其事迹被绘成很长的历史画卷,称为祖图或太公像,每隔三五年举行一次隆重祭典,同一血缘成员都得参加,集体拜祭,气氛热烈,方式独特。平时节日也举行祭祀祖公活动,代代不衰。畲族这种图腾崇拜,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使畲族文化在强大的汉文化包围下得以存在和相传。此外,还信奉多种崇拜,如门神、灶神、路神、财神、土地神等。由于这些崇拜而产生诸多禁忌,例如禁吃狗肉,忌用脚踏碓舂米等。

畲族游耕,所开垦土地曰峯,“峯当作畲”^[84],所以畲族过去亦称作峯人,以峯或畲为地名者常见于粤东山区,说明畲族过去分布很广。现在畲族已定居,男耕女织。但与游耕相适应而形成的风俗并未泯灭,如妇女服饰裳长过膝,大襟无领,显然是便于在山地活动,散热取凉。

畲族和瑶族风俗颇多相同之处,如族内婚、同姓不婚、招郎入赘、善歌舞、对歌求婚、禁吃狗肉等,说明两族有很深刻渊源关系。但畲族又有自己的特色,如崇尚青、蓝、黑三色,所穿衣服以此为美。妇女喜穿凤凰装,辫子盘于头上,称为“凤髻”,并以髻之大小、高低区别婚姻、年龄状况。凤凰在畲族被赋予特殊意义,实乃越人鸟崇拜遗风。

畲族笃信风水,丧葬礼俗与汉人大同小异,初葬筑坟树

碑，曰大葬；二三年后起棺、捡骨盛于陶罐，曰小葬。这种二次葬式，与很多少数民族不同，显然受周围汉人影响所致。

六、回族风俗文化群落

广东回族分布在海南三亚、广州、肇庆和韶关等地区，虽然具有共同的风俗文化，但三亚回族分布地域集中，文化特质至为典型，可为回族风俗文化群落的代表。

这一群落由三亚市羊栏区相距不远的回辉乡和回新乡组成，总人数虽只 4000 余人，但作为一个文化群落，在广东也算是凤毛麟角。据文献记载和人类学研究表明，三亚回族祖先一部分是宋元间从占城（今越南中南部）迁来的，此后也有岛上其他回族到此定居。虽经近千年不同的文化接触和交流，但在海南闭塞的地理环境，附近其他民族较低文化发展水平的特定条件下，三亚回族得以保持自己的伊斯兰风俗文化，传承至今。三亚回族使用回历，过伊斯兰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节，保持到伊斯兰圣地麦加朝圣的习惯。“不食猪肉，家不供祖先，共设佛堂，念经礼拜，……婚嫁不忌同姓，惟忌同族，不与民俗为婚，人亦无与婚者”^[85]。建国后虽有其他民族女子嫁入村子，但回族女子从不外嫁，嫁入外族女子一切习俗受伊斯兰教规约束，连语言也不例外。村里平时除了念经做礼拜，不搞其他文娱活动，也不参加当地其他民族的活动，过去很少人到外地工作或学习。这是其风俗文化很少变异的主要原因。回民爱整洁，嗜食甜醋泡制鸡蛋。举凡勒、打、跌死的禽畜，污秽，毒虫

食余,以及奇形怪状的东西,均不食,与当地其他民族嗜食蛇、鼠、猫等野味以及禽畜下脚料形成鲜明对照。

回族实行土葬,墓用石砌,树碑,建立公共墓地。老人蓄胡子的较多,缠普通头巾,诵《可兰经》时白衣白帽,每逢节日则穿上民族盛装,举行集会,欢度庆典。此外,三亚回族也与其他地区「族」一样,还有练功习武、尊老扶弱等优良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正是三亚回族能够自强不息,立于祖国民族大家庭之林的一种可贵的原动力。

注释:

- [1] 应劭:《风俗通义·序》,吴树平校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2] 据叶春生:《岭南风俗录》,广东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本表略有删减。
- [3] 光绪《崖州志》卷1。
- [4] 参见《汉书》卷25,郊祀志。
- [5]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7,广东,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 [6] 《潮州三阳图志辑稿》卷3,风俗形胜。
- [7] 范瑞昂:《粤中见闻》卷3,时序。
- [8]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事语。
- [9] [10] 民国《儋县志》卷1。
- [11] 范瑞昂:《粤中见闻》卷3。
- [12] 《后汉书》卷76,任延传。
- [13] 《后汉书》卷86,南蛮传。
- [14] 欧大任:《百越先贤传》卷4,陶基传。
- [15]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7,广东,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

- [16] 转见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试刊号)第107页,1985年版。
- [17] [18]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7,广东。
- [19]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2,诗语。
- [20]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7,广东。
- [21]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风土门。
- [22] 光绪《高州府志》卷3。
- [23] 曾广亿:《海南岛东汉瓮棺墓发掘考略》,广东省博物馆《文博通讯》1979年第10期。
- [24] 《广东省博物馆馆刊》1988年第1期第8页。
- [25] 中山市博物馆《中山历史文物图集》第6页,香港大公报出版,1991年。
- [26] 曾广亿:《广东佛山鼓颢岗宋元明墓记略》,见《考古》1962年第8期。
- [27] 嘉靖《广东通志》,卷20,风俗。
- [28]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8,广东。
- [29] 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第20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30] 黄进、黄瑞红:《丹霞地貌与人文景观》,油印稿,1991年。
- [31] 《墨子》卷6,节葬下。
- [32] 嘉靖《广东通志》卷20,风俗。
- [33] 光绪《嘉应州志》卷8,风俗。
- [34] 光绪《惠州府志》卷45,风俗。
- [35] 乾隆《潮州府志》卷12,风俗志。
- [36] 光绪《嘉应州志》卷8,风俗。
- [37] 光绪《嘉应州志》卷8,风俗。
- [38]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一册第51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 [39] 光绪《嘉应州志》卷8,风俗。
- [40] 乾隆《潮州府志》卷12,风俗。
- [41] 光绪《肇庆府志》卷3,輿地。

- [42] 乾隆《潮州府志》卷 12, 风俗。
- [43] 光绪《高州府志》卷 6, 輿地。
- [44] 商承祚:《广州市人家的神》,《民俗》第 41—42 期。
- [45] 张华:《博物志》卷 1, 五方人民。
- [46] 《淮南子》卷 7, 精神训。
- [47] 《北平晨报》1936 年 12 月 25 日《漫话吃狗肉》。
- [48] 刘恂:《岭表录异》补遗。
- [49] 王士性:《广志绎》卷 4。
- [50] 刘锡万:《岭表纪蛮》第 55 页, 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
- [51] 苏东坡:《和劝农六首·序》, 见民国《儋县志》卷 10。
- [52] 裴渊:《广州记》。
- [53]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佚文五, 黎。
- [54] 樊绰:《蛮书》卷 10。
- [55] 《宋书》卷 97, 西南夷传。
- [56] 魏濬:《峤南琐记》卷下。
- [57]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 2。
- [58] 《考古》1963 年 2 期:《广东清远发现周代青铜器》,《文物》1974 年 11 期:《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
- [59]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16, 器语。
- [60] 梁伦:《广东民间舞蹈分布、分类和特点》, 见《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第二集第 146 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61]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6, 神语。
- [62] 转见《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第二集第 147 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63] 梁伦:《广东民间舞蹈分布、分类和特点》, 见《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第二集第 142 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64]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16, 器语。
- [65] 《南方日报》1991 年 9 月 7 日, 第 2 版。
- [66]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 卷 7, 广东。
- [67] 光绪重刊《肇庆府志》卷 2。

- [68] 嘉靖《广东通志》卷 20。
- [69] 潘雄:《谈谈民族学的源流与广东汉区的民俗研究任务》,见《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第二集,第 52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 [70]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101,广东五。
- [71] 范瑞昂:《粤中见闻》卷 24。
- [72] 光绪《高州府志》卷 3。
- [73] 同治《连州志》卷 10。
- [74] 道光《南雄州志》卷 9。
- [75] 同治《连州志》卷 2。
- [76] 清水:《韶郡古昔的命名观》,见《民俗》第 84 期,1929 年 10 月。
- [77] [78] [79] 光绪《嘉应州志》卷 8。
- [80] 王士性:《广志绎》卷 4。
- [81] 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载《黎族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 208--210 页,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印,1983 年。
- [82] 《汉书》卷 28,地理志。
- [83] 转见《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馆刊》创刊号第 86 页,1987 年。
- [84] 范瑞昂:《粤中见闻》卷 20。
- [85] 《古今图书集成》卷 1380,职方典。

第七章 宗教文化景观 与地理分布

宗教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目前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宗教的存在。它渗透到政治意识、伦理、哲学、文学、艺术、风俗等各个方面,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历史上固然如此,即使到了现代,“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1]。因此,宗教研究得到广泛注意,并可从多角度和不同层面上进行。时下取得的研究成果不少,正掀起一股宗教文化热。但在宗教文化空间组合上,这些研究还很薄弱。有必要从文化地理角度,研究宗教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经籍、文物、宗教仪式、规范、气氛以及宗教群体即教徒等所构成的宗教文化景观及其空间分布。这既指它们的历史变迁,也有它们地域的差异和特色,共同构筑起宗教文化地理体系。

人们往往把宗教视为人的价值和习俗的重要塑造者。岭南人崇尚自然、唯实的价值观,以及多姿多

彩、又多少带有古越人禀赋的风俗文化,使岭南原始宗教较多地传承下来,而岭南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加宽广的兼容性,又使外来宗教,无论是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和传播,共同建立起岭南丰富多样的宗教文化殿堂,甲于全国许多省区。

第一节 佛教文化景观与分布

在宗教方面,对岭南文化影响最大者,首推佛教。而广东又是佛教传入我国最早的地区之一,南宗顿教的发祥地,佛教文化根深蒂固,不但历史上保存下来的遗迹遗址分布甚多,而且佛教现在也颇流行,佛教文化景观见于各个角落,且正与宗教旅游相结合,更加速了它的传播,和扩大自己的社会功能。

一、佛教在广东的历史传播

佛教在广东传播的历史源远流长。据萧梁释慧皎《高僧安清本传》,相传东汉灵帝之末(170—171年)已有佛教徒来广州的说法^[2]。三国时代,天竺僧人真喜沙门(强梁娄至)来广州,翻译《十二游经》一卷。西晋武帝时,又有梵僧迦摩罗抵广州,在城中修建广东最早的两座寺院,即三归寺和王仁寺。以后广州因地处出海要道,时有梵僧往来,佛寺繁兴,名僧居士聚集。如东晋隆安时(397—404年),罽宾国(今克什米尔)高僧昙摩耶舍至广州,在城西虞翻旧苑建王园寺,即今光孝寺,

并植苹婆诃子树,后人称为“诃林”。宋文帝元嘉初(424—453年)天竺僧求那跋摩来南海,后取道始兴入京,改始兴虎市山为灵鹫山(天竺名山)。其时还有西域名僧杯渡来南海,憩屯门山,即今香港青山。梁武帝初,天竺僧智药禅师先到广州,继上曲江曹溪水口,开门立石,建宝林寺,即今南华寺。梁武帝中,禅宗始祖达摩泛海来广州,创建西来庵,其登陆地点曰“西来初地”。梁大同元年(535年)佛教传上罗浮山,建南楼寺,此后山上寺院建筑接踵而起,成为岭南佛教的发祥地之一。六朝时代,佛教大兴,在广东各地先后兴建的大小寺院有87所之多^[3],其中广州城19所、始兴郡11所、罗浮山4所。这虽是佛教传入岭南之初,但对丰富岭南文化内涵,扩大人们文化视野,起了开创性作用。除了留下的名胜古迹和神话传说以外,在物质工艺创作上也增加了新题材。南朝广东墓葬出土瓷器,器身开始流行与我国传统风格不同的各种莲花纹。例如中山市征集到北周天和六年(571年)佛像砖,铭文曰:“天和六年,岁次辛卯六月朔日,佛弟子陈岁为父母之中轮转生死,造像一区。”^[4]广州海珠区龙潭村建于光绪年间的祠堂窗棂刻以卍字图案。这都是印度佛教绘画和雕刻艺术传入岭南留下的物证。

隋唐政府大力宣扬佛教,寺院兴建不减于前,成为这时期重要的建筑艺术和文化空间。如唐代广州佛寺,不但数量多,而且规模大,著名的有开元寺、宝严寺等,凡28所,皆按天上二十八宿序列布局。其他地区比较著名的有潮州开元寺,西江地区白云寺、香山寺、峡山寺、龙山寺、国恩寺,佛山塔坡寺,乳

源大觉禅寺,海康天宁寺,罗浮山华首寺、明月寺,梅州灵光寺,振州大云寺,儋州和崖州开元寺等。唐天宝七年(748年)鉴真一行从海南返回广州,广州都督卢奂亲自率领官员百姓到城外迎接,引入光孝寺供奉。采访使刘巨麟还亲自受戒,“佛教热”席卷羊城。此外,大量佛塔也相继出现。这种新的建筑与寺院相结合,构成新的宗教文化景观。以后塔又有所发展,不但形制有变化,功能也趋于多种多样,兼具登高远眺、导航、装点山河、美化环境等,往往成为风景名胜的标志。特别重要的是禅宗六祖惠能创立了南宗顿教,这是中国佛教史上一次空前的变革。此后,佛教拥有更多的普通百姓,并不断向岭外传播。惠能发迹和埋骨的曲江南华寺被誉为“祖庭”和岭南禅林之冠,也是世界著名佛教圣地之一。

宋元时佛教在广东一些地区渐趋式微,但却在琼雷等开发较迟、经济落后的地区流行起来。湛江湖光岩,南宋建炎间(1127—1130)沙门僧琮居此,弘洁化俗,高风可挹。此后雷州半岛,寺庵迭起,蔚为风气,延续至今。元代琼州以高僧多而出名。还有一些誉僧深入粤东各地,创建一批禅林,如元末西藏僧胆巴喇嘛谪居潮州,弘化密宗咒术。

明清时广东禅风颇振,肇庆鼎湖庆云寺、新会叱石寺、徐闻华捍寺、兴宁和山古寺等先后落成。高僧每四出升帐讲佛,拥有大批信徒。如罗浮山永福寺释真空每出山说法,听者常至千人,高僧德清居粤五年,常往返曹溪,中兴六祖之道,大畅禅风,声名远播。其弟子道邱,世称栖壑和尚,任广州白云山蒲间寺住持时,四方学者云集。清初,一些有志之士在抗清失败后

出家,许多地方留有他们的踪迹。是时,广州附近海云寺、大通寺、海幢寺、粤北丹霞寺等,皆为重要禅林。只是到了清末,一些僧徒为官府迫害,著名广州长寿寺等被焚,加上西教渐兴,广东禅风日衰。

民国初年,新学兴起,佛教再度冷落。许多寺宇年久失修或被拆毁或移作他用。广州光孝寺、大佛寺、长寿寺、海幢寺和华林寺五大丛林已无一完全者,各地寺院除鼎湖庆云寺尚能维持香火以外,亦有日渐衰落之象。但到30年代,佛教在广东又有所复兴,各地修复寺庵不少。据光绪《嘉应州志》记载,梅县光绪年间有寺庵52所,而到解放前夕庵宫寺庙增加到110所,其中绝大部分属佛教丛林,分布在全县,其中梅城及其附近地区多达30—40所,丙村地区20所,松口地区18所^[5]。佛山民国时有寺观29所、庵70所,其中寺观主要是指佛寺^[6]。这些寺庵很多是抗战前修建的,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现象。各地还成立一些佛教法会,更有一些僧人到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和学海书院等院校演讲,听众常至数百人。佛教文化景观复呈兴盛气象,这与其时广东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一定发展不无关系。此后虽经抗日战争和内战,但佛教仍能维持相当地位。到1949年底,全省有寺庵870多所,僧尼3700余人,占同年全省五教(佛、道、天主、基督、伊斯兰教)活动场所2300多所的37.8%,神职人员总数4800人的77.1%^[7]。

总而言之,佛教自在广东传播以后,已历1800余年,由它引致的社会集群到各种宗教景观,已成为一种区域性文化现象,在岭南文化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佛教群体分布

近 30 多年来,佛教在广东同在全国一样,受到多次冲击,僧尼四散,寺宇失修,活动也基本停止。近年随着各项宗教政策的落实,佛教始获得新生,寺宇得到恢复或重建,活动得以正常开展,佛教文化被继承和保存,并有所发展。1987 年全省有大小寺庵、精舍 410 所,僧尼 1800 人。1979 年以来,全省新出家僧尼达数百人。到 1990 年底,全省有佛教徒 27205 人,约占全省各类教徒总人数 8.4%,虽次于天主教和基督教徒人数,但佛教神职人员(指僧尼)达 2407 人,占全省各教神职人员总数 77%,独居首位。同年全省开放寺庵 585 所,占全省各类宗教活动场所总数 46%,规模较小和未开放的寺庵还不包括在内。另外,佛教社会基础深厚,不少人虽不是教徒,但他们的潜意识还是比较倾向于佛教文化,所以佛教的群体,除了寺庵里的僧尼,社会上的教徒,还包括一部分无法统计的群众。就寺庵密度而言,以汕头、潮州、湛江最大,与僧尼教徒人口地区分布格局基本相符。海南岛现在没有佛教组织和僧尼。但据道光《琼州府志》记载,其时岛上有寺庵 86 所^[8]。以后历经变乱,到建国初全岛有教徒约 2000 人,仅海口、琼山地区有寺庵 17 所^[9],1958 年全被拆除。近年始在万宁东山岭复建潮音寺和净土寺,但未有僧尼。而一海峡之隔的徐闻、海康,则是全省寺庵最多,佛事活动最活跃地区之一。据悉,海康县自 1982 年恢复佛教协会后,全县有大小寺庵 66 所(登记开放的有 52

所),常住僧 191 人,尼 392 人,居士 340 人,出家人数几占全省僧尼一半^[10]。信佛人数更多,影响很大,甚至连北方一些出家人,也选择海康作为归宿。潮汕和雷州半岛,历史上一个是地狭人稠,一个是贫困落后的地区,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老百姓,找不到出路时,有的人只好遁入空门,求得暂时栖身或精神上的解脱。嘉靖《广东通志·风俗》说雷州地区“自梁唐以来,寺观庵堂半民居”^[11]。潮汕也是个“重巫覡”、“名僧仙逸”的地区;乾隆年间潮州府 9 县有寺观 318 所^[12],其中佛寺占大多数。现在两地的佛教地位,主要是历史传承的结果。

三、佛教建筑文化景观

寺院殿堂是供奉佛和菩萨之地,也是僧尼起居、生活和修持的地方,从来就是佛教的活动中心和宣传佛教的基地,被认为是一个“神圣空间”。从文化景观视角来看,寺院殿堂作为一个集中了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等琳琅满目的综合艺术馆,既是宗教文化活动中心,也是人们休憩游览的重要场所。此外,寺院还与工农业生产、商业经济,以及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相联系,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因此其文化景观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岭南寺院的建筑文化风格与中原地区一样,也经历了许多演变。早期采用以佛塔为中心的我国传统世俗建筑的院落式布局,院落重重,层层深入,常至数十院,回廊周匝,廊内壁画鲜艳,引人入胜。例如始建于梁大同三年(537 年)的广州六

榕寺,时称宝庄严寺,建有舍利塔,唐初诗人王勃路过广州,曾撰《宝庄严寺舍利塔记》,赞其“庄严宝塔,基构鼎新,亭栌栴嶸,弃日霄排,归云晓纳”[13],显见塔为寺院布局中心。不过早期王公大臣施舍邸第为佛寺成为一时风尚,这些寺院原系私宅,很少重新造塔,而以正厅供奉代替佛塔,这样寺院的布局渐有改变。广州光孝寺现址,即为南越王赵建德(赵佗玄孙)故宅,其布局自不能脱离以上风格。

隋唐以降,佛寺建筑逐渐改变过去以佛塔为主体的布局,而代之以佛殿为中心,即使建塔,也建于寺前、寺后或两侧。按照我国营造法则,殿堂配置大致以南北为中轴线,自南而北,依次为山门,山门左右为钟、鼓数,山门正而为天王殿,后为大雄宝殿、法堂;再后为藏经楼,两侧廊庑;正中路左右两侧的东西配殿,有伽蓝殿、祖师堂、观音殿、药师殿等。有些大寺院还有五百罗汉堂。寺院东侧为僧人生活区,包括僧房、职事堂、香积厨、斋堂、茶堂等。西侧主要为云会堂,以容纳四方云游僧人。整个寺院由多层院落组成,形成独特的宗教活动聚落。广州光孝寺,经历代修建,现建有朝圣、佛事活动、学术活动、安养、居住、外事等功能小区。全寺布局,以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为中轴线,以钟楼、鼓楼、伽蓝殿、千菩萨殿、六祖殿、罗汉殿、睡佛阁、戒坛、三圣殿、药师殿、风幡堂、禅堂、方丈堂、首座寮等为辅助性配套建筑群,总用地面积达1.5万平方米,集岭南佛教建筑艺术之大成。有岭南第一宝刹之称的曲江南华寺,也采取整体为中轴线平面布局,由山门、放生池、宝林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灵照塔、六祖殿、方丈室,以及

钟楼、鼓楼等建筑物组成。广东现存颇负盛名的寺院,除上述以外,还有潮州开元寺、饶平观音寺、潮阳灵泉寺、梅州灵光寺、新兴国恩寺、肇庆庆云寺、海康天宁寺、阳江石觉寺、惠来西来禅寺、乳源云门寺、吴川古龙寺、清远飞来寺、惠州华首寺、揭阳双峰寺,以及香港宝莲寺、澳门普济禅寺等,其整体布局大同小异,视寺院规模而定,但都强调整体的严谨、布局对称和中轴线地位,以造成殿堂空间的神圣感。另外,这些寺院多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名山之中。语云“天下名山僧占多”,宋代赵抃诗:“可惜湖山天下好,十分风景属僧家。”尤其是环境特殊、视野良好的郊野,往往为寺院所在。佛教建筑美与大自然美交相辉映,形成人工美与山水美的和谐统一,也是佛教名胜景观能够长留人世的一个巨大优势。至于今日有些寺院位于人烟稠密的闹市地区,这是城市扩张的结果,大都不是当日选寺之旨。

雕刻和彩画也是佛教建筑艺术的瑰宝,它们把幻想的宗教世界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把外来的艺术精华有机地融合到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中,自成风格。尤其是岭南佛教重义理,往往将雕刻、彩画、诗歌、书法等集于一寺院,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宝库。广州光孝寺保存的石雕狮子,通过集中、夸张的手法,表现了狮子的内在力量。寺里木雕罗汉像,用简练的线条和块面,刻划不同类型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以僧、佛神像表达凡人之情,充满亲切感。世江南华寺木雕罗汉,或胖或瘦,或老或少,或恶或善,奇特异常,喜怒哀乐,神情不一。广州华林寺 500 罗汉,按著名的浙江净慈寺 500 罗汉式样造型,

个个形神不一,为佛教像雕珍品。潮州开元寺屋脊所饰宝葫芦、卷草、瑞兽等瓷雕,檐廊及月台上72块神话和吉祥故事石雕,又自成风格。一般说来,佛教雕刻主要是殿堂各种塑像,包括释迦牟尼、金刚、弥勒佛、四大天王、韦驮、罗汉、观音等,皆神态不同,栩栩如生,充满感人的精神力量。但它们的设置视寺院规模不同而定。上述各大寺院,这些塑像颇为齐全。香港和海康现在已成为岭南佛像雕刻中心,许多新建或重修寺院的塑像,多半是在两地雕刻的。而一些小型佛像,则成为工艺品,各瓷厂多有生产,在旅游点、陶瓷商店、街边摊档大行其道。如观音像不胫而走,供奉于广东城乡许多家庭。

佛塔后来虽不是寺院主体,但它与经幢一样,仍是重要的佛教建筑,文化内涵还扩大到其他领域,成为岭南各地很普遍的建筑景观。据研究,塔作为佛教建筑物是汉代传入我国的,此后广为流行。初时塔从梵文译成汉文,有二十多个译名,常见有浮屠(图)、高灵、灵庙等,倒是清代任两广总督学者阮元把它们统一起来,通译为塔。佛塔在广东最早出现在五代时期,计有铸于南汉广州光孝寺东、西铁塔,梅州千佛塔等,也是我国较早的楼阁式铁塔。据统计,广东(不含海南岛)现存古塔240多座^[14],大部分为佛塔。宋元之际是广东建塔高峰时期,北宋时以楼阁式砖塔为主,南宋以后转为石塔。广东深受外来文化影响,南宋出现阿育王式塔及幢式塔。楼阁式塔主要为砖石结构,中空,有楼层可登,最能代表我国佛塔特色。而阿育王式塔平面方形,单层塔身顶,四隅置山花蕉叶,保留了浓郁的古印度塔特点。而幢式塔宛如长方形碑,石面上刻法轮、飞天,

轮下刻人物和动物浮雕,充分表达佛教的轮回转世意识。广东现存宋代砖塔 20 多座,元塔 10 座,大部分分布在粤北地区。南雄三影塔为宋代砖塔代表。石塔则以潮州开元寺内四座阿育王式塔及阳江北山楼阁式塔为其杰作。前者上有“四大部洲”浮雕,为这种形式佛塔传入我国的最早实例之一。幢式塔以南雄珠矶巷石塔为代表,是一座平面八角七层实心石塔,塔身各面刻有佛像,出檐刻莲瓣纹,刻工古拙粗犷。其余属省级重点保护文物的有广州六榕塔、连县慧光塔、曲江六祖塔、韶关仙人塔、英德蓬莱寺塔、龙川正相塔、河源龟峰塔、新会兴龙寺塔等,其中以广州六榕塔为全省最高,17 级,57.6 米。

明清为广东造塔的另一个高峰时期,现存有 200 多座。主要为祈求科举及第、风水迷信或作为山川名胜与园林胜景点缀物而修建的,包括文风塔和风光塔。虽然它们不一定与佛寺同时修建,但其形制和文化风格多是前代佛塔的继承和发展。例如广东明塔造型,以传统的楼阁式为主,总体轮廓与宋塔相似,但在塔的体积、层数、层高及装饰上都有所改进和创新,塔的结构和建造技术也臻成熟,以海康启秀塔(三元塔)、惠州泗洲塔、五华狮雄山塔、肇庆崇禧塔、潮州凤凰塔、潮阳文光塔、番禺莲花山塔、琼海聚奎塔等最具特色。

入清以来,广东主要在沿海州县新建了一些佛塔。其他地区对旧塔多进行改建或重修。各地工匠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使塔的结构形式更为繁多,地方性更强,技术和艺术水平更高,立面造型从雄浑向挺拔秀丽的方向发展,装饰则由简洁淡雅趋于繁复,大部分与殿堂相匹配,构成有机结合之宗教景观。例如明清修建的

大小佛塔,与现在寺院地区分布是比较一致的,说明两者有紧密联系。但也有一部分佛塔是单独修建的,如徐闻登云塔、阳江文昌塔(现已被毁)、廉江文笔塔、三水魁岗文塔、海丰东山塔、饶平文明塔等,说明塔功能有所扩大,包括登高远眺,了望敌情,导航引渡,装点河山,美化环境等,成为独立的文化景观,也说明风水学说更加流行。尤其是大量修建的风水塔、文风塔、文星塔、文昌塔等,虽也称作浮屠,但与佛教毫无关系,而是借文星之名建塔,以弥补山川形势之不足而已。

四、佛教寺院音乐

寺院自古以来就有音乐活动,这种佛教音乐亦称庙堂音乐。现在各地寺院保存下来的音乐,内容非常丰富,是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过去多被荒废而渐渐湮没。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十余年来,佛教音乐才重放光芒,成为寺院不可或缺的一种景观。

广东佛教音乐,广泛吸取各地佛乐养分,从内容到器乐和声乐,都有地方特色,自成风格,并形成潮州和雷州两大佛乐中心。潮州佛乐曾多次参加在广州、汕头举行的音乐会演,有“南海赞”、“六天母”、“大三宝”、“反韵香”、“无量寿”等节目,其中“南海赞”、“六天母”曾获优秀节目奖。这些佛乐不但在潮汕地区寺院里赞唱,而且扩布到寺外,极为当地群众喜爱。

佛乐在雷州半岛也很盛行。据1980年调查,光流行于海康各寺庵的佛乐就有50多首,分赞、叹、颂、念、白等5种,

如“戒定真香赞”、“万德圆融赞”、“祝寿赞”、“佛宝下莲台赞”、“忏悔文”叹、“观世音大悲忏”颂等,表达了对诸佛菩萨的功德、智慧、苦行、法力、慈善的赞颂,风格古朴,情调庄严,感情起伏,既有流畅、轻快的旋律,也有深沉、蕴藉的咏叹,增添了寺庵肃穆和神秘气氛。

各地佛乐来源不同,风格也有差异。潮州佛乐之“禅和板”(声乐)从广州传来,而另一类声乐“香花板”又颇类闽南僧侣所唱,明显深受福建佛乐影响,故其风格两者兼而有之,既有庄严典雅、婉转悠扬之韵味,也有热烈昂扬、跌宕活泼之旨趣。上述雷州佛乐与肇庆鼎湖山庆云寺佛乐唱腔比较相似,属“内江腔”,即产生于省内的唱腔,说明南路地区与西江地区有较深厚的文化渊源。而广州光孝寺、大佛寺,曲江南华寺,以及罗浮山明月寺、延祥寺等佛乐唱腔与前者又有很大不同,速度较慢,情调缠绵低沉,以虚远、清淡为特征,属“外江腔”。^[15]说明它来源于省外,显与它们所处地区交通方便,接受外来文化有关。至于香港佛乐,则介于两腔之间,但偏于“内江腔”。实际上,经过历史的长期演变,“内江腔”和“外江腔”也很难截然分开,都给人以强烈的宗教感染力,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一方面是对某些信奉佛教的人起到感染、诱发和潜移默化作用;另一方面是佛教演唱变文、诵经等活动,犹如文艺演出一样。

第二节 道教文化景观与分布

道教为我国本土宗教。其在岭南虽不及佛教盛大和影响

深广,但由于它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的信仰宗旨,对各阶层人士都具有很大吸引力,加上道教是多神教,诸神庞杂而无严密系统,故在民间更容易流传,且与民俗文化相互渗透,构成五光十色的文化景观,比其他宗教文化景观要复杂纷繁得多。

一、道教在广东神仙系统及其历史分布

道教有自己的神仙系统,传人岭南以后,不断发生变化,补充加入地方诸神,使其谱系更加复杂。据道光《广东通志》载,秦始皇时,罗浮山已被认为是修道圣地,有“蓬莱山三岛,罗浮山其一也”之说^[16]。山东琅琊人安期生,这位东海之滨的卖药翁,曾居罗浮山玉泉。此后,相继入山修道者,大不乏人,诸书记载甚多,但皆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难以置信。自东晋葛洪在广州创建三元宫,在罗浮山建冲虚观,才是道教在广东传播之始,罗浮山也被视为道教在广东的正宗之地。迭经历代变迁,到清初,道教全真派邱处机十二代弟子杜阳栋抵广,道教才有较大发展,全盛时全省有道士、道姑千余人,宫观也不在少数。本世纪20年代,道教式微,宫观颓坏,道徒四散。到建国前夕,全省仅剩宫观20所,道士道姑数十人。但这仅是所谓正宗道教的历史变化,实际上道教作为一个庞杂的大系统,教门林立,举凡敬神事鬼的各种活动和场所,大部分可以归入这个系统,所以它的发展变化,不能以一概全。只有将这个大系统分

解为若干个子系统,才能窥见其时空分布概貌。

根据广东民间供奉诸神,以及方志、杂记诸书所载,道教在广东可分为以下三个子系统:

尊神系统,享有最高威望和法力诸神,包括至尊三清及诸尊神。三清为道教最高天神,即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罗浮山冲虚观供奉三清塑像,海口五公祠即为明三清观旧址。诸尊神包括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五老君,地位仅次于三清。以地理位置和环境关系,“粤人祀赤帝,并祀黑帝。盖以黑帝位居北极而司命南溟。南溟之水生于北极。北极为源而南溟为委。祀赤帝者以其治水之委,祀黑帝者以其司水之源也”[17]。黑帝亦称北帝、上帝、真武帝,“粤多庙祀真武”,如“琼州十州县,城北门俱有真武庙”[18]。佛山真武庙,俗称祖庙,为祀黑帝的代表性庙宇。而赤帝一说为祝融,司南海,故广州南海神庙,也是祝融享受人间香火的庙宇。西王母也是道教尊神女仙之首,“广州多有祠祀西王母”[19],据传西王母专司人间福、禄、寿,也是全国各地供奉的至尊女神。

主神系统,位居尊神之下诸神,包括天地日月星辰、风云雷雨、河岳山川等主宰诸神,《礼记·祭法》曰:“山林川岳丘陵,能出云,为风雨,皆曰神。”粤人本尚鬼,所以对这个系统的神仙,祭祀最勤,庙宇很多,分布地区也广。广州越秀山脚下的三元宫,供奉上元天神、中元地神、下元水神。岭南多雷,尤以雷州半岛为甚,故多雷神庙。海康英榜山雷神庙又与唐雷州刺史陈文玉联系起来,歿后被当地人祀以为雷神;又“粤岁有飓(即台风,今称热带风暴),多从琼雷而起,……故琼雷皆有飓

风祠”[20]。实际上广东沿海多有此风神庙,显示越人对风的敬畏之情。广东临海,越人善水,以舟楫为家,“然今粤人出入,率不泛祀海神”[21],这个海神,既包括天妃,也指祝融。“天妃者,泛言水神也”。“吾粤水国,多庙祀天妃”[22]。天妃庙又称天后庙、妈祖、马祖庙、妈阁庙等,广泛分布于东南沿海,明代海南较大的天妃庙就有10处[23],现在广东各地的天妃庙遗址遗迹也很多。南海神也是水神,宋康定二年(1041年),南海神赐封“加洪圣”,故南海神庙又称洪圣庙,珠江三角洲地区甚多,其他地区没有,带有一定地域性,与珠江三角洲水网纵横有关。至于各地风云雷雨山川坛、东岳庙、玉皇庙(殿)、龙王庙等,也比比皆是。此外,还有“纲维天道,掌握人文”的文昌帝,传说其既爱武,又司文和子嗣,故“吾粤崇祀文昌”[24],其庙宇遍布各府州县。

杂神系统,属第三层次,包括灵官、太岁、功曹、城隍、土地、灶君、门神、财神、人鬼、各姓祖先、圣哲贤才、忠孝义烈之士,以及其他真人、仙人等,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很多人也分不清这些神属那一教门,但实际上他们绝大部分来自道教。除了共同性的神祇以外,他们不少是开发岭南的有功之臣,或为当地人做了好事的人,死后被道教吸收进神仙系统中,或在不同程度上结合了道教的形式和内容。例如汉初平南越有功的路伏波(路博德)和马伏波(马援),后被“粤人立祠祀之”[25],伏波庙遍于粤北、粤西和海南水陆交通沿线。广州三元古庙供奉金花夫人,握云有助人生子神力,尤为妇女崇拜,而银花夫人职司保佑农业丰收,也同时被请进该庙中。广州五仙观,源

于古代五仙人骑羊负五谷降临广州的故事,五仙成为五谷神,反映楚农业文化在岭南的传播。又珠江三角洲地区,如中山村落多祀禾谷夫人,人们以为她是后稷之母姜嫄,本居陕西武功,然能在岭南立祠,同样是华夏农业文明南移的反映。其他贬谪岭南的名人,后被立祠而祀的更多,海口有五公祠,海康西湖有十贤祠,潮州有韩文公祠等。它们的主人虽不是道教人物,但身后都被神化,涂上道教色彩。此外,粤西、海南冼夫人庙(祠)、增城何仙姑祠、崖县黄道婆祠等,皆因其主人有功于当地而建立的。再有祖祠,“粤中世家望族大小宗祖祢,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世世守之,此吾粤之古道也”[26],有所谓“顺德祠堂南海庙”之说。据记载,南海所属佛山镇,明代有庙 28 座,清代 134 座,民国 136 座,其中关帝庙 11 座,天后庙 6 座,三圣庙 5 座,帅府庙 5 座,真君庙 6 座,华光庙 11 座,花王庙 5 座[27],佛山能成为一个充满宗教色彩的城镇,这个庙群的存在是一个很重要因素。此外,还有数不清的来源于虚构人物、神话传说、小说、戏曲、市井江湖,以及人格化了的动物、植物等,熔于一炉,都在这个系统中有自己的位置,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充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实际上,道教很多神仙,大部分都属行业崇拜神,历史上有所谓 36 行、72 行、120 行和 360 行等划分,每一行都供奉一个神祇,或一神为多业崇拜。岭南地区除了很多属全国共有的行业神以外,还有一些由于自己特定的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神祇,更显示道教文化在岭南的多元性、复杂性和地域性。这些行业神有:

陶瓷业,以石湾为代表,奉舜为祖师,立祖师庙,道光《南海县志》曰:“陶师祖庙,在石湾莲子岗。”[28]

砖瓦业,有窑神,各地皆然。例如花县某村,“附近有砖窑,相距里许,窑人舁之归,谋奉为窑神”[29],但仅为一石头而已。

建筑业,以鲁班为祖师,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广州岁时记》说:“六月十三日,俗传为鲁班先师诞,建筑家及水土工匠最敬奉之,是日休业庆祝,亦有建醮巡游之举。”佛山木雕业,宣统年间每年举行四次纪念鲁班宴会,称之为“禡聚”[30]。

搭棚业:南越人住干栏式建筑,后广人以有巢氏为搭棚业和泥木业祖师。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61回记广东泥水匠奉有巢氏为神。而在广州,有巢氏、鲁班和华光三位祖师同为搭棚业所奉之神[31]。

冶铁业,一业多神。冶城佛山,“其神女子,相传有林氏妇,以其夫逋欠官铁,于是投身炉中,以出多铁,今开炉者必祠祀,称为涌铁夫人”[32]。但佛山金属杂货业,又以石公太尉为祖师,嘉庆丁丑(1817年)建太尉庙,并在会馆与庙宇一起共祭,沿街坊店亦设太尉神龛,香火颇旺。

医药业,以华佗和孙思邈为神。广州四月二十八日为药王诞,奉祀场面很盛,而医家主祭华佗,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61回有这样的一段:“广东人的迷信鬼神,有在理的,也有极不在理的。他们医家只止有个华佗。那些华佗庙里,每每在配殿上供了神农氏,这不是无理取闹么?”

银钱业,佛山、广州等地钱庄,供奉玄坛祖师,即赵公元帅。

武术业,供奉关羽为祖师,清季广东武馆,厅堂正中悬挂关羽像,早晚点灯,收徒更隆重。但海南东方县,却奉华光为祖师,开馆时叩拜,杀鸡饮血宣誓^[33]。

戏剧业,佛山为粤剧源地,供奉从湖北来的名伶张五为祖师。而广州梨园,设老郎庙。《梦华琐簿》说:“粤东省城梨园会馆,世俗呼为老郎庙。”按:老郎一说指唐明皇李隆基,为其设教坊,提倡技艺而被后人奉为祖师。

娼妓业,供奉铁板桥头真人仙师和地主神为祖师^[34]。

赌博业,潮州赌博业供奉地主爷,即上地神为祖师。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61回写“九死一生”看见广东赌馆祭神道:“他们的祖师,用绿纸写了甚么‘地主财神’的神位,不住的烧化纸帛,那香烛更是烧得烟雾腾天的。”另一位主人公述农说:“地主是广东人家都供的,只怕不是什么祖师,”但却是赌业保护神。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行业神,其中不少属于虚构、附会、随意和含混而成的,是一个大杂烩,其文化景观当然也不例外。

无论道教神仙系统或其行业神,也无非是中国封建社会组织结构的投影,每因这个结构变化而变化,故其文化景观也代有隆替,经过长期积淀,才形成今日在广东的分布面貌。

二、道教主要文化景观与分布

据1950年广东省宗教社团登记,全省有道观13所,道士道姑481人,分布17个县市,以罗浮山人数最为集中,其余散

见于广州、西樵山,以及清远、广宁、四会、普宁等地。鉴于当时形势,这种统计只反映部分实况。以后道教在广东并没有多少发展。到1990年统计,全省道士和道姑仅48人,教徒688人,宫观11所,分布在广州、惠州、汕尾和梅州^[35],主要宫观有广州三元宫、纯阳观,清远飞霞洞仙观,西樵山云泉仙馆,潮阳王龙宫,罗浮山冲虚观,惠州元妙观,以及香港黄大仙庙等。从数量统计而言,道教群体在省内宗教界地位很微弱。但道教是个多元教,在民间有很大势力,许多供奉神灵场所及信徒根本无从统计,他(它)们散布广大城乡,进入很多家庭,包括少数民族地区。过去俚俗之中,还有各种形式的“道馆”、“善社”、“斋堂”等组织,如抗战前广州斋堂多达200余所。至今这类组织虽已不存,但专管与人喃巫、念经、算命、捉鬼、攘灾之业者仍大不乏人,有时还很活跃。所以,道教在广东仍是一个庞大的宗教文化群体。

道佛建筑在外观上难以区分,皆以对称的中国宫廷式建筑为主题。按道教神仙系统组织空间,供奉从三清到诸路杂神者为道宫观,而供奉释氏、观音、罗汉者为佛寺院。例如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广州漱珠岗的纯阳观,奉祀吕祖纯阳,院落建筑包括大殿、东西廊屋、拱篷、拜亭、步云亭、灵宫殿、客房、楼阁、库房、斋厨等,代表了道教宫观建筑文化及其风格。纯阳观侧又分别建有汉议郎杨子南雪祠和崔菊坡祠,诸神可以相容于一院落。惠州元妙观创建于唐,元代扩建时,置“正殿两廊,钟鼓二楼,三房,库房,横雷重檐,涂饰壮丽,像座威仪”^[36],附近还置大片田园、池塘等,构成一个与四周环境相

协调的建筑群体。此后元妙观经历许多变迁,但现存殿宇、塑像仍保持以道教文化为主的风格。因为除了玉皇殿和吕洞宾、天王君、慈航道人和三元塑像以外,还有观音殿和包公殿,不但说明道佛合流,而且把历史人物也请进殿堂,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这种情况明清以来不断发生,广州花地旧有黄大仙庙,供奉吕洞宾、魏征、如来、弥勒、文殊等,已无严格的教门界限。但广东现存佛山祖庙,广州南海神庙、三元古庙,顺德西山庙,德庆悦城龙母庙,潮州韩文公祠,揭阳城隍庙,惠东谭公祖庙,乐昌韩泷祠,海康雷祖祠,海口五公祠等,都基本上是按道教建筑文化来组织空间的。

道教也有塔作为辅助性建筑景观,但道教塔甚至在全国也非常罕见,而且其建筑形式与佛塔没有多少区别,主要原因是明清以来道佛合流,而保留下来的明清以前的道塔已属凤毛麟角。清代仁化丹霞山惠道人塔是广东少有的道教塔。

道教节日很多,各位神仙诞辰日子都被定为它的节日。每逢节日来临,都要举行隆重斋醮仪式,有些节日还有热闹庙会集市,带动各种风俗活动。不过现在道教活动一般在道场进行,至于家庭和个人奉神行为则难以历数,每逢节或诞日以及每月初一、十五,这种景观至为触目,在港澳地区尤甚。香港黄大仙庙为全港最大的宗教庙宇,每逢农历年节,善信云集,人头攒拥,笼罩在一片虔诚香火云雾中。在澳门不足6平方公里土地上,属道教系统的庙宇就有30座左右,如妈阁庙、天后庙、地母庙、女娲庙、北帝庙、大王庙、包公庙、哪吒庙、谭公庙等。此外,几乎家家都有一个神龛,供奉土地神。土地神公占据

了一家最好的空间位置,使本来已挤拥的空间更为狭小。每年二月土地神圣诞,前往最大土地庙“永福古社”的香客络绎不绝。三月二十三天后诞,顶礼膜拜的人更多。

道教斋醮活动也使用音乐,称为法事音乐或道场音乐,不仅在宫观,而且在农村十分流行,包括独唱、齐唱、鼓乐、吹打、合奏等多种形式,可不断变换,灵活组合。既可制造出锣鼓喧天、调兵遣将、声势磅礴的场面,也可唱出盼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心情,使人有“耳听仙乐”的感受。特别是道教音乐与广东方言及铃、鼓、铙、鱼、钟等民族乐器相结合以后,成为民间音乐一部分,除了有时在宫观演唱以外,绝大多数是在民众集会和各种红白喜事中进行,往往吸引许多人,形成人山人海的场面,许多大型集会莫不如此。

道教讲究占卜、符箓、炼丹、养生诸术,充满神秘、迷信色彩,但在道教文化中也有一些精华,如道教丹鼎派在岭南的代表人物葛洪,先居广州,创建三元宫,为民治病,后携家上罗浮山,采药炼丹,著书立说,有《抱朴子》、《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等达 60 余种,计近千卷传世,在祖国医学、化学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广州纯阳宫道士李青来,在漱珠岗上建立广州最早的天文台——朝斗台,并协助两广总督阮元撰修《广东通志·天文志》,在广东方志史上传为佳话。

道教除宣扬天界、仙境、地府以外,又谓世上诸名山中,有仙人及真人生活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等。所以许多名山多以此为基础,修建宫观庙宇,经营为风景名胜地,如南海西樵山、博罗罗浮山、万宁东山岭、三亚鳌山小洞天

等,不但有被人格化了的岩洞、石蛋等,附会各种异闻传说而形成的洞天神地,并且还有历代骚人墨客留下的大量摩崖石刻,吸引远近游人,丰富了旅游文化。

第三节 儒教文化景观与分布

儒学是否可称宗教,目前分歧很大,但它作为汉文化的脊梁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却是无可置疑的,且佛道儒三教并称由来已久,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学是具有中华民族形式的一种宗教,即儒教。儒教为显学,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历代王朝每用行政命令手段推行它的主张,除了要求人们诵读儒家经典以外,还有祭天、祭孔等不同形式和等级的祭祀活动。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各级学校,即学宫,作为传授儒学的场所。此外,公私举办的各种书院社学,以及为宣扬封建文化道德而建立的府第、牌坊、碑刻、额匾,楹联等,皆为儒教文化外壳部分,构成可视的文化景观。由于各地文化发展状况不同,这种景观同样具有较大地域差异。

一、儒教建筑文化景观

秦汉以降,中原封建文化进入岭南,公私学校代有发展,由官办的府州县学到官办或民办的书院、社学、义学等虽构成不同等级的教育层次,但它们的建筑文化景观却同出一辙,并无特质上的区别。

儒教在中国历史上的显赫地位决定了学宫(孔庙或文庙)的特殊地位,被视为中国封建文化的崇高殿堂,“神圣空间”代表之一。明清时代学宫在广东发展最盛,各府州县治所都有成立。一般多设在城内,也有在城外者,但都离开市井和喧哗嘈杂之地。有些学宫设置在风景秀丽的山脚之下,成为独立的文化聚落,如增城、三水和香山县学即属其列。清末废科举,学宫多改为新式学堂,省内现今许多中小学校,即为学宫旧址,如增城县学宫为今增城中学所在地;阳江县学宫俗称考棚,今改为县城一小;海丰红宫也是明代县学宫改成的;广州香禺学宫,即现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学宫规模大小可以不一,但其布局都按儒教礼制要求来组合,特别强调在空间组织上体现上下、主从、内外有别的社会秩序。由间到幢到进,再由进组合成庭院。庭院中空,虚实相间,层层渐进,达到给人以无穷无尽之感的空间效果,自然要表明封建社会秩序长存不衰。其配置格式,皆为中轴对称,包括棂星门、大成殿、东、西庑殿、乡贤祠、名宦祠,以及庭、桥、台、畔池等,有些学宫还有华表、牌坊、碑林、尊经阁、明伦堂等建筑,进深从三开间到五开间,组成一个庭院相间、殿祠兼具的建筑群落。学宫外观立面多为重檐歇山顶,正脊、垂脊和戗脊都装饰以龙、凤和合角吻等。又结合岭南多雨潮湿特点,檐柱多采用整条石柱或上木下石相结合结构。屋顶多采用琉璃瓦板、瓦筒、瓦当;官室内外的梁、枋、檐板、门窗、隔扇等构件上多有祥龙彩凤、花鸟虫鱼、狮子等瑞兽的雕刻和彩绘。雕凿精湛,造型华美。许多学宫的雀替、驼峰、爪柱等构件多施透雕,玲珑剔透。这都使建筑物显得雄

伟壮观,华丽又不失细腻,具有浓厚的岭南地方特色,堪为建筑文化杰作。加上春秋两次祭孔和平时其他纪念活动,更加强了殿堂热烈和隆重的气氛。这些学宫虽经时代变迁,但仍有很多被保存下来,成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比较著名的有新会学宫、五华长乐学宫、梅州孔子庙、龙川老隆孔庙、德庆学宫、高要文庙、揭阳学宫、南海学宫、韶州学宫、海康圣宫、遂溪孔庙、文昌文庙等。

晚近宗教建筑,不但佛道合流时有出现,而且连儒教也被纳入其中,构成三教合一的建筑群。如建于1911年的清远飞霞洞,包括了三教殿、弥勒佛殿、无极宫、藏经阁、礼耕书室等,亦反映佛道儒三教文化日渐走向趋同。

书院是学宫以外的重要教育场所,虽然官办或民办都有,但它到底不像官学那样随政治隆替而兴衰,具有相对稳定性,故能成为传递和延续学术思想的重要基地,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书院一般都有讲堂、廊庑、斋舍等建筑,形式不如学宫严格。但有的书院规模并不亚于学宫,建筑风格也很有岭南特色。例如著名的广州陈家祠,原称陈氏书院,占地面积达1.32万平方米,主体建筑为三层院落的四合院,两旁廊庑纵横,厅堂轩昂,充分运用石、砖、木、灰、铁、陶等广东民间传统材料和工艺进行装饰。题材广泛,包括历史人物、民间故事、岭南山川风物、楼台胜景、名花佳果等,构图严谨,工艺细腻,富丽堂皇,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书院文化景观的代表。

社学和义学是地方教育中最基层的一种,有启童蒙、兴教

化之意,过去遍设于乡里。其布局与书院颇多共同之处。例如鸦片战争时曾作为广州各界共同反帝总指挥部的石井升平社学,即为三进院落的四合院式布局,硬山顶建筑。从它的规模和建筑文化风格也反映其他社学与书院是一脉相承,具有共同文化景观的。

儒教极力宣扬和维护封建礼教,为褒彰封建忠孝节义和功名寿禄而兴建的牌坊曾大量见于各地,以明代建的最多,在潮州、海康、琼州都出现过牌坊群,构成独立的文化景观,可惜存下无多。这些牌坊,木、石、砖三种材料都有。木牌坊以江门陈白沙祠牌坊为代表,佛山祖庙灵应牌坊也是木构的。但广东多雨,为保存耐久,花岗石牌坊代替部分木牌坊、潮州宗山书院坊、新会文庙石牌坊、东莞余屋进士坊、佛山升平人瑞坊等都是保存完好的石牌坊。砖牌坊是以砖墙柱承重,以砖雕作为主要装饰的牌坊,如佛山祖庙内“褒宠”牌坊、潮州碧湖洞天坊、广州海珠区龙潭村“乐替好施”牌坊等。广东牌坊一般为四柱三间或二间三楼庑殿顶建筑,高约5—8米,外观古朴厚重,有些雕有龙凤、花卉、人物等图案,所书多为贞寿、流芳、纪功、名宦、及第等字样,内容很复杂,封建糟粕也不少。但其中也不乏有历史文化价值者,故能作为文物留存至今。

二、儒教文化景观分布

中原封建文化传入岭南,儒教也逐渐得到扩布,公私学校随之兴起。但由于资料所限,难以确定古代广东各类学校分布

状况。至迟到唐代,岭南一些郡县已有儒学之设,不过数量很少。正德《琼台志》说:“唐岭南州县学仅四十五人”^[37],到宋代,绝大部分州县都有儒学了,连僻处炎荒的海南岛,“教化之开,始于南宋”^[38],元代则“遍天下郡县皆有学”^[39]。但儒学兴盛,还是明清时代。不但府、州、县以及卫所有公办官学,而且私学也很发达,尤以书院为著。明代一些理学名儒相继抵穗或其他州县,创办书院,士子云从影随。据统计,宋代广东书院有20多所,明正德年间广东共创建书院8所(含官立和私立,下同),嘉靖年间达78所,万历年间又建43所,崇祯年间再共建16所。书院所在地除广州、惠州、高州、潮州、罗定洲、儋州、雷州、南雄等府州以外,比较偏远的县亦有设立,连海南定安、会同、澄迈等县也不例外。到清康熙元年至雍正十五年(1662—1785年)广东共有书院101所,而乾隆元年到道光二十年(1786—1840年)又创设190所,遍布各州县,如香山县有15所,广州有11所,新会有9所,潮州有6所^[40],成为这些州县作为广东文化发达之区的一个标志。明清书院至今旧址犹存的有广州广雅书院、玉岩书院;番禺召棠书院、九成书院;汕头翁公书院;澄海冠山书院、莲砂书院;饶平瑞光书院、琴峰书院、乙峰书院;潮阳莲峰书院、贵山书院;普宁三都书院;始兴桂山书院;乐昌紫阳书院;蕉岭桂岭书院;陆丰西峰书院;中山龙山书院;佛山莲峰书院;南海西樵云溪书院;阳江廉溪书院;徐闻贵生书院;海康浚元书院;肇庆三都书院;高要嵩灵书院、五云书院;新兴武功书院、植槐书院;英德文吴书院;罗定罗西书院;连县南轩书院;四会登云书院;珠海金山书

院;琼山琼台书院;儋县东坡书院等,约五十余所,分布比较分散,皆为重要文物古迹。

宋代初创社学,后世因之。如元代农村每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社学一所,明代社学成为各类学校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广东全省社学数量不详,但据正德《琼台志》记载,成化十年(1474年),海南各州县共建社学 179 所^[41],全省数量当然更可观。到清代,社学更加普遍。据道光《广东通志》统计,全省有社学 562 所,其中广州府有 232 所,韶州府有 44 所,惠州府有 50 所,潮州府有 34 所,肇庆府有 40 所,高州府有 35 所,雷州府有 17 所,罗定州有 14 所,南雄府有 16 所,嘉应州有 29 所,琼州府有 51 所^[42],广州府社学占全省总数 41%,成为全省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牌坊地区分布也不平衡,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收录统计,省内现存各类牌坊约 70 多座,见于 40 多个县市。历史上文化发达的地区,方志所记牌坊更多,现在每县也不止一座,如顺德、南海、番禺、中山、潮州、揭阳、大埔等县市,多有三五座不等,而见于粤北,海南山区者甚为寥落。这也反映了儒教文化空间占用的地域差异。

第四节 伊斯兰教文化景观与分布

广东是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最早地区之一。作为一个新兴教派,伊斯兰教虽饱经沧桑,但它生长出的强固枝干和繁密绿叶,始终覆盖着岭南部分土地。特别是它的宗教生活与家庭生

活合而为一,较其他宗教更具持续力量,由此产生的宗教文化景观特别强烈,影响也至为深远,至今仍在岭南文化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一、伊斯兰教文化在广东的传播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有海陆两条路。海道从波斯湾经印度洋,绕马来半岛到广州。最早记载是隋开皇七年(587年),韩葛思自大食航海抵广,方建礼拜寺于广州,赐号怀圣^[43],自此,伊斯兰教文化开始在广东传播。

唐代,岭南海外贸易与文化交流更为活跃,入居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数量大增。据说黄巢起义军攻克广州时,被杀的阿拉伯教徒多达12万。他们在广州的聚居地曰蕃坊。唐代人们多信佛教,所以伊斯兰教文化在岭南,主要为阿拉伯人所接受,另外,唐政府规定:“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聚、来往”^[44],这也有助于保持伊斯兰教风俗文化,蕃坊也就成了广州城市文化景观孤岛。那里建有怀圣寺和光塔,居住在那里的“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45],为广州增添不少别致的文化景观。

宋代,广州作为国际性贸易港更加兴盛,入居伊斯兰教徒人数更多,除广州以外,还分布于南海、番禺、顺德、潮州、海口、万宁、三亚、儋县等地,伊斯兰教文化随而向这些地方传播,影响范围更大。顾炎武说:“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

城，以长子孙。……禁网疏阔，夷人经商，翱翔城市。”^[46]这些教徒多蒲姓，居住在光塔东侧普宁巷，时称蒲夷人巷。有个大食商人叫辛押陀罗，居广州多年，家资甚富，熙宁年间曾进银助修广州城，为广州文化建设作过贡献。据说他曾出任广州蕃坊蕃长，任命诏书还是苏东坡起草的。另据岳珂所著《程史》测知，蒲姓商人聚居的广州光塔路，屋宇宏丽，楼高百尺，布置大方，后花园有池亭阁榭，花木掩映其中。光塔状如银笔，高入云表，气势不凡，常有外商登塔祈风，祷告之声，全城可闻。此蒲姓人非常富有，每宴客，“龙麝扑鼻，奇味不知名”，且爱以烤全羊待客，“皮色如黄金”^[47]。在海南陵水到三亚海岸一带，有数百座伊斯兰教徒珊瑚墓葬群，其文化内涵比广州伊斯兰教文化稍早，也比较简朴，时代约从唐到宋。此正是伊斯兰教徒在海南活动频繁时期，与宋文献记载占城回教徒迁移海南沿海事件吻合^[48]。唐鉴真一行从海南回大陆，在万安州见当地大首领冯若芳奴婢居处，“村村相次”^[49]，当为波斯奴村落。又据李昉《太平广记》载，唐振州豪强陈武振也以掠夺波斯商船致富^[50]。宋万安军城东北有舶主都纲庙，俗称番神庙，即道光《琼州府志》和《万州志》所称的莲塘昭应庙，祭祀时忌用猪肉，也实为伊斯兰建筑文化生根海南的佐证。

元明以后，伊斯兰教文化在广东日趋衰落。原因一是元统治中国，伊斯兰教处于最盛时期，但广东位处南疆，伊斯兰教文化远不如他省强劲；二是部分伊斯兰教徒与中国人同化后，放弃原先文化，习用中国伦常方式，伊斯兰教文化的地位相对下降，但到明清之交和清道光、光绪年间，又有一些伊斯

兰教徒从省外迁居韶关、肇庆、海南等地,主要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建立清真寺,自成社区,开展宗教活动,伊斯兰教文化继而在这些地区扩布,此后代代传承,延续至今。

二、伊斯兰教文化景观

伊斯兰教是一种世界性宗教,当初它是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传入岭南的,但与其他宗教一样,在岭南这块肥田沃土兀兀高长,形成自己的文化景观,跻身各宗教文化之列。

近年统计,广东伊斯兰教徒约有 1.25 万人,主要分布在城市,其中广州 6500 人,深圳 300 人,珠海 250 人,肇庆 400 人,三亚 5000 人,神职人员仅十余人。从人数上看,伊斯兰教徒比唐宋盛时要少得多。但长时间积淀所形成的文化成果,与其现在人数多寡并不成比例。这在各种文化景观中都反映出来。

伊斯兰教建筑文化,从《古兰经》到建筑个体,都有自己一套完善的词汇体系和符号系统,建筑个体与城市结构体系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广州怀圣寺与光塔,即这种结合的杰作和范例。

怀圣寺是伊斯兰教的活动场所,一说建于贞观元年(627 年),为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最早建筑,由礼拜大殿、看月楼、月台、碑亭和东西长廊等组成,与光塔一起构成一大建筑群。大殿形式类似穹庐,有西域风格,而其顶与看月楼一样,为重檐歇山顶,形式与我国南方干栏式建筑相同,说明它们是结合岭

南地理特点兴建的。同一时期兴建的光塔，高 36.3 米，为圆柱形砖塔，下大上小，光滑无窗，呈砖灰色，故群众称为光塔，另教徒礼拜时，每登临塔顶高呼“邦卡”，即招呼教徒作礼拜仪式，“邦”与“光”音近，故有此俗名。塔顶过去饰以金鸡，可测风向和起导航作用。光塔形态不同于佛教宝塔，充分显示伊斯兰教的独特建筑风格，但又类似我国旧传华表，反映它也是西方建筑文化传入广东与当地建筑文化相互融合的物证。光塔所在之地，唐代还是一片汪洋，建造者就地取材，以蚌、螺壳为原料，掺以糯米建成，亦为中国建筑文化一大贡献，现在广东各地留下用此原料的建筑物不少。再者光塔没有避雷针，千百年来久经风雨侵蚀而岿然独立，专家认为由于它建立在水眼上，得以防避雷击。怀圣寺与光塔珠联璧合所构成的建筑文化景观，不仅为广州建筑文化增添异彩，而且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起过重要作用，因为它是阿拉伯人东方航路的终点和伊斯兰教东传，以及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现在广东仍保存十座清真寺，在广州除怀圣寺以外，还有小东营清真寺，在肇庆有城东和城西清真寺，在三亚还有六座清真寺，它们都有相类似的伊斯兰教建筑风格。

伊斯兰教讲究艺术，各地清真寺和墓群上保持不少阿拉伯文雕刻，内容既有宗教经文和祈祷语，也有追述历史记载和年代考证；种类既有石雕铭文或墓志，也有木刻匾额和楹联；风格有的保留阿拉伯传统，有的结合中国书法艺术形式。海南陵水到三亚海岸伊斯兰教徒墓葬群上墓碑，上面刻有阿拉伯文和图案。图上画了一轮明月和云彩，两侧各有飞鸟，似是波

斯神话中的神鸟。文中还有《古兰经》片段。墓主人屈膝朝西埋葬,以朝向西方伊斯兰教天国。据考古工作者认定,这属唐代碑刻,也可能是我国规模最大、形式最原始、年代最久远的伊斯兰教文化古迹,只是还有很多问题目前仍未弄清楚。广州北郊先贤古墓(又称响坟)即为伊斯兰教文化另一荟萃之地。那里环境优雅,一派乡村景观,为伊斯兰教徒安息之地,包括高大石牌坊、门廊匾额、墙壁碑碣、墓志铭等,琳琅满目。例如南门高大石牌坊上端正中,有一祥云圆月图案,上刻圆形阿文奉名词,“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名”,下刻《古兰经》文曰:“人总是要死的,死后即归召于我。”牌坊两侧还刻两段圣训,“死亡足以发人深省”、“现世足以分晓逝迁”。其中最著名的圆顶墓(宛葛素墓),属摩尔式(即圆顶)风格建筑,还有塔式墓盖等。古墓除中世纪真迹以外,主要是上述近代文化精品。当地人传墓里常发出响声,使住在附近的迷信者感到恐怖,是以名坟。实际上,这墓被视作非常神圣的地方,常有穆斯林朝觐者从很远的地方来朝拜。墓园里还有数十座外国建筑风格墓葬,墓主人来自海外。这展示海外文化也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1955年在广州新市镇附近另建立回族坟场,墓碑林立,分别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或英文书写,为外来文化与岭南文化相结合的另一个场所。

伊斯兰教徒有其特殊生活方式,也是广东文化景观一个窗口。按照教规,教徒必须执行“五功”,一即念,时常念诵“清真言”;二为礼,每天向麦加作五次礼拜,即晨礼、晌礼、哺礼、昏礼、宵礼,以及每星期五“主麻日”到清真寺聚礼;三为斋,

每年封斋一个月；四为课，即纳天课；五为朝，有条件者一生至少到麦加城朝觐一次。平时遇有红白喜事，皆由阿訇主持，举行宗教仪式，例如男孩割礼，不过这一习俗现已革除。此外，在节令、服饰、食品制作等方面的一些习惯，都是根据《古兰经》规定沿袭下来的。特别是伊斯兰教饮食文化别具一格，风靡大中城市。在广州、肇庆、三亚等城市普遍设有不同档次的回民饭店和酒楼、宰卖光鸡光鸭以及烧烤等排档。据说广州油煎饼制作技术也来自伊斯兰教。

在广州阿拉伯人过去聚居的蕃坊，留下许多阿拉伯语地名，也直接或间接反映伊斯兰教文化景观。据马逢达《广州蕃坊考》^[51]，这些古今地名计有：

| 古地名 | 今地名 | 阿拉伯语含义或称呼 |
|------|------|---------------|
| 甜水巷 | 甜水巷 | 中国山岗 |
| 朝天街 | 朝天路 | 朝天房 |
| 大市街 | 惠福路 | 大食街变音 |
| 诗书街 | 诗书路 | 狮子音译 |
| 光塔街 | 光塔路 | 大舍巷 |
| 仙羊街 | 海珠中路 | 送别巷音译 |
| 仙邻巷 | 仙邻巷 | 支那(中国) |
| 蓬莱北街 | 蓬莱北街 | 真主至大 |
| 玛瑙巷 | 玛瑙巷 | 大食、波斯人卖珍珠玛瑙之地 |
| 擢甲里 | 擢甲里 | 小巷 |
| 纸行街 | 纸行路 | 与大食有关 |
| 番巷 | (已佚) | 光塔街意思 |
| 玳瑁巷 | (今无) | 装饰物 |
| 蒲宜人巷 | 普宁巷 | 蒲氏宜(夷)人居地 |

这些地名皆以光塔路为中心，大抵东起今解放路，西迄人

民路,南达惠福路和大德路,北止于中山路,覆盖广州老城内,形成伊斯兰教文化地名集群,反映阿拉伯人信仰、风俗、语言、服饰、商业和建筑文化,给广州文化景观空间组合,留下宝贵的吉光片羽。

第五节 天主教和基督教文化景观与分布

天主教和基督教是 16 世纪以后逐步传进广东的,由于它们来自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多或少都附带传来了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但当时的传教士为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大不乏人。他们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为后盾,故能以比其他任何宗教都无法相比的规模和速度,渗透到各行业、地区和民族,并作为一种新文化景观,占用广东各地文化空间,改变它的结构和风貌。

一、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广东扩布

于唐代传入中国之景教,被认为是基督教前身。据阿拉伯旅行家阿布·扎德·哈桑(Abu Zaid Hassan)《东游记》称,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有 12 万回教徒、犹太人、火祆教徒和景教徒被害。可见唐代景教已进入岭南,但没有留下多少遗迹,以后一蹶不振。直到明中叶以后,传入广东的首先是天主教,继为基督教。前者以意大利人利玛窦,后者以英国人马礼逊为早期代表人物。他

们分别于明末和清中叶从澳门进入肇庆和广州传教,开创西方宗教在我国传播的先河。这股新的宗教势力逐步深入广大城乡,包括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在所到之处办教会、建教堂,发展教徒,举行宗教活动,同时建立医院、学校、育婴堂以及其他慈善事业,作为传教的手段和先导。据统计,到雍正十年(1782年)在广州有男女天主堂八处,男教徒一万人,女教徒二千人^[52]。而在此之前1565年,澳门已有天主教徒五千人^[53]。而这个时间前后,澳门人口也不过五六千人^[54],即澳门绝大部分居民都成为天主教徒。1576年在澳门成立主教区,它控制了中国、日本、朝鲜、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老挝和印尼等国家的教会,成为世界性宗教活动中心。万历九年(1581年)利玛窦始抵澳门,前后留居20年。在此期间,利玛窦以澳门为基地,往返于澳门和肇庆之间,在肇庆建立了中国内地第一间天主堂——仙花寺。此消息传到欧洲,引起很大反应,各国争先派教士到澳门伺机进入中国。利玛窦还在肇庆从事一些宣传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活动,后来又到了韶关,在韶关城西建立一所教堂,几年间经常往返于韶关和南雄之间,使天主教在粤北扩展起来。利玛窦离开广东以后,去了南昌、南京和北京,受到万历皇帝接见,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各国天主教、基督教徒一批接一批来到广东,传教活动达到高潮。特别是基督教更有后来居上之势。它首先在广州立足,战后开始在汕头布道,很快把香港、东莞发展为传教根据地,继而伸向粤西客家地区。第二次鸦片战

争后,佛山成了基督教宣教基地,珠江三角洲被纳入其布道区域,接着向韶关、东江、西江和潮汕一带扩展,使之成为自己势力范围。到上世纪末,两阳、德庆、罗定和海南沿海被开辟为新宣教区,以后则在东江流域和海南一些边远地区发展。只是粤西南与广西接壤边境,海南岛中部,英德以西山区和连州附近,由于各种原因,尚未被基督教势力侵入,全省已基本被其覆盖。在人口稠密的珠江三角洲和沿海一些通商口岸,几乎每个镇都有教堂,宗教文化和影响几乎达到无处不在的地步。1914年全省有基督教徒48347人,到1919年全省有基督教差会43个,教堂924所,教徒62262人,占全国基督教徒总数1/6强,教会举办小学797所、中学37所,中小學生四万余人,另办岭南大学一所、医院39所,拥有病床2702张。天主教也不在基督教之后,1919年,全省有天主教堂464所,教徒约10万人,翌年全国天主教徒为197.1万,广东有12.4万,占6.3%,居全国第一位^[55]。仅新会一县,1908年就有西洋教堂20所,其中10所有教徒1600多人^[56]。宗教生活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尤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甚:“礼拜之期,附近南(海)、番(禺)、东(莞)、顺(德)、新(会)、香(山)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唯顺德县紫泥人最多。”^[57]这些数字和现象充分显示近世西洋宗教在广东扩布是全国其他省区难以相比的。

建国前夕,天主教在广东发展到九个教区,主要由法、意、美、葡萄牙等国主教控制。即广州总主教区,统辖广州话分布区;香港教区,统辖港九和新界;嘉应教区,统辖客家话分布地

区为主,包括梅县、兴宁、蕉岭等地;江门教区,统辖以讲四邑话为主地区,即潭江流域;澳门教区,只辖澳门一地;韶州教区,统辖以韶关为中心的粤北地区;汕头教区,统辖讲福佬话为主的地区;北海教区,统辖南路地区;海南教区,统辖整个海南岛。

基督教在广东也划分 11 个教区,布道范围及教堂分布如下(表 5):

表 5 基督教在广东分布(1949 年)

| 教区别 | 区 辖 范 围 | 教堂数(所) |
|-----|----------------|--------|
| 总 计 | 全省 | 222 |
| 第一区 | 广州、南海、佛山、盐步 | 23 |
| 第二区 | 顺德、南海、中山、高明、高要 | 16 |
| 第三区 | 台山、开平、恩平 | 55 |
| 第四区 | 东莞、增城、博罗、龙门 | 35 |
| 第五区 | 阳江、阳春 | 13 |
| 第六区 | 香港、九龙、新界 | 17 |
| 第七区 | 番禺、从化、花县 | 8 |
| 第八区 | 连县、阳山、连山 | 10 |
| 第九区 | 茂名、化州、电白 | 14 |
| 第十区 | 新会、中山、澳门 | 28 |
| 特别区 | 湛江 | 3 |

(资料来源: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订正中华基督教团体调查录》,1950年1月再版)。

基督教区并不包括潮汕、兴梅和海南岛,这可能是组织上未覆盖它们,而不是没有教堂和信徒。因为这些地区有不少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实际上,分属美、英、德、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各个基督教系统的分支教会,都瓜分得一定布道范围,其中兴梅地区归美国浸信会和德国信义会,潮汕地区归德国崇真会。而海南早在明崇祯年间就有基督教活动,清初布道已及沿海,教徒约有4000人,到本世纪初,深入五指山黎苗族地区,教徒达上万人,建立教堂和教会学校十余间,主要为德国信义会控制。

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均以十字架为旗号,以宣扬天主和基督福音为名,争取群众入教,所以它们布道区域,并没有严格界限,实际上它们的传布,都是交叉、重迭,不断从点到面,逐步拓展,相联成片,率而覆盖全省的。

二、天主教和基督教分布格局与文化景观

建国后,西方宗教在我国走上自主、自养和自教道路,在经历许多坎坷以后,近年才踏上正常发展轨道,不但修复被损坏被占用的宗教场所,教徒也有所增加。如1987年全省有基督教徒约13万人,1990年已达17万人,增加30.8%,分布区域也在扩大,连偏远山区也不例外。如海南琼中县,到1986年恢复和新建基督教堂12间,传教点6处,新入教的黎、苗族群众1371人^[58],从县城到农村的教堂,每逢礼拜天都挤满了祈祷上帝的基督教徒。其他地区

发展状况当不在琼中县之下。

从教徒和教堂分布看,汕头、汕尾、梅州、湛江为天主教布道中心,而基督教则以汕头、梅州、河源、汕尾、湛江、江门和广州为中心,形成几个比较大的分布区域,构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例如临高东英镇凤潭村附近有 500 多名基督教徒,原因是 1927—1928 年在那里设过分教堂,群众大部分都入了教。由于同样原因,揭西县上砂区山仔村,则是天主教徒聚居地。

西方宗教虽然教派林立,但在文化景观上却有很多共同性,特别是建筑文化,主要是教堂。坐落于城市者,鹤立鸡群在众多普通建筑物中;位于乡村者,每建于山丘、高地之上,有居高临下之势,突出其“神圣空间”形象。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统计,广东(未含海南岛)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西式教堂有 58 所,散布在 35 个县市,即广州、佛山、中山、番禺、高明、三水、江门、新会、台山、开平、汕头、澄海、饶平、南澳、潮阳、揭西、始兴、新丰、乐昌、和平、紫金、梅州、蕉岭、五华、博罗、汕尾、陆河、阳江、廉江、湛江、肇庆、高要、罗定、云浮、怀集等。这些教堂建筑形式和风格丰富多样,主要有:一、哥特式。现存 10 所,如广州石室天主堂、佛山中华基督教堂、江门象溪天主堂、澄海盐灶中华基督教堂、澄城天主堂、湛江霞山天主堂等。哥特式建筑特点在于高耸入云的尖塔、屋脊的尖顶和弯而高的拱门。在视感上这尖塔似乎可将信徒带上高深莫测的神秘天堂,产生与天国沟通的宗教气氛;大门上的雄伟雕刻,廊柱上逼真的浮雕,墙壁、屋穹上那缤纷多彩、风格严谨的壁

画,以及色彩美丽的玻璃镶嵌,都造成色彩斑斓、若明似暗的空间环境。置身其间,一种肃穆、庄严和神秘之感油然而生。其中广州石室亦称圣心大教堂,是我国现存最大花岗石构筑的哥特式天主堂,被誉为“远东巴黎圣母院”,占地 270 平方米,高 57.95 米,比广州六榕寺花塔还高 1 米多,塔尖上嵌大时钟,现已恢复报时,远近可闻。石室东侧角石上,刻有拉丁语 Jew-salem(耶路撒冷)1863,而西侧的角石上刻有 Roma(罗马)1863,意为天主教创立于东方耶路撒冷,而兴盛于西方罗马。当年修建石室时,曾分别从两地取一公斤泥块作奠基用,这也是东西方文化在广州移植、生根的一桩佳话。湛江霞山天主堂外观与石室一样,目前保存尚佳,其余地区哥特式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二、仿哥特式。现仅存中山石岐天主堂和环城区鳌溪村基督教堂,但楼顶没钟楼。三、罗马式。现存两处,即揭西上砂镇上山子天主堂和汕尾镇捷胜天主堂。圣心殿为圆柱形,殿顶为悬拱形,给人以一种权威感觉。四、意大利式。现仅见于从化县街口镇基督教堂,抗战时被毁,后重修,为钢筋混凝土建筑。五、中西合璧式。兼具中国宫廷式与西洋式建筑风格。现存 23 处,院落外观红墙绿瓦,悬山顶,但又有尖顶式钟楼和哥特式或罗马式门窗,显示西方宗教建筑色彩。六、其他形式。指建筑风格不明的教堂,也占很大比例,想当初是按一定风格兴建的,后来重修,原来的风格反被湮没了。实际上,不管那种形式的宗教建筑,外观都有十字架、钟楼、圣母像,内设洗礼堂、经堂、忏悔室、祭台、牧师或神甫室等,有的还有莲花池、小花园之类建筑。有些教堂功能扩大,将附属建筑

联成一体，构成复杂建筑群。例如梅州圣约瑟天主堂与修道院、传信大学、女修道院等联成一建筑群。江门北街天主堂，同设男女修道院等。雕刻也是教堂的重要文化构景，一般有镶嵌画、玻璃画、湿壁画、祭坛画、细密画等。广州教堂绘画较少，唯石室有玻璃画和祭坛画，表达圣经里的故事，间有红、橙、绿等颜色，在阳光照耀下，教堂空间更加扑朔迷离。此外，教堂一般都有圣像，包括圣母像、耶稣像等。而蕉岭叟乐天主堂却由祠堂改成，增雕了梅雀、梅鹿、羚羊等宗教图案，也是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的一种结合。

天主教和基督教有一套独特活动内容，包括布道、洗礼、礼拜、募捐、救济，以及一系列宗教仪式，如静坐、唱诗、宣召、燃点圣灵降临烛光、考侯、召请、认罪、赦罪、默想等，充满了虔诚气氛，信徒在这样的意境中求得心理平衡和满足。如广州教堂设有唱诗班，题材多以宗教思想和圣经故事为主。另外，这种宗教生活，既然是所在地区世俗或市井文化一部分，也使它充满了生活气息。因而能为一些人所向往和追求，常常可见一些青少年，脖子上带上十字架项练，参加教堂礼拜活动。尤其是圣诞节，广州各教堂挤满了教徒和非教徒；一些学校举行舞会，学生间相互赠送礼品。在广州，圣诞平安夜的庆祝活动，近年也有渐趋兴盛之势。

注释：

[1]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67页，《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2] 转见民国三十年《广东年鉴》第25编,第六章《社会事业·宗教》。
- [3] 据《大藏经·传记部》诸部统计。
- [4] 中山市博物馆《中山历史文物图集》第43页,香港大公报出版,1991年版。
- [5] 《梅县市文史资料》第四辑,第84页,1983年。
- [6] 佛山市宗教事务局《佛山市宗教志》第45页,1990年印。
- [7] 据《当代中国的广东》第二节,送审稿,1990年。
- [8] 道光《琼州府志》卷11,建置。
- [9] 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海南省志·宗教志》(稿)第13页,1992年印。
- [10] 《广东佛教》1990年第6期第6页。
- [11] 嘉靖《广东通志》卷20。
- [12] 乾隆《潮州府志》卷15。
- [13] 转见《广东佛教通讯》1989年第6期第16页。
- [14] 《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第36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8年版。
- [15] 詹南生:《雷州佛教音乐》,见《海康文史》1985年第2期第61~62页。
- [16] 道光《广东通志》卷329,安期生传。
- [17]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6,神语。
- [18] 范瑞昂:《粤中见闻》卷5。
- [19] [20] [21]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6,神语。
- [22] 范瑞昂:《粤中见闻》卷5。
- [23] 正德《琼台志》卷26,坛庙。
- [24] [25] [26] 范瑞昂:《粤中见闻》卷5。
- [27] 佛山市宗教事务局:《佛山市宗教志》第55页,1990年印。
- [28] 道光《南海县志》卷12。
- [29] 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1。
- [30] 《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五辑,《清末民初的佛山木雕业》。

- [31] 《广州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广州的搭棚业》。
- [32]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15,货语。
- [33] 《东方文史》第三辑,《墩头村武功馆》。
- [34] 杨睿聪:《潮州的习俗·职业·妓馆》,支那印书社,1930 年版。
- [35] 广东省宗教事务局提供数字,1990,12。
- [36] 局歧后:《修元妙观记略》,转见《惠州文物志》第 49 页,惠州市文化局博物馆印,1986 年。
- [37] 正德《琼台志》卷 15,学校上。
- [38] 林之椿:《序宝粹书塾藏书目录》。
- [39] 陈大震:《南海志》卷 9,学校。
- [40] 以上统计数字,见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第 380、381、465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 [41] 正德《琼台志》卷 17。
- [42] 道光《广东通志》卷 144。
- [43] 福建泉州《重立清静寺碑》,但对怀圣寺建立时间,很多学者认为在唐代。
- [44] 《册府元龟》卷 999。
- [45] 庄季裕:《鸡肋编》。
- [46]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104,广东条。
- [47] 岳珂:《程史》卷 11。
- [48] 《宋史》卷 489,外国五,占城。
- [49]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第 69 页,中华书局,1979 年版。
- [50] 李昉:《太平广记》卷 286。
- [51] 转见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第 235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 [52]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 195~196 页,中华书局,1962 年版。
- [53] 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第 126 页,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
- [54] Roderich Ptak:《The Demography of old Macao 1555—1640》,《Ming Studies》1982 No:5。

- [55] 以上数字见《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1920 年》(上),三章十二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
- [56] 《广东文史资料》第 14 辑,第 165 页。
- [57] 民国《香山县续志》卷 6,海防。
- [58] 王国全、陈日深:《基督教与海南岛苗族》载《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馆刊》创刊号,1987 年第 79 页。

第八章 地名文化探源

地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不仅因为它往往直接反映语言和民族起源的空间分布,具有可悟性的一面,而且当它出现在聚落、道路、田野、标牌和布告栏时,又具有直观性的一面。所以,地名属于既可悟又可视的文化景观。文化地理力图通过地名研究,再现各地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景观,指示历史上的重大政治变革,经济兴衰,民族迁移,宗教信仰等状况,从地名可透视无限丰富的文化内涵。

第一节 广东历史政区地理与地名

岭南未有行政建置时,地名早已产生。在先秦诸子文献中,岭南就有瓠、邓、桂国、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胸国、桂林、南海、牂牁、苍梧、大庾、邗阳、缚娄、阳禺、番(贲)禺(隅)、玄山、陆梁、儋耳等地名,指实岭南部族居地、山水、城邑等,并有一定文化内涵。例如番禺一说指盐村,“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

曰余”^[1],而“牂牁者系船筏也”。^[2]又陆梁一说指山谷^[3]等,说明当时中原政治势力已顾及岭南,许多情况为中原人所熟知,为以后实行政治统治打下基础。

秦汉岭南并入中央王朝版图,正式有行政建置。秦置南海郡,在今广东境内置番禺、龙川、四会、博罗(博罗)、揭阳5县。西汉初则在广东设3州7郡26县,许多政区地名相继确定下来。以后由郡——县二级政区发展为州——郡——县三级政区,县以下还设乡或亭,地名层次增多,层层叠压,覆盖地区越来越大,也相对稳定下来。事实上,广东政区不少名称,为秦汉时期所确立,其中有些县名2000年来未尝改变或只有小改,如南海、番禺、增城、中宿(清远)、曲江、贞阳、含洫、博罗、龙川、揭阳、高要、四会、临允、端溪(后省入肇庆)、徐闻、桂阳、阳山等,皆为广东第一批政区地名。

三国时期,广东境内设立县比汉代时增加了三分之一,新建思平(恩平)、平夷(新会)、始兴、尚安(连山)、安宁(阳江)5县,均存至今,唯有些县名称不同,广州地名也在这时产生。

两晋南北朝时期,岭南行政建置急剧膨胀。萧梁时,广东境内建置达14州39郡146县之多^[4],超过现在县市数量。许多地名应运而生,有些已难以开列和考证,但亦有些留存至今,如安遂(云浮)、新诏(广宁)、宁化(电白)、罗州(化州)、新丰、仁化、河源、程乡(梅县)、乐康(徐闻)、扇沙(遂溪)、翁源、梁化(乐昌)、梁德(信宜)等。

隋代对前期叠床架屋式的建置大加省略并精简,从三级制变为二级制。广东郡县数量仅及前代一半,许多地名被废弃

不用,成为历史地名,至今仍考证不清,如刘宋时宋熙郡之初宁、招兴、建宁、崇化、熙穆、崇德 6 县;高凉郡之平定、西巩、禽乡 3 县;宋康郡之单城、逐度、海邻、化隆、开宁、石门、威覃、绥定 8 县;海昌郡之成宁、永建、招怀、兴定 4 县。

唐代政区恢复三级制,即道——州(郡)——县,广东境内增至 24 州(郡)98 县^[5],产生许多新地名,如广州又曰“广府”,新置端、康、新、勤 4 州;隋高凉郡分为恩、春、高、潘、辩、罗 6 州,以及至今仍存的贞昌(南雄)、东莞、石城(廉江)、万安(万宁)、乐会(琼海)等县。

两宋行政区划袭用唐制,以路代替唐代的道。广东由广南东路简称而成,州县数量与唐相差无几,创建长乐(五华)、香山(中山)、乳源 3 县,州县分布比较均匀。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广东粤语、客家语、闽南语(潮州话、福佬话)三大方言区已经形成,它们的分布区域与这时政区界线部分重合,其中粤语和客家语分界线北段和南段与宋代政区界线完全一致,北段即宋英德府与连州的界线,而南段即广州与惠州界线,甚至中段即今新丰、佛岗和龙门(宋属广州)也与循州界线一致。至宋代,客家语和闽南语的分界线当在大埔、丰顺之北,即跟梅州和潮州的政区分界线相吻合,不吻合部分界线则是后来移民的结果。这说明具有地方特色的广东三大方言区的地名格局也在宋代基本上形成,历史行政区划界线也可说是一种地名分界线。

元代除首创省为地方一级行政区以外,还首置专管城厢居民事务的录事司,分置于广州、韶州和潮州路治,为广东城

区行政地名之嚆矢。例如广州录事司有 10013 户,其中南人有 9641 户、北人有 372 户^[6],即为非常珍贵的城市人口和城市地名沿革资料。

明代实行省——府(州)——县三级行政制,元代道、路、司等名称均被废弃,一些政区通名发生变化;如广州路改为广州府、雷州路改为雷州府等,但专名被保存下来。明代海南岛已划归广东,结束与广西长期同属一个政区的状态。广东作为省一级政区疆域已经形成。广东新建或恢复的县颇多,保留至今的有澄海、饶平、普安(普宁)、平远、镇平(蕉岭)、永安(紫金)、和平、连平、龙门、从化、三水、顺德、新宁(台山),多数在粤东,一部分在珠江三角洲,政区分布基本稳定和趋于合理。明代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筑城运动,广东也改变过去一些州县有治无城的状态,以后这些行政中心很少搬迁,它们的行政地名也相对固定下来。另外,明代乡里制度更加完善,县以下大抵十里为一都,以都统堡、以堡统图、以图统甲。嘉靖年间,广东有 4028 个里^[7],每里 110 户。很多里与自然村落名称一致,也有些里是由数个自然村或一个大自然村分开组成的。这些聚落小地名绝大部分保留至今,唯有些通名发生变化而已。

清代广东行政承明制,变化极少,只增建花县和丰顺两县。但乡里数量比明代增多,尤其乾隆以后,户口直线上升,必须设置更多乡里来控制他们。以东莞为例,宣统《东莞县志》曰:“城内曰坊、附城曰厢。坊三而厢一,其在野则以乡统都,乡四而都十三,图则分属坊、厢、都、凡 177”^[8]。番禺则分设沙湾、菱塘、鹿步、慕德里 4 司,6 都、70 堡、120 图、569 村^[9];

顺德县有 3 都、40 堡、294 村^[10]，皆有地名，形成基层建置地名群。

民国时代也基本继承明清建置，不过地名更新不少，如长宁改新丰，新安改宝安，归善改惠阳，永安改紫金，海阳改潮安，会同改琼东等，大都为避免与别省雷同或废弃带有封建性地名。

随着时代变迁，也有一些州县治所搬迁或废弃而被冠以旧州或旧县地名，如湛江附近有旧县 2 处，高州有旧城，信宜、琼海、昌江都有旧县，琼山，儋县有旧州，它们过去都作过州县治所。

综观今广东境内，从秦代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共建置 1317 个县，截至 1980 年，保留下来的县为 109 个，占 8.3%，随着历史发展，许多县名称不断被淘汰。各时代县名存废如下^[11]。

| 时代 | 县数 | 县名存今数 | 占% |
|----|-----|-------|----|
| 秦 | 7 | 4 | 57 |
| 西汉 | 26 | 7 | 27 |
| 东汉 | 18 | 8 | 44 |
| 三国 | 29 | 10 | 35 |
| 西晋 | 31 | 10 | 32 |
| 东晋 | 51 | 13 | 25 |
| 刘宋 | 102 | 15 | 15 |
| 南齐 | 134 | 18 | 13 |
| 梁 | 153 | 21 | 14 |

| 时代 | 县数 | 县名存今数 | 占% |
|-------|------|-------|----|
| 陈 | 135 | 12 | 9 |
| 隋 | 71 | 22 | 31 |
| 唐 | 93 | 36 | 39 |
| 南宋 | 61 | 41 | 67 |
| 元 | 60 | 42 | 70 |
| 明 | 76 | 59 | 78 |
| 清 | 77 | 64 | 84 |
| 民国 | 98 | 89 | 91 |
| 1950年 | 95 | 88 | 93 |
| 总计 | 1317 | 550 | 43 |

从总体上看,广东历代建立的县,平均约有43%名称被继承下来。但在历史早朝建立的县名很不稳定,宋以后才改变这种状况。明清县名基本不变,并发展为今日县名。政区和地名的更替,都是同步进行、紧密相关的。

政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广东政区命名方式,大致可分地理和人事两大类,其中地理类又分为以山、水、方位、物产、故国、驻所、民族、自然现象等,人事类分为教化、祥愿、人物、风俗、宗教、袭旧等。兹将现在县市命名方式列表如下(见表6):

表 6

广东县市命名方式表

| 命名方式 | | 县 市 名 称 | | | | | | | |
|-------------|------|--------------------|----|----|----|----|----|----|----|
| 地 理 类 | 水 | 增城 | 龙门 | 曲江 | 江门 | 湛江 | 深圳 | 珠海 | 南海 |
| | | 高要 | 四会 | 新兴 | 三水 | 郁南 | 封开 | 清远 | 始兴 |
| | | 翁源 | 龙川 | 河源 | 吴川 | 廉江 | 潮州 | 阳江 | 阳春 |
| | | 化州 | 徐闻 | 澄迈 | 昌江 | 陵水 | 琼海 | 汕头 | |
| | 山 | 韶关 | 鹤山 | 台山 | 云浮 | 英德 | 连山 | 乐昌 | 佛岗 |
| | | 紫金 | 五华 | 南澳 | 蕉岭 | 高州 | 信宜 | 揭阳 | 琼山 |
| | | 临高 | 大埔 | 番禺 | 花县 | | | | |
| | | | | | | | | | |
| 人 事 类 | 方位 | 连南 | 惠东 | 潮阳 | 揭西 | 琼中 | | | |
| | 物产 | 连县 | 乳源 | 东莞 | 海丰 | 宝安 | 梅州 | 崖县 | |
| | 自然现象 | 电白 | | | | | | | |
| | 故国 | 博罗 | | | | | | | |
| | 民族 | 广州 ^[12] | | | | | | | |
| | 驻所 | 海口 | 高明 | 开平 | 阳山 | 南雄 | 白沙 | 保亭 | 乐东 |
| | 教化 | 从化 | 恩平 | 顺德 | 怀集 | 罗定 | 广宁 | 仁化 | 饶平 |
| | | 平远 | 连平 | 定安 | | | | | |
| 人 事 类 | 人物 | 茂名 | 中山 | | | | | | |
| | 祥愿 | 新丰 | 肇庆 | 德庆 | 惠州 | 惠阳 | 和平 | 普宁 | 澄海 |
| | | 兴宁 | 丰顺 | 海康 | 文昌 | 万宁 | | | |
| | 宗教 | 佛山 | | | | | | | |
| | 袭旧 | 惠来 | 陆丰 | 东方 | 屯昌 | 斗门 | | | |
| | 风俗 | 儋县 | | | | | | | |
| | 其他 | 新会 | 遂溪 | | | | | | |

据以上命名方式表统计,以自然地理特征命名的县市 57 个,占全省县市 52%,以人文地理特征命名的县市 17 个,占 16%,两项共 74 个县市,占 68%。而从县市名称保留持续时间来看,凡第一次命名以后,历史上虽有兴废,但至今仍保留原称地名者,有如下关系:

| 留存时间 | 县市数 | 占% |
|-------------|-----|-----|
| 2000 年以上 | 9 | 8 |
| 2000-1500 年 | 13 | 12 |
| 1500-1000 年 | 32 | 29 |
| 1000-500 年 | 14 | 13 |
| 500-100 年 | 17 | 16 |
| 100 年以下 | 24 | 22 |
| 总共 | 109 | 100 |

留存 1000 年以上的县市地名达 54 个,约占全省县市地名半数,其中以山、水、关隘、自然现象命名的有 33 个,占千年以上县市地名 61%。可见,以自然地理特点命名县市占广东政区地名大部分,这不但符合广东地理环境特点,而且留存时间长久,具有稳定性,不失为广东政区命名主要原则。反观人事命名县市,大部分历史短,兴废颇大。

第二节 移民与地名

岭南是由汉人和土著居民共同开发的,但汉人的多次南下无疑起了重要作用。移民到达新居地,与当地语言发生一系

的渗透、交融、取代、影响等过程，其结果也在地名上反映出来，这是移民与地名最重要的关系。追溯移民的路线和分布，也就有可能揭示他们所到地区的地名的文化内涵。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运动，无论是官方策划还是民间自发的，在公私文献上记载搬迁地名之事却甚为寥寥。但也不是无迹可寻，通过一些小地名，仍可找到移民的下落。

东晋南朝以降，人居岭南汉人大增，史曰：“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移迁，占籍各郡”^[13]。地方建置也空前发展，侨置州县不少，留下一些侨置地名。这类地名多来源于中原或其他地区，以小地名居多，而没有作为新郡县名称，说明移民是分批南下，小股聚居的。例如著名的南雄珠玑巷，唐代曾称敬宗巷，“而旧谓（河南）祥符（县）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人岭，至止南雄，不忘粉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颍，以志故乡之思也。”^[14]这是地名更改的一个典型事例。在广州侨置地名也不少，如高阳里源于东汉置河北高阳郡；颍川巷为河南颍川陈氏聚居地；汾阳里为山西汾阳郡郭氏住地；陇西巷为甘肃陇西郡李氏居地；嵎山巷乃四川眉山县人居地等。此外，还有岳州、彭城、福州、宜春、南昌、新会、东莞等路或街，也属侨居地名。

移民多聚族而居，故以姓氏为起首之地名遍及广大城乡。在粤北和珠江三角洲多以屋、村为通名，以姓氏为专名。例如东莞有陈屋、麦屋、何屋、缪屋、马屋、胡屋等村落；在粤北乐昌有欧家村、邓家村、吕家村、王村、邝村、魏村、关村这类地名。潮州市以姓氏定村名有 200 多个，占自然村总数 1/6。如

余厝村先民余梅于明宏治年间从澄海来此定居，是名以村；又李厝村则是明末李云轩从揭阳来此定居的。徐闻有麻城，清乾隆年间许姓人从湖北麻城迁来，为纪念故土而命名。在粤东闽南语地区，则多以厝为聚落名称，如饶平有张厝、李厝、陈厝、林厝、崔厝、施厝等；澄海有刘厝、黎厝、蔡厝、廖厝、灰厝、王厝；陆丰、海丰也有很多以厝为聚落地名；而丰顺则有罗厝、张厝、林厝、洪厝、胡厝等，但属很个别，说明丰顺为客家语和闽南语民系的分界地区。广东城镇则多以里、巷为街道通名，以姓氏为专名，如广州有钟家巷、李家巷、杨姓里、宁家里、赵氏巷、司徒右巷等，也充满移民色彩。但凡一些旧州县治所在城镇，此类地名更多。

历次进军岭南，也同是移民方式。这些军人及其家属后来在当地驻守或屯田，每以所、亭、都、堡、军、台、营为地名起首，再加上专名，构成军事移民地名。例如海南岛有八所、九所、十所；汕头有所城；海南有保亭；湛江有金堡、军堡、新堡；海南有三都；龙川有四都；肇庆有六都；湛江、海南都有军田、军寮、军府；沿海有炮台、炮子；湛江有营盘、营仔；海南有营根；广州有小东营，八旗二马路，北较场路，较场东、西路；海南有乐东（乐安）等。这类地名，全国许多地区都不乏其例。例如都字前冠以数字的地名，浙江省有八都，福建省有二十四都，湖南、江西、广西、安徽有三都等。都为唐代以后的军队编制单位，集中分布在南方，具有明显地域特色。又所字地名在海南西部沿海有两处，皆与汉代路博德、马援两位伏波将军进入海南的传说有关，显系军队驻防留下的地名。另海南新营（黄

流)、前营(山荣),亦以兵命名。元明在岭南广泛屯田,设立许多卫所,故所字地名也可能是屯垦地名,如海南陵水有军屯坡和军屯村,阳江也有军屯村等。这类地名多分布在交通便利的沿海,或山区以及边远地区,更具军事移民性质。这些地区原来无人或少人居住,故地名更为新命名的,这也为地区开发提供线索。

移民有时把原籍的地名原封不动地搬到新居地,这给寻找他们的根源带来极大的方便,也是地名考证中很容易处理的问题。这类地名屡见不鲜。例如海南岛福建移民最多、人居早、分布广、多集中在岛北部和东部沿海,留下地名覆盖面也较大。在海南百万分之一行政区划图上出现的 527 个地名中^[15],有 87 个地名可在福建省地图中找到,占海南幅地名 17%,其中一部分地名完全雷同。例如在文昌县较大的地名,在福建沿海同样出现。文昌东郊、东坡、东门,在莆田也有;铺前为文昌港口,福建闽侯、同安亦有;东阁、蓬莱、南阳、后湖、凤尾竹这些文昌居民点的地名,同样出现在福建福清、闽侯、晋江、漳浦、长乐、和平、龙溪等县;在儋县、昌江沿海有海头、海尾、光村等港湾,但它们分别在福建龙溪、莆田、晋江可找到。另外,两地相同的地名,在福建者主要分布在漳、泉、福州一带沿海。反映其商业移民和航海盛况;而海南同一地名,往往在福建几个县市都有,又说明海南移民来源广泛。例如澄迈太平,在福建永春、南平、浦城、建瓯都有;定安龙门,同样出现在福建漳平、龙岩、安溪、长乐、大田等县;文昌蓬莱,在福建安溪、永春、长泰、闽侯都有^[16]。类似事例还很多,当然并不

是每个地名都有必然联系,但可以肯定一点,它们的一致毕竟是因为共同的地方文化,由移民沟通起来的。

移民有时并不完全照搬原籍地名,而使用与原籍相同的地名通名。这在海南地名中亦有反映。例如今日福建常见的地名通名坑、田、围、头、尾、潭、塘、坡等在海南很普遍。移民抵达新居,总希望安居乐业,于是以安、仁、丰、兴、福、和、龙等词命名周围地物。这类地名约占两地相同的 87 个地名 1/3,乃两地居民共同心里素质作为文化转移的反映。雷州半岛也是闽人移居地,现有南田(滕)村、林宅(厝)、寮村、平原、白院等地名,其中田、宅、滕、厝是典型闽南语,读音一致,只是用字不同,为后来音变结果。又如岭南客家地区许多地区地名通名与浙南、闽北、江西等省区地名通名属同一系统,标志着岭南一部分客家人是从以上省区迁来的。这些地名通名常有礲、嶂、岫、坑、潭、里、峰、溪、洋、源、州、濂、坪、浦、陇、墩、圳等。例如闽北有刘地礲、牛皮濂、小洋州、洋坑、旧墩;浙南有白水礲、昆濂、青嶂、梅坑、横洋、吴墩;江西有麻州、高坑、深坑、吉潭、温家圳、茅坪、叶坪、曲洋等。广东这类地名更多,如礲下、礲头、铜鼓嶂、东水嶂、仙花嶂、五指峰、雪峰、牛田洋、黄竹洋、楼子岫、龙石岩、龙田、上濂、下濂等。据 1982 年地名普查,以礲为首尾的地名,丰顺有 11 处,陆丰有 12 处,梅县有礲下、杉里、黄竹洋、雁濂塘、宝坑、蕉濂、高墩、沁源、瓜州;兴宁有龙丝嶂、白水礲、龙潭、朱坑;五华有黄沙嶂、练溪、蕉州、龙狮礲、竹山里、楼子岫、水墩等;蕉岭有双田礲、长濂、石窟溪、大峰嶂等。与此相关地名很多,特别是福建宁化县与客家地区地

名相类似程度最深,与历史上客家人多取道于此和江西大庾岭道南下是吻合的。此外,移民南下的其他水陆交通线,如揭阳岭道即今闽粤沿海道,桂阳道即今骑田岭道,九疑山道即今萌诸岭道,谭城道即今越城岭道,以及牂牁江即今柳江道,沿途地区流行语言与移民来源有很大关系。例如湘桂走廊与海南岛西部流行军话,略似普通话,“即中州正音,缙绅士夫及居城厢者类言之,乡落莫晓”〔17〕。这显然是秦汉进军岭南时传播的中原语言,在地名上也会有同样痕迹。海南儋县地区开发最早,那里有些地名反映了中原地名命名的一些习惯。如河流中原和北方多称为河,南方多称为江,儋县除以江为通名以外,还有石牛河、庆窑河、永庆河、珠江河、光村河、沙河、河弦村大河等;昌江县则有南罗河、石碌河、南屯河、南尧河、河阳河等,都是以中原语言命名海南地名的佐证。

第三节 民族地理与地名

岭南古代为百越族居地,包括南越、骆越和闽越等,这些土著民族后来大部分被汉化,一部分迁走并发展为现在的黎、壮、瑶、畲等少数民族。地名也作为土著文化的一部分留存下来,大量散布在岭南各地。这些地名属古越语。而古越语现在保留下来的一部分即为上述少数民族使用的壮侗语和苗瑶语各语支,但在广东大部分地区,被保留下来的主要是壮语地名,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条云:“广东有僮瑶两种,瑶乃荆蛮,僮则旧越人也。”这些壮语地名意义不能照汉语通

常解释,而有其特殊含义,另其命名方式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即所谓齐头式,与汉语地名齐尾式正好相反。研究这部分地名比研究汉语地名要困难和复杂得多,一般要借助于民族历史、分布及其语言加以解决,在此基础上复原民族地名分布格局。

一、表示自然地理的壮语地名

岭南背山面海,水网稠密。古越人根据这个地理特点,通常以洞(峒、峒)、罗、六(禄、菴)、黎、陇、弄表示山谷、山野、山冲等意义;以南(滴)、濼、塘、潭表示水义。这些地名分布皆有一定的地域性,以广西至为集中,在广东则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和中部,次则北部,而东江、兴梅、粤东(潮汕)地区则很少,甚至几乎绝迹。原因是这些地区古代多为畚族分布范围,俚(獠)人很少,壮语地名不流行。

带洞字的地名在岭南很广泛,本指山间谷地、盆地或为群山环绕小河流域,后来往往成为某个血缘氏族居地,地名含义有所扩大。例如隋唐时粤西冼夫人,“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万余家”[18],梁大同中,海南儋耳千余峒俚人归附其麾下[19]。宋代海南“峒落日以繁滋,不知其几千百也”[20],洞也成为历史上古越人留居地常见地名。在1966年编纂的广东地图集一百万分之一专区普通图上,洞字地名全省有43个,其中湛江专区25个,韶关专区8个,肇庆专区5个,广州市和汕头专区各一个,其他地区3个,1981年地名普查结果

远不止此数。例如台山有洞美,新会有洞角,阳春有大洞,阳江有高洞、隋洞,遂溪有垌口,廉江有横洞、垌心、大垌、上阁垌、上眉垌,吴川有低垌、姜家垌、苏州垌,湛江市郊有谢垌、陈垌、垌口、垌尾,深圳有南洞、白花洞、高应洞,中山有梅花洞等。按壮语地名齐头式结构,洞字应在地名起首,但现在被加上一些修饰语,显系后来汉人到来,冠以新的含义,形成洞字地名首尾成份。

以罗字起首的地名,据洞字地名所在图幅,广东有 22 个,实际上也大量存在,散见于省内各地,但粤东很少,以粤西南较多,如阳春有罗银;阳江有罗琴山、罗引山;信宜有罗马岭;电白有罗笠;湛江有罗阳、罗坑;分布于其他地区如海南岛有罗带、罗豆;粤北有罗坝、罗佛寨;粤中有罗岗、罗林村、罗溪、罗坑、罗仔、罗秀洞、罗家厅;西江地区有罗定、罗镜、罗坪、罗逢、罗孔、罗荔、罗沙、罗求、罗横、罗冲、罗沙、罗郁岗、罗练山等,粤东则以饶平有罗坑为代表。

六字地名中的“六”不能作数字解。带六字的地名广西最多,在广东分布比较分散,例如信宜有六岸、六琶、六双、六突堡、六石租、六井、六西河、六蓬、六佳、六谢、六云、六断、六定、六省、六石等 20 多个。吴川有六鳌;廉江有六凤、六深、六环;化州有六马岭、六王嶂、六村、六堆、六磊坡;徐闻有六黎;湛江有六坑;海康有六内、六梅、六余;云浮有六源、六马、六合、六都;台山有六合、六庆、六调、六福、六乡;新会有六里、六联、六场、六村、六堡;韶关有六合;连山有六寨、六联、六弓;阳山有六调、六楼、六豆地;德庆有六冲等,多为一些小地名。

六字有时也写作禄、录、藁、陆、弄、珑等,如南海有禄境;中山有禄围、禄湾;台山有禄马;高要有禄步、禄峯、、禄栏;鹤山有禄洞;阳江有禄蓝;德庆有禄滚、禄村;四会有禄村;云浮有禄源村;电白有禄岭;海康有禄高、禄马、禄切;徐闻有禄家、禄齐、禄寿;文昌有禄家;万宁有禄马、禄益;定安有禄地;茂名有藁汛;吴川有梅藁等。此外,与六、禄、录、藁表示洞、穴意义相类似的还有冲字地名,也广泛见于珠江三角洲和西江地区,如顺德有冲鹤堡,新会有冲塘、冲廉、冲茶、冲花,从化有冲岭,台山有冲洋、冲华、冲柴、冲金山、冲云圩,封开有冲等、冲陵等,都有壮语齐头式命名特征。

隋唐时古越族有一部分被称为俚族,宋以后俚族被称为黎族,因“俗呼山岭为黎,人居其间”〔21〕,所以黎也为山之意。以黎字为起首的地名分布于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例如海康有黎郭、黎家陈、黎家伍、黎上、黎中、黎下,海南岛有黎母岭、黎歧、黎昌等,皆分布在山区或以山为方位命名。此外,在海南和雷州半岛还有很多带调字的地名,也表示山的含义,如临高有调楼、调俗,海康有调爽、调良、调排、调黎,徐闻有调禄、调晓、调胜,旧县志上还记有调黎佃岭、调黎埠、调兰村、调甸村等。

壮语表示水的地名也很特别,河流叫南或滴,但与方向无关。以南、滴起首的地名广泛分布在广西和广东南部,1981年地名普查结果,海南岛就有255个,琼山有南渡江,滴渭溪,定安有南远溪、滴白溪,儋县有南建江,澄迈有滴滚泉,临高有南定汛,陵水有南能山、南漏山,东方有南龙江、南浪村,以及南

圣、南坤、南罗、南闻、南美、南头、南口、南丰、南阳等，遍及全岛，但以黎苗族聚居地居多。海康这类地名有 50 个^[22]，如南坑、南田、南六、南塘、南畔、南兴等。在徐闻则有南陈、南湾、南洋、南上等，遂溪等县也不乏其例。

濼也是与水有关的古越语地名，《汉书·武帝纪》曰：“濼，湍也，吴越谓之濼，中国谓之碛。”即河滩之意。这种地名仅见于南方，据《广西壮语地名选集》记载^[23]，广西濼字地名 13 个，可见它也属壮语地名。但在广东比较分散，如阳江有上濼、下濼、西濼，这与阳江地属古高凉郡，曾是俚人分布区不无关系。

池沼壮语曰塘，通名在前，专名在后，故每曰塘某表示地名。这类地名当不限于岭南，古越族分布地区都有同类地名。随着时代变迁，以塘字为首尾的地名变得非常普遍，广东各地都有分布。如广州附近就有良塘、大塘、罗汉塘、菱角塘等。表示池塘地名还有潭，多见于广东南部，且以潭为地名之首，如临高有潭水、潭龙、潭都；徐闻有潭鳌、潭北寮、潭板、潭星、潭才、潭家等，潭改谭乃晚近之事。

二、表示人文地理的壮语地名

岭南古越人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虽然它很多已随着时代过去而消失得无踪无影，但从残存的表示人文地理的壮语地名中，仍可窥见这种文明的光辉。

稻作文化是百越文化特征之一。稻是种植在田地上的，在

壮侗语族各语支和方言中,以带那字的地名表示水田或田地。据研究,那字地名 90% 以上集中在北纬 21° — 24° [24], 大多数又在河谷平原。除广西以外,另有一部分那字地名分布在广东西南部、云南南部、缅甸、越南、老挝、泰国北部等地区。这个地带积温、雨量、日照、土壤等都适于稻生长。古代农耕越族人迁移频繁,栽培稻从这个起源地带中心向四周传布。至广东那字地名,主要集中在粤西和琼雷地区,其他地区比较少,粤东则很个别。据统计,海南岛有 154 个,其中崖县 12 个,白沙 8 个,东方 6 个,琼中 4 个,儋县 18 个,文昌 1 个,琼山 7 个,澄迈 10 个,临高 1 个;徐闻有 56 个,海康有 30 个,阳江有 65 个,遂溪有 8 个。例如琼山有那环,澄迈有那夹,儋县有那大,临高有那盘,徐闻有那加,海康有那稳,吴川有那罗,化州有那楼,电白有那花,阳江有那峒,阳春有那阳,恩平有那吉,开平有那波,台山有那扶,番禺有那都,清远有那落村,高要有那落圩,新兴有那康,大埔有那口等。广东那字地名,大抵北起珠江三角洲,西南经雷州半岛,渡海散布于海南岛北部、西部和南部沿海,少数进入五指山区,似极受高山约束,很少能逾南路与西江之分水岭,所以罗定、云浮、郁南等县,绝少以那字为地名者。分水岭以南之山区,例如信宜县境,亦少见踪迹。但南路东部山区两侧之天然交通线却多有之,形成那字地名集群,例如吴川有那六、那亭、那界、那良丙、那津、那陵、那邹、那贵洞、那西村、那林;电白有那关歧、那禄山、那岩、那增、那霍;茂名有那田、那楼峒;高州有那鸾、那慢、那峒;化州有那渡、那洲、那冰、那务、那平;阳春有那魁、那庆、那旦、那座、那柳、那扶

等等,皆在鉴江和漠阳江流域水稻产区。在阳江通往恩平、开平之宽广谷地中,即有那格、那安、那寨、那塘、那岳、那庆、那栋、那龙、那朗、那吉、那西、那黎、那罗、那竹等地名,基本上沿那龙河,过低矮分水岭,至潭江上游河谷分布,呈北西——南东走向,但到鹤山丘陵被阻后未见踪影,继向东折向新会,出现那邓、那越、那伏等,也是水稻主要产区。这里水田开发比较早,显然与古越人稻作文化发展有关,可见山地对于那字地名扩展的限制非常有效。但那字地名最密集的地区是在十万大山两侧,那里也是那字地名策源地。而在广东境内,十万大山东侧80—90公里范围内,那字地名数以千计,与十万大山平行分布,如影随形,至为触目,尤以防城、钦州一线为甚,此线以东数量有所减少,但从徐闻、海康以北,又渐见增加,可见外来文化难以进入十万大山西麓,而东麓渐为汉文化占据,发生更替地名现象。粤西有若干独流人海的小河流域,平原河谷土地肥沃,土著居民早就种稻为生。其后土著被汉人同化,但地名仍作为底层文化保留下来。反观珠江三角洲冲积低地,开发较迟,大量种植水稻不过在宋代以后,土著居民已差不多被汉化,其那字地名数量不多,显然与稻作文化发生早晚有很大关系。

再看那字地名内容,虽原指水田、田地,实包罗万象,异常丰富。以那字命名的聚落,大小不一,有农村、圩市、城镇等,广西还有个那马县。从那字地名的分布聚集,可知古越族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组织已很健全,长期活动于一个比较固定地域,进步到一定成熟阶段。

隋唐以前,岭南古越人尚处在部落社会阶段,互不统属,以血缘氏族为单位分布各洞落,多以板、古、都、思字表示村寨。据《广西壮语地名选集》统计,广西带板字的地名多达 402 个,广东则多见于琼雷地区,如海南东方有板桥,保亭有板寮,高州有板村、板桥,吴川有板桥,新丰有板岭等。另据徐松石教授研究^[25],广东许多地方,把板字从上语音译为边字,并将原始土语倒装为顺装,所以称村为边,如称张村为张边,李村为李边,江村为江边,但绝不是靠河边的意思。如海康有纪边、沟边;佛山有谢边、庄边、高边、钟边、邝边,谭边;三水有麦边、罗边、刘边、蔡边、钱边、张边、欧边;阳江有葛边等等。南海县边字地名有 80 个。与板读音相类似的还有班、番、曼、万、迈、孟、麻、便等地名,也作村寨解,不过分布比较零散,如增城有麻车,南海有麻奢,湛江有麻章,徐闻有迈陈,等等。

带古字的地名在两广很常见,广东以珠江三角洲和西江地区较多,粤东则很个别。如广州附近有古田、古料,佛山有古灶,番禺有古楼场、古坝,顺德有古楼、古粉,新会有古兜山,中山有古镇,台山有古斗、古井、古板、古镜、古岭嘴,鹤山有古劳,开平有古博岭,清远有古濂,东莞有古坑,佛岗有古场坪,博罗有古泥塘,高要有古坝水、古径、古旁、古西、古遗,新兴有古伦村,广宁有古丽、古楼、古灶、古兴,罗定有古榄、古范、古模、古连冲、古龙,德庆有古杏、古望、古洲、古有、古宪、古垒、古蓬,封开有古令,郁南有古山远、古莲、古罗、古洞、古番,云浮有古雾汛,阳春有古宠,阳江有古劳、古井,信宜有古立、古丁,吴川有古流坡,惠阳有古灶乡,河源有古云约,紫金有古

田,惠来有古乡,陆丰有古寨,潮阳有古楼,揭阳有古沟村,饶平有古楼山,兴宁有古楼、古平石,梅县有古松、古野、古西村,仁化有古夏村,南雄有古禄铺,和平有古镇山等。

以带都、思字的地名表示聚落的规模可能大些,分布偏于粤中和粤西。番禺有都那,顺德有都宁、都粘,新会有都会,台山有都偃水,恩平有都四铺,高明有都权,高要有都万凹,新兴有都斛,德庆有都洪、都巨、都白,云浮有都骑圩,罗家有都门,封开有都缕、都郎,郁南有都城圩,怀集有都布,信宜有都龙甲,始兴有都安水等。这个“都”字作地名有时与“多”字通用,常见于海南岛,如琼山有多佩村、多贤村,文昌有多寻,琼海有多坭村、多异岭,万宁有多扶、多格、多萌、多辉乡,陵水有多味弓,乐东有多能村,儋县有多美、多业,临高有多文、多莲、多瑞、多郎、多贤、多朗;亦偶见于大陆,如廉江有多浪、多宝洞,吴川有多曹,惠东有多祝,曲江有多田,蕉岭有多宝,德庆有多林、多盆,怀集有多贺等。

壮语“思”作溪解,意即人聚于溪边,形成聚落或市井。广东也有不少以思字起首的地名,多见于西江地区,如封开有思六、思科,郁南有思和,德庆有思罗、思阳,新兴有思来,云浮有思劳,高要有思霖园。此外,信宜有思贺堡等。在壮语中,思与虚、希、施、迤、四、仙等同义,“粤谓野市曰虚”[26],虚以后演变为圩,即集市,以圩为地名者大量见于岭南各地。

云,壮语意为人,也作村解,而不是天上的云。屈大均《广东新语》说新兴村落多云字,列举18个,如云盏、云稠、云铁、云芜、云山等,但他说因新兴山多云而得名,实误。西江、高雷

地区云字地名不少,其他地区比较个别,如高要有云解山,德庆有云陵、云贞、云朗,封开有云迳、云塘,郁南有云霄塘,罗定有云罗凤,怀集有云田,徐闻有云头、云仔,遂溪有云头,廉江有云峡,湛江有云基头、云头、云脚,茂名有云县圩,信宜有云罩汛,化州有云马,阳春有云霍,恩平有云立山,高明有云宿水,顺德有云路,中山有云步里、云汉、云衢,深圳有云林,增城有云马山,鹤山有云勇,清远有云立,博罗有云步,海丰有云路,普宁有云落司,潮安有云步圩等。

海南黎族与壮族同源不同流,从大陆入居海南以后,语言发生变化,属壮侗语族黎语支。其表示聚落地名计有抱(bao 含宝、保、报、包)、番、什、毛等,在黎语中皆有村寨之意,不过也有含义的演变,如什字黎语为田,汉译地名多用打、三、杂、大、孔、昨、十、祖等近音字,后用于村寨地名,通什即为一例,意指树下田。又毛字黎语意为亩,汉译成亩、毛、茅、茂等,宣统《崖州志》村峒条中就有亩猥、亩强、亩感,今称为毛贵、毛阳、毛感。据近年地名普查,全岛带抱字的地名有 329 个,各县都有分布,如乐东有抱田、抱界,崖县有抱头、抱营,东方有抱板、宝上,文昌有抱罗,临高有抱茂、抱河,昌江有保蛮,儋县有保牙,保亭有报什、报导等。带番、什、毛的地名全岛有 469 个,光保亭县就多达 273 个,占 58%,其他各县都有分布,如乐东有番豆,番阳、毛或、什文,崖县有番毛、番园,白沙有番伦、番印,琼中有番响、番沟,儋县有番真、番朗等。此外,岛上一些地区,还以方、芬(坟)、武为地名起首表示村落,如乐东有方头,白沙有方平,琼中有方满,保亭有芬法;儋县有武教,临高有武来,

琼海有武弄,澄迈有武田等。实际上海南岛是黎语地名荟萃之区。

兹列表如下(表 7):

表 7 海南岛黎语地名分布表^[27]

| 县别 数量 通名 | 崖 县 | 乐 东 | 白 沙 | 保 亭 | 陵 水 | 东 方 | 琼 中 | 昌 江 | 儋 县 | 屯 昌 | 万 宁 | 琼 海 | 文 昌 | 定 安 | 琼 山 ^[28] | 澄 迈 | 临 高 | 小 计 |
|-------------------|--------|--------|--------|--------|--------|--------|--------|--------|--------|--------|--------|--------|--------|--------|---------------------------|--------|--------|--------|
| 抱(保 宝、保、 包) | 51 | 83 | 5 | 10 | 2 | 18 | 3 | 8 | 8 | 1 | 7 | 11 | 67 | 6 | 13 | 3 | 33 | 329 |
| 番 | 5 | 5 | 3 | 41 | | | 8 | | 12 | | 2 | | | 1 | 1 | 2 | 7 | 87 |
| 什 | 3 | 11 | 15 | 191 | 7 | | 82 | | | | 3 | | | | 1 | 1 | | 314 |
| 毛 | 4 | 5 | | 41 | 2 | 1 | 11 | | | | 1 | 3 | | | | | | 68 |
| 那 | 12 | | 8 | | | 6 | 4 | | 18 | | | | 1 | | 7 | 10 | 1 | 67 |
| 南(南) | 8 | 22 | 24 | 29 | 7 | 3 | 24 | 5 | 11 | 27 | 11 | 14 | 6 | 20 | 12 | 11 | 12 | 246 |
| 总计 | 83 | 126 | 55 | 312 | 18 | 28 | 132 | 13 | 49 | 28 | 24 | 28 | 74 | 27 | 34 | 27 | 53 | 1111 |

据上表统计,自治州 8 县黎语地名占全岛 70% 左右。联系到这些地名与大陆的关系,有力地说明黎族祖先是大陆百越一支。因为海南上述地名同样出现在广东南路,如徐闻有包西、包萝,海康有包金、保田、毛斋、南天、武郎、番昌,湛江有抱(包)睦、抱芳,高州有保黎,电白有保田,化州有保山、宝圩,信宜有保城,阳江有埠场,台山有宝兴圩,中山有埠圩等,故都是两地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渊源的反映。当然,随着汉黎文化交流,许多黎语地名也发生变化。其一是由倒装改为顺装。如乐

东县有奋跃村,东方县有月大村,汉语意为得田村。其二是两字地名改为三字地名,如保亭县有什坡示(黎语即锅铲村),汉译为汉族人田地;三亚有那新,汉译为石头田(村)。其三是纯黎语地名改为黎汉混合,即半黎汉地名,如上述地名所加村字,即属汉语地名部分。

古越人常以舟楫为交通工具,在地名上通用步、埗、埔、甫、埗等表示津渡码头。唐人柳宗元《永州铁炉步志》说:“江之浒凡舟可糜而上下者曰步”,到宋人吴厚处《青箱杂记》更明确指出:“岭南谓水津为步。”南方各地都有此类地名,而在北方绝迹,显系百越人常用地名。广州地区有八步、增步、黄埔、凤埔、第二甫、第八甫、第十甫、黄金埗;花县有官禄埗;深圳有上埗等。

古壮人一说分为黑、白、红、花、黄壮五支。黑壮古代文献上被称为乌蛮或乌浒蛮,亦称良壮,水陆两居,后被分化,地理上留下最深遗迹的就是带乌字和黑字的地名。但此类地名分布比较分散,现在广州有乌石、乌土、乌龙岗,番禺有乌涌圩,顺德有乌洲,中山有乌石、乌沙、乌珠山,深圳有乌石、乌涌、乌料龙,东莞有乌河,广宁有乌山、大乌水,新兴有乌围,阳春有那乌水,阳江有乌石,吴川有乌泥,遂溪有乌塘、乌蛇岭,海康有乌黎、乌石,信宜有乌村,河源有乌峒、乌泥,惠阳、河源都有乌石,海丰有乌村,乳源有乌坑,五华有乌坡,阳山有大乌山等。乌就是黑,台山有黑山,开平有黑坑,怀集有黑冲等。岭南乌姓的人也不少,还有诸如侬、鸡、花、磨、陀、盘、青等奇特土著姓氏,直到民国初年佛山还有鸡、田、布、老土著四姓^[29]。

古壮人以黄壮活动范围最广，黄壮又叫黄族或大良族。良或佻字为壮语黄色的意思，顺德大良则是黄族居地之意。明朝南海人邝露《赤雅》指出“大良与壮同类”，但后来“多为壮人占杀，散处城廓，为人灌园”。大良族所到之处，留下不少带良字的地名。广东各方言区都有此类地名分布，属粤方言区的清远有良垌、良湾，顺德有良村、良教，南海有良村、良保、良登，东莞有良边，新会有良溪、良都，高明有良村、云良，开平有良边、良洞，阳江有良村、良垌、麻良，高要有良村，怀集有良村，德庆有高良、良村，新兴有良洞、良田、良细、良位，高州有良村、良洞、良坑，湛江有良村，廉江有良洞、良岸、良村，韶关有良村，英德有高良，连县有良塘、良江岸、良溪、马高良等；属闽南方言区的揭阳有北良，揭西有渔良，徐闻有北良，海康有良马、良垌，陆丰有良洞，海南琼山有本良、心良、良坑，文昌有良安、良洞、良梅，临高有美良、加良、良爱，陵水有良风、良亚，东方有良任等；属客家方言区的梅县有富良，丰顺有丰良，博罗有安良、良田，紫金有积良、良庄，惠州有良洞，惠阳有良井等，显然是广州方言区这类地名占优势。但经历代变迁，许多地名只留一个良字，从粤中、粤西与广西连成一片。例如南海有良村、良宾，番禺有九良洞，顺德有良村，新会有良都、良溪，中山有良都，三水有良岗，广宁有良田，郁南有鸡良，新兴有良洞，德庆有良义，清远有良湾，惠阳有良村，博罗有安良村，恩平有良塘圩，鹤山有良庚村，阳春有大良山，阳江有良朝、良保、踏良、良村，茂名有那良村，信宜有良洞村，化州有良塘等。往往同一地名在许多地区重复出现，如乌石、大良、良洞、良村

等,表示这些地区土著文化同一起源。

壮语“大”字表示地的意思,大和地两字广州话过去曾同音,后来它们的读音才分开。岭南有许多以大字为起首的地名,为数 1000 以上,几遍及两广各地。例如南海有大富,番禺有大石、大黄楼,顺德有大罗,东莞有大林,龙门有大阮,增城有大江(但不靠河),新会有大金,三水有大宜岗,台山有大江村(亦不靠河),清远有大仆,宝安有大王山,花县有大珠,佛岗有大挾,曲江有大源村,乐昌有大王山,仁化有大富村,乳源有大布圩,翁源有大腊岭,阳山有大江圩,南雄有大雄,惠阳有大白圩,博罗有大罗陂,陆丰有大茂,龙川有大人村,兴宁有大望山,五华有大亨水,连平有大席水,潮阳有大布,揭阳有大洋村,大埔有大靖,丰顺有大罗汛,高要有大筒圩,广宁有大乌水,新兴有大稳,德庆有大满岭,高明有大南村,恩平有大埗铺,开平有大罗,阳春有大陈圩,封开有大乐,罗定有大小堡,云浮有大安堡,郁南有大历,阳江有大安村,电白有大王村,信宜有大人洞、大人山,吴川有大岸,海康有大林港,文昌有大人沟,琼海有大礼村,临高有大江岭等。这些带大字的地名,自然有一部分表示大小之意,但有相当一部分是土著地名遗迹。又据徐松石教授研究,大地有时译作都字或多字,这样大字地名又可与上述都、多字地名相通,显示岭南土著文化共同性。

第四节 图腾文化与地名

古代岭南越人尚鬼,迷信风气盛行,形成具有浓郁地方

特色的图腾文化。主要以鸟、鸡、牛、狗、龙、蛇、鳄、雷等为崇拜对象，作为本部族的保护神或标志，以及风俗活动的中心，并以之命名自己的居地或活动地域中的山川风物，隐喻着古越人一定的希冀与追求，至今仍在岭南地名中留下很多印记。

渔猎时代，鸟类既是古越人的重要食物来源，也是他们的生产助手，有所谓“田鸟助耕”、“雉田”、“鸟田”等传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铜筒上所铸船纹，舵上立着一鸟，说明古越人对鸟类某种崇拜。岭南地区水鸟很多，如鹤、鸮、鸬鹚等，这些鸟类知鱼性，有的经驯化能助人捕鱼（如鸬鹚，至今仍是捕鱼鸟类，称为鱼鹰），于是被古越人奉为神灵。岭南出土铜鼓中经常有身饰羽毛的羽人形象，即为原始祭祀中图腾化装。岭南以六、陆、禄、淥、罗、骆、乐为起首的壮语地名，除含山谷、山野等意义外，有的则与鸟图腾崇拜有关，在壮语中山谷与鸟读音相近（Luuk 和 Lok），故以上述字为起首的地名的汉语音很容易混淆，皆以六、骆、陆等对译，留下一些鸟地名，计有鹤、鸡、鸬鹚地名等。

以鹤字命名的地名：广州有白鹤洞、鹤边、鹤林、鹤鸣，顺德有冲鹤，中山有古鹤，花县有鸣鹤，番禺有鹤洲、鹤溪、鹤庄，新会有鹤庄（即小鸟天堂）、鹤湾，斗门有鹤咀、鹤兜山、鹤洲山，深圳有鹤斗、鹤园、鹤坑、鹤洲，鹤山有鹤城、鹤边，增城有白鹤洲，东莞有鹤田，清远有白鹤汛、白鹤石，恩平有鹤坪，开平有独鹤，阳春有鹤塘，德庆有鹤颈、双鹤、蕃鹤，阳江有白鹤园、鹤村，电白有鹤山，茂名有白鹤坡，高州有鹤山、鹤山坡，廉

江有鹤岭、鹤塘、鹤山,遂溪有鹤山,信宜有鹤地,定安有白鹤村,高要有朗鹤、鹤咀,怀集有白鹤寨、白鹤山,惠阳有鹤埔、鹤湖、鹤山,博罗有鹤溪、鹤田、鹤岭,惠东有鹤楼,龙门有鹤湖,河源有鹤塘,紫金有鹤埔,龙川有鹤市、鹤联、鹤峯,五华有鹤园,兴宁有鹤子塘、鹤莹,梅县有鹤坑,蕉岭有鹤湖,连平有鹤湖,丰顺有鹤坑,潮阳有鹤洋、鹤联、鹤丰、鹤星,饶平有鹤山,英德有鹤坪,乐昌有鹤仔等。珠江三角洲分布较多,次为高雷地区,这与此类地区曾是古越人主要农耕区不无关系。

以鸡字命名的地名:古越人盛行鸡卜,现在海南黎族、广西壮族仍有此遗风。鸡崇拜是古越人进入农耕社会以后对鸟崇拜的继续。岭南以鸡为地名者甚多,广州有鸡心岭、鸡心岩、鸡血岩、金鸡、金鸡石、鸡冠围、鸡啼岭、鸡耙岭,从化、花县都有鸡枕山,顺德有鸡洲,中山有鸡头角、鸡肠滘,东莞有鸡岭、鸡啼岗、鸡笼山,深圳有鸡公头、鸡庙、鸡魁石,珠海有鸡山、鸡抱围、鸡笼岛、鸡啼门,增城有鸡公关、金鸡石、鸡凤,台山有鸡婆头,开平有金鸡山,博罗有鸡麻地,新丰有鸡岭,清远有鸡凤、金鸡咀,肇庆有鸡笼山,高要有金鸡,新兴有鸡田,广宁有鸡皮山,郁南有鸡林,云浮有鸡村,怀集有石鸡头和鸡村,阳春有鸡岭坡、金鸡岗、鸡洲岗,阳江有金鸡阁、鸡皮洞、鸡六咀,高州有谢鸡、鸡岭、鸡冠顶、鸡母塘,廉江有鸡立峰、鸡笼塘,信宜有白鸡,吴川有鸡鸣鼓,电白有鸡打、放鸡岛,海康有鸡弄田、鸡村,徐闻有金鸡,文昌有鸡窠巷、竹鸡村、鸡母园,定安有金鸡岭,琼海有金鸡,乐东有山鸡田,惠州有金鸡,紫金有公鸡嶂,兴宁有鸡鸣山、鸡公桥、鸡子,梅县有锦鸡、鸡卵渊,连平有

鸡公寨、金鸡咀、鸡啼石，陆丰有鸡坑、鸡栖、鸡爪，潮阳有鸡翁寨、饶平有鸡笼山、鸡箬礁，英德有金鸡山，乐昌有金鸡岭，翁源有金鸡等，鸡地名分布格局与鹤地名基本一致。此外，壮语呼栅为禄或鹿，故饲养禽畜、堆放杂物及其他闲置地方皆冠以禄或鹿地名，如鸡鹿、鸭禄、牛鹿、粪鹿（厕所），不过这都是一些小地名，普遍见于广东南路各地。

狗也是古越人处于渔猎时代的崇拜对象。现今岭南有些地区仍禁吃狗肉，保持“视犬为珍”的风俗。广东带狗字的地名不少。广州有瘦狗岭、狗牙岩，番禺有大狗岗，顺德有仔狗岗，中山有石狗山，清远有狗掩背，斗门和四会有石狗，深圳有狗公山、狗洲，开平有狗山，恩平有狗比，德庆有金狗塘、狗尾坑、石狗顶、狗头脑，阳江有石狗塘、狗前、狗牙尖，电白有狗耳山、狗毛虫坡，茂名有石狗岭，化州有狗园岭，信宜有石狗，吴川有石狗塘，海康有田狗寮，徐闻有山狗孔、狗头铺、狗肚，屯昌有狗拉村，海丰有石狗湖，阳山有狗牙滩等。又壮语狗音麻或马(ma)，而广东恰有许多齐头式从汉语角度无法解释的麻、马地名，如马联、麻车、马屋、马前、马克、马羌、马兹湖、马步、麻步、麻北、马齐、马林、马东、马墩、马兰、马龙塘、麻汕、麻布演、麻斜、麻东、麻扶、马廉、马岚、马沥、麻一、麻二、麻三、麻四等等，主要分布在广东南路，很有可能是狗地名音译。

古代鳄鱼在岭南很普遍，残害人类。古越人由于敬畏而产生崇拜，不得不“断发文身，以象鳞虫”[30]，“故不见伤害”[31]，这鳞虫即为鳄鱼。韩江以前又叫鳄溪、恶溪，想见鳄鱼不少。韩愈贬潮州，曾撰《祭鳄鱼文》，试图把鳄鱼赶走。实际

上广东鳄鱼是宋以后才渐被消灭的。鳄鱼过去也被称为“蛟”或“龙”，故这类地名也颇常见，例如广州有蛟龙围、蛟湖，增城有鳄鱼潭（即今岳埔），高明有蛟塘，封开有蛟塘口、蛟龙、蛟水、蛟寨，东莞有蛟乙塘，海丰有蛟湖，陆丰有蛟溪，揭阳有蛟龙村、旧蛟，普宁有蛟池，惠东有蛟边，梅县有鳄骨潭、鳄鱼嶂、洋蛟湖，深圳有蛟村湖，开平有腾蛟，电白有潭蛟龙，茂名有下腾蛟，高要有蛟塘，紫金有乌蛟塘，阳山有蛟龙，香港新界有乌蛟腾，海口有蛟头，文昌有蛟村、蛟龙田、蛟塘等，多与水有关，显系鳄鱼出没地区。至于以龙字为首尾的地名遍布全省各地，仅广州地区以龙字为起首的地名就有 113 个，除了隐喻龙的精神以外，与鳄鱼不无关系。又现代壮语鳄音 ngwek，汉语译为俄、峨、额等音，广东有峨蔓、俄井、俄颈、安峨、云额等地名，它们有可能因鳄鱼而取名的。

岭南多雷，尤以雷州半岛为甚。古越人视之为神灵，除立庙祭拜以外，还用作地名。例如海康有雷城、雷州湾、雷公山、擎雷山、擎雷水、雷高、雷州塘，遂溪有雷公塘、雷坡，廉江有雷公山，定安有雷鸣圩，陵水有雷丰坡，电白有雷打石，阳江有雷岗、雷山，增城有雷公山，新丰有雷公寨，清远有雷屋边、雷碧石、雷公背、雷坑，龙门有雷公背，深圳有雷公井、雷公山、雷公岭、雷公塘，龙川有雷公凹，兴宁有雷打社，丰顺有雷公坪，大埔有雷打石，揭西有雷公坑，韶关有雷坑，乐昌有雷家窝，阳山有雷村、雷公坑，怀集有雷公球等，包括以山、水、聚落等命名的地名，显然与雷电现象有密切关系。另外，两广都有许多齐头式带巴、把字的地名，如广东仁化有巴塞，梅县有巴庄，深圳

有巴丁,湛江有巴东,西沙有永兴岛又称巴注,东岛又称巴兴。这类地名有的指山,有的指雷。在壮语中山和雷皆读 bya,仅有音调上有细小差异,汉译甚易混淆,所以没有山却称巴或把的地名,当与对雷的崇拜有某种联系。

第五节 历史经济地理与地名

秦汉以降,岭南渐渐开发,人类经济活动日益增多,历史经济地理与地名关系越来越密切,在地名上留下许多印记,成为广东地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上古岭南除了建置、山、水、关隘地名以外,见于记载保留至今的历史经济地理地名并不多。例如直到唐代,珠江三角洲圩镇古地名仅南海金利镇^[32](不是今高要金利镇,而在南海官窑东南麻奢、里水一带)、龙山大岗圩^[33](今龙江),牛鼻圩^[34]、容奇、桂洲、黄连、北水、古粉、马齐镇^[35]、香山镇^[36]、青歧镇^[37]等。宋代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圩镇增加,成为州县治所以下的重要地名。如珠江三角洲就有南海大通、佛山,番禺瑞石、平石、猎德、大水、沙湾、石门、白田、扶胥,顺德逢简,增城足子,高要三水,四会胥江,开平太平,新会小岗、会海、番山古镇等。明代广东圩镇大量增加,多达 439 个^[38],其中一部分发展为专业圩市地名,如罗浮山药市,东莞香市,番禺菱塘鱼市,顺德锦鲤海龙眼市,增城沙贝荔枝市,顺德陈村和高要花果秧苗市等。到清代圩镇数量更急剧增长,仅珠江三角洲 16 县从明代 175 个增加到清雍正、乾隆时 570 个^[39],地名相应

增长 2.3 倍。在城镇内部出现了市集、作坊、商行地名。例如佛山明代有三圩六市,清乾隆发展到 13 个圩市,有布基、椅巷、花衫街、凿石街、装包街、狗苑、煤炭地等。在广州则有柴栏路、西猪栏路、杉木栏、糙米栏等以“栏”为起首的粤方言地名,还有诸如白米巷、芽菜巷、雨帽街、故衣街、牛角巷、扁担巷、瓦窑街、面房街、稻谷仓、容丰新街、旧仓巷等与手工制作、销售、仓储相关的地名,大部分沿用至今。这些地名对研究广东区域经济史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古代手工业分布往往能从许多地名中体现出来,其中盐场、陶瓷窑址和矿冶场是最典型的产业地名。宋代岭南盐业比较发达,广东沿海开辟了 17 个盐场,如东莞靖康、大宁、东莞、海南、黄田、归德盐场;新会海晏、博劳、怀宁、都斛、金斗盐场;惠阳淡水盐场等。这些盐场地望大部分可考,据中山大学徐俊鸣教授的意见,靖康场在东莞太平圩以北、白蟻一带;大宁场在太平圩以东,大宁一带;海南场在太平圩以南的西头一带;归德场在宝安沙井;黄田场即宝安黄田;东莞场在深圳南头;香山场在珠海香洲;金斗场在中山磨刀门以东的坦洲一带;都斛场在台山崖门西南方都斛附近。据东莞、香山等县志记载,这些盐场大都于明末清初被废弃。主要原因是陆地淤积日广,海水难以到达,已不适宜制盐。但明代广东盐业在沿海更发达。盐场增加到 29 个^[40],一批新地名又相继产生,如阳江双恩场、咸水场,海丰石桥场,惠来龙井场,饶平东界场,潮阳招收场,澄海水江场,电白博茂场,吴川茂晖场,海康武郎场,遂溪蚕村场、调楼场、东海场,临高三村马袅场,儋县博顿

兰馨场,万宁新安场,琼山大小感恩场等。现今沿海以盐字起首的地名很多,如阳江有盐田、盐灶、盐行、盐仓,深圳有盐田、盐村、盐灶,海丰有盐町头和盐町(当地称田为町),惠东有盐洲岛、盐洲港、盐洲镇、盐灶背,湛江有盐坡,海康有盐灶仔、盐庭,遂溪有盐仓等。特别是盐灶、盐田这两个地名在沿海地区多处出现,但在内陆却绝迹,反映历史上广东海盐业之盛。

岭南陶瓷业历史悠久。粤方言称陶瓷为缸瓦。广东唐宋窑址很多,明清更盛,主要集中在潮州、梅州、广州、惠州、粤西等地,与陶瓷业相关的地名斑斑可考,首尾有窑、碗窑、碗厂、缸瓮窑、瑶等通名。如南海有官窑,始兴有碗厂下,英德有碗子窑、碗窑坪、碗山背,梅县有瑶上村、瓦坑口,大埔有碗窑、陶溪,兴宁有瑶岗,五华有上陶、碗窑坪,揭阳有碗窑山、碗架山,惠州有窑头山、瓦窑岭,德庆有窑头山,罗定有碗窑村,阳江有瓦窑湾、瓦窑口,阳春有碗窑岭、缸瓦瓷、碗坑,高州有窑尾岭、缸瓦地,化州有苑窑村,吴川有瑶头,廉江有瑶头,遂溪有缸瓦窑,海康有碗洋村等,皆以窑为中心,附加大小、上下、头尾等来说明窑的方位、形状,以及其他特性。这些地名不但反映了广东陶瓷文化的辉煌成就,而且为古窑址调查、发掘指明了方向,有些还可以恢复窑址位置。

岭南又是我国有色金属之乡。唐代以来,广东矿冶业盛极一时。与矿冶业有关的地名散布各地,主要有以铜、铁、金、银、锡为起首的地名。

古代越人善铸铜鼓,铜鼓被视为财富的象征,故铜鼓地名很多,我国第一部著录铜鼓专著《西清古鉴》云:“今岭南一道,

廉州有铜鼓塘、钦州有铜鼓村、博白有铜鼓潭,则因以为地名矣。”^[41],如曲江有铜鼓岭,万宁有铜鼓坡,文昌有铜鼓岭和铜鼓岬,广宁有铜鼓岗,信宜和海康有铜鼓村,台山有铜鼓海、铜鼓河、铜鼓山、铜鼓角、铜鼓村,中山有铜鼓地,鹤山有铜鼓井,德庆有铜鼓山、铜鼓塘等,皆传为历史上记载和现今出土过铜鼓,或取意于铜鼓之声而得名。此外,反映铜采冶的还有阳山铜坑、英德矾洞、乐昌铜山、铜罗坵等地名。

东晋以后,广东开始冶铁,与铁有关的地名相应出现,并代有增加,反映了冶铁业的发展和地域分布。如南汉阳春有铁屎迳,宋代曲江有铁屎岗,乐昌有铁屎岭,连南有铁屎坪、英德有铁屎塘,茂名有打铁街,明清佛山有铸砧街、铸犁街、铁香炉街、铁矢街、铁门链街、铁廊街、模岗里、针巷等,阳山有铁屎坑,紫金有铁嶂、铁炉嶂,曲江有灵溪炉,郁南有铁屎坑,化州有铁炉坳、平迳炉下,广州有铁局巷,香山有铁坑,平远有铁嶂,打铁寮,连山有铁坑,龙川有铁场、铁坑,翁源、东莞、博罗都有铁场,蕉岭有铁坑,惠东有铁涌,遂溪有打铁塘等。

广东金、银、铅、锡开采历史比铁更早,地点多而分散,唐代以前产地已难考究。宋代这类地名有清远大富银场、东莞桂角银场、香山崖银场、高要沙利银场、归善流坑银场、西平银场、英德钟洞银场、清远钱纠锡场、归善永吉锡场、信上锡场、五华锡坪、乐昌铅锡坑等。明代以降,随着矿业勃兴,这类地名更多,如始兴有银龙嶂,河源有银坑,海丰有银屏,梅县有银溪、银场,清远有银盏坳,曲江有银山,廉江有打银等。与金采冶有关的地名则有英德金山迳,湛江金窝、金洞、金塘,梅县有

金坑口,韶关有金坑口,佛山有金溪,广州有淘金坑等。此外,一些非金属矿开采也留在地名中,如英德产英石,有地名英山;曲江产煤,有东水煤山,西水煤山等。矿冶地名不可能在产地以外,故往往为找矿提供可靠线索,这在现今勘探工作中大不乏其例。

土地利用与水利事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在何种地形区,都会有与水利工程相关的地名。山区多有以陂为通名的地名,如车陂、陂头、陂西、陂下、陂洋、西山陂等。表示人工筑坝蓄水灌田。在台地地区,坡字地名很多,显示旱地开发利用,如廉江、遂溪一带,很多“坡禾地”地名。而没有水利工程灌溉的丘陵、山地,其被开发利用土地的通名为畲地或畲田,实为梯田,过去实行刀耕火种,至今在海南、粤北黎、瑶地区仍有残存,故以畲为首尾的地名在内陆山区较普遍,如客家人聚居的平远县就有欧畲、下畲、香花畲、良畲、小畲、梅子畲、大畲、丙子畲、周畲、黄畲等,反映山区梯田文化景观。平原河网低地或滩涂必须围垦造田才能开发利用,所以以基、围为通名的地名在这类地形分布区很常见,尤以珠江、韩江、潭江、鉴江、漠阳江三角洲地区为著,如珠江三角洲所属各县有桑园围、长利围、赤项围、罗格围、景福围、龙利围、大有围等,难以一一举例。甚至城市也颇多与堤围有关地名,如广州长堤、东堤、西堤、新基路、黎家基、长堤街、水松基、水盛围等,皆为在水利工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的城市地名。

交通路线与地名关系也非常密切,古代交通制度和设施都在地名上留下痕迹。秦汉建立的驿传制度历久实施,直到近

代新式交通兴起才被淘汰，所以古代交通地理不失为研究地名的一个重要依据。

秦汉时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南海郡贡献龙眼、荔枝上长安，即依此传递。其时沿途地名虽因年代久远而难考究，但后世沿用此里数所置交通站的地名很多。各地主要商路或州县附廓差不多有二里亭、五里亭、十里亭等地名。到唐代亭、置、传舍之名被取消，但驿作为地名仍大量使用。在五岭入粤交通干线上有驿站分布。早在三国时，孙吴校尉陆凯过梅岭寄友人诗云：“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42]唐人张九龄开大庾岭山路，驿站之设当更多。到宋又修治，“每数里置亭，以憩客”^[43]，以亭为通名的地名一定不少。宋代为传递文书，设立邮铺，铺作为地名自此产生，如广州入京路线，“由大庾岭步至南安军，凡三铺”^[44]。到元代传驿制度发展为系统急递铺制度，铺地名更加广泛，闽粤方言至今仍把十里路称为一铺路。元代驿传制度蒙古语译音为站赤，以后省称为站，现代车站之站即来源于此。站赤有水马站、递铺之分，包括有马站、水站、馆驿、旱铺、水铺、长河渡、横水渡等水陆地名。据陈大震《南海志》记载，元代南海路（约今珠江三角洲）有马站6处，水站11处、馆驿14处、递铺43处、长河渡43处、横水渡79处，皆有专用地名。如番禺湓湖站、马骑铺、大石渡、南站、官窑站、胥江铺、丹灶渡；增城乌石站、鹤子铺；清远回歧站、横石铺；东莞黄家山站、蕉利铺等^[45]，皆历历可考。明清时驿站名称变得更细更多，例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林则徐自京赴广东禁烟，取道大运河南下，过梅岭进入广东，据其日记所

载,这段水陆路程,就有南雄来雁亭、新铺塘、水马头、丹铺塘、草铺;始兴总铺、太平铺;仁化平圃驿;韶关官滩汛、车头汛;乳源白沙汛;英德沙口汛、清溪汛、朗姑汛、江湾汛、大庙汛、黄江汛、白庙汛;清远山塘汛、塘头汛、上界牌、下界牌;三水芦苞汛、沙墩汛、牛尾汛、南津汛;南海常济汛、张槎汛等,各种交通制度地名俱全。后来京广铁路选线与林则徐所走路线相同,大抵也曾参考古代交通线。到光绪张人骏编《广东舆地全图》亦全用元代铺名,许多至今仍在使用,只不过一些地名已省去驿、站、铺等通名,唯剩专名而已。但将这些地名复原,仍看出过去交通路线走向,不失为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有效途径。

第六节 从文化层次参证地名结构

一个地区文化是时间积淀的结果,并有其层次结构,所以地名也在每个层次中占有相应位置。剖析文化层次也就可以看出地名层次及其结构,加深对地名演变规律的认识。

岭南文化可分三层,第一层即底层,为百越族土著文化,反映在地名上是壮语地名,这如前所述。第二层即中间层,为带有浓厚区域特色的地方文化,在广东分为广府民系文化、客家民系文化和福佬民系文化,在地名上反映各自文化内涵和方言特色。第三层即表层,所代表的是中原正统汉文化,其地名为全国通用地名通名。这三个层次的地名像地层古生物一样,层层积压,组成岭南地名体系。

底层壮语地名盛行于百越人分布最广、人数最多的古代，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隋唐以后，百越人大部分被汉化，土著文化相继被汉文化覆盖，壮语地名发生很大变异，但没有完全消失。至今保留下来的壮语地名，即为其吉光片羽。

作为中间层次地方文化，大抵在宋代基本形成，乃楚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汉文化与岭南土著文化融合的结果，地名上兼有各种文化特点，形成方言地名。广东境内有三种汉语方言。一般说来，凡带有涌、冲、塍(塘)、坭、埗、埕、𪗇、濠、滘、沥、𪗇、藁、菑等字为首尾的是粤语地名；带有厝、垵、坂(阪)、墘、社、涌、苍、汕等字为首尾的是闽南语地名；而用嶂、埗、背、良、磔、嫫、垵、坵字为首尾的是客家语地名。但由于历史上语言相互借用，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实际上通用地名还是很多的，尤其是一些小地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澳、涌、寮、洋、圳、磔等。澳指可停船水边，以其为地名有澳门、澳头、澳角、南澳、中澳、大澳等，皆在沿海；涌指河流，在好些地区已成为河流代名词，广州有西关涌、东濠涌，花县有芦苞涌，佛山有佛山涌，阳江有麻濠涌等；水沟曰滘，广东很多地区都有此地名，以粤语区最为集中，如广州附近就有沥滘、新滘、横滘、增滘；田边水沟叫圳，但这种地名不多，除了深圳，广州有圳口埗，南海有梅圳，三水有圳东，德庆有圳边，封开有圳田、圳竹；山间水滨曰磔，广东有磔下、磔面、磔头、小磔、白水磔、七娘磔，以客家语区为主，其他方言区较个别。冲积平原或水网沼泽地称为塘，以珠江三角洲、西江沿岸和粤西一些独流入海河流河口区至为常见，如塘口、塘边、塘溪、大塘、司塘等；

又以洋表示田间,宋元时已通行,带洋字的地名,不但见于江浙,广东也不少,如汕头有牛田洋,潮安有枫洋,梅县有洋梅,紫金有洋头,阳江有上洋,遂溪有洋青,地名方言特色已冲淡。又南方多用寮表示小屋。海南黎族过去有放寮风俗,青年男女所居曰寮。但查阅方志,明代以前寮字地名很罕见,而现在很多,说明它是后来产生的方言地名,地域特色不明显,闽浙湖湘等地都有,广东更多,已成为三大方言区通用地名。但寮在广东多写作芋,《广东新语》说:“贫者欲避火,门于野外,构茅以栖,名曰‘芋’(音寮)。雷州有‘芋村’,有‘蒲芋’,有‘新芋岛’。吴川有‘芷芋镇’,琼有‘芒芋港’,儋有‘郎芋圩’,定安有‘坡芋市’,万有‘黎芋都’,乐会有‘薄芋滌陂’,会同有‘李芋塘’”等[46]。此外,大埔有高寮、田埔寮,饶平有许厝寮、红港寮,潮安有狗王寮、旧寮,增城有双合寮、耕寮,顺德有上寮,阳江有那芋,廉江有和寮,海康有讨泗寮等,都突破了方言界线。

另外,广东地名除通名体现地方特色以外,还把方言直接加在通名上,构成许多特别地名,加强了各方言区地名的共同性。如阳江有鸭𪗇坡、猪牯石、猪𪗇棚、鸡母岭、鸡公咀;增城有牛牯嶂、鸭𪗇潭、猪牯岭;潮安有牛牯岭、鸡神山、鸡公髻、鸡母坞;普宁有鸡婆石;揭阳有鸡母墩;丰顺有狗牯坑;梅县有鸭妈坝;五华有鸡麻桥、虾公地、猴公寮;乐昌有猴牯岭、鸭麻冲等。这些以禽畜野兽性别表示的地名,其词序是名词在前,修饰词在后,与中原地区正好相反。又其性别以牯、公表示雄性,以𪗇、妈(麻)、母、婆表示雌性,显然是方言地名。这类地名分布如此广泛,完全不受方言区限制,具有鲜明的共同性,

也显然是上著文化与外来文化相结合在语言和地名上的反映。

表层地名,即全国古今通用标准地名,如山、水、湖、沼、沟、岛、礁、滩、城、镇等。这些通名比较稳定,不因地区而别。随着汉文化不断占据岭南而扩大其覆盖区,已成为广东地名主体,无须多述。

这三个地名层次是有一定更替关系的,通过文化占用研究,可剖开其结构。例如以罗字为起首的底层地名,在壮语中本来已有山谷、山野之意,但后来又在其后加上山字,叠加在罗字之上,变成罗山,构成两个层次。清远、肇庆等地都有罗山此地名,有的加上岗字,变成罗岗,广州市郊、龙川等地都有这一地名;又古字已有村寨之义,可是古寨这个地名仍然不少。这些似有架屋叠床之嫌,可能是后到的汉人不明其原义之所为。像这类不同层次地名相加的现象,实难一一列举。

另外,同一壮语地名可在不同地区出现,形成某种对应关系,也是地名空间演变的一种方式,试以两广某些地名为例:

广西钦县有那禄

广东德庆有禄村

那丽

丽村

那蒙

蒙洞

那彭

彭村

那宾

宾村

那益

益村

那律

律村

那沙

沙村

| | |
|-------|------|
| 那里 | 里村 |
| 那旧 | 都那村 |
| 替眼 | 替眉 |
| 那康 | 台山康洞 |
| 那达 | 高要达村 |
| 防城那葵 | 德庆葵洞 |
| 白都那蓬村 | 德庆古蓬 |
| 灵山那龙 | 德庆龙村 |
| | 阳江那龙 |
| 灵山那胜 | 广宁胜村 |
| 防城那儒 | 南海儒村 |
| 邕宁员村 | 广州员村 |
| | 乳源员洞 |
| | 大埔员坑 |
| | 阳春员湖 |

再有,同一意义的地名译音也有地域差异,桂西钦廉一带,喜用那、板、曼、陇字地名,而广州、西江地区则多用罗、云、六、禄字地名,实际上那与罗、板与云、陇与六都同义。结合上列地名对应关系,可证明这些地名所在地区,皆为古越人居地,不过前者为早期古越人居地,后者为晚期古越人居地而已。通过文化转移,形成这种有趣现象。《广东新语》早已指出:“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过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地黎称峒名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横大、陀横小之类;有四字者,如曹奴那纽、曹奴那劝、

曹奴那累之类;有六字者,如从加重伯那针、从加重伯那六、从加重伯那撑之类;有七字者,如从加重伯那白吾之类”〔47〕。据研究,这些地名构词法是壮语成份在前,黎语成份在后,壮族先民作为古越族一支,有一部分先入海南,后来发展为黎族,于是在壮语地名后面加上黎语成份,构成两个层次,最后才是汉人到来,再加上其他通名,形成地名层次复杂的现象,分析这些地名层次叠压的关系,亦可说明民族迁移时间早晚,不失为历史民族地理研究方法之一。

注释:

- [1] 《越绝书》卷 8。
- [2] 杨孚:《异物志》一卷。
- [3] 樊绰:《蛮书·蛮夷风俗》。
- [4] 据《梁书》及洪麟孙:《补梁疆域志》。
- [5] 据新、旧《唐书·地理志》及参考《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
- [6] 陈大震:《南海志》卷 6,户口。
- [7]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 35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 [8] 宣统《东莞县志》卷 3。
- [9] 同治《番禺县志》卷 3。
- [10] 民国《顺德县续志》卷 1。
- [11] 根据徐俊鸣:《广东省县市名称演变的初步整理》油印本,1984 年。
- [12] 广州来源一说为黄族居地,广即黄,为黄族土音,而黄族为古越族一支。
- [13] 道光《广东通志》卷 92。

- [14] 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第 72 页,南雄县县志办公室翻印。1985 年。
- [15] 《广东省地图集》第 80 页,1966 年印。
- [16] 参见《福建地图集·普通地图》地名索引,第 152-221 页,1962 年印。
- [17] 咸丰《琼山县志》卷 2,方言。
- [18] [19] 《北史》卷 91,列女。
- [20] 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海南。
- [21]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 169,儋州,风俗。
- [22] 海康县地名委员会《海康县乡镇地名登记表》1984 年。
- [23] 《广西壮语地名选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 年版。
- [24] 游汝杰:《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 年第 3 期。
- [25] 参见徐松石:《泰族、僮族、粤族考》第 24 页,中华书局,1936 年版。
- [26]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2,地语。
- [27] 资料来源:海南岛各县地名录
- [28] 含海口市。
- [29] 《佛山市人口志》第 30 页,广东科技出版社,1990 年版。
- [30] 《淮南子·原道训》。
- [31] 《史记·吴太伯世家》,《集解》。
- [32] 据佛山博物馆调查资料。
- [33] 嘉庆《龙山乡志》,《重修大岗圩武庙碑记》。
- [34]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 34。
- [35] 佛山地区编《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一)第 60 页。
- [36]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 34。
- [37] 朱彧:《萍洲可谈》卷 2。
- [38] 嘉靖《广东通志》卷 25。
- [39] 广义珠江三角洲,据嘉靖《广东通志》卷 25,雍正《广东通志》和雍正、乾隆三角洲各县志统计。

- [40] 《明史》卷 80, 食货志。
- [41] 《西清古鉴》卷 37。
- [42] 道光《南雄州志》卷 33。
- [43] 《宋史》卷 328, 蔡挺传。
- [44] 《宋史》卷 263, 刘熙古传。
- [45] 陈人震:《南海志》卷 10, 兵防。
- [46] [47]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 11, 文语。

第九章 人才的产生、 分布和流动

人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产生、分布和流动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包括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传统等。它们对不同的人才地理格局的形成发生重要作用。而人才的地理行为,又与人才的生理需要,精神需要和对事业追求需要有很大关系。人才的这些需要不仅与自然景观,而且与文化景观和区域社会发展相互感应和推动,由此产生人才流动,不断改变人才的地理分布格局。这个主题和过程,在广东文化地理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人才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动因

人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古代岭南开发较迟,社会经济落后,被中原王朝视为化外之地,瘴疠之乡,从未在中国文化上占据重要地位。梁启超说过,“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之价值者也,自百年

以前,未尝出一非常之人物,可以为一国之轻重”[1]。此语前段虽属过激,一笔抹杀广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后段却不无道理。从汉到隋长达800余年,广东被朝廷察举人才总共不过24人[2]。唐朝开科取士,北方进士、诗人如群星灿烂,蔚为大观。江南人才也崭露头角,可是岭南人才却寥若晨星,被认为是唐代岭南文化代表人物的曲江张九龄和新兴惠能,祖籍都是河北范阳,他们的先辈都是或为官或被降罪而流落岭南的。但正如“邱文庄言,自公(指张九龄)生后,五岭以南,山川焯焯而光气”[3],为“岭海千年第一人”。张九龄和惠能算是升起在文化荒凉的岭南大地上的两颗明星。到宋代,伴随着人口迁移和经济开发高潮到来,广东人才始渐渐增加,时有“岭外科举尤重于中州”[4]之说。公私学校相继建立,培养了一些人才。两宋时广东被制举、辟荐168人,乡贡250人,进士575人,共993人[5],达到空前规模。各类地方著作也相应增多,凡195种[6],超过以往各朝代总和,并开始修志,有各类图经28部(大部分已佚)。在此期间广东有更多人才进入仕途,例如宋仁宗时曲江余靖,孝宗时四会李大性,光宗时增城崔与之,理宗时番禺李昉英等,皆一时之俊彦。但唐宋岭南人才的重要来源仍是北人南下,他们在岭南扩充与经营,对中原文化在广东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有利于各类人才产生和成长。例如苏东坡被贬海南昌化军,在那里办学兴教,培养了不少人才,也开创了海南学风。琼籍第一位举人姜唐佐就是苏东坡最器重的一个学生。宋代海南有举人10个,进士6个[7],为海南历史上破天荒的事情。所以时人评论“(东坡去后)今十余年,(海南)

文学彬彬,不异闽浙,”^[8]诚为确论。

人才地理行为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在历史早期,这首先是人才生理需要与自然景观相互感应。民以食为天,那里自然环境优越,资源丰富,适宜人类生存,人就往那里迁移。岭南本有丰富水土光热等资源,适于种植水稻等高产作物,可养活更多人口。但在宋代以前,人们对南方地理特点认识尚差,低地平原利用不多,稻作文化不发达。宋代北方人口对粮食需求增加,加之战乱,相当一部分移民向岭南湿热地区转移,华夏文明随向岭南发展,一些人才也应运而生。虽然人才与岭南自然景观的这种感应仍属一种最基本和低级的人地关系,但在当时条件下有很强作用,自此吸引中原文化一次又一次南移。

法律、制度作用也是文化景观因素之一。元朝对南人实行高压政策,文化受到惨烈蹂躏。广东人才数量与全国一样,沉于低谷。据道光《广东通志·选举表》载,元代近90年间,广东仅有乡贡(举士)119人,进士31人,加上察举者,凡422人,平均每年不到5人。所撰地方文献仅15部(其中方志5部,现存1部),简直不敢望前后各朝背项。

到明代,广东文化随着社会经济前进而踏上向前发展道路。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和沿海地区,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城镇兴盛,海外贸易繁荣,传统农耕文化观念被动摇,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出现造就了一批时代先进人才。屈大均说:“明兴,才贤大起。”^[9]他们不是一些个别人物,而包括一个巨大人才群体。据诸史不完全统计,有明一代广东被察举618人,有举人6437人,进士874人,凡7929人,超过历代广东上

述人才总和,而清代广东这些人才也不过 6192 人^[10],所以说明代是广东人才鼎盛时期。足以说明这一点的还有在历代有关广东的 2115 种文献中,撰于明代的有 992 种,占 47%,超过清代(723 种,占 34.2%)^[11],另外,明中叶以后,广东商品经济发展也大大增加了人才对广东区域的选择取向。全国各地不少商人落籍广州或佛山。广州“天下商贾聚焉”^[12],许多人往往乐而忘返,后来粤商成为角逐于海内外的巨大商人集团。他们是一批无法统计的各类人才。这种商品价值观念凝结着广东区域文化景观的最本质特征,也是一扫以往广东人才单簿的重要原因。

但从总体上说,这并不能改变广东历史人才在全国的微弱地位。据丁文江以二十四史 6 千多名历史人物为对象,选取 5 千多名有籍贯可考者进行统计结果,广东仅占其中 60 名,在清朝 18 省中排 14 位,只高于湖南、广西、云南和贵州,远远落后于河南、河北、浙江和陕西等历史人才分布中心^[13]。这说明人才产生和成长需要有一个较长历史过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明代广东经济高涨仍未能在短时期内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人才匮乏局面。

清代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向衰亡。虽然康熙到乾隆期间,封建文化仍有一定发展和昌盛,但选择人才的科举制度已腐朽不堪。如上所述,清代广东科举人才和完成地方文献都在明代之下。只是现存地方志多修于清代,明代所修散佚不少,容易产生清代文化兴盛表象。另外在明清之交的抗清斗争中,广东许多知识分子仗义死国,幸存者或循迹山林,或循人空门,或

以诗文自娱,学者无闻,人才浅露。当然,自明中叶西风东渐以来,在中西文化冲突、交融之中,也产生了一批近代文化人才,在他们所从事的学术领域里有很大建树,如理学大师新会陈白沙、增城湛若水,岭南三大诗家番禺屈大均、顺德陈恭尹、南海梁佩兰,爱国思想家南海朱次琦,番禺陈澧等,皆为这时广东人才的代表人物。

宋代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广东察举、科举人才数量微不足道,几乎无学术可言。至宋代这类人才数量才开始上升,也是学风肇始时期。但到元代,人才受到压抑,学术式微,只在明代才达到人才鼎盛、学风浓厚的高峰,可以说是广东文化发展一个黄金时期。清代这两者又有所萎缩。但人才和学术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冲破束缚他们的罗网以后,仍然踏上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

在清朝闭关锁国政策之下,只有广东尚能保持一定的开放性。特别是早期的澳门的开埠以及鸦片战争后香港的丧失,西方文化有了在中国传播的桥头堡,西方世界的新思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科学技术等首先由此传入。深感屈辱而又眼界大开的广东人,蓦然面临一个崭新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情怀激越,热衷于新的追求,于是“咸道以降,粤学(风)乃骤盛”^[14],大大加强了广东文化景观对人才产生及其地理行为的反作用,不但自己人才辈出,竞相争辉,而且吸引内地大批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志士仁人到来。他们的精神需要与广东文化景观相感应,出现了诸如洪秀全、洪仁轩、容闳、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到丘逢甲、詹天佑、冯如、孙中山、朱执信、高剑

父……这样的人物,其人数之多,影响之大,不仅为广东人才舞台前所未有,而且几乎左右了整个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的发展潮流,形成了近代中国人才史上最辉煌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主要通过高等学校培养的各类专门人才有成倍增长,据各次人口普查结果如表 8:

表 8 广东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变化

| 1953 年 | | | 1964 年 | | | 1982 年 | | |
|--------|------------|------------|--------|------------|------------|--------|------------|------------|
| 人数 | 占全省 人口% | 每万人 占有数 | 人数 | 占全省 人口% | 每万人 占有数 | 人数 | 占全省 人口% | 每万人 占有数 |
| 9085 | 0.03 | 3 | 151790 | 0.38 | 38 | 283710 | 0.48 | 48 |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广东分册》第 390 页。

此外,人才结构也有很大改变。1982 年全省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自然科学人员共 21.76 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 7 万,农技人员 2 万,科研人员 0.76 万,卫生技术人员 7 万,教师 5 万。同一体制社会科学人员 11 万,包括教师 5.2 万,财会人员 4 万,统计人员 1.2 万,以及从事科研、新闻、文艺、出版、翻译人员 0.6 万人,形成一支门类齐全、结构比较合理的科技人才队伍,有力地促进了广东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发展。但是广东和全国一样,长期在一个封闭环境里开展经济文化建设。一方面

广东不是国家重点投资建设地区,未能吸引住较多人才,另一方面,原有人才使用也未尽合理,结果造成人才发展缓慢和相对过剩矛盾状况,例如广东高校毕业生 1952 年为 0.13 万人,1982 年为 1.6 万人,增长了 11 倍多,但 1964 年和 1982 年广东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占当年全省总人口比例却分别为 0.38% 和 0.48%,均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处于后进状态。又例如 1982 年每万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广东为 47.8 人,比全国平均的 59.9 人少 12.1 人;同年在校大学生广东共 4.4 万人,平均每万人口仅有 7.4 人,比全国平均的 11.4 人少 4 人,在全国各省市中排第 21 位,还有同年全国成人高校学生,每万人口中有 6.4 人,而广东仅有 3.6 人,比全国平均数少 2.8 人^[15],至于被闲置、改行或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的各类人才更无从统计。从实质上说,此乃文化景观所致。因为一个区域观念与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而后者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前者的特征。只有开放的社会系统,才能在竞争、协同的对立统一中组成耗散结构,并使之渐渐趋于有序。竞争又是以成果多少贡献大小来衡量、评价一个人才的价值、地位和利益的。反观一个封闭社会则在平均主义与相互妒忌,反对冒尖中内耗,导致“熵”值增大。结果派别之争,门户之见,官场角逐,权力崇拜等盛行,知识成果与个人利益难以联系,人才缺乏归属感,严重挫伤人才地理行为的积极性,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全国如此,广东也不例外。

近 10 年广东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区域发展呼唤着更多人才为它贡献力量,人才的理想和追求事业的需

要与区域发展相互感应,终于迎来了广东人才鼎盛的春天。据1990年统计,全省(含海南岛)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已达922196人,为1982年的3.25倍,其中不少是外地流入的各类人才,他们正为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里,他们的自主权、经济利益、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但与广东区域发展密切联系,而且受到业已形成的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的保障。这就有可能使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与区域发展融为一体,建立起一种持久、稳定、和谐,逐渐增强的人地关系,并由此处处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文化景观。这也是广东十年改革开放所体现的区域文化个性根本所在。

第二节 人才的区域分布

人才区域分布与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并深受历史进程和传统文化观念的制约,也是区域发展的一个间接标志。

广东开发历史大体上是自北向南、自西向东推进的。直到唐代,广东经济重心和人口重心主要在粤北,所以人才分布也没有脱离这个格局。例如从汉到唐广东察举和科举人物凡72人,粤北为29人,占40%,粤中为26人,占36%,其余地区很个别,甚至空白,说明粤北是广东文化重心。宋代广东经济和人口逐渐南移,珠江三角洲地位开始上升。只是人才历史继承性并没有消失,粤北仍保持人才重要地位,但已让位于粤中。例如在宋代993个各类科举人才中,粤北占21%,粤中占

34%，西江地区占 16%，粤东占 13%，其余地区占 16%。其中进士仍以粤北最多，连州又居其首，计有 106 人，南雄也有 36 人。韩江三角洲进士数量稍逊于珠江三角洲，人才区域差异有所缩小。如唐代时鳄鱼为患，野象横行的潮州，到宋代学风大变，南宋淳佑十一年（1215 年），参加州试士子超过 1 万人，为绍兴二十年（1150 年）的 5 倍^[16]，实为人才兴旺缩影，宋代诗人杨万里赞曰：“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潮汕被称为“海滨邹鲁”。

元代大致保持宋代的人才分布格局。变化较大者，为粤西人才地位上升，其人才数量仅次于粤中。原因恐与这里兴修水利，又是外贸港口，促进地区社会进步有关。

明代广东经济重心完全移到珠江和韩江三角洲地区，粤北已失去昔日的领先地位，文化随而南移。珠江三角洲所在的粤中区，各类人才占全省 49%，韩江三角洲所在的粤东区则占 16%。许多封建人物应运而生，其中南海有进士 148 人，举人 563 人。顺德有进士 99 人，举人 257 人。番禺有进士 86 人，举人 405 人。三县进士举人总数分别占全省 38% 和 19%^[17]，成为著名的南番顺人才之乡。终明一代潮州中举者达千余人，“历宋明而弥盛，邹鲁之流风，韩赵之遗泽不替也”^[18]。潮州古城的儒林坊、状元坊、四进士等牌坊林立，皆为人物殷盛的侧影。此外，东莞、新会、惠阳、博罗、肇庆、四会、高州等也诞生了不少这类人才。值得注意的是海南岛，于明代不但结束了作为官员、罪犯流放地的历史，而且出现了文化兴盛局面。明代海南有进士 62 人，洪武十七年到嘉靖十年（1384—

1531年)中举者409人^[19],被誉为“海外衣冠盛事”,“鼎臣继出,名满神州”^[20]。以海瑞、邱浚为代表一大批著名人物的产生就是汉文化传入海南的结晶。此外,过去默默无闻的东江、兴梅客家地区,明代社会经济在逐步上升,从中原带来的汉文化得以生根、发扬,为人才产生创造了条件。据道光《广东通志·选举表》统计,明代东江、兴梅地区共有举人484人、进士51人,各占全省7.5%和6%,比宋元有显著进步,为客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代广东社会文化背景虽然发生很大变化,但人才地域分布格局基本上仍袭前朝。只是客家文化自明代初露头角以后,清代更有进一步发展,外出读书求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尤以客家文化代表梅县为著,大批人才相继产生,被誉为文化之乡,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例如到道光二年(1822年)兴梅地区有举人700人,进士120人,各占全省14%和12%,几乎可与粤东地区相伯仲,崛起为广东另一个人才中心,与粤中、粤东构成三足鼎立的人才分布格局。

但从广东历代察举科举人才的籍贯分布观察(见表9),广东历史人才差不多半数集中在粤中(占47%),次为粤东,其余各地区相差无几(5—7%)。前两个地区乃广东经济精华所在,特别是珠江和韩江三角洲更处在经济高峰区,势必产生和网罗更多人才。而其余地区人才多寡虽然代有差别,但终因经济欠充裕,人才与环境感应非常微弱,人才分布最后自发地趋于均衡,这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发展水平所致。

表9 广东历代察举科举人才籍贯分布

| 朝代 | 地区类别 | 全省 | | 粤北 | | 粤中 | | 西江 | | 粤西 | | 江东 | | 粤东 | | 兴梅 | | 南海 | | 附记 | |
|----|------|-------|-----|-----|------|------|------|------|------|-----|------|-----|------|------|------|------|------|-----|------|----|--|
| | | 人数 | % | 人数 | % | 人数 | % | 人数 | % | 人数 | % | 人数 | % | 人数 | % | 人数 | % | 人数 | % | | |
| 汉 | 察举 | 14 | 100 | 3 | 21.4 | 7 | 50 | 3 | 21.4 | | | | | 1 | 7.2 | | | | | | |
| | 察举 | 9 | 100 | 3 | 33.3 | 3 | 33.3 | 2 | 23.3 | 1 | 11.1 | | | | | | | | | | |
| | 察举 | 1 | 100 | | | | | | | | | | | 1 | 100 | | | | | | |
| 隋 | 乡贡 | 7 | 100 | 4 | 57 | 3 | 43 | | | | | | | | | | | | | | |
| | 进士 | 32 | 100 | 15 | 46.9 | 8 | 25.1 | 5 | 15.6 | | | | | 2 | 6.2 | 1 | 3.1 | 1 | 3.1 | | |
| | 小计 | 39 | 100 | 19 | 48.7 | 11 | 28.1 | 5 | 12.8 | | | | | 2 | 5.2 | 1 | 2.6 | 1 | 2.6 | | |
| 五代 | 乡贡 | 1 | 100 | | | 1 | | | | | | | | | | | | | | | |
| | 进士 | 8 | 100 | 4 | 50 | 4 | 50 | | | | | | | | | | | | | | |
| | 小计 | 9 | 100 | 4 | 44 | 5 | 56 | | | | | | | | | | | | | | |
| 宋 | 察举 | 168 | 100 | 14 | 8.3 | 64 | 38.1 | 20 | 11.9 | 2 | 1.2 | 6 | 4.8 | 15 | 8.9 | 6 | 3.6 | 39 | 23.2 | | |
| | 乡贡 | 250 | 100 | 11 | 4.4 | 105 | 42 | 105 | 42 | 10 | 4 | | | 6 | 2.4 | 3 | 1.2 | 10 | 4 | | |
| | 进士 | 575 | 100 | 184 | 32 | 157 | 28 | 31 | 5.4 | 22 | 3.8 | 40 | 7 | 112 | 19.5 | 13 | 2.3 | 6 | 1 | | |
| 元 | 小计 | 993 | 100 | 209 | 21.2 | 336 | 33.8 | 156 | 15.7 | 34 | 3.4 | 48 | 4.8 | 133 | 13.4 | 22 | 2.2 | 55 | 5.5 | | |
| | 察举 | 272 | 100 | 21 | 7.7 | 84 | 30.9 | 9 | 3.3 | 30 | 11 | 8 | 2.9 | 34 | 12.5 | 8 | 2.9 | 78 | 28.8 | | |
| | 乡贡 | 119 | 100 | 19 | 16 | 48 | 40.3 | 25 | 21 | 17 | 14.3 | 5 | 4.2 | 3 | 2.5 | 1 | 0.85 | 1 | 0.85 | | |
| 明 | 进士 | 31 | 100 | 5 | 16.1 | 13 | 41.9 | 1 | 3.2 | 4 | 12.9 | | | 6 | 19.4 | 2 | 6.5 | | | | |
| | 小计 | 422 | 100 | 45 | 10.7 | 145 | 34.4 | 35 | 8.3 | 51 | 12.1 | 13 | 3.1 | 43 | 10.2 | 11 | 2.6 | 79 | 18.6 | | |
| | 察举 | 518 | 100 | 81 | 15.1 | 119 | 19.3 | 51 | 9.3 | 103 | 16.7 | 53 | 10.2 | 88 | 13.9 | 35 | 5.7 | 80 | 12.8 | | |
| 清 | 举人 | 6437 | 100 | 291 | 4.5 | 3278 | 50.9 | 411 | 6.4 | 423 | 6.6 | 354 | 5.5 | 1009 | 15.7 | 130 | 2 | 541 | 8.4 | | |
| | 进士 | 874 | 100 | 32 | 3.7 | 494 | 56.5 | 43 | 4.9 | 53 | 6.1 | 36 | 4.1 | 145 | 16.6 | 15 | 1.7 | 56 | 6.4 | | |
| | 小计 | 7929 | 100 | 404 | 5.1 | 3891 | 49.1 | 505 | 6.4 | 579 | 7.3 | 453 | 5.7 | 1240 | 15.6 | 180 | 2.3 | 677 | 8.5 | | |
| 清 | 察举 | 114 | 100 | 4 | 3.5 | 73 | 64 | 5 | 4.4 | 8 | 7 | 13 | 11.4 | 4 | 3.5 | 6 | 5.3 | 1 | 0.9 | | |
| | 举人 | 5083 | 100 | 167 | 3.3 | 2435 | 47.9 | 323 | 6.4 | 238 | 4.7 | 275 | 5.5 | 819 | 16.1 | 700 | 13.8 | 122 | 2.3 | | |
| | 进士 | 995 | 100 | 35 | 2.6 | 590 | 59.3 | 35 | 3.6 | 39 | 3.9 | 37 | 3.7 | 121 | 12.2 | 120 | 12.1 | 26 | 2.6 | | |
| 合计 | 小计 | 6192 | 100 | 197 | 3.2 | 3088 | 50 | 364 | 5.9 | 285 | 4.6 | 339 | 5.3 | 944 | 15.3 | 326 | 5.3 | 149 | 2.4 | | |
| | 总计 | 15606 | 100 | 384 | 5.7 | 7496 | 47.9 | 1070 | 6.9 | 950 | 6.1 | 845 | 5.4 | 2363 | 15.1 | 1040 | 6.7 | 960 | 6.2 | | |

人才要靠培养,故学校分布也反映人才分布。道光初年,广东包括府、州、县学及私立书院、社学、义学等凡 950 间,地区分布如表 10:

表 10 广东学校地区分布^[21]

| 全省 | | 粤北 | | 粤中 | | 西江 | | 粤西 | | 东江 | | 粤东 | | 兴梅 | | 海南 | |
|-----|-----|-----|----|-----|------|----|-----|----|-----|----|-----|----|---|----|-----|----|-----|
| 间数 | % | 间数 | % | 间数 | % | 间数 | % | 间数 | % | 间数 | % | 间数 | % | 间数 | % | 间数 | % |
| 950 | 100 | 114 | 12 | 434 | 45.8 | 59 | 6.2 | 85 | 8.9 | 68 | 7.2 | 86 | 9 | 42 | 4.4 | 62 | 6.5 |

其中南海、番禺、顺德三县学校多达 251 间,占全省 26%,是广东最大的人才基地。粤东、兴梅人多而学校少,故外出求学蔚为风气,舍此不足以维持它们在全省的人才地位。

人才必然掀起学风。一个地方学风盛衰还体现在地方文献撰述及其作者地籍分布上。秦汉以来有关广东地方志凡 615 部,记述广东文献作者 941 人,它们的地区分布如表 11、12:

表 11 广东地方志地区分布^[22]

| 全省 | | 粤北 | | 粤中 | | 西江 | | 粤西 | | 东江 | | 粤东 | | 兴梅 | | 海南 | |
|-----|-----|----|------|-----|------|----|------|----|------|----|-----|----|-----|----|---|----|-----|
| 部 | % | 部 | % | 部 | % | 部 | % | 部 | % | 部 | % | 部 | % | 部 | % | 部 | % |
| 615 | 100 | 95 | 15.5 | 163 | 26.5 | 76 | 12.4 | 63 | 10.2 | 61 | 9.9 | 55 | 8.9 | 43 | 7 | 59 | 9.6 |

表 12 广东文献作者地籍分布^[23]

| 全省 | | 粤北 | | 粤中 | | 西江 | | 粤西 | | 东江 | | 粤东 | | 兴梅 | | 海南 | |
|-----|-----|----|---|-----|----|----|-----|----|-----|----|-----|----|-----|----|-----|----|-----|
| 作者 | % | 作者 | % | 作者 | % | 作者 | % | 作者 | % | 作者 | % | 作者 | % | 作者 | % | 作者 | % |
| 941 | 100 | 28 | 3 | 670 | 71 | 25 | 2.7 | 14 | 1.5 | 48 | 5.1 | 88 | 9.4 | 43 | 4.6 | 25 | 2.7 |

地方志具有地方百科全书性质,为一种重要文化建树,各地都有编修,唯修志时间间距可能不同。珠江三角洲州县修志次数多,卷帙庞大;粤北开发历史长久,志书数量也不少。其余地区志书数量大致平衡。而文献作者的地籍分布却很悬殊,基本上集于粤中,主要又在南海、番禺、顺德等学风兴盛之地,它们不仅是广东财赋之地,也是人文渊藪。

新中国成立后,区域发展成为左右人才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一些科技人才、教师先后奔赴海南、粤西、粤北以及边远山区,在那里艰苦创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地区人才短缺的局面。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人才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的现象仍无重大改变。据 1982 年人口普查,广东大学文化程度以上人才的地区分布如表 13:

表 13 广东大学文化程度以上人才地区分布^[24]

| 全省 | | 粤北 | | 粤中 | | 西江 | | 粤西 | |
|--------|-----|-------|-----|--------|------|-------|-----|-------|---|
| 人数 | % | 人数 | % | 人数 | % | 人数 | % | 人数 | % |
| 283710 | 100 | 19088 | 6.7 | 159216 | 56.3 | 11997 | 4.2 | 25622 | 9 |
| 东江 | | 粤东 | | 兴梅 | | 海南 | | | |
| 人数 | % | 人数 | % | 人数 | % | 人数 | % | | |
| 9476 | 3.3 | 22472 | 7.9 | 14196 | 5 | 21643 | 7.6 | | |

作为现代人才摇篮的高等院校地区分布,也因袭上述人

才分布格局。1982—1984年广东高等院校凡43所,其中广州有23所,占54%,其余是湛江4所,佛山、梅州、韶关、深圳各2所,汕头、潮州、肇庆、惠州、海口、通什、那大、江门各1所。同期在校学生,广州地区为50439人,占全省73077人的69%^[25],次为湛江4725人,占6.5%,其他各市人数所占比例都很低,实为人才地域分布的一个缩影。

第三节 人才在广东的流动和走向

文化传播必须靠人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流动方式与途径进行。过去广东地处偏僻,封建王朝每有鞭长莫及之势。故常常成为朝廷叛逆者或反抗异族入侵的斗士逃亡之地。每当改朝换代之时尤其如此。他们中不乏有识之士或为时代先驱者,成为移民文化在广东传播的生力军,也是广东人才潮流的重要源头。

东晋南朝第一次移民高潮,进入岭南的人才以中原人士为主。他们或泛洞庭,历湘漓入粤西;或经鄱阳,溯赣水抵粤北;或经浙闽沿海进入粤东和粤中,嘉靖《广东通志》引《交广记》云:建兴三年(315年)“江扬二州民多流人广州,诏加存恤”。不过这时期人才潮流都是一种自发和无意识,随机性质的流人,具有很大盲目性,人数也不会很多,但他们对中原文化在这些地区的移植和生根,毕竟起了先锋和示范作用。

北宋末和南宋末,我国人口第二次大转移。一部分沿大庾岭和沿海入粤,其中衣冠望族及一批封建文化人才落籍珠江

三角洲和沿海州县,促进那里的文化勃兴。元灭宋后,文天祥、张世杰等率领 10 万江淮军民,历浙闽入粤,转战于潮、惠、广州一带。也有赣西、闽南一些居民避乱进入广东。抗元失败后,很多人流落广东或逃亡海外,其中有不少是商人和具有较高学识的官绅世家以及工匠等,皆为开发广东,尤其是潮惠的一支人才队伍,对发展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作出贡献。

明末清初岭南历史上发生第三次移民高潮,除自发逃亡的难民百姓以外,还包括效忠明王朝的豪绅家族及其他残余势力,曾在广东掀起惨烈的抗清斗争,也涌现一批政治和军事斗争人才。恰如乾隆时广东学政李调元在《粤风》中说的,“益信深山穷谷之中,抱瑾握瑜之士犹在也”。

由于政治斗争而引起北方人才南迁,构成广东人才另一重要来源。比起上述移民,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大,影响深远。据道光《广东道志·谪宦录》,从宋到明以各种方式,包括贬、安置、流徙、编管等流寓广东的各级官吏、文人墨客等凡 541 人^[26]。实际上不止此数,特别是唐宋时在激烈党争中的败北者,往往被流放岭南,尤以武则天时代为甚,许多人一贬再贬,最后流落最蛮荒的海南岛。许多史志书都说,“当唐宋时以新、春、儋、崖诸州为仕宦畏途”^[27],也是人才流寓所在。唐代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韩愈、韦执谊、刘禹锡、王方义;宋代寇准、章淳、蔡京、丁谓、卢多逊、李光、李纲、范祖禹、苏轼、赵鼎、胡铨、秦观,以及明代汤显祖等,都是入粤名人。他们或多或少为当地办了些好事,给那里荒凉的文化大地带来一线曙光。如韩愈贬潮州、苏东坡贬惠州和昌化军,在当地兴办学

校,提倡学风,颇有成就,流韵遗风,影响至今。

近世广东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和时代思潮重点的地位更加突出,吸引全国大批志士仁人到来。更有一批又一批粤籍人士出国留学,其人数之多为全国之冠,形成一股人才流动新高潮,也造就了一个站在时代前列,叱咤风云的人才群体。大革命时期广东成了全国革命策源地,各地人才趋之若鹜,是继辛亥革命之后又一次人才流动高潮。例如黄埔军校从1924年创办到1927年3月就共培养了2万多名干部。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来自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和华南各省区。他们从广东走向全国各地,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熊熊烈火。

1978年以后,广东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的建立,海南单独设省和作为全国最大特区的建设,以及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崛起,为各类人才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吸引成千上万移民南下,形成规模空前的人才流动热潮。近年佛山从外地引进人才有3万多人,南海2300多人,顺德近2千人。广州平均每30个人中就有1个是近10年才定居的新移民,深圳、珠海这个比例当然更高,还有“十万人才过海峡”的佳话。目前已难以统计这支人才大军究竟有多少人,反正他们流向全省城乡各个角落,从事能够发挥他们智慧和力量的各项事业。回顾当年美国开发西部、苏联开发远东,以及我国东部沿海开放所出现的人才大发展和流动,都说明只有区域发展才是人才地理行为的最大动力。

中国历代人才和学风地理分布都是自北向南,且有渐向

东南倾斜之势。在这个人才大势支配下，广东人才流动有自己的格局。历史早期的北江和西江地区，一则有比较适宜中原人生活的地理环境；二则为交通线所经；三则深受岭北文化影响，所以文明发生较早，形成两条人才流通走廊。其后，人才继续自北向南，自西向东流动，继而辐辏于珠江三角洲，构成向心式人才流动格局。到历史后期，主要是宋代以后珠江和韩江三角洲已成为广东人才和学风重心，并取代北江和西江地区位置。人才在向它们集中的同时，又向北、向西和向南流动，形成两个人才聚散中心。近年广东区域发展引发的来自全国各地人才大潮，主要流向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其中又以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城市为主，形成人才密集区。此外，则流向汕头、海南经济特区，也有一部分人才流向港澳和海外，形成多向人才扩散结构。

注释：

- [1] 梁启超：《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七册，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版。
- [2] 道光《广东通志》卷67，选举表。
- [3]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2，诗语。
- [4]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风土。
- [5] 道光《广东通志》卷67，选举表。
- [6] 道光《广东通志》卷189—198，艺文志。
- [7] 道光《广东通志》卷67，选举表。
- [8] 李光：《昌化军学记》，见《庄简集》卷16。
- [9]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事语。

- [10] 据道光《广东道志·选举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统计,举人数字到道光二年。
- [11] 据道光《广东通志》卷189—198,艺文志统计。
- [12] 吴震方:《岭南杂记》上卷。
- [13] 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载《科学》1923年8卷1期。
- [14]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见《饮冰室文集》第14册第78页。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
- [15] 有关数字均见《中国人口·广东分册》第390—392页,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版。
- [16] 《潮州三阳志辑稿》卷10。
- [17] 以上统计数字均见道光《广东通志·选举表》。
- [18] 序烈火:《潮州耆旧集·序》,香港潮州会馆印,《潮州文献丛刊》本。
- [19] 小叶田淳:《海南岛史》第111页,广东省民族研究所译,1964年。另据道光《广东通志·选举表》海南进士56人,举人541人。
- [20]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2,广东条。
- [21] 道光《广东通志》卷137—144,学校。
- [22] 本表据中山图书馆《馆藏广东地方志目录》,并参考陈谦《明清两代广东修志概况》(载《岭南文史》1983年第2期)整理而成。本表未含省通志,包括府、州、县志及乡、围、城坊、山、水、寺志等。所列615部地方志,现存322部,其余已佚。
- [23] 据道光《广东通志》卷189—198,艺文志,省外作者不含在内。
- [24] 据广东省人口普查办公室《1982年广东省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上册,1984年。
- [25] 《中国教育年鉴》1982—1984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 [26] 道光《广东通志》卷263—267。
- [27] 道光《琼州府志》卷2,舆地。

第十章 文化区划

岭南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文化景观多种多样,彼此之间相互交融和渗透,都归结于区域,形成自己的区域个性。为了有效地对它们作出描述,必须借助于区域概念,即划分不同的文化区,也叫文化地理区。文化区直接揭示文化的空间差异及其分布规律,是文化地理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和必然结果。离开区域概念,一切文化现象就失去依托。

第一节 区划的基本原则及区划体系

文化区是一种空间单位,以不同地区人群中盛行文化特征的差异划分的。在同一区内,其语言、宗教、习俗、艺术形式、道德观念、社会组织、经济特色以及反映这些文化特征的景观是一致的。文化区又是一个历史范畴,一个动态概念,一方面,文化有其历史演变过程、发展阶段性和连续性,即时间结构;另一方面,文化又有其空间推移变化,即占用地域的

扩大过程,也就是地域结构。因此,现在的文化区,则是这种时间推移和空间扩张的某个限度,集中反映了两者相对一致的统一体。

根据文化区的基本概念,在这里,依照以下基本原则划分广东文化区。

- I. 比较一致或相似的文化景观;
- II. 同等或相近的文化发展程度;
- III. 类似的区域文化发展过程;
- IV. 文化地域分布基本相联成片;
- V. 有一个反映区域文化特征的文化中心。

这些原则是一个整体,但 I、II 两项是最基本的,而在区划实践上,具有强烈地域性的语言和风俗又有特别重要意义。

一个文化区,是由文化中心、文化核心区和文化辐射区(亚区)组成的。由于文化相互交流和空间占用,所以文化区之间没有绝对分明的界线,其文化的一致性只在核心区中最为明显,向外(即文化辐射区)则逐渐减弱,不同文化区之间的接触地带实际上是一个过渡地带,故文化区划分常常带有一定主观性。

文化区域个性差异有大小,故文化区也有其等级结构或层次。一级区下有二级(亚区)或三级区(次亚区),形成范围大小不同、等级高低相套的空间体系。在这里,只划分文化区和文化亚区。

文化区的名称,反映了它在文化区划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这里,一个文化区的名称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地理区

位+民系(民族)+区划等级。根据上列原则,广东文化区划方案如下:

I. 粤中广府文化区

I-1 珠江三角洲广府文化核心区

I-2 西江广府文化亚区

I-3 高阳广府文化亚区

II. 粤东福佬文化区

II-1 潮汕福佬文化核心区

II-2 汕尾福佬文化亚区

III. 粤东北——粤北客家文化区

III-1 梅州客家文化核心区

III-2 东江客家文化亚区

III-3 粤北客家文化亚区

IV. 琼雷汉黎苗文化区

IV-1 琼雷汉文化亚区

IV-2 五指山黎苗文化亚区

第二节 文化区划分论

一、粤中广府文化区(I)

本区位于广东省中部和西南部,基本上属粤语方言区范围,包括珠江三角洲、西江和高阳(即粤西)地区,是广东覆盖面积最大的文化区之一。区内大部分为平原、丘陵,也有相当

面积的山地,自然条件复杂多样。珠江、西江、贺江、绥江等河流贯流其间,交通比较方便,文化发生较早,原始文化遗址星罗棋布,是岭南原始文化一个摇篮。历史早期中原汉人多取道湘桂走廊和贺江南下,定居于西江沿岸,成为中原文化进入岭南的第一站。西江也就成了岭南开发由西向东空间推移的一个接力点。这种推移最后一站是番禺(广州)。它以三江交会地理形势,博采多种文化养分,成为岭南最大的文化中心,同时以其为结点,构筑起珠江三角洲文化核心区,形成对外辐射之势,影响整个岭南文化发展过程和空间分布格局。而粤西南若干独流入海的小河流,如漠阳江、鉴江等,通过低矮分水岭,与西江和南、北流江相互沟通,接受中原文化,在与西江地区有共同文化渊源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广府文化特色的地方文化。本区文化特质和景观的一致性或相似性虽是主要的,但文化发生有先后,文化形成前因后果每有不同,故在相对一致的前提下,仍可分出文化核心区和文化亚区。

I-1 珠江三角洲广府文化核心区

文化核心区是在文化中心的基础上,向外缘扩展所形成的一个范围比较小,文化特质比较一致的地区。它是文化区划指导性架构,而本核心区,一是在珠江三角洲范围内,相当于粤语区广府片一部分和四邑片。两片语言可以通话,所以地区历史上与广州有紧密稳定的经济文化往来,现在更深受广州影响;二是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基本上与广州处在同一个层次上,三是历史和现在的文化特征都比较趋同或者均衡。这种文化空间组合,足可充任广府文化核心区。

珠江三角洲是广东农业文化精华所在。稻作文化在这里起源很早,是土著南越人主要文化形态之一。东汉时个别地区已有发达耕耘农业;宋元大规模围垦开发,形成多种土地利用类型,奠定了农业文化的深厚基础;到明清时,已成为中国基本经济区之一,建立起发达的商品农业,形成专业性生产的经济作物集中种植区,尤以顺德、南海、中山、番禺等地基塘农业驰名于世,为人类农业文化史上一项重大成果。现在,珠江三角洲已发展为现代农业在广东的基地,稻作、经作和生态农业等不同层次和结构的农业文化得到充分发展,生产大量粮、蕉、鱼、禽、畜、果、花卉等,支持了当地整个经济运行,并通过农产品和技术输出,将这里的农业文化辐射海内外。

珠江三角洲人口稠密,村落连绵,城镇发达。人们聚族而居,不乏大村巨姓,千人以上的村庄比比皆是,故乡里文化很兴旺,世俗观念也很强烈。由于商品流通的需要,使这里自古以来就产生众多城镇,广、佛、陈、龙四大镇即为其中代表者。近年兴起的城镇化高潮,已经和正在迅速改变本区城镇文化风貌。它是以广州为中心,形成从广州到深圳和香港,以及从广州到珠海和澳门的两个密集城镇带,聚集着大量人口、产业和财富,构筑起一个巨大的城镇文化群和向其纵深地区作文化辐射态势。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东莞、新塘、宝安、陈村、大良、石岐等市镇已成为这个地带城镇文化的窗口。与珠江三角洲地理环境相适应,这里的建筑文化风格多种多样,既保留着具有南越人“干栏”建筑遗风的沙田地区简陋田寮,也有传统竹筒屋、明字屋、三间两廊等村镇常见民居,以及综合多元文

化类别构建的广东四大名园,更有近年崛起的各种流派和风格的各类建筑群,包括从各种仿古建筑到玻璃墙面高楼大厦和五星级酒店,无不反映珠江三角洲城镇已成为各种建筑文化荟萃之地。

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发达,使这里文化在不同程度上染上商业色彩,商业水平凌驾在其他文化区之上。不但一切物质财富生产环绕着商品这个轴心进行,而且为了商品的流通和消费,也无不在它身影所到之处,出现强烈的商业文化景观。举凡一切公共场所、街头巷尾、影视屏幕和大小报刊,以及日常用品的包装,都无不充满各色的商业招牌广告。而遍布三角洲各市镇、交通口岸的茶楼酒馆,也同时是洽谈商务和交易的一个重要场所。广府人的茶文化掺杂了很多商业文化成份。至于商品价值观所造就的三角洲人民的商业文化心态和性格特征,例如追求财富、笃信金钱的力量和作用、高消费甚至超前消费等,都较其他地区群众为甚。

经济发达是文化兴盛带来的结果。本区自宋朝以来,人文兴旺,一直居全省人才优势地位。各类科举人才、教育机关和公私著述,甚数量之多,学风之盛,甲于全省。尤以南海、番禺和顺德为人文渊藪。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珠江三角洲涌现了一个站在时代前列,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人才群体,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詹天佑等即为他们的代表。近年三角洲经济崛起,区域发展使这里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人才中心之一。在改革开放形成的新的社会环境中,各类人才得以在这里大显身手,推动三角洲各项事业不断走上新台阶。

本区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地区，中西文化在这里长期交融、碰撞，加上三角洲又是著名侨乡，华侨文化的参与，使其文化的许多方面，从聚居建筑形式、语言、饮食、风俗，乃至人们衣冠履带等，都带有异国文化的风情或色调。例如在开平、恩平一带，建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炮楼式小洋房数以千座，成为五邑侨乡特殊建筑景观。华侨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参与，过去多限于补桥修路、办学校、开医院以及其他慈善事业，现在则扩大到回乡投资设厂、兴办各类实业，引进技术资金、信息和人才，由此建立的文化景观在三角洲很普遍。正是岭南本土文化的凝聚力，使大批海外赤子心系故土，千里回归。

本区自成一风俗文化群落，一方面保存南越人许多古风遗俗，另一方面又博采外来风俗文化之长，形成自己的风俗文化风格。例如浓重的市民意识、淡泊政治、追求享受、不怀旧、不拘泥历史、冒险、开拓、接受新鲜事物及善于融合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等等。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影响下，本区人民不断接受和强化现代文化意识，风俗中上述一些优点得以弘扬，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些陈规陋习，比如迷信、过分讲究排场、部分人中狭隘的排外心理等，实属应予革除之列。

文化区不论等级高低和范围大小，必须有一个文化中心，作为区域文化个性代表。广州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多元文化相容共处的开放性城市，也是岭南和本区文化中心和典型代表。如果从广州前身“楚庭”算起，广州已有 2800 多年历史。广州建城后，逐渐发展为一个具有汉式、越式、楚式和汉越混合式等多元文化共存特色的城市。广州后来又吸收了印度文化、阿

拉伯文化和西洋文化,扩大自己文化的多元性。特别是广州作为南越国和南汉国都城期间,城市建设有进一步发展,在全国古都体系中居重要地位。尽管封建王朝不断更替,地区经济代有兴衰,但广州千年不衰的港市地位从未动摇,即使元代及近代广州外贸地位一度被泉州和上海压倒,也不能从根本上取代它。广州也有过兵燹之祸,但社会安定以后,很快恢复并发展起来,远远超过原来状态。所以广州依靠这样优势,成为蜚声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建筑艺术、宗教、戏剧、音乐、绘画、雕刻、刺绣、饮食、园林、风俗各个文化领域,处处表现出悠久的历史渊源和鲜明的个性,给人以多层次的、立体的和丰富的感受。例如广州骑楼、多种宗教建筑,有“南国红豆”之誉的粤剧,充满乡土气息、节奏明快广东音乐,以革新国画著称的岭南画派,饮誉中外的粤菜,以及象牙雕刻、彩瓷等,都代表了广州文化特色。尤其是广州引进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和新思想意识,造成自己很高文化势能,不但影响了岭南社会经济发展,而且辐射到全国许多省区。故明清时已被指出:“五岭之南,郡以十数,县以百数,幅员数千里,咸执秩提稽受治于广州之长。”^[1]总之,从历史文化看,广州在全国同类历史文化名城中堪为翘楚。

现在,广州得改革开放春风,正成为中国新文化一个生长极。据统计,广州地区拥有各类科研机构 150 个,科研专业人员 13 万多人,各类学校 2140 所,在校学生 92.23 万人,其中高等学校 25 所,在校学生 64.9 万人^[2],为岭南最大科技文化中心;无论是对待开放态度,改革精神和劲头,还是日常生活

方式,衣着打扮等,广州都走在全国前列;而日新月异的城市景观,与商品经济发展相感应而涌现和流动的各种文化思潮,更令世人刮目相看。例如广州环市路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群、天河体育中心和天河新技术产业区科技一条街,以及初步形成的集信息传递、中介服务、技术贸易、投资、开发、人才交流等于一体的广州技术文化市场等都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广州文化出现的新产物。它们不但重建了广州文化形象,而且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或参照体系,令许多地区效法或模仿,这样广州文化又走向全国,成为一个巨大的新文化辐射中心。

一个文化区的文化中心不是唯一的,也有双中心现象存在,广州和香港就属这种关系。香港是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国际文化中心。香港虽然由于历史原因已从广东分离出去,但它与建国前的上海、广州等在内一批半殖民地城市一样,都是近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和结合的产物,有着共同的历史背景;而特别重要的是香港无论在地缘、血缘、亲缘和俗缘上都与广东,主要又是与珠江三角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更何况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以后,这些关系将变得更加密切;再有,香港文化虽然是在殖民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仍是它的根源,而西方文化只是流而不是源。实际上经过一百多年的拼接、融合和交流,中西文化在这里已经紧紧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香港文化,它与广州文化一起,共同参与珠江三角洲文化核心区,发挥其作为另一文化的各种功能。

香港文化产生于特殊背景,具有许多异于内地文化的特

点。在文化内容上,世界上各种文化流派和思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自由放任地发展。从城市建筑景观,人们衣冠履带,社情民俗、宗教信仰到宣传广告、饮食娱乐等无不如此,给香港文化涂上各种色彩;在文化空间上,形成多层次结构。早期城市景观体现了英国人与华人居住区和商业区,山间别墅式高级住宅与山下破旧贫民窟,以及港九近代西方文明与新界传统闭塞生活方式之间的强烈对照。当然,现在这种反差已被冲淡,但高耸入云的“石屎森林”与山坡上低矮铁皮木屋仍是截然分明的两种景观和空间层次;在文化形式上,各种文化景观、生活方式和文化意识可以相容共存,表现了广泛的文化多元性和多重性。例如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文化艺术设施和服务,也有低级下流、粗俗文化场所。香港作为闻名天下的“购物天堂”的“美食中心”,五花八门,光怪陆离行为方式都可满足不同阶层和人群需要。香港人在激烈竞争、紧张地生活之余,也舍得花钱花时间去旅游、娱乐,包括以赌彩、求签拜神等方式求得意外收获和心理上平衡;在文化网络上,香港依靠它的高度发达通讯、传媒手段和人员往来,与世界各地建立便捷联系,广泛吸收、消化和传播西方文化,同时也使自己文化生活更趋西化;最后,在文化价值上,香港作为一个商业高度发达城市,金钱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尺度,文化也不例外,所以香港文化最大特质在于它的商业性。依靠这个特性或优势,香港文化能集世界各地层次不同、良莠不齐的文化于一身,比任何城市文化都更富于多元化和多样化,堪为一个世界文化博览馆。据统计,1983年在香港注册有70家报纸、455家

杂志、150 多家出版社,报纸发行量达 157 万份,平均每千人拥有 380 份,阅读率居亚洲第二。中英文广播电台 10 个,每周广播 700 小时。1981 年港产电影 130 部,上映影片 390 部,观众过 6500 万人次^[3]。文化艺术信息覆盖量在亚洲数一数二。至于物质文化方面,香港聚集着巨大物质财富,拥有世界上先进科学技术产品、交通工具、家庭设备和娱乐设施,在香港可购买到来自世界各地任何产品,特别是香港对日新月异的科技文化保持着狂热追求,所以世界上高新科技文化能在香港长盛不衰,这是世界许多城市都难以相比的。正因为香港文化拥有如此巨大的优势和能量,故能辐射世界各地,首先是地理上一体的珠江三角洲,并以此建立穗港两个文化中心的相互采借和互补关系。

广州作为岭南传统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汇中心,当前又正发展为我国新文化一个生长极,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广州可利用其传统文化和博采各地文化之长的优势,向香港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和最新文化成果,包括各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产品,例如科技文化、旅游文化、风俗文化、文学艺术以及人才交流等,借以弥补香港文化民族根基浅薄,传统观念淡泊的缺陷;而广州主要假道香港引进西方科技文化,并走上与国际文化交往的道路,以加强广州文化现代性和崭新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风貌,有利于拓展广州人的文化视野,促进广州文化发展。例如 80 年代初,广州人先从香港人那里引入一些诸如太阳镜、牛仔裤之类服饰,继而涌入录音机、计算器、彩电、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接着港台流行歌曲、报刊、小说,以及待人接物

方式、家庭价值观念等在广州风靡起来。广州的发型屋、精品商店、美容中心、音乐茶座、卡拉 OK 舞厅,以及名目繁多的西方节假日等时新文化景观,很多源于香港这个世界文化中心。

I-2 西江广府文化亚区

本区包括西江中下游地区,计有封开、郁南、怀集、广宁、德庆、罗定、云浮、新兴、高要、四会、肇庆等县市,分属西江及其支流贺江、新兴江、罗定江、绥江等流域。这些河网虽然较密,但多为中上游,与北方南下交通线联系方便。山丘河流交错,盆地穿插其间,加之地势较高,气候干爽,不像珠江三角洲那样卑湿,颇适宜中原人居住,故能成为岭南早期文化中心。最早生活在当地的所谓苍梧族人,即为传说中尧舜时代已由今陕西南迁,与土著居民相结合发展而成的人群。关于广州五羊神话,在西江地区流传的是七位仙人牵七只羊降临粤地,五只去了广州,两只留在肇庆。这个神话反映以巫文化为主体的楚文化在西江地区的传播,以及西江与广州地区的文化渊源。广东春秋到战国晚期墓葬发现的青铜器,主要分布在西江地区交通线附近,显系受中原和楚文化影响所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西汉初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上所标“封中”一地,即泛指贺江流域。而该图在珠江流域所标的地名仅两个,另一个为桂阳(今连县)。同一汉墓中还发现“广信令印”。广信即今广西梧州一带,可见本区开发很早,西江文化称盛一时。正如罗香林教授在《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中所指出的,汉代“当时珠江三角洲虽然也有相当的学术表现,但可以代表广东学

术思想的,还是西江中部的几个学者”(按:指广信陈元、陈钦、陈士燮)。他们对儒、佛学很有研究,“这是广东学风的重要先河,有相当的引导作用”。例如封开就是一个文明中心,大抵唐宋以后,西江文化才让位于珠江三角洲。但中原移民很多是顺西江而下,最后抵达珠江三角洲的,语言风俗与后者相近,故西江文化仍不失为广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江地区过去商品经济不发达,很多地区与外界交流甚少,土著文化保留比较多。直到清中叶,峒落间还居住着不少瑶、壮族人,民风醇厚朴实,迷信、早婚盛行。例如具有代表性的新兴一带,“民皆力耕,商贾罕通,……病不服药,丧尚浮屠”;曾为文明中心的封开,“俗虽荒陋而知义,婚姻不论门第,惟视贫富”。“地广人稀,瑶僚相杂,居民多健悍,男子喜习巫,耻为工商,妇女蕉衫跣足”[4]。西江所在肇庆府属各县,类多如此记载,反映在历史后期,本区文化进步仍很缓慢。

西江地区语言属粤语方言区广府片,操白话,日常用语与广州人习惯相同。如称平人为佬,女婿叫郎家,帆叫𦨭,不叫唔,以刀削物曰批等。“皆有字者,与吴越近”[5]。但本区古代为南越人主要居地之一,地理上与广西为邻,地方文化带有不少壮文化特点。例如多壮语地名,如以古、六(鹿)、良、多、思、扶、那、武、麻为首尾命名村落、田地等。特别是替(tan)字地名,壮语意为塘,在本区很常见。在风俗文化上也自成一群落,比珠江三角洲保存更多的南越人古风遗俗,与粤北瑶族比较相近或者相同,显示鲜明的地方文化个性。

肇庆为本区文化中心,又是中国历史名城,南越文化、楚

文化、中原文化很早就在这里移植生根。作为西江文化象征的端砚产于附近,唐代时上贡朝廷,闻名全国;宋为端王赵佶封地,赵佶即后来的宋徽宗。此后人文蔚起,学术流芳。明末西洋教士利玛窦等首途于肇庆入粤,在这里传播西方文化,至今仍史迹斑斑,肇庆遂成为近代西方文化传入内地的第一站,继梧州、封开之后成为西江学风之中心。这里还有广东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城墙,乃城市建筑文化一项杰作。此外,附近风景名胜甚多,如七星岩、庆云寺等,旅游文化很发达,是全国旅游名城之一。肇庆又恰在两广水路交通线中央,为穗港文化辐射大西南的一个中继站。这个文化区位,必将推动肇庆和西江文化的复兴与高涨。

1-3 高阳广府文化亚区

主要指漠阳江和鉴江流域,即习惯所称粤西地区,包括阳春、阳江、信宜、高州、茂名、电白、化州、吴川等县市,由几个相对独立的小河流域组成,文化发展水平比较接近,操粤语方言,与广州话虽有一定差异,但基本可以通话。

本区岭谷平行,有不少通道沟通内陆和沿海,与珠江三角洲、西江地区乃至广西保持联系,利于区域和民族文化交流,加上这里是南亚热带与热带过渡地带,环境感应强烈,在文化景观上体现了这些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土地利用方面,不但常见大片洞田分布于盆地河谷间,而且低山、丘陵上梯田、坑田也不少,以信宜云开大山至为典型。水田壮语称“那”,粤西是广东那字地名集群最大分布区,也是稻作文化起源甚早的一个佐证。但由于本区陆地上升日浅,河流多未能扩充其谷地,

许多地方缺水,不适宜栽培水稻,故甘蔗、花生、番薯等作物历史也很悠久,旱作文化景观触目皆是。另外,本区又是橡胶、咖啡、菠萝蜜等热带作物分布北界,近几十年垦辟大片荒山林地,兴办许多热作农林场,热作文化从海南推进到此为止。各自成社区的农林场也是一种封闭式区域文化细胞。

高阳为古高凉郡地,南北朝时建置特别复杂,但长期为封建势力所难及地区,也是俚族根据地。曾昭璇教授曾指出广信以南的粤西区古代为一国家。当然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部族或民族。虽然当地俚人后来大部分被汉化,但土著文化仍然根深蒂固,时至今日,仍在多方面表现出来。例如这里出土越式鼓铜数量最多。除了“那”字,还有大量壮语地名,尤以西陲一线,如形随影,常见禄、替、板、屯、左、米、麻、马字等,皆不可按汉语解释。民俗文化也多俚族遗风,例如洗夫人根据地阳江,“气习颇殊,好勇轻生,不循礼法”^[6],械斗事件过去常有所闻。此外,在婚姻、丧葬、服饰等方面,也流行俚族人风俗。又由于本区过去建封势力较弱,民众心理的儒家文化板结层也比较薄弱,区域文化发展水平不高,故迷信得以大行其道,神鬼被奉为神明。例如吴川“信巫而论神”;茂名“俗尚佛事,疾疾延巫师,吹角鸣锣”^[7]。还有厚葬、早婚、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等,至今仍比较流行。近世风气日开,“海滨遐陬冠婚丧祭,悉遵典礼,蔼然无异于中州”^[8],已赶上西江地区甚至珠江三角洲的文明程度。“唯山居者犹存俭朴”^[9],即保留较多的传统文化。

本区山川分割,加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区内外文化

交流也欠活跃,难以形成统一的文化中心,在漠阳江流域以阳江城为地方文化中心,其为广东南路与珠江三角洲交通咽喉,兼具两者文化特色。而鉴江流域则以高州城为地方文化中心,这里长期为高州府治,具有浓厚的汉俚文化风情。

二、粤东福佬文化区(II)

本区主要分布在潮汕平原和粤东沿海,包括史称三阳(揭阳、潮阳、海阳即潮安)、饶平、惠来、澄海、普宁、揭西、海丰、陆丰、潮州、汕头、南澳以及惠东、丰顺、大埔一部分,在广东是一个占地面积较小的文化区。全部使用闽南语,其居民主要来自福建,故有“福佬”之称。而土著居民是闽越族人,东晋南朝第一次移民高潮以后,中原和闽南汉人才不断人居,成为当地居民主体,以闽南方言为标志的福佬文化大抵在唐宋时形成。三阳地区首先得到开发,文化产生最早,明代已发展为地狭人稠的经济发达地区。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很突出,为此先后以三阳为基础,分建饶平、惠来、普宁、大埔等县。也有一部分人口迁往琼雷地区。福佬文化随之而向外扩散,粤东沿海首受浸染,尤以惠来、海丰和陆丰程度最深,大抵在粤中地区被隔开,再分流到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在那里产生变异,形成另一个文化区域。故今潮汕平原充当本区文化核心区,而由此往西至海丰一带,为一文化亚区。

II-1 潮汕福佬文化核心区

本区指潮汕平原,由韩江、榕江和练江下游冲积平原组

成,为广东第二大平原,地势平坦,河网交错,耕地连片集中,土地肥沃,是全省最宜农耕地区之一。但人口密度居全国之冠,人均占有耕地和活动空间非常狭小,人口对环境压力很大,迫使人们在有限的土地和空间内创造了种种文化奇迹:一是农业上精耕细作,有“种田如绣花”的美誉,至今仍是广东水稻单产最高地区,这已作为一种稻作文化模式向全国推广。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批潮汕老农外出传经送宝,即属这种文化输出。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这种高水平,平原上自明代起就修建大批堤围涵洞、灌渠等水利工程,深刻改变昔日沼泽低地荒凉的自然景观;二是聚落布局 and 空间使用上精巧玲珑,小中见大。平原上村落密集,规模巨大,但布局紧凑,多院落和较多文化娱乐设施,有单佩剑、爬狮、四点金等民宅建筑;三是向多元物质文化方向发展,潮州陶瓷、五金技艺、刺绣、木雕,以及造船、冶铁、榨糖等手工业明清以来就很出名,文化风格瑰丽多彩。例如“绣以潮州绣工为上”^[10]，“广南锡工,以潮州为第一,广州不及也”^[11],都凝聚着很高的文化成果。

潮汕面向海洋,人类许多活动以海洋为舞台开展,海洋文化至为发达。沿海有众多渔港、运输港、渔村、帆影和鱼货。过去许多人为了谋生,远走他乡,故潮汕成为广东侨乡,华侨文化与海洋文化有不解之缘,在语言、服饰、建筑、人们心态等方面都有许多华侨文化特征。这已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背景,汕头经济特区和汕头大学的创立体现了华侨文化的价值。

潮汕人文发达,“文物之富始于唐而盛于我宋”^[12],至元

代，“五岭，首称一潮，士俗熙熙，有广南闽峤之语，人文彘彘”^[13]，明清时已成为广东主要人才和学风中心，地位仅在珠江三角洲之下。至潮汕音乐、戏剧更以独特风格著称。近代汕头开埠，在古老文化基础上，输入和融合外来文化因子，加速了本区近代文化的进程，形成作为近代经济投影的文化象征，包括设置海关、领事馆、教堂、医院，兴办近代工业和公用事业等，潮汕也是中西文化接触交流的一个重要基地。

潮汕与闽南地理上本为一体，“而与汀、漳平壤相接，又无山川之限，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言又与漳泉二郡通”^[14]，风俗文化与闽南实属同一群落。除了语言、饮食、服饰、丧葬具有福佬人共同特色以外，这里宗教文化很兴盛，过去常有迎神、赛神、乡社集会等活动。乾隆年间，潮州府属九邑，有寺观 318 座^[15]，至今仍是广东宗教活动较活跃的地区和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主要根据地之一。

潮州是广东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而汕头则是近代兴起的港市，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粤东区域的文化特征。两城地理上很接近，实际上是一个组团式文化中心。

潮州在韩江三角洲顶点，西晋时为义安郡治，已成为粤东政治中心。唐宋时作为港口，外船可直航城下，商业文化相当繁荣，附近瓷窑栉比林立，名曰“百窑村”，所产各式精美陶瓷，被视为潮汕古代文化兴旺的标志，畅销西亚和东南亚各地。潮州港也是继我国“丝绸之路”之后的“陶瓷之路”始航港之一。至迟在宋代，潮州已经筑城，奠定了城镇文化基础。唐代兴建的开元寺和宋代湘子桥，乃岭南建筑文化杰作。唐代时潮州地

区仍很蛮荒,相继贬来的有韩愈、常袞、杨嗣复、李德裕、陈尧佐等,他们为中原文化在潮汕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也加强了潮州作为开疆文化中心的地位。明清时潮州城屡加修筑,城市规模和人口不断扩大,城市景观“不减上国”^[16]。许多风景名胜被经营为游览区,其中不少是文化创造的结晶,著名的潮州西湖即为一例。现在潮州被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处,省级11处,市级31处,仅从这些数字就反映了潮州历史文化的中心地位。迨至近代,一则韩江三角洲不断南移,潮州失去港口地位;二则汕头兴起,潮州文化中心地位逐渐为汕头所取代。不过汕头只是潮汕近现代文化的代表和中心,而古代文化中心仍存在潮州,两地成为福佬文化在潮汕平原上相互辉映的两颗明珠。

II-2 汕尾福佬文化亚区

本区含今汕尾市所辖海丰、陆丰和陆河县,以及汕头市属揭西、普宁、惠东一部分。东接潮汕平原,西邻东江下游,南临大海,基本上为群山环抱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单元。但本区大部分地区历史建置长期属惠州府辖,又是广州通粤东传统商路必经之地,颇受客家文化和广府文化影响,但这并不能改变其福佬文化特质,仍是福佬文化一个亚区。本区东部界线通过揭西、普宁和惠来西部。因为揭西县境大部分原为揭阳县地,小部分为陆丰县地,考古发掘谓揭阳故城即在河婆镇^[17],为潮汕最早开发地区之一;普宁过去属“潮郡诸邑,大约与三阳、澄海同(俗)”^[18];而惠来县,“原系惠潮二府属县分割成邑”^[19],“潮昔是为海滨邹鲁,惠亦被其流风欤”^[20],所以本区

东部不失为文化差异的一个过渡带。

本区仍操闽南方言，“海丰谓粥为糜，屋为厝，近潮多潮音，与闽漳泉相近”^[21]。但由于以上原因，其方言与潮汕也有小异，渗入客家方言和广府方言成份。例如这里的地名，除闽南语常见以厝、墩、汕等为首尾命名的地理实体以外，还有广府方言常见的坳、冲（涌）、浦（埔）等地名，以及客家方言常见的嶂、磔、墩、崙、背、峯等地名。近年汕尾设市，文化交流蒸蒸日上，已成为闽南语和粤语双方言交际城市。在风俗文化上，“按陆（丰）之岁朝伏腊，纳节时庆与通省同”^[22]，说明外来风俗或多或少冲淡其地方风俗色调。在宗教文化上，本区与潮汕地区一样，崇拜共同神祇。但本区是天主教徒在广东人数最多的地区，有 2 万余人，加上其他宗教，成为宗教文化在广东的重要中心之一。

本区地理环境比较多样复杂，沿海地区仰给于海洋，发展海洋文化；而内地台地、丘陵广布，水田面积狭小，稻作文化欠充，水稻人均占有量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唯番薯等杂粮在土地利用中占优势，“岗麓高坦，其所种植不过豆黍薯芋，以及姜、蔗、茶、盐之类，可补谷食之不足”^[23]，这种景观至今仍无根本改变，也是它异于潮汕平原特色之一。

位于龙津河畔、莲花山主峰不远的海城镇是一座千年古城，相传唐已筑城，后屡有兴废，明初始筑今城。自此“有城有池，而后民安于居，商安于市，士安于庠，兵安于伍”^[24]，发展为地方性经济文化中心。本世纪 30 年代广汕公路建成通车，处在这条东西交通于线上的海城镇，也就成了传递广府、福佬

和客家文化的一个中转站。附近有方饭亭、龙津桥、赤山塔、潮郡会馆等文物古迹。

三、粤东北——粤北客家文化区(III)

本区据有粤东北和粤北,是广东占地面积最广的一个文化区,包括梅江、东江和北江流域,基本上为客家方言覆盖地区。本区范围内交错分布着非客家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区,但它们作为语言板块或方言岛,深受客家方言影响,多数可以相互通话,文化上共同性也比较多,故仍可视作属同一个文化区。

客家文化发生于山区。一则广东山区自然和人文条件复杂多样,地区差异大;二则客家文化在各地发生早晚,景观类型和发展水平也不一样,所以在共同文化特质的前提下,仍有一定区域差异,据此可分梅州客家文化核心区、东江客家文化亚区和粤北客家文化亚区三大部分,组成客家文化在广东的空间体系。

III-1 梅州客家文化核心区

本区在梅州市范围,即过去所称嘉应五属梅县、兴宁、五华、平远、镇平(蕉岭),以及大埔、丰顺一部分,为客家人集中分布之地,几乎全是清一色客家人,也是客家文化的典型代表,同时发挥以梅州为中心的对外辐射功能,故本区堪为客家文化的核心区域。

客家人是入粤较晚的一个民系。至迟在西晋后期,永嘉乱

后,即有大批中原汉族迁入岭南,谋求安身立命之地。但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已为其他民系占据,客家人只能在山区寻求发展。由于梅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适中,可以兼控闽、粤、赣三省边区;地形上是个盆地,无论战守、交通和城建都非常有利,故能够比邻近地区更快和更稳定地发展起来。加之历史上不少贬谪岭南的官员取道梅州而下粤东,带来中原文化,加速了当地文化肇兴,在梅州出土的隋唐精美瓷器和铁器可为佐证。五代今梅州从程乡升格为敬州,铸造和建筑业都有发展,宋代周必大《续学记》碑记说:“南海属郡,潮为大,潮之属邑,程乡为大。”^[25]宋代入居梅州的客家人更多,但那里还很蛮荒,可供谋生门路狭窄,客家人于是发挥自己固有文化优势,以读书作为将来谋生求出路的一种手段,读书求知识乃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光绪《嘉应州志·礼俗》引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云:“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可见州之士喜读书自宋已然。”此风俗一经形成,历代不衰,也是梅州自宋以后能成为“文化之乡”的重要原因。明代梅州人口增加,大量土地被开发,以梯田为主的农业文化和以刻苦耐劳著称的客家人精神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清雍正年间,程乡脱离潮州,升为直隶嘉应州,完全确立了梅州在广东客家地区的区域中心地位。到清中叶梅州已出现地狭人稠现象。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一方面迫使部分人口外迁,客家文化随而向其他地区扩散;另一方面促使留在当地的客家人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也有大批人外出求学。乾隆《嘉应州志》说:“士喜读书,多舌耕,虽困穷至老不肯辍业。近年应童子试者至万

有余人。前制府改设州治，疏称文风极盛，盖其验也。”这种环境感应推动客家文化向着不仅持久，而且逐步增强的方向前进，反过来又强化了梅州作为这种趋势的中心地位。又梅州也是粤东北交通中枢，明清时代，部分广东商旅及当地应试举子常假道于此北上京师。梁伯聪《梅县风土二百咏》注云：“在昔海运未通，潮郡九属人上北京中原地方，由梅县经过，向江西大道而去。来往辐辏，市场热闹，百花洲尾花船群集，夜静笙歌声达十里外”^[26]，这是梅州作为区域文化中心的写照。由是梅州地区人才辈出，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据道光《广东通志·选举表》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清代梅州地区有进士举人凡 826 人，占同期广东同类人才总数 13.3%，仅次于粤中和潮汕地区，成为全省三大人才中心之一。鸦片战争以后，梅州与其他地区一样，陷人痛苦深渊。这时沿海和东南亚区域开发，为素以外出谋生为风气的客家人提供更多发展机遇，也给当地文化注入新成份，推动它向更高层次前进。这就是梅州作为华侨之乡的兴起和华侨文化的参与及其作用，造就了梅州客家文化的近代形态，这包括吸收更多当时的先进西方文化和其他域外文化，兴办各种产业、学校、医院、教堂等。特别是当地教育有长足发展，培养出更多人才，对改变人们世俗观念和社会文化景观，发挥很大作用，也标志着梅州客家文化走向高峰。但是，这是在新环境和时代条件下，由传统客家文化与新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具有更高层次和结构的客家文化，它拥有较高的文化势能，故不但是区域文化的重要特征，而且不断向外辐射，也是梅州能够成为客家文化核心区的重要原因。

梅州客家文化对外辐射,还在于梅州在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是客家人进出的一个中转站,不少客家人从这里辗转迁移粤北、粤中和其他山区。例如英德“至明成化间多有自闽及江左来人籍者”[27],他们不少人是取道梅州过去的。所以,梅州成了客家文化第二个源头,承担向外传播自己固有文化的特殊任务。随着这种传播距离越远,客家文化内涵一致性渐渐减弱。例如客家方言是以梅县为代表的,但到连平、和平、龙川、河源东江地区已产生差异;再西到从化、花县、清远,西南到增城,即与粤语混合;东抵饶平、南过揭西、丰顺即与闽南语混合,形成双语流行地区,也是不同民系文化交汇地带,对客家文化而言,这是它的边缘地区了。

客家文化源头虽在中原,但自进入岭南,与当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相感应,在许多方面发生变异,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文化风格,梅州即为其典型区域。这包括了山区梯田文化,形式多样、风格特殊的客家民居,即客家大屋;在精神文化方面,除形成客家方言和读书求知的社会风气以外,还保持着极浓厚的家族观念、宗法观念和传统道德观念,在艰苦创业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客家人自信自强、克勤克俭的性格和风尚,特别是客家妇女的勤劳能干和无私奉献的美德,以及人际间互助互爱精神,“乡中农忙之时,皆通力合作。惟聚族而居,故无畛域之见,有友助之美”[28],都受到社会各界一致公认。还有多姿多彩的客家山歌,以梅县为其发源地,形成人人会唱的社会风气。客家汉剧、山歌剧、山歌舞以及年节各项乐俗活动等,都有鲜明的客家地方色彩。此外,尚武、爱整洁、烹调客家风味菜

看等,梅州都有其地方代表性。当然,在风俗文化上,梅州也盛行二次葬和厚葬,残存着买卖婚姻、童养媳等现象;在宗教文化上,梅州也是西方宗教较早布道的地区之一,现是天主教在广东的中心之一,民间宗教和迷信也还有一定势力。在华侨文化上,过去华侨兴教办学的业绩堪为后人赞仰,而现在梅州几乎每处都有华侨捐建的校舍、仪器以及其他文化娱乐设施等。然而本区最本质的区域文化特征,依然是山区农业文化和建筑文化景观,教育、人才、学风和传统道德。尤其是梅州作为文化之乡,经济虽不及珠江三角洲发达,但群众文化水平普遍较高。据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这里大、中、小学文化程度人数约占总人口 70%,仅次于佛山地区,居全省第二,而每千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者为 3.76 人,又居全省各地区之首^[29]。这笔宝贵的人才和智力资源,过去使梅州获得“人文秀区”称誉,现在也必将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推动本区经济文化走向繁荣和兴旺。

位于梅江和程江交汇处的梅城,是一座有 1400 多年历史的古城,从南齐程乡县治到清嘉应州治乃至现在梅州市,历为粤东北行政中心和交通商业中心,也是客家文化中心。这里有晋代古窑,梁代大觉寺,唐代灵光寺,南汉州署、千佛塔,宋代学宫,明清官衙、书院、亭阁等历史文物古迹,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地方文化发展断面。特别是城市教育事业很发达,法国天主教神父赖里查斯在梅县传教 20 余年,他在 1901 年所著《客法词典》中说:“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中(按指梅城),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学生的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

一半。”本世纪 40 年代,梅县有 34 所中学,普及中学教育为全国之冠,梅城为当地人才的主要摇篮。又由于梅城馆毅粤、闽、赣三省边境交通,而这些地区都是客家人聚居的大本营,故梅城不但能够成为客家文化荟萃之地,而且也是客家文化一个辐射之源,影响广及粤东北、闽西和赣南地区。

III-2 东江客家文化亚区

梅州是客家文化荟萃之区。客家文化向外扩展的第二线便是东江和北江流域,分别形成客家文化两个亚区。在东江流域者约今惠州地区辖境,大体上介于九连山与莲花山之间,为粤东岭谷平行地区一部分,相当于清代惠州府大部分疆域。包括今惠阳、惠州、惠东、博罗、紫金、河源、龙川、和平、连平等县市。

东江旧名龙川水,在客家文化覆盖本流域之前,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地区。博罗、惠州一带,战国时有个缚娄国,应为南越族人某个部落;在这一地区出土的以夔纹为特征的陶器,与楚国产品相似,可见先秦时楚、越文化已在当地立足;秦汉在岭南所立郡县,在东江流域就有龙川、博罗(时称傅罗)两县,辖境广及流域大部分地区。赵佗随秦大军人岭南,初为龙川县令,在那里筑城、打井,即今佗城;中原居民亦有入居龙川,如龙川霍山,“秦初有霍龙居之因名”^[30],这恐是北方移民定居东江流域的最早记载。中原文化随之而在当地传播。但土著居民或境外来的少数民族仍是当地居民主体,主要是畲人和瑶人。东江流域至今是广东“畲”字地名分布较广的地区,还有很多“文字……不特如峯、稔、圳、涌、埕、墩、榻之不类,……

皆为土字”[31]，也是土著文化表现。又例如瑶人，“宋始称蛮，其在惠者俱来自别境，椎结跣足，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为拳，故称瑶所止曰拳”[32]。《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条称，“博（罗）邑万历以前，民皆地著，土旷人稀”。大抵宋代以前，东江流域仍保持这种以土著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现象。

东江上源有寻乌水，为粤赣交通孔道，历史上中原移民有一部分由此南下，定居于东江流域。另外，从福建汀江入韩江，溯梅江上源，过大帽山蓝关，亦可抵龙川，下东江以至于广州。这种交通形势到唐末五代第二次移民高潮得到进一步利用，一部分客民进入河源、惠州和韶州；宋元之际，在第三次移民高潮中，一部分客民由闽西先迁梅州，再西迁龙川、紫金、河源以及粤北各地。至此客家人渐渐成为当地居民主体。此后也不断有外地客家人入居，“旧俗惠民多居南雄”[33]，直到万历“戊申己酉间（1608—1609年），兴宁、长乐（五华）之民，负耒而至，无援无节。邑人摈之。当事者谓，兴、长稠而狭。……自是两邑之民，鳞集拱布。闽之汀、漳亦间至焉，流寓与地著杂处”[34]。客家文化占了上风，并继续加强，成为东江文化主体。例如宋代惠州采冶业和陶瓷业很发达，乃客家文化占领当地的结果。

本区文化特质与梅州基本上是一致的。“盖梅循（惠）接境，其人多由江、闽迁来，故风俗相同”[35]，但一则本区与客家文化策源地毕竟有一定距离，二则与文化势能很强的广府文化区为邻，同时也接受福佬文化和江西文化影响，故其文化特

质与核心区也有小异,也是其自成一亚区的原因。明王士性指出:“惠州诸邑皆立于南支万山之中,其水西流入广(州)城以出,则惠真广郡也。……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36]“大都归善(惠阳)、河源、龙川,其音轻以柔,博罗重以急。……和平谓父为亚公,风气与赣州近,语稍类赣。”[37]语言上的这种差异,使得客家方言在东江流域被分为粤中片和惠州片,其韵尾不同于梅县标准客家话。此外,本区还有客家话与广州话和闽南话交错分布地区,语言景观就不是纯客家话了。又珠江三角洲地区常见的粤语地名,如沥、瑚、潞、涌、埔(埗)等,也会在本区南部出现,其中惠州有沥林、横沥、下沥,惠东有长沥、后沥,博罗有茜沥、赤沥,龙川有沥口,博罗有瑚虾、潞虾、下瑚等,而这类地名在梅州地区几乎绝迹,这显系受广府文化影响所致,也是与梅州地区文化有差异在地名上的反映。

东江重镇惠州,扼东江流域水陆交通要冲,又是广州东南屏障,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被称为“岭南名郡”。城内外众多名胜古迹,如惠州西湖、泗州塔、六如亭、东坡纪念馆、元妙观等,反映惠州历史文化风貌。自客家人成为东江流域的居民主体,这里也发展为客家文化荟萃地之一。现在惠州经济正在崛起,各地移民云集,正变为一座以客家文化为主,兼具广府文化和福佬文化特点的多元文化中心。

III-3 粤北客家文化亚区

本区包括北江及其支流连江、浈江、武江、翁江和琶江等流域覆盖地区,含南雄、始兴、翁源、仁化、乐昌、曲江、韶关、英德、清远、乳源、连县、阳山、连山、连南、佛岗、新丰、从化等县

市,是客家文化在广东占地最广的一个文化亚区。

本区位处于广东北部山区,自然条件复杂,民族成份也较多,特别是横亘北部的五岭山地,不仅是一条自然分界线,也是一条文化分界线,历史上岭北文化假道五岭间通道南下,与土著文化相结合,使本区文化一开始就具有类型多的特点,著名的北江文化就是这样形成的。秦汉进军岭南所走路线大部分经过本区,包括萌渚岭道、都庞岭道、骑田岭道和大庾岭道等。中原北方移民首先在这里落脚,传播中原文化。连州盆地即为汉人移人较早区域,首先采用中原传来的农耕技术。秦汉时,为了加强对岭南控制,连州、乐昌和坪石盆地等被划入长沙郡,南雄盆地则划入九江郡;南越国时代,连州盆地不在南越国版图,而属长沙国管辖。所以北江文化除了吸收中原文化以外,还深受楚文化影响,同治《连州志·疆域》云:“州地界荆湘,山连韶石,故其风俗好尚,多与相类”。唐人刘禹锡谪连州刺史,“观民风与长沙同祖习”^[38]。又由于交通关系,南岭古道沿线,形成许多城镇、关隘,也成为不同文化荟萃、传播基地。例如乐昌峡南口的任嚣城,今仁化城口附近的赵佗城,连江上的阳山关(在阳山县城西北),湟溪关(在今英德连江口与盲仔峡附近)和横浦关(可能在今始兴县城西北浈江与墨江汇合处)即属其列。此外,粤北民族成份很复杂,除了汉人,还有瑶、壮、畲人,少数民族文化也占一定地位。这都使本区文化类型复杂多样,内涵丰富。北江文化与西江文化一样享有盛誉。唐宋连州“人物富庶,商贾阜通,常有小梁州之号”^[39],后同治《连州志》称“连之文物媲美中州,则禹锡振兴之力居多”。韶州

附近曲江南华寺，为惠能发迹和埋骨之地，素有“祖庭”之称，佛教文化圣地之一。而自张九龄开凿大庾岭山道以后，南北文化交流更为繁盛，不少身穿奇装异服的外国人也假道北上，给本区增添了许多域外文化色彩。大抵宋代以前，粤北社会经济在岭南的领先地位，保障了北江文化的优势和发展。

虽然历史上客家人不止一次人居粤北，但直到宋代，客户占总数比重仍很低，如据《元丰九域志》韶州为7%、连州为17%、南雄州为8%，所以客家文化未能在当地取得主导地位。直到明清时期，粤北经济优势地位已被珠江三角洲取代，客家人更多地从赣、闽、粤东迁来，占领广大山区，客家文化至少在人口比例和空间上渐渐占了上风。例如在南雄一带，“世家巨族，多由珠玑巷而徙居，意者地瘠，而冲自北而来者，不少望南而去亦多。而今殊不尔矣，烟村鳞接，考其先进来自岭北者，十之九宅而宅，田而田，安土重迁，各有世业，以长子孙”[40]。在英德，“明初地少居民，至成化间多自闽及江右来人人籍者，习尚一本故乡，与粤俗差异”[41]。在本区与东江客家文化亚区分界的新丰，“语有两样，一水源音，一客家音，传说开建之始祖，自福建而来，则客家音；自江西而来，则水源音。今各随其沿下来，不拘泥”[42]，有人估计，明清广东人口流向山区者，主要向梅州、南雄州、韶州和惠州，其中迁人南雄和始兴者，江西人占一半，福建人占二成[43]。客家方言、习俗、聚落建筑、土地利用方式和景观等随之而在山区扩布，成为那里主要的文化类型和格局。但是，在一些较大的城镇和交通口岸，一方面客家人人居较晚，人数不多，难以改变当地先人为主的

文化特色；另一方面，随着近现代交通发展，特别是京汉铁路通车，南部强大的广府文化节节北移，很快推进到沿路各城镇，岭北文化也取道南下。它们带有较强的商业文化特点，孕育成长于山区的客家文化在这里难以取得支配地位，结果形成相互兼容共处的局面。所以韶关、英德、南雄等城镇通行多种方言。粤北土语也很庞杂，有些支系不明，夹杂着不少湘、赣方言。加上少数民族文化板块镶嵌其间，构成以客家文化为主，广府和土著文化在部分地区占优势的分布格局，粤北由此成为广东文化区划体系中最突出的一个地区。

粤北各地环境差异颇大，古今文化景观也不尽相同。交通闭塞的山村，“习尚简朴，不事纷华，俗重稼穡，山泽无禁，耕樵织红，可以自给。山谷之民，有老死不见官府者”^[44]，诸如信巫和风水，尚鬼、早婚、病不求医药等过去很盛行，现在仍存于少数地区，过去许多山区实行刀耕火种，瑶、壮地区尤甚，现只在个别地区存在。即使在交通路网沿线，也由于商旅过境而不留，某些地区土著文化少受冲击而长存下来。例如南雄地区，“虽为冲要之区，尚留余古之气”^[45]。又粤北岩石裸露石灰岩分布很广，用水很困难，旱作农业为主，多种玉米、谷子等杂粮，村落稀疏；稻作只在水源充裕的河谷盆地比较发达，那里城镇村落也颇稠密，山地则是广东主要林业基地。粤北还有不少矿场、冶炼厂，散布在山区或城镇，是广东采冶工业聚落比较集中的地区。而今粤北除韶关市以外，其余地区人口文化程度都普遍偏低，与海南地区一样，是广东文化落后地区之一。尤其在阳山、连县、英德、乐昌等石灰岩地区，文盲和半文盲充

斥,其中大部分又为妇女。据报道,英德县青坑乡近 1.6 万人口只有 8 个高中生,该乡一间小学有 160 名学生,女生只有 8 人^[46]。类似情况当不在少数,这是与客家文化传统相悖的。

粤北自然风光秀丽,文物古迹众多,更有客家人和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美和人情美,构成丰富的旅游资源。经过古今开发经营,已形成比较发达的旅游文化,著名曲江“马坝人”和石峡文化遗址、南华寺、南雄珠玑巷和大庾岭古道等,皆为岭南历史文化的瑰宝。

韶关扼浈、武二水要冲,京广铁路纵贯,水陆交通十分畅便,历为五岭南北文化交流枢纽,从早期的中原文化、楚、越文化到后来的客家文化、广府文化,以至近现代的湖湘文化等都在这里交流、融合。韶关作为一座多元文化古城和粤北文化中心,正肩负着振兴北江文化传统,建立新的区域文化网络,辐射粤北和湘南的历史重任。

四、琼雷汉黎苗文化区(IV)

琼雷是我国最大热带区域。在热带条件下产生的文化景观在许多方面异于其他地区。虽然两地大部分居民操闽南方言,与福佬民系居民有很深的文化渊源,但这些来自闽南和粤东等地的移民到达新居地后,一则不可避免地受当地文化浸染和采取适应新环境的文化模式,二则他们源地的文化也在发展变异,所以在新条件下产生的琼雷文化有自己的文化特质和风格,与粤东福佬文化有一定距离,加上海南少数民族文

化存在,更加强了其地域文化个性,而自成一体。然而,琼雷汉文化的源头之一又在闽南和粤东,从文化类型而言,可视为福佬文化向外延伸的一部分。作为其文化特质代表的文化核心区已在潮汕,故本区不单独划分文化核心区,而根据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差异,分为两个文化亚区。

IV-1 琼雷汉文化亚区

包括雷州半岛之遂溪、海康、徐闻、湛江,海南琼山、海口、文昌、定安、屯昌、琼海、万宁、澄迈、临高、儋县,以及昌江、陵水、东方、乐东,三亚一部分,即环岛使用汉语地区。所用汉语方言有海南话、临高话、儋州话、村话、军话、广州话等,语言至为复杂,个别话种甚至不能与别的通话,但文化上的共同性毕竟是主流,故能整合成一个文化区。

琼雷为海洋包围,海洋环境成为本区文明的一个摇篮。古代土著居民使用独木舟或竹筏横渡海峡或北部湾,踏上海南土地;沿海居民捕捞水产,大量贝丘遗址留下古时代海洋文化佐证。秦汉时代,我国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北部湾海域,其始发港徐闻、合浦港在雷州半岛南端和北海湾附近,本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农史工作者认为,海南最早种植的棉花和蚕桑是假道海洋从印度和越南传进来的。宋代以降,闽潮移民大量入居本区,许多人从事海上贸易,商业文化在沿海地区发展起来。为了祈求海上航行安全,沿海多建海上保护神天后庙,香火颇盛。这不仅是海洋文化一种折射,也是福佬文化转移本区的直接表现,因为天后(妃)传为福建湄洲岛人,最先为闽人崇拜的女神。近世海禁既开,琼州(海口)和广州湾

(湛江)相继开埠,海洋经济成为本区经济的一根支柱。清代广州有著名十三行,其来源一说是琼货买卖之地,因琼州领十三县而得名。在今天海洋时代,琼雷所拥有的大片海域及其包括的以油气、水产为主的海洋资源,已成为本区物质文化类型和模式选择的一个主要方向,海洋文化将成为琼雷区域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

开发热带自然资源和适应热带地理环境所采取的方式是琼雷热带文化的主要内涵,包括土地利用类型,聚落布局,建筑形式,乃至饮食、服饰和风俗等。为了驱除热带森林瘴气和取得耕地,古代人们实行刀耕火种,甚至今天仍然残存;本区大部分地区缺水干旱,水田不多,稻作文化起源很早但不发达,旱地梯田成为农业土地利用的主要类型,旱作文化很兴盛,广泛种植薯、粟、旱禾和其他杂粮,并成为当地居民主粮,人们长期过着“薯蕷为粮,杂菜作粥”^[47]的生活。旱作单产一般都很低,本区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缺粮,故食粥又成为饮食习惯,当然这与炎热气候也有关系。这里大片台地、荒坡和沙地,适宜椰树、槟榔等热带作物生长,故驯化和种植热作也是土地利用的主要方式和景观,椰文化和槟榔文化风靡海内外。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橡胶、咖啡、胡椒等种植园已成为本区热带农业土地利用主要类型和景观群落。众多的农林场即为热作文化赖以发展的空间和社会组织形式。适应热带高温、强光、台风、暴雨等条件,本区聚落多布局于隐闭条件较好的地形上,或环绕以防护林带,民居矮小;人们衣着简单,就地取棉、麻、蕉、葛等纤维作衣料,戴斜斗笠,竹帽惯涂桐油,向以牛车为普

通运输工具,牛马也套上掌垫,充满特殊的热带风情。

琼雷地处祖国边陲,古代被人视为畏途,它们的开发浸渍着各民族人民的汗水。所以琼雷文化也是一种开疆文化。它既指汉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也有名家流寓人物对发展琼雷文化的贡献,同时也包括近现代农垦、矿业和盐业等事业的成就。特别是本世纪60年代以来,大批来自大陆城市的知识青年奔赴琼雷农村,开垦出大片处女地,使之披上绿装,建立了许多聚落、水利工程、学校,兴办教育,传播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对改变当地文化景观作出过重要贡献。儋县白马井、伏波庙、海口五公祠、海康十贤祠、昌江石碌铁矿、乐东莺歌海盐场,以及许许多多的橡胶园、咖啡园等,无不铭记着开疆文化对发展琼雷文化的历史功绩。

琼雷海岛和半岛地理位置,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反而加强了自己封闭性的一面,少受外来文化冲击,故能保持较多的传统文化风貌。例如直到建国前,海南很多地方仍实行六进制,“其数用六,……以六文为一钱,六十文为一两,六百文为一贯,……皆秦旧俗也”[48]。迷信风气盛行,根深蒂固,相沿成习,如:“雷俗崇信巫覡,陬澨之间,丛祀迭起,溯其由来,茫无援据面泯”。“正人君子明知其非,不能变其俗”[49]。宗教文化得以大行其道,过去海南寺观庵庙很多,建国后绝大部分被拆除,但在雷州半岛却保存尚好,或近年得到恢复,至今仍是佛教和天主教在广东的中心之一。

琼雷文化基础浅薄,水平也较低,除明代海南有过短暂的人文肇兴以外,余皆寂寞,是广东教育后进、人才短缺的地区。

建国后主要是农垦事业发展,吸收一些人才到来,但尚未能改变本区人才地位。只是近年海南设省,兴办经济特区,才引发人才流动高潮,有“十万人才过海峡”的佳话。但要从根本上提高本区人口文化素质,仍要在教育和其他文化建设上倾注更大努力。

由于琼州海峡的阻隔和分割,本区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中心。琼山长期为琼州府治,知名度大,文物古迹多,为海南历史文化的摇篮;而海口历史上是个港市,移民文化荟萃之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被辟为商埠,渐渐兴起为一座近代化城市。大陆文化、西方文化、华侨文化与当地文化在此交融整合,成为海南近代文化代表。实际上琼山和海口地理上自古就是一体,文化功能既有分工又相互补充,共为海南文化中心。近年随着海口升格为海南省省会和市区范围扩大,两地文化空间组合关系更加紧密,除了历史文化的界限,已很难划分现代文化的畛域了。

雷城镇旧为雷州府治。嘉靖《广东通志》曰:“汉徐闻旧县,即今雷州府署”,是一座千年古城,城内人文蔚盛,有三元塔、天宁寺、西湖、十贤祠、浚元书院等文物古迹,集中了雷州文化精华,现在雷城镇已被定为广东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IV-2 五指山黎苗文化亚区

在海南岛中南部,五指山地区,包括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各县市。五指山区内有山地、丘陵,不少盆地和河谷错落其间,植被茂密,自然资源很丰富,但环境也很恶劣。海南原始居民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在山区一些盆地、河谷上定居,它们也是

岭南远古文明的一个亮点。西汉初,黎族先人开始从沿海退入山区,这个过程到元代基本完成。原先在沿海发生和成长的土著文化偏离了汉化轨道,不得不在山区重新发展起来,嬗变为黎族文化。明中叶,苗族从广西入居,带进和发展本民族文化。黎苗族长期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民族文化日渐趋同,并在不同程度上被汉化。但直到建国前夕,黎苗族还停留在低级社会发展阶段上,甚至保留较多的原始社会残余,文化形态也很原始落后,堪为人类原始文化博物馆。

大抵从宋代开始,黎族才广泛使用铁器和牛耕,开辟部分水田,耕耘农业有一定发展。稻作文化主要发生在一些水源充足、灌溉条件较好的盆地,所产黎米甚至外运,接济境外。而广为流行的仍是游耕农业,即刀耕火种,当地称“砍山栏”。山栏文化成为黎族农耕文化的主体。这种原始的文化形态发生在山区封闭环境里,长期得不到进步,在某些地区甚至流行至今,成为当地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根源。新中国成立后,农垦事业在海南节节推进,以橡胶为主的热作在五指山区大面积推广,出现大片胶林,许多农林场成为开疆文化在本区的主要根据地。另外,建国后发展起来的灌溉事业也使水田从谷底或盆地上升到冲积扇或台地,梯田文化占据越来越广的空间。

黎苗区聚落很分散,多为孤屋或小村,主要坐落在地势比较平坦的河谷阶地上,个别在山腰,以竹木茅草构成,有船形屋或金字屋,乃古越人“干栏”屋的发展形式。不过现在这些建筑很多已被瓦房取代。

本区有特殊风俗文化,黎族操属壮侗语族的黎语,苗族操

属苗瑶语族的苗语。不过他们一般都会讲海南话。而聚居三亚的回族则讲属南岛语系占语群的回辉话,并保持回族特有的伊斯兰风俗文化。黎苗地区有很多以抱、板、什、滴、番等为起首的黎语地名,具有特殊含义。黎苗族妇女地位一般都比较高,过去一些黎峒,系由女子领导。例如北宋崇宁中有一个女酋长王二娘“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50]。以前黎族妇女文身,现仍有残余。此外,黎、苗族在饮食、服饰、丧葬、岁时节日、宗教等方面都各有自己民族特色,形成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群落。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原因,黎苗地区教育落后,文盲和半文盲很普遍,人口出生率也很高,迷信和巫术流行,一些陈规陋习还有很大势力。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素质,是本区文化建设的一项长期性任务。

五指山区过去长期处于蛮荒状态,不存在任何文化中心。建国后在原始聚落基础上崛起的原自治州首府通什,是一座美丽山城。其文化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已初具规模,原自治州民族博物馆,集黎、苗历史民族文化之大成;反映黎苗族风情民俗的旅游文化也比较齐全和活跃。通什已成为五指山区民族文化中心。

注释:

[1] 光绪《番禺县志》卷 10。

[2] 《名城广州》第 7 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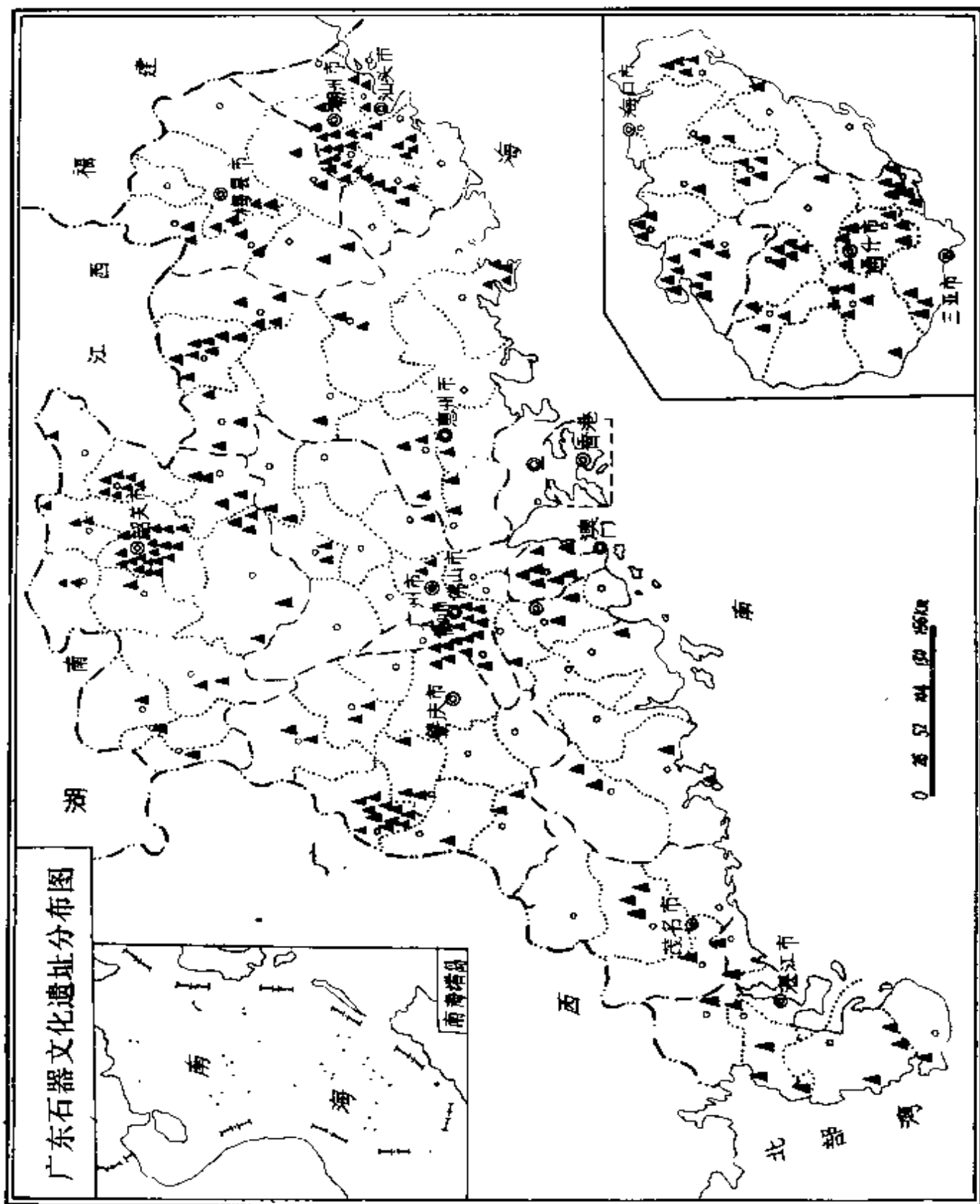
[3] 《广州的文化风格》第 110 页,广州文化出版社,1988 年版。

- [4] 道光《肇庆府志》卷 3, 风俗。
- [5] 道光《肇庆府志》卷 3, 风俗。
- [6] 道光《肇庆府志》卷 2。
- [7] [8] [9] 光绪《高州府志》卷 3。
- [10] 《岭南丛述》卷 28。
- [11] 《岭南丛述》卷 32。
- [12] 《潮州三阳志辑稿》卷 12。
- [13] 《元一统志》卷 9。
- [14] 王士性:《广志绎》卷 4。
- [15] 乾隆《潮州府志》卷 12, 风俗。
- [16] 王士性:《广志绎》卷 4。
- [17] 参见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文博》1983 年第 2 期。
- [18] 乾隆《普宁县志》卷 8。
- [19] 康熙《惠来县志》卷 4。
- [20] 康熙《惠来县志》卷 13。
- [21] 光绪《惠州府志》卷 45。
- [22] 乾隆《陆丰县志》卷 2。
- [23] 乾隆《海丰县志》卷 2。
- [24] 乾隆《海丰县志》卷 1。
- [25] 光绪《嘉应州志》卷 12, 古迹。
- [26] 转见徐俊鸣《岭南历史地理论集》第 128 页,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1990 年。
- [27] 同治《韶州府志》卷 11, 风俗。
- [28] 光绪《嘉应州志》卷 5。
- [29] 《广东山区国土开发与治理》第 108 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 [30] 巫荣等:《续修龙川霍山志》。
- [31] [32] [33]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100, 广东四。
- [34] 光绪《惠州府志》卷 45, 风俗。
- [35] 光绪《嘉应州志》卷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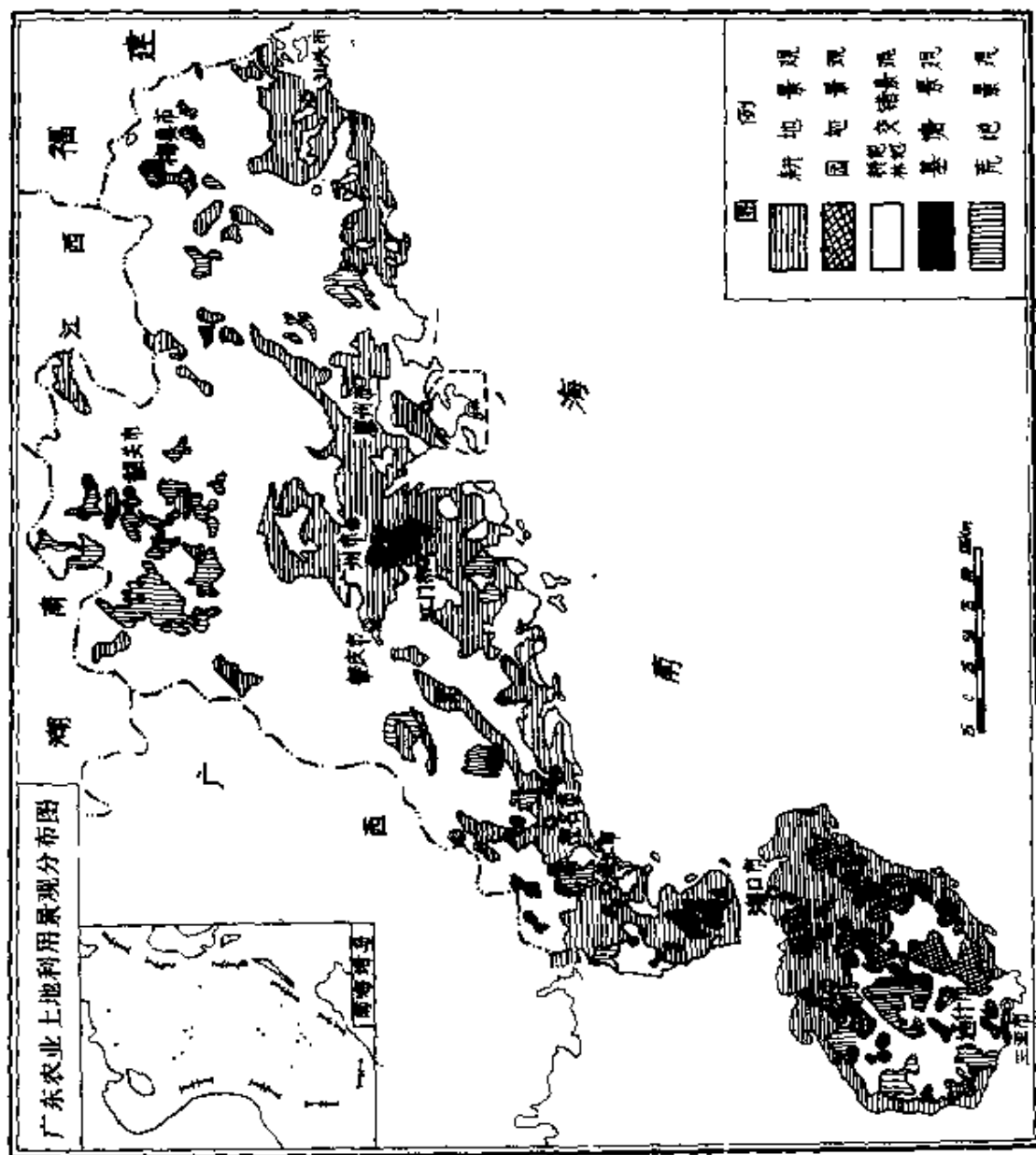
- [36] 王士性:《广志绎》卷 4。
- [37] 光绪《惠州府志》卷 45。
- [38] 同治《连州志》卷 10。
- [39]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 3。
- [40] 道光《南雄州志》卷 9。
- [41] 同治《韶州府志》卷 11。
- [42] 乾隆《长宁县志》卷 8。
- [43] 吴建新:《明清广东人口流动概观》,见《广东社会科学》1991 年第 2 期。
- [44] 同治《韶州府志》卷 11, 风俗。
- [45] 道光《南雄州志》卷 9, 形胜。
- [46] 《广东山区国土开发与治理》第 216 页, 广东科技出版社, 1991 年版。
- [47]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 124, 琼州。
- [48] 道光《琼州府志》卷 3, 风俗。
- [49] 嘉庆《雷州府志》卷 8。
- [50]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2。

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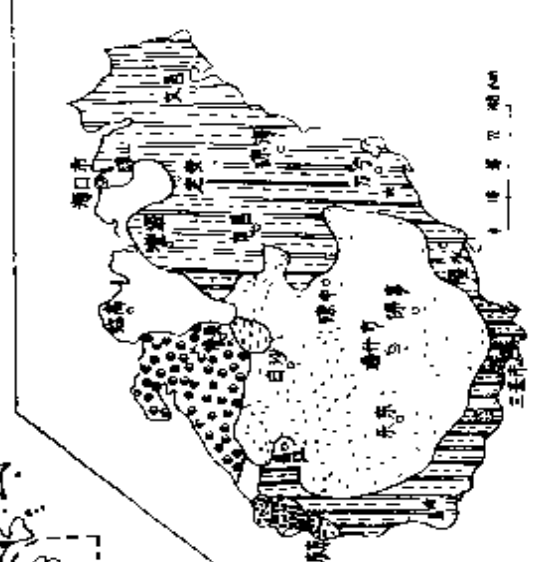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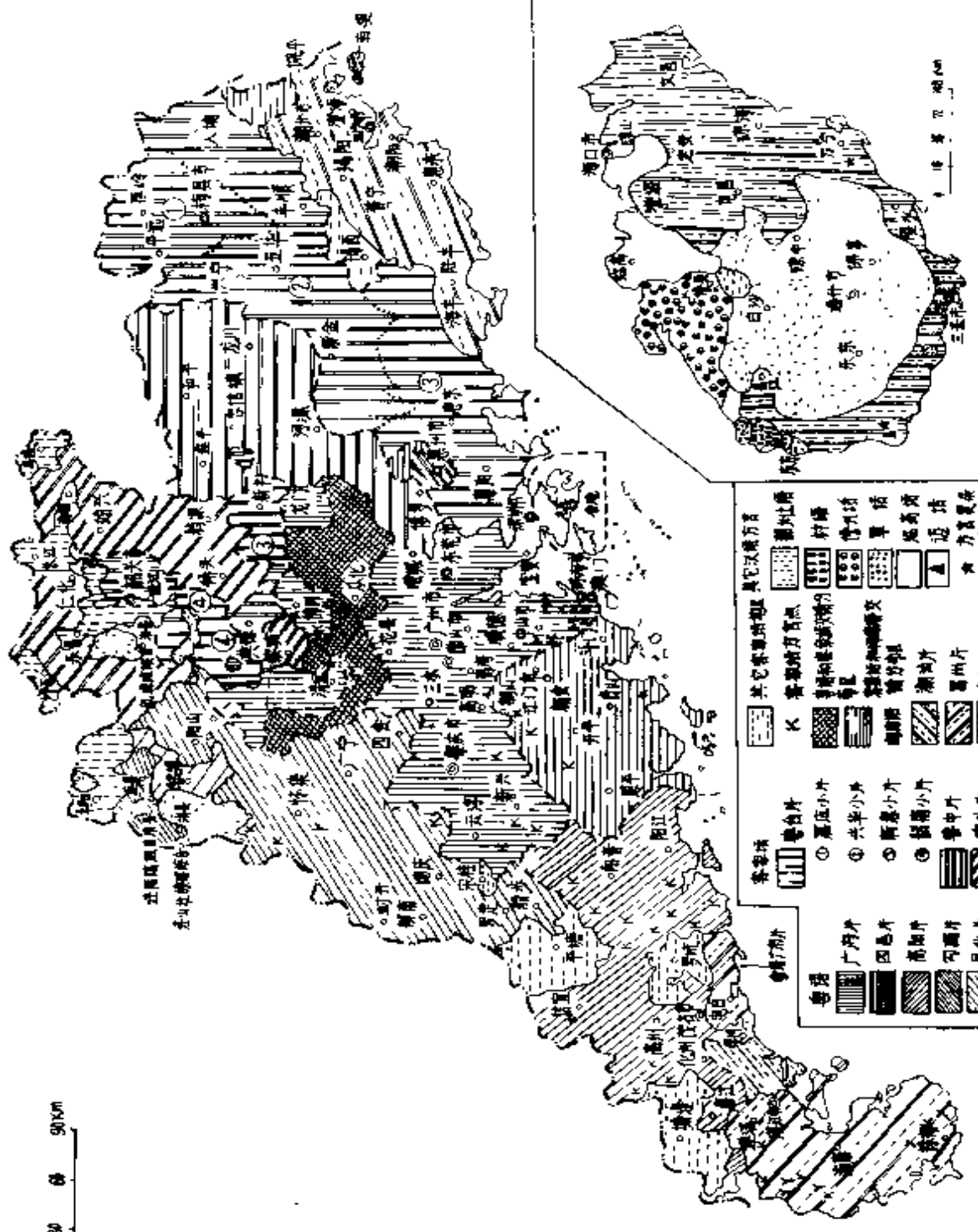
- 广东石器文化遗址分布图
- 广东农业土地利用景观分布图
- 广东省语言分区图
- 广东各类教徒分布图
- 广东壮语地名分布图
- 广东图腾文化地名分布图
- 明代广东举人进士分布图
- 清代广东举人进士分布图
- 广东大学文化程度人才分布图
- 广东文化区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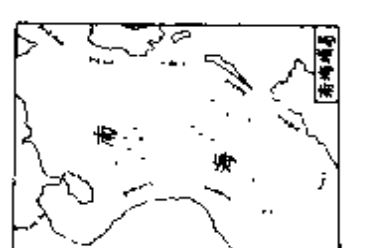
广东石器文化遗址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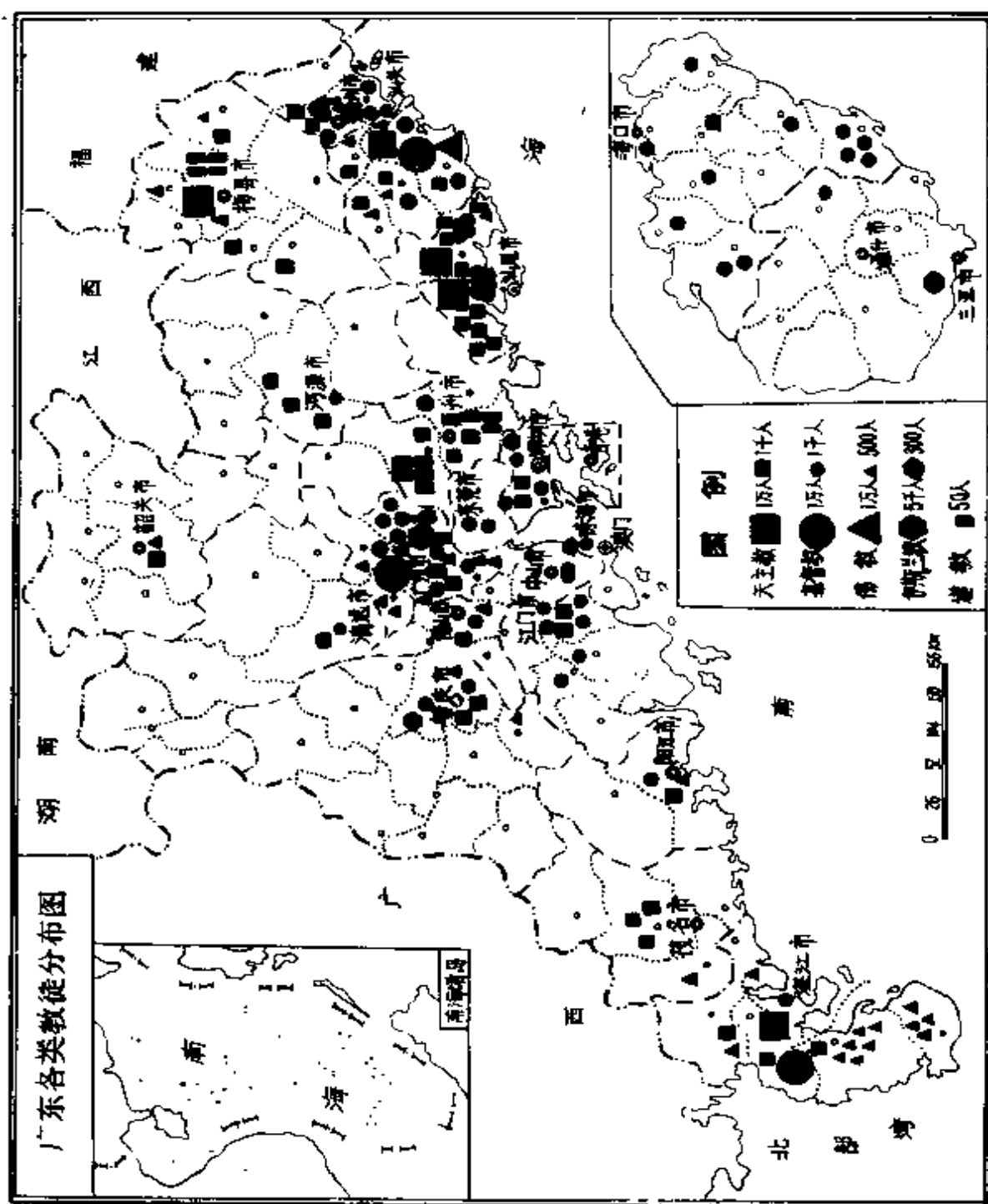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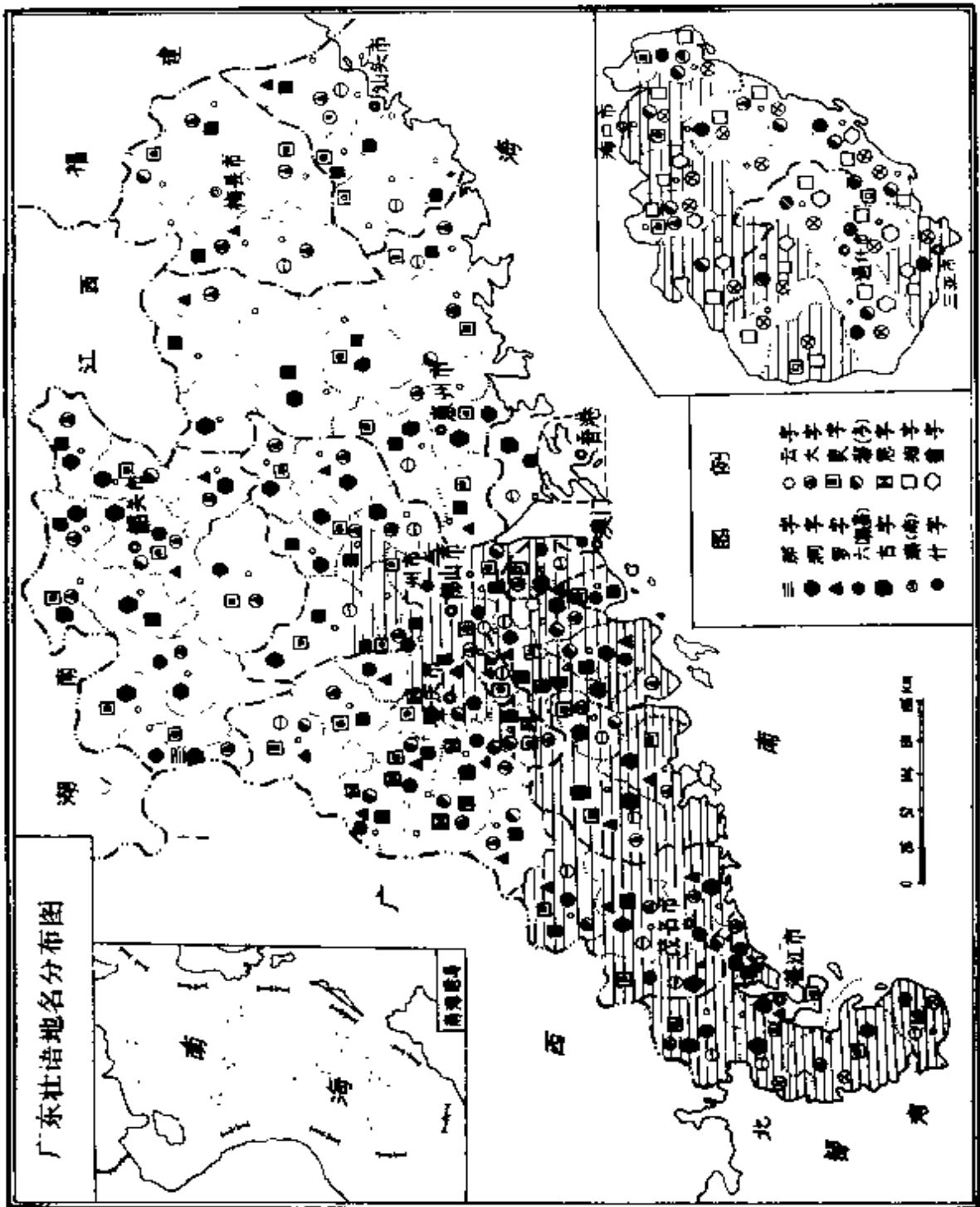
广东省语言分区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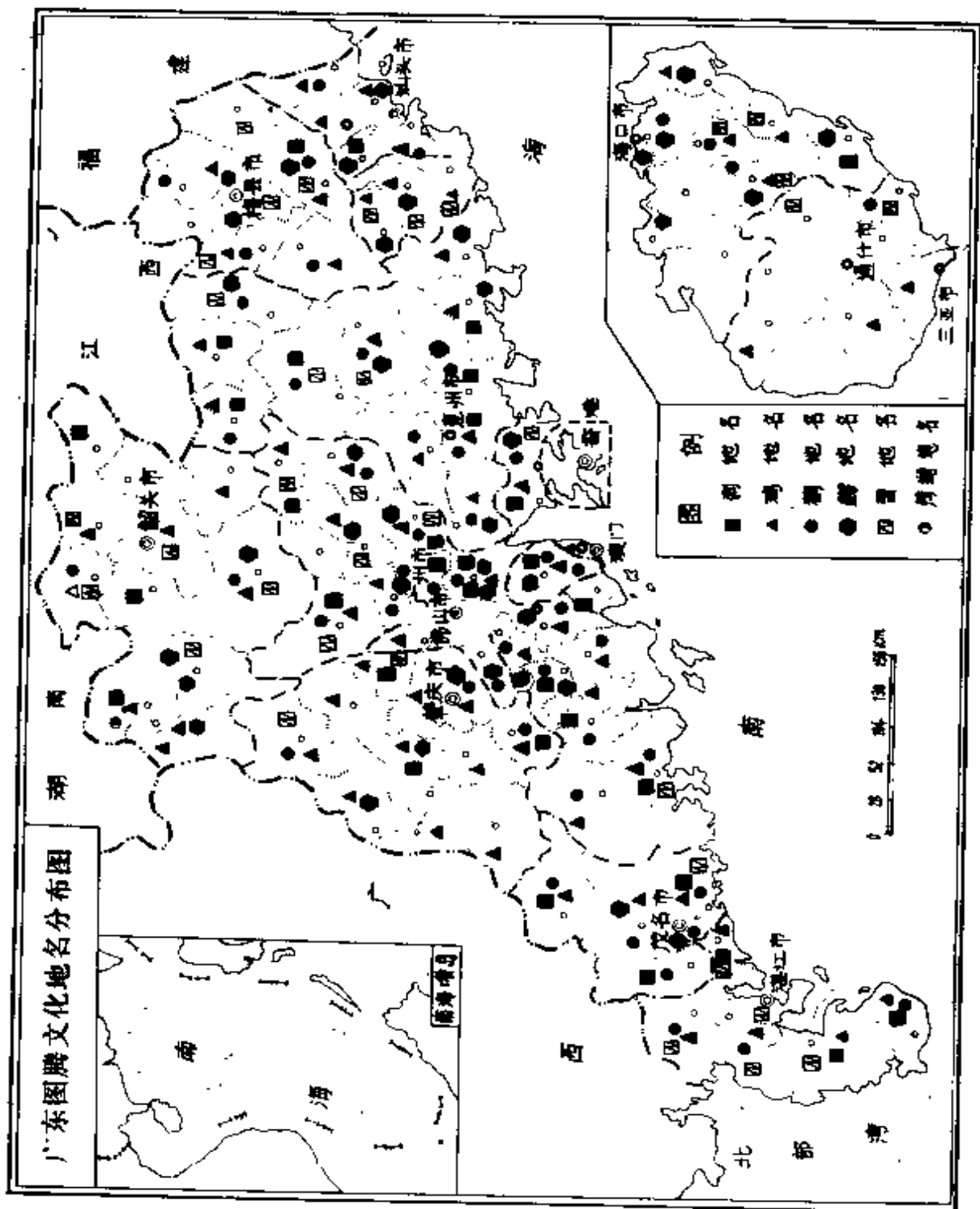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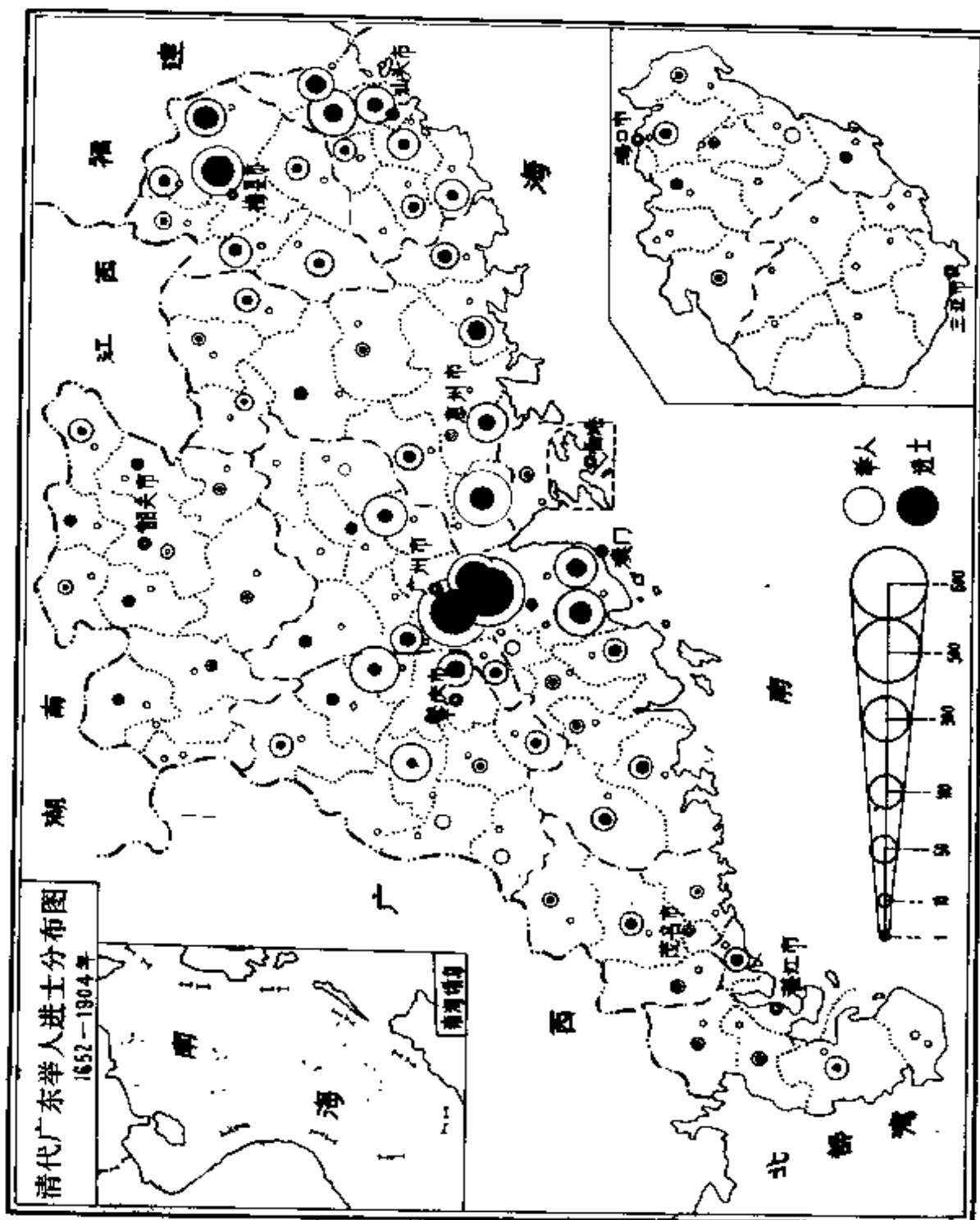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
| 客家话 | ① 粤东片 | ② 粤西片 | ③ 粤南片 | ④ 粤北片 | ⑤ 粤中片 | ⑥ 粤南片 | ⑦ 粤北片 | ⑧ 粤南片 | ⑨ 粤北片 | ⑩ 粤南片 |
| 其他客家话 | ⑪ 粤东片 | ⑫ 粤西片 | ⑬ 粤南片 | ⑭ 粤北片 | ⑮ 粤中片 | ⑯ 粤南片 | ⑰ 粤北片 | ⑱ 粤南片 | ⑲ 粤北片 | ⑳ 粤南片 |
| 其他汉语方言 | ⑳ 粤东片 | ㉑ 粤西片 | ㉒ 粤南片 | ㉓ 粤北片 | ㉔ 粤中片 | ㉕ 粤南片 | ㉖ 粤北片 | ㉗ 粤南片 | ㉘ 粤北片 | ㉙ 粤南片 |
| 其他方言 | ㉚ 粤东片 | ㉛ 粤西片 | ㉜ 粤南片 | ㉝ 粤北片 | ㉞ 粤中片 | ㉟ 粤南片 | ㊱ 粤北片 | ㊲ 粤南片 | ㊳ 粤北片 | ㊴ 粤南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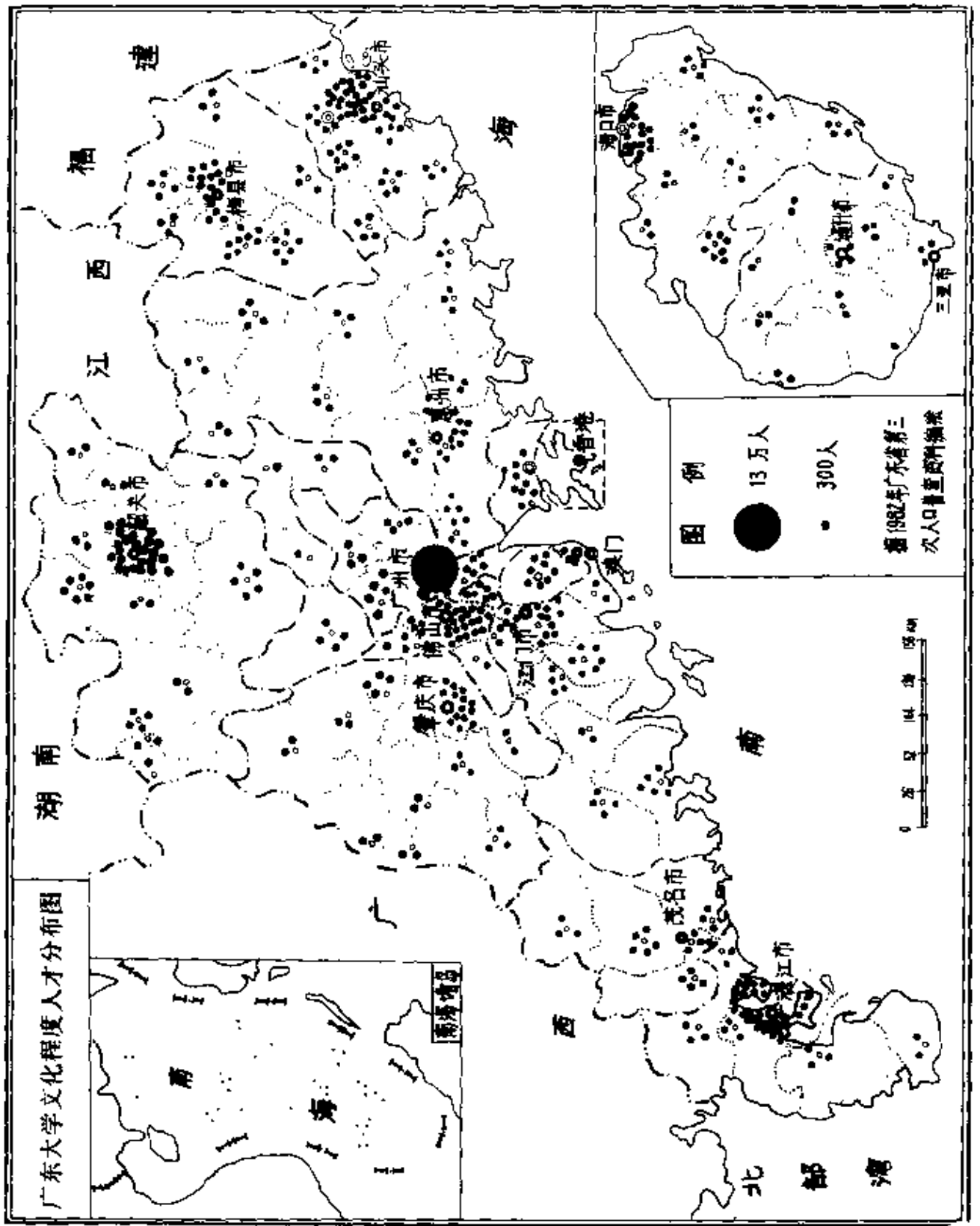












广东大学文化程度人才分布图

图例
 ● 13万人
 ● 300人
 据1982年广东省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编绘

0 25 50 100 150 km

